

领袖  
同志

广交朋友

良师益友



周恩来

红旗出版社

## 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 总理与爱国老人沈钧儒

沈钧儒，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清末进士，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一生追求真理，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从事革命工作。他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靠拢党，相信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真心实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坚持革命的原则性。他的思想所以能够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其中共以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远，沈钧儒与周恩来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彼此肝胆相照，结下了极为亲密的革命友谊。

沈钧儒与周恩来的初次晤面是在南京，时间是1937年夏。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6年5月，沈钧儒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会正式组成，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因而更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摧残和迫害。11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被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的6项条件中，第二条即为“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这里提到的“上海爱国领袖”，就是指“七君子”而言。这对沈钧儒的思想震动很大。这时他俩虽未见面，相距千里，但革命的共同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1937年夏，“七君子”从苏州监狱释放不久，沈钧儒就来到南京，这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8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沈钧儒应邀出席。真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他神交已久的周恩来，二人又约定次日9点钟在办事处会面。周恩来说，万一他不在，可以与叶剑英同志谈，叶剑英是完全可以代表他的。第二天，沈钧儒见到了叶剑英同志，谈了救国会的工作以及“七君子”出狱后的情况。叶剑英同志一方面对救国会致以慰问勉励，一方面说他将救国会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武汉沦陷以后，沈钧儒和周恩来都到了重庆。周恩来除与国民党政府作面对面的斗争外，还始终关怀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团结争取聚集在重庆的各党派爱国民主力量。这一时期，他们接触颇多，活动也相当频繁。

当时，重庆上清寺鲜特生的住所——“特园”，是各民主党派经常集会和活动的场所。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黄炎培和爱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还有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常常光顾“特园”。高朋满座，谈笑风声。周恩来便利用这块特殊的地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见面，分析形势，指明方向，从各方面帮助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他常常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和形式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如利用沈钧儒、郭沫若作生日时的集会，作为宣传团结抗战和揭露国民党阴谋投降、压迫人民的讲坛，从而吸引和团结了各党派抗日爱国民主力量，揭露和孤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因而，“特园”被誉为“民主之家”，并由郭沫若题了匾额。

1943年7月初，周恩来因事暂时离开重庆，时隔1年5个月之后，于1944年11月，又飞回到“山城”重庆。当时的重庆一片黑暗，周恩来的到来，宛如黑暗中忽归秉炬人，给烟雾笼罩下的“山城”带来了光明。11日，他参加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集会后，沈钧儒喜而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杯宽，  
雾压山城夜飞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  
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  
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笑狂欢俱未足，  
河山杂 试凭栏。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很明显，沈钧儒寓情于诗，他通过对周恩来的爱戴，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彻底粉碎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周恩来在百忙中还安排毛泽东与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见面。1945年9月2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事实上，这是一次欢迎毛泽东同志的盛会。沈钧儒、郭沫若、张澜、冯玉祥等人都出席了这次酒会。在此期间，周恩来仍利用“特园”这个特殊的场所，及时地向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谈判的经过和进程，让他们明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和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真面目。

为便于谈判和斗争，在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返回南京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也于1946年5月3日到达南京，以南京的长江路梅园新村30号、35号、17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以上海的马思南路107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他经常往返于（南）京沪之间，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及时将美国的“调解”真相，以及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诡计，告诉了沈老和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周恩来的影响和鼓舞下，沈老与郭沫若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揭穿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阴谋。

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的办事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将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的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老，这表示了党对沈老莫大的信任。那时候，周恩来表示：从各方面看来，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的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所以，周恩来赠送给沈老这个瓷如意的寓意是很深刻的。全国解放以后，沈老住在北京，他把这个瓷如意放在小客厅里作为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老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沈老与周恩来晤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时，沈老对党的忠诚和爱戴与日俱增，老而弥

笃。他曾几次说：“我很想再活 20 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了。”说话的时候，沈老的表情非常严肃，象是有点遗憾，又象引以自豪。一心向往党的事业，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一切服从革命需要，这就是沈老在和党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

1963 年元旦，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主持团拜会，招待在京 70 岁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人和参事中的老人。同时为沈老 90 诞辰祝寿。周恩来在致祝酒辞后，转向沈老说：“沈钧儒老人今年 90 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沈老听到周恩来的祝辞，十分激动地起立举杯祝酒：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确地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提议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长寿、祝大家健康长寿。周恩来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沈老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一生经历的最好总结。回家后，沈老激动地对家人说：“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

这是沈老最后一次参加的宴会。这时，他的身体渐见衰老。6 月初，他突患急性支气管炎，住进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于 11 日逝世。

沈老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不愧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在与周恩来交往时，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彼此之间互相敬重。沈钧儒为知识分子不断地探索进步树立了光辉榜样。

## 友谊永存——周恩来与陶行知和育才学校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京、上海郊区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抗战时期直到逝世，他都积极从事民主运动。陶行知由一个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与党对他的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帮助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陶行知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办育才学校，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在学校里成立了党支部，开展党的工作，帮助陶行知把学校办好。抗战期间，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新华日报》馆都是大后方人民群众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从这些地方可以听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使人们透过迷雾看到前进的方向。陶行知非常信赖共产党，他象其他民主人士一样，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发生问题，育才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到“周公馆”去，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对付办法，许多问题一经周恩来指点，顿时迷雾驱散。这使陶行知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鼓舞，并由衷地钦佩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伟大革命家的气魄。陶行知感慨地说：“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民主人士的活动日益加剧，形势异常紧张。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常找借口要封闭育才学校。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40年一个秋夜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陶行知的住处，向陶行知讲明形势，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愈在困难的情况下，愈要树立必胜的信念。第二天，陶行知还陪同周恩来同志看望了一些文化界、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第三天，陶行知又陪同周恩来参观了育才学校。周恩来同志满面笑容，亲切地向师生们问好。他一边喝学生用瓦壶给他倒的白开水，一边回答大家关心的时局问题。周恩来同志谈话中特别指出，要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的投降派。周恩来说，斗争的形式很多，根本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座的有的搞戏剧，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我看通过音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都可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都是有利的战斗武器嘛！他还说，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吃了多少苦，才找到革命的真理，可你们呢？现在就能学到革命的真理。真是一代胜似一代啊！谈话结束后，同学们围着周恩来同志，掏出本子要求他签名。周恩来同志高兴地接过本子，在上面写了“一代胜似一代”。离开学校时，周恩来还为学生增加营养、购买体育器材捐款400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有这样一幅手迹，上面写着：“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加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还开列了饭钱和坐船费数字。这不仅反映了陶行知和周恩来的珍贵友谊，也可见陶行知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

党的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教导，给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1943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使陶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顶住种种政治压力，还要天天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学校募捐经费。有一次陶夫人问他：“你为育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陶行知坚定地回

答说：“我若一走，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师范一样，被蒋介石封闭，所以我非在这里顶下去不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何妨！”就在这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和董老派专人送来了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解放区军民开荒生产自给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陶行知收到这珍贵的礼物，心情非常激动，对党倍感亲切。他们仿照延安的做法，动员全校师生开荒生产，开展“寸土运动”，在师生们的勤奋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度过了难关。

194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行将投降时，为迎接新的局势，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陶行知的工作。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的心目中威信高，影响也大。但这些年来创办育才学校，几百个孩子的生活要他操心，常为孩子们衣食住行累得精疲力竭，影响了他做社会青年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建议让陶行知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青年运动上。陶行知遵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不久便和郭沫若、李公朴、史良、邓初民一起在重庆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开学时，周恩来同志参加开学典礼，并讲了话。以后，陶行知积极参加了许多民主活动和斗争。

抗战一结束，重庆的一些党的办事机关撤走。周恩来考虑到育才的校舍较紧，便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房舍让给了育才学校，还托人经香港汇入了800块银元给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师生。此后，陶行知经常邀请周恩来等同志参加育才学校的一些活动，周恩来只要有时间，总是有请必到。这年冬天，育才音乐组同学举行儿童音乐演奏会，陶行知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和冯玉祥以及中外记者参加。演出后，周恩来高兴地为音乐组同学题了词：“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1946年，叶挺将军出狱后，八路军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晚会，育才学校音乐组参加了晚会并演出了节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人也参加了晚会。周恩来同志还在育才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下讲了话，他鼓励同学们“要做小先生，为人民服务”。

在党的引导下，陶行知更积极地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1946年4月，陶行知为育才迁校来到上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顾特务的捣乱、破坏和威胁，到各大中小学以及工厂讲演了100多场，为人民呐喊，吹响战斗号角，强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6月22日，在上海北站10万群众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大会上，陶行知慷慨陈词：“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民主。”面对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蒋介石穷凶极恶地派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而且把陶行知列为黑名单上的“探花”。当翦伯赞同志打电话告诉陶行知这个消息，要他提防“无声手枪”时，他却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临危不惧，夜以继日地整理自己的诗稿，终因刺激太深，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症。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弥留之际，周恩来同志赶往医院，伏在陶行知身边，拉着他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忍不注流下了热泪。他对陶行知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我们必定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陶先生你放心吧。”在陶行知周围的亲人和朋友们听了这肺腑之言，无不感到慰藉和感动。这一天，周恩来同志还因陶行知逝世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的会谈。也是这一天，周恩来同志给党中央拍去电报，告诉党中央，陶行知“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

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周恩来评价陶行知先生：“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周恩来还说他这次来上海，曾意识到陶行知的身体健康问题，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但话未传到人已不在，使他深为痛心！周恩来同志一方面提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一方面指示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大规模的公祭和告别集会。安葬那天，周恩来敬送了花圈，寄托对陶行知的无限哀思。

周恩来同志和陶行知虽然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正如鲁迅所云“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他们之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结成的珍贵友谊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一代一代传颂下去。



## 深挚的情谊——周恩来与宋庆龄

1981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庄严地作出《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这样一位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在宋庆龄奋斗的一生中，结识过不少革命家、同志和朋友，而其中情谊最为深挚、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同周恩来的交往。从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她都把周恩来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朋友；而周恩来也十分敬重宋庆龄同志，热情地称她为“国之瑰宝”。

他们的革命友谊始建于20年代，宋庆龄曾回忆道：“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他们联系起来。1927年8月1日，宋庆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和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联名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因而起义成功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宋庆龄和周恩来等25人被选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宋庆龄高度赞扬这次起义，她说：“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她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岁月中，宋庆龄依靠中国共产党，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密切合作，建立诚挚友谊的思想基础。

30年代，宋庆龄寓居上海。那时正值一片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住所严密监视，但宋庆龄同志无所畏惧，坚持斗争，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多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1936年初，宋庆龄在住所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就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者董健吾，也就是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宋庆龄拿出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客人，告诉他这是一封非常秘密的信件，要他马上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带回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以及送给宋庆龄的纪念品——红军在江西时铸造的带有镰刀斧头的三枚银币和苏区的一套纸币。宋庆龄一见到董健吾，就紧紧的握住他的手，急切地问：“毛泽东、周恩来可好吗？还有很多很多共产党同志，他们可好？”当听到他们都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向她致以问候时，宋庆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喃喃地说：“是吗！……”读罢回信，她激动地将一张张纸币在桌子上摆好、摊平，仔细观看，那三枚银币在她看来更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就在这封信里，中共中央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由于宋庆龄同志的协助，斯诺和马海德得以成行。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

《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雄伟业绩；马海德此行之后也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于第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在炎热的夏日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芦沟桥的枪声，使中共中央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沉重呼吁，提出了“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的响亮口号。为此，周恩来等同志去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7月下旬，地下党组织通知宋庆龄，周恩来同志途经上海，要来看望她。近十年来，虽然她时常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情况，共同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也时常有信件来往，但毕竟地处南北，天各一方，难得有机会相见。所以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

这天，宋庆龄早早地就派人上街购买食品，并且自己亲自动手做菜，她要好好地招待家里来的“贵宾”。

当周恩来等同志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时，宋庆龄急步走到门口热情地欢迎客人。“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说着将周恩来等请到客厅。

“夫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见到您，您近来身体好吗？毛泽东及其他同志都问候您！”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宋庆龄的手，高兴、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客人坐定，喝着刚沏的清香扑鼻的绿茶，顿觉暖意盈怀，在挂有孙中山先生肖像的客厅里，客主亲切地关谈着，充满了主人客人多载离别、一朝重逢的兴奋和喜悦。

周恩来同志仔细地向她介绍着当前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宋庆龄听后，表示坚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方针、政策，并愿为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真正实现而努力。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会见虽然短暂，但是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大家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景都充满着信心。宋庆龄从周恩来这位政治家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当年任务的论述中，感到受益匪浅。

不久，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处境，特意拍来电报，敦促她尽快撤离上海，在这山河破碎、国危事急的关头，宋庆龄最终听从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放弃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的念头，惜别寄托着她无限情思的莫里哀路29号中山故居，乘轮船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以后，宋庆龄积极从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援助的工作，为国内的抗日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宋庆龄。1938年8月，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同志的夫人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在姐妹般的亲切会见中，邓颖超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亲切问候与致意，并向她讲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过后，宋庆龄亲自赶赴广州协助开展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摘下香港这颗英国皇冠上的宝石，加紧了进攻香港九龙的步伐。就在香港沦陷前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发来特急通知，

指示广东地下党必须全力以赴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港。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宋庆龄才在硝烟弥漫中，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重庆。走后几小时，日寇就占领了香港。

在雾都重庆，宋庆龄依然处境险恶，受到监视和威胁，但她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将自己的住宅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办公室，使其很快地恢复了工作。在这期间，她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将一架国外捐来的大型X光机，设法运到延安，给解放区人民以极大的支援。

在重庆，宋庆龄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而令她最为难忘的一次则是1942年底在她家举行的欢送董必武等同志返回延安的茶餐会。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茶餐会，应邀出席的有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等。

为了热情地招待大家，宋庆龄请名厨做了十几道菜。周恩来同志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对她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从没象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开怀大笑。外面是阴湿寒冷的冬天，但宋庆龄的家中却难得的热闹，充满着欢乐的友情。

当时，宋庆龄虽身为国母，却没有多少自由，她平时除去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外，平时很少会客，一直深居简出，承受着巨大的折磨。今天这么多知心朋友聚在一起，宋庆龄非常欢乐。

大家亲热地围坐在温暖的壁炉前面，凝神聆听周恩来同志分析国内外的形势，整个客厅变得格外肃静。室外寒风呼啸，阴云密布，室内炉火正旺，茶水正浓，气氛和谐而融洽。大家虽然党派不同，信仰各异，但在争取抗战、振兴中华这个目标下，结成了真正的朋友。

在炉火的照耀下，壁炉架上挂着的两株稻穗金灿灿、黄澄澄，玲珑剔透，十分可爱。这是入秋以后，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李德全激动地指着禾穗大声赞叹道：“你们瞧，多好看哪！这两株禾穗简直象金子铸成的一样！”“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坐在她身边的宋庆龄，秀丽的脸上泛着红光。她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继续讲道：“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禾穗，放在右手中，用左手深情地抚弄着，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宋庆龄含笑轻轻颌首，连说：“谢谢，谢谢！”她那双动人的眼睛里闪烁着光彩，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看到了金光灿灿的国徽……

客厅里的宾主都为周恩来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所感染，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杯祝愿人民的胜利早日到来。

就在这个聚会后的第七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成立了。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齿轮两旁，便是两株禾穗，金光闪闪，光彩照人。

1949年5月，宋庆龄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大上海的解放。7月1日，宋庆龄抱病出席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庆祝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28 周年，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她欢欣鼓舞的心情。她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七一”后不久，邓颖超同志携带毛主席的亲笔信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行前，周恩来又亲书一函：“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当邓颖超把信交给宋庆龄时，宋庆龄亲切地递过一把扇子：“谢谢，您一路辛苦了，先坐下休息！”然后立即走到窗前拜读着，她露出喜悦的神色：“人民胜利了！人民在瞻望一个光明的未来！”

接着，邓颖超恳切地陈述自己专程来上海陪孙夫人尽快北上的使命。

宋庆龄听后，沉思良久，她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的确，宋庆龄两次到北京都是和悲痛连在一起的。一次是 1925 年，她尊敬的导师、挚友、丈夫孙中山先生病逝在北平；一次是 1929 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她到北平手扶丈夫的灵柩，出了北平。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所以一提北平，她就感到伤心。

陪同邓颖超一起来的廖梦醒进一步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泽东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恩来同志特地接你的。”宋庆龄听了眼睛一亮：个人感情事小，国家大计事大，中共领导人对自己如此器重，不能再推辞了。她欣然同意，于 8 月底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9 月 1 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到达了金秋时节的古城北京。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在站台上迎候……

在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她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最后，她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9 年 10 月 1 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这一天，城门五阙，重楼九楹，白栏黄瓦雕梁画栋的天安门城楼，八个飘着长长黄丝绦的大红灯笼高悬在大红柱旁，城楼两边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人群如涌，歌声如潮，红旗如林。在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在 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城楼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并排站在一起的宋庆龄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

从此，宋庆龄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做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等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她通报，与她协商。而她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帝反霸、争取和平、促进国家统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在这共同的奋斗中，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友情更深厚了。

1950 年，周恩来、邓颖超收到宋庆龄的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你们在结缔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

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宋庆龄

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深挚的友情。

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宋庆龄总要亲自向她相识的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每人送些礼品。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请人转告宋庆龄，不要这样费心了。宋庆龄欣然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对在东北视察过程中拍的照片，她亲自整理入册，赠送周恩来同志留念。解放以后，好客的宋庆龄很少请周恩来同志到家中做客、吃饭。跟随她多年的秘书感到疑惑不解，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宋庆龄。宋庆龄解释说：“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秘书又建议是否让邓颖超同志来家中，宋庆龄又说：“不必了，要让邓大姐腾出时间照顾总理的生活，协助总理处理一些事务。”这不难看出，她对革命战友的无限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从事大量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创办了《中国建设》这本刊物。她在《怀念周恩来》一文中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那是建国初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准备创办一个刊物。1951年3月的一个傍晚，周恩来亲自来到北京宋庆龄的寓所，与她共进晚餐，并商谈这件事情。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希望由宋庆龄承担刊物的创办工作。宋庆龄当即答应下来。俩人又就刊物的方针、所需的干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52年初，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终于创刊了。

从这以后，为了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个对外的英文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经常给予重要指示。1957年，周恩来为杂志创刊5周年题词；同年，就编辑方针问题作出具体批示；次年，就如何改进杂志一事，指出“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1962年，为了庆祝创刊10周年，周恩来与宋庆龄一起亲赴杂志社看望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鼓励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

即使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时期，这两位革命家的深厚友谊也依然是坚定不移的。

1966年8月，宋庆龄得知父母双亲在上海的墓地被一些红卫兵砸了个稀巴烂，气得双手颤抖，泪如涌泉。此事被周恩来同志得知后，他立即给上海市革委会挂长途电话，严厉地责令有关部门要妥善处理。上海民政局根据总理的指示，重新修缮墓地，刻立了墓碑。

对于保护宋庆龄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亲自拟订的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宋庆龄。当听到有人要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寝的孙中山铜像，预谋冲击宋庆龄寓所时，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面规劝红卫兵，并警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如果胆敢一意孤行，“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万人集会。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陶铸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临会场。在这个会议上，宋庆龄登上庄严的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这篇正气凛然的演讲，

赢得了全场多次雷鸣般的掌声，并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内外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事先曾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修改、润色。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时期还全力保护宋庆龄的事情，宋庆龄了直十分感激，铭刻在心。

7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身患重病。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愁肠百结，她多么盼望周恩来同志早日治好病，恢复健康阿。当她得知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情严重，而江青还时常到医院干扰治疗时，万分愤慨，她把江青称之为“泼妇”，并将这一严重事件向有关人员作了通报。宋庆龄在对江青的行为表示愤恨的同时，对周恩来同志的处境深感忧虑。她常说：“没有总理，‘文革’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为了使总理早日康复，宋庆龄亲自将自己家的鸽子蛋一个个积攒起来送给周恩来同志吃。有一天，几位工作人员在宋庆龄住宅的湖里打上了一条23斤半重的大胖头鱼，他们对宋庆龄说：“首长，这鱼多大！今晚上让李妈给您烧鱼吃，好补养身体。”宋庆龄马上说：“谢谢大家，这条鱼还是先留着吧！”说完，进屋就嘱咐秘书：“那条大鱼请你尽快送到总理那里去，总理现在更需要补养身体！”原来，她听说近一个时期，周恩来同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十分挂念，所以这条大鱼她舍不得吃，赶紧让人趁新鲜把鱼送给了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这使宋庆龄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常静静地独坐着流泪，不住地叹气：“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83岁的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悼念活动，并且发表了寄托自己哀思的《怀念周总理》一文。她深情地写道：“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如今，周恩来、宋庆龄这两位卓越的革命家都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和奋斗精神却将永载史册、永不消失。

## 半个世纪的革命友情——周恩来与郭沫若

周恩来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作家、艺术家们的挚友和知音。他与当代文豪郭沫若同志有很深的革命情谊。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郭沫若最早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那次郭沫若是去听周恩来的讲演，相互并没有打招呼。而真正的相识是在1926年3月，阳翰笙、李一氓同志问郭沫若是否愿意参加北伐大军，希望他见一见周恩来同志，郭沫若欣然同意。俩人很快见了面，经过谈话后，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挥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4月14日，郭沫若见到周恩来，他说：上海现在不行了，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同志说：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当晚，郭沫若买好票，第二天就回武汉了。

后来，周恩来等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了南昌起义，郭沫若积极参加。在部队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南昌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为了保存力量，经周恩来同志同意，郭沫若东渡日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为今后的革命斗争积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毅然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重新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

当时，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周恩来同志担任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是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在酝酿厅长人选时，周恩来竭力推选郭沫若。起初，郭沫若执意不肯就职，认为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干工作是耻辱之事。针对郭沫若的思想，周恩来一再与他倾心长谈，指出：“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并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以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很亲切随便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弟恩来”。而这次只有一句话的短信，则开头称同志，落款写姓名。这一切都表明周恩来同志希望郭沫若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纸短情长，郭沫若拜读再三，终于走马上任，担任了第三厅厅长一职。

上任后不久，郭沫若亲自起草了工作计划，送交周恩来审阅。针对这个计划，周恩来做了细致的修改，并做了重要指示。有了周恩来的领导，三厅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宣传抗战，募捐资金、慰劳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在武汉，而且遍及各战区，甚至深入到最前线。

国民党当局对此又恨又怕，百般刁难。1938年7月，对政治部进行了大幅度的人事变动，排挤进步人士，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升任领导职务。郭沫若一气之下，接连三天未去办公，并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和其他一些负责人研究工作时严肃地指出：“这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份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对于郭沫若的辞职意见，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次周公向我动了声色”，“向来炯炯有神的周公的眼光仿佛要着火了，他向着我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他看我沉默着，又补充了一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了委屈，比这大得多呢！’”

“为了革命的利益”，周恩来同志的疾言厉色使郭沫若顿时清醒，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和份量。十年后，郭沫若写道：“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他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良师，无比敬仰地比喻周恩来同志是“一棵擎天大树”。

1941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大规模公开地开展斗争是不可能的了。这时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

郭沫若多才多艺，既是出色的戏剧家、诗人、作家，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一生中有许多伟大的作品，利用文艺形式与敌人作斗争是他的拿手好戏。

1941年正值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他对敌人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时机和方式。旧作《棠棣之花》经过修改上演了，这可以说是为新编历史剧演出打下了头一炮。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对共产党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一次沉重打击。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七次出席观看，并保留了这个剧的全部剧照。国民党当局对这出戏大为恼火，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就曾为此破口大骂。

郭沫若在剧中强调了“士为知己者死”这个主题。周恩来同志心领神会，多次指出：“郭老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郭老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他十分重视对《棠棣之花》的宣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专门讨论了历史剧问题和这出戏的演出，并决定《新华日报》出专刊，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了刊头题字“《棠棣之花》剧评”。他告诉郭沫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非常喜欢《棠棣之花》的插曲《湘累》。郭沫若听后非常感动。这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的尊重和深情。

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50寿辰，《新华日报》当天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周恩来同志写的社论《我要说的话》，这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章论述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郭沫若大半生的战斗经历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完整的评价。郭沫若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是继鲁迅之后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的这一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周恩来第一个给予科学说明的。早在1938年，周恩来同志就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



建议，由中共中央作出党内决定，确认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周恩来在比较了鲁迅与郭沫若生活与战斗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经历之后，深刻地指出：鲁迅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而郭沫若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为了庆祝郭沫若的50寿辰，周恩来还亲自拟定参加庆宴人员的名单，使众多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心情愉快的郭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周恩来也非常高兴，举杯同大家一起为郭沫若祝寿。没过多久，周恩来又为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再一次举行盛宴。这样的聚会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难得的。

在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下，郭沫若的创作激情有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1942年1月《屈原》、同年2月《虎符》、同年6月《高渐离》、同年9月《孔雀胆》、1943年4月《南冠草》，他一口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5部历史题材的剧本。

特别要提到的是《屈原》。它通过对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昏庸无道的描写，有力地揭露了蒋家王朝的反动腐朽，暗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有光明的未来。

周恩来同志反复地阅读了剧本，多次亲临剧场观看排演，对其中的“雷电颂”尤为赞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怒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周恩来还把主要演员找来，通过反复朗诵这段情绪热烈、文采照人的台词，对演员进行具体指导。他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正确表达郭老的思想感情。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果然，《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每当舞台上演到“雷电颂”时，台下的观众便爆发出狂涛似的掌声。广大群众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周恩来同志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立了大功。”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十分关怀。多次写信问他：“除在报纸外，你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有便，带我一些，盼甚盼甚。”在重庆时期，郭沫若常把自己写的文章、诗歌、剧本读给周恩来听，而后两人字斟字酌地共同讨论。遇到郭沫若一时表达不出意思的时候，周恩来一语提醒，恰到好处，俩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有些学术方面的意见不大一致时，周恩来便让步说：“你是作家，尊重你的意见。”但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同志却从不含糊，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对话剧《孔雀胆》他就认为，这个剧虽然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周恩来不同意剧本对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的处理，嘱咐一定要改。郭沫若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

史人物常有偏爱偏见，这是很难改的毛病。”虽然此剧即要上演而来不及修改，但人们却再也没有听到郭沫若谈起这出戏，他的戏剧集里也没有收入。解放后，曾有人问他是否要修改这个戏时，他笑了笑，只是说让它留在故纸堆里吧。

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屈原研究》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屈原的思想》，经过仔细阅读后，不仅帮助作过一些修改，使提法更为科学，而且就作者所引典故是否有笔误提醒过他，周恩来就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整个为人的估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尚有商榷余地。周恩来将郭沫若对“仁义”的阐释“把人当成人，该做就快做”，改为“该做就要做”。一字之差反映了精明干练的革命家和诗人气质的革命家的不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抢摘胜利果实，把全国又一次推向了内战的深渊。这时候，周恩来要求郭沫若在国统区积极进行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他对郭沫若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郭沫若以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党的领导、党的意图同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讲人民群众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共产党不便讲的话，在党和非党人士中间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46年，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代表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深知国统区黑暗的郭沫若不禁常常为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担心，但他见到周恩来同志时，又为他的镇定、乐观所感染。在《南京印象》中，他抒发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无比爱戴、敬仰之情。书中写道：“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同年11月，周恩来同志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飞返延安，郭沫若得知后，以诗相赠：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在诗中，郭沫若将周恩来比做疾风中的劲草，岁寒中挺拔的松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伟大革命品格的深情歌颂。

全国解放后，作为周总理的助手郭沫若先后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热忱。而

总理对郭沫若的工作、生活则关怀备致。建国初期，郭沫若常率和平代表团出国开会、访问，每次成行之前，总理都要接见他们，详细询问有关事宜，布置工作；回来之后，又及时看望，听取工作汇报。

1955年，有一次郭沫若从香港乘坐荷兰的飞机前往日本，途中飞机发生故障，只好返回香港。消息传到总理那里，周恩来同志很着急，马上通过苏联使馆打电报到日本，叮嘱郭沫若不要坐飞机回国。随后又通过外交途径，请苏联方面派了一条船，专程接郭沫若回来。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的关怀，就更加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1966年冬，国内形势极度混乱。为了保护郭沫若，周恩来同志在“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把郭沫若列在宋庆龄之后的第二位，并派人专程看望郭沫若一家，转达他的意见：请郭沫若一家离开家里到外面去住，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强调，不要告诉机关，只带秘书和司机，防止泄密。等过了一段时间，局势有所缓和，总理才允许郭沫若回家居住，并将在郭沫若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调回郭沫若处工作。

1967年以后，郭沫若经常陪同总理接见外宾。郭沫若这时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总理在工作中处处照顾他。有一次，郭沫若陪总理送外宾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当时天寒地冻，寒风凛冽，又是黎明时分。总理回屋后就批评有关人员工作没做好，指出郭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让他吹风，然后又劝郭老回去休息。郭沫若因耳聋，没听清总理在讲什么，回家的车上郭老问秘书总理为什么发脾气，听了回答后，郭沫若感慨万分：“他自己不是也在吹风吗？”

还有一次，总理拿着参考资料与郭沫若谈一个问题，郭沫若因为没看到参考资料，所以不知道。总理马上追问为什么没看到？郭老回答，参考资料是通过交换站送来的，星期天休息，所以今天看不到。并说提出几次意见也没有改进。总理听后马上对工作人员说，你告诉新华社的领导，以后星期天交换站要安排人值班，并马上派人将参考资料送到郭老家中。

1974年年初，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总理当时派人到郭老家中，传达了三点指示：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24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二，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要铺上地毯；三，请郭老从小卧房中搬到大办公室住，后来总理见到郭老，向他解释原因：地面大滑，铺上地毯，防止摔倒；人老了，需要充足的氧气，屋子太小，氧气不足，危害身体。7月间，郭老患大叶肺炎住院期间，发生了一次医疗事故：郭老因打针过敏引起高烧。总理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作了批示：以后给郭老用药要特别慎重，一定要经过试验再用。对于郭沫若的病，总理很关心，经常派人探望。周总理的情谊使郭老很感激。

同样郭沫若对总理的感情也很深，他对总理既敬重又佩服，一直协助总理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处境艰难，郭沫若主动为总理分忧，在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接待外宾时，虽然身体不舒服，耳朵听不清，但坚持让秘书在身边记录给他看。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的儿子在北京农学院被歹徒绑架，22日被害致死。在这期间，郭沫若曾陪同总理接见过外宾，由于他考虑总理工作繁忙，处境险恶，所以没把此事告诉总理。事后夫人于立群责怪他，郭沫若悲痛地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1974年春，江青在中央一次万人大会上，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指名批评、侮辱郭沫若。会后几天，张春桥、江青先后跑到郭沫若家里，当面逼迫

他写文章，要他承认当年抗战时期写的历史剧和历史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动毛主席的；要他“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对“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反对总理的阴谋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认为“四人帮”反他也是针对总理的，所以他感到极大的愤怒，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当面严厉斥责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使得本来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张春桥哑口无言。

由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和被“四人帮”恶毒围攻，郭沫若患上了重病。当他得知总理病重后，心情很沉重，常在报上查找总理的消息，总理的病情一直是他惦念的事。就在这时，沉重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76年1月6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他悲痛欲绝，在病床上满怀无限哀思和对“四人帮”一伙的无限愤恨写下了一首七律诗篇：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里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在当时“四人帮”横行，形势险恶的情况下，敢于写下这样的诗篇，没有无畏的气概是无法想像的。他不顾体弱病重，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坚持要去向周恩来同志作最后的诀别，坚持要去参加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回家后他在日记本上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字迹因情绪激动，手太颤抖而难以辨认，但郭沫若借用古人荆柯的诗句表达了他自己对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无限哀思。

周恩来同志与郭沫若同志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期间，不管环境怎样恶劣，他们之间的友谊始终是牢固的。他们的革命情操，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 周恩来与和平使者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他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一个身居国民党高官的人，怎么和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结成了朋友呢？古人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们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代表各自的阶级，但他们毕生推诚相处，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所以结下的友谊，历尽风风雨雨，经久不衰。

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友谊始于 20 年代。1924 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这年 6 月成立了“黄埔军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1 月，俩人都调到入伍生总队，周恩来任党代表，张治中任总队副，这样他们的接触就更多了。俩人都具有豪爽的性格，所以一见如故。

张治中起初对工人、农民革命运动所知不多，对政治斗争也不感兴趣，只醉心于军事教育。自从与周恩来相识后，他好像了一个人似的，周恩来给他讲马克思主义，讲工人、农民革命斗争，讲中国前途，他听得如醉如痴。每次周恩来为学生上课时，他都要去旁听。因此，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思想逐渐进步，把周恩来奉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后来，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开始排挤共产党人、打击国民党左派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越来越尖锐。先后发生了廖仲恺被刺，“三·二一”中山舰事件，周恩来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张治中对这些极为不满，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

张治中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颠沛流离生活，吃过很多苦，因而使他从感情上趋向共产党。在这种环境下，他萌发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并首先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当时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表示请示组织后即给予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解放后，周恩来曾与张治中回忆过去这段往事，张治中颇有感慨地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

1925 年 7 月，蒋介石在组建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任命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主管人事和事务工作。当时张治中就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应由周恩来担任。但蒋介石居心叵测，始终不答应，最后只表示周恩来可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但被周恩来同志拒绝了。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恩来参加，是一个大损失，他深为遗憾。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张治中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俩人的接触至此中断。

1927 年“4.12”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逐渐暴露。

一天，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原张治中军官团连长陈赓突然找到张治中，说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治中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赓：“恩来先生现在何外？”陈赓答到：“已到上海。”张治中将旅费交到陈赓手上时，一再叮嘱：“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治中已嗅到火药味，他特别关心周恩来的安危。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

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在武汉，有时到长沙，与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研究工作。这样张治中与周恩来中断十年的交往得以恢复，他们之间时有过从。

1938年，武汉被日寇占领后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治中对部下也有明确指示，但执行人负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擅自到处点火。张治中从睡梦中惊醒时，大火已经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局势无法控制，酿成了一场惨案。张治中知道大祸已然闯下，惶惶不安。事后周恩来由郊外回城，看到张治中的焦急、憔悴之状，便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在指出其责任的同时，加以亲切的劝慰。张治中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草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过后认为，国民党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的政策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对此事予以严正的批评，同时对文稿字斟字酌，多处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当时社会各方面尤其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要求惩办张治中的呼声强烈，正当各方责难纷至，落井下石使张治中感到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作为中共方面朋友的周恩来所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张治中由衷地感激，终生难忘这一亲切的关怀，也充分体现了患难之中的真挚情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张治中积极行动，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促成蒋介石电请毛泽东到重庆会商国是。毛泽东以民族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慨然应允。

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个高潮。张治中作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建议人之一，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专机到延安亲迎。

周恩来在这些过程中，再三叮嘱张治中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找到张治中间：“文白兄，你把毛泽东接来了，让他住哪啊！”张治中答：“委员长不是安排了一处房子吗？”周恩来非常幽默地说：“那么阔气的房子，我们主席住不习惯呀！”张治中恍然大悟：周恩来同志是在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那处房子便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控制。于是张治中慷慨地说：“如果毛泽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的房子吧。”就这样，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0天之中，一直住在了张公馆——重庆桂园。在其它问题上，如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张治中始终与周恩来合作得不错，遇事主动与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推诚合作的精神。

到了谈判末期，特务活动猖獗，并准备给毛泽东制造麻烦，破坏谈判进程。有的民主人士关切地劝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找张治中商量：“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行不行？”张治中问：“准备哪一天走？”周恩来说：“越早越好！”停了一下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啊！”张治中干脆的说：“我既然把毛泽东先生接来了，当然要送他回去！”他找到蒋介石：“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快40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等他回去料理，他想早点回去。”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为啥偏这时候走呀！和平协定还没签订哩。”张治中又说：“毛泽东先生是我接来的，我想还是我送他回去的好！”这下蒋介石更不高兴了，

怒气冲冲地说：“现在新疆来了几个电报，催促你去，不然，谈判就有破裂的可能。”张治中马上回敬他：“去新疆，我到延安后正好顺路。”一句话使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张治中的请求。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第二天一早，张治中就陪同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在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你答应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在毛泽东走的当晚，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家的亲属和全体服务人员，和大家一一握手、敬酒，并赠送了延安生产的羊毛筒子、毛线等物品。10月12日，张治中返回重庆。13日就踏上了赴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代表谈判的路程。此时，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狱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处境十分险恶，而新疆又地处塞外，党的营救工作力所不及。在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专程到桂园张治中寓所送行。周恩来同志当面托付张治中，请他到新疆后查清此事，设法释放他们并派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听后一口答应。果然到新疆后，了解到监狱里关押着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张治中经多方努力，完成了周恩来同志的面嘱，妥善为这批共产党员安排了专人专车及医务人员，并电告沿途负责人招待，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于1946年7月1日送达延安。这批干部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嘱托，是很难得的。因为张治中真心敬佩周恩来。

1949年元旦，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第二次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同意国共再次举行和平谈判，并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为了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张治中到浙江溪口，当面将自己的和谈腹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只是冷冷地回答：“我没什么意见。”并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这样，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团于1946年4月1日到达北平，开始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进行和平谈判。

一见面，周恩来同志就质问道：“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见他呢！”张治中连忙解释：“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他可以遥控一个军乃至一个师的行动，光我与你们谈，谈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周恩来觉得张治中说的在理，才消了气。这可以看出，周恩来与张治中俩人之间直言不讳，无话不讲，坦诚相见。

在谈判中，张治中曾讲过：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周恩来同志立即严肃地指出：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愿意接受。但如拿过去国共两党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多来的关系，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急！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代起，对周恩来就深深地怀着敬意，此时周恩来的分析，既正确，又深刻，也得体，坚持了原则性，照顾了老朋友，张治中从心里佩服。

经过20天的艰苦努力，双方签订了《国内和平协定》，但4月2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拒绝签字，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致使谈判破裂。同

时急电北平，召张治中等一行速回上海，预定 23 日飞机去接代表团。

这天，周恩来同志来到张治中的住所，真诚地对他讲：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告戒张治中：代表团不论回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最后，周恩来深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听后深受感动，终于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安排。

23 日这一天，接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果断地指示机场指挥台回答：“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降落，两天后再来。”飞机只好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南京。这实际上是周恩来同志为挽留张治中等人设下的缓兵之计。

实际上，早在谈判破裂时，周恩来同志便亲自指示南京和上海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将张治中的亲属集中到上海，由专人负责，设法坐下一班接代表团的飞机安全抵达北平。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后，全力以赴，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周恩来兴冲冲地找到张治中，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张治中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客人？我认识吗？”“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说完周恩来带上警卫员和张治中一起乘车来到西郊机场。不一会儿，一架飞机徐徐降落，从上面走下几个人，张治中一看，不禁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是夫人洪希厚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其他家属。亲人团聚，大家都兴奋地抱在一起。张治中揉着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所有这一切，事前张治中及家人都不知道，可见周恩来办事是多么稳重、细致、周到，促使张治中决意留下来，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而获得了新生。

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安排在北京饭店一楼暂住，他和毛泽东主席就在二楼办公。他们时常走下来看望张治中，问长问短，并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很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听了这一席话，张治中言语哽噎，心里却象涌进了一股暖流。那时毛主席和周恩来非常忙，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也只能小憩片刻。为了能让他们休息好，张治中就让夫人带着孩子白天到公园去玩。不久，周恩来即为张治中一家安排了宽敞、舒适的房子。

张治中留在北平后，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一直很激烈。他总在想：我是国民党员，现在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会不会说我是背叛领袖呢？针对他的想法，周恩来和他谈心时一针见血地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使张治中衷心感激，终生难忘。

通过周恩来同志做工作，张治中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了。建国初期，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为祖国的西北边疆不放过一枪全部解放做出重要贡献。为此，1954 年国庆五周年时，毛主席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张治中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



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解放以后的20年，不论在各项工作中或历次运动中，他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教育，使他能注意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

他曾对周恩来同志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发展平等的贸易往来；在国号、国旗、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在制定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是否为国家元首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这些建议，都受到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的重视，许多意见被采纳。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视察，都要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书面文字，呈送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供决策时参考。

“文化大革命”中，张治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当时周恩来同志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但是他毅然在“一张应予保护的名单”上开列了张治中的姓名，并派解放军前去张家保护，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同志马上采取果断措施，将张治中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强化保卫工作。他对红卫兵讲，张治中是我们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

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造谣诬陷，周恩来同志愤怒地驳斥了他们的诬蔑之词：张治中释放和派人护送新疆被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做了一件好事。

以后，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派人到301医院看望张治中，自己也常常抽出功夫去和他谈心。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忧虑地向周恩来倾吐肺腑之言，每当这时，周恩来总是劝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在张治中病危时，周恩来派人将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的张治中的亲属送到张治中面前，使他得以在病逝前与家人团聚。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途。周恩来闻讯后悲痛不已。当时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气焰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仍为张治中设立了灵堂，亲自前往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并致悼词。张治中的亲属们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沉重，神情严肃。他不顾当时的恶劣形势，对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

之后不久，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同志立即嘱咐他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以解燃眉之急。每当提起这些往事，张治中的亲属们都激动万分，他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先生在长时期中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道义相砥砺，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确是非常真诚的。

## 总理与女豪杰林巧稚

1976年4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花圈、花到处悬挂，景象壮观；“怀念总理”“民族英魂”挽联、横幅引人注目，气氛肃穆；演说声、朗诵声、鼓掌声不时从人山人海发出，群情激昂，人们无限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群中，目睹这一切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眼闪着激动的泪花，连连点头“好！好！”。她就是中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杰出的妇女代表林巧稚大夫。

林巧稚，这位出生在旧社会的妇科专家，用自己的双手，迎接过千千万万个小生命的到来；用小小的手术刀解除过许多垂危病人的痛苦，使她们获得了再生。可是很长时间，她却被自由的信仰困扰，找不到拯救众生的根本良方，信奉上帝，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天地。“一个人关起门躲在房间里，闭紧了窗子，把大好的阳光锁在外面，为自己造成一个人工的黑夜……”这句《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台词，也正是她的真实写照。是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无私和无畏，使她透过窗子的缝隙，看到了外面阳光普照的世界。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以他那宽广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明白了自己原来信奉的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而找到了生活的动力和源泉。

1949年，北平解放了，认为与政治无缘的林巧稚开始了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一天，林巧稚在协和医院门诊室里值班看病。开诊不一会儿，护士引来两位穿灰布军装的人。前面一个年轻些，象是陪同；后边一个已入中年，剪着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显得有些苍白。林巧稚边询问病情，边做例行妇科检查。

“你今年多大了？”

“46岁。”

“生过孩子吗？”

“生过。”

“多大啦？”

“要是活着的话，该22岁了。”

“怎么？……”

那位妇女慢慢地叙述：那是在1927年的广州，当时环境恶劣，为避开敌人的搜捕，她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医院里找一个护士来接生，孩子生下来，是个胖胖的男孩，有九磅多重，十分招人喜爱，可是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不久就病死了。后来，环境更加恶劣，行军、打仗，身体就落下了病根，由于在行军路上，工作繁忙，没有条件医治，从此她就失去了作母亲的权利。

林巧稚仔细听着，正在写病历的笔顿住了，不由得对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女性升起敬意，向她投去钦佩的目光。事后有人告诉她那就是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她惊讶地站起来：

“谁？谁，她就是我们国家总理周恩来先生的夫人！”

林巧稚素来敬佩倔强自立的女性，敬佩那些为了争取妇女自立生存的权利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女性。今天，她找到了这个典型。真没想到，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林巧稚心中平添了几分崇敬之意。共产党，在她心里有了一个具体的形象。

过了不久，林巧稚接到一个会议通知，请她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报告会，报告人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到周恩来这个名字，巧稚心里有一种亲切而又好奇的感觉。她不想听政治演讲，但却很想看看这位早已知名的政治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会议准时开始，分秒不差。科学家们惜时如金，想不到共产党开会还那么准时。林巧稚脱口而出：“共产党开会还真准时啊！看样子还能办事！”话一出口，举座为之一惊。几十年后，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常常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好笑。

就是在这次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她被主席台上的周总理吸引住了：他风度潇洒，神采飘逸，炯炯有神的目光扫向每一个人，仿佛在同每一个人交谈。他的讲话条理清楚，富有说服力，句句打动着听众。随着报告的深入，林巧稚脑海中对共产党的偏见，对于政治的隔阂，逐渐消除，同时心中升起一股新鲜的力量，共产党是信得过的，可以跟他们一道走。

新社会使林巧稚迎来了第二个青春，她凭着对人民的热爱，凭着自己精湛的技艺，凭着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信任，人民给了她更高的荣誉。1953年她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医学会议，随后又参观和访问了苏联。1954年8月她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又相继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人民对她越信任，她越觉得受之有愧。听说总理要她去接见外宾，她心里直犯嘀咕，悄悄对叶惠芬大夫说：

“为什么叫我去接见外宾呢？我能起什么作用呢？总理了解我，邓大姐了解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有意地要带带我，给我一个见世面的机会！那我就要跟着好好地学一学！”

1960年，一辆“吉斯”牌轿车在“跃上葱笼四百旋”的牯岭山道上盘桓，坐在车内的林巧稚深深为大自然的深沉、宏伟和奇妙所吸引、陶醉。汽车将她送到一所清静幽雅的别墅面前。

她刚从车子里下来，就见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健步走来，向她伸出一只宽大有力的手，满脸含笑他说：“林大夫，一路辛苦了！还没有到过庐山吧？我没有时间回北京去，只好把你请到这里来了！”

巧稚两颊微红，就象人们站在伟大的人物面前常要产生紧张、拘谨、慌乱和不自然等等感觉一样，巧稚一时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为消除她的紧张情绪，总理有意识地轻松平淡地向她打听看到庐山后的感受。

来到会客厅，总理刚给巧稚斟过一杯清茶，邓大姐就在护士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巧稚连忙站了起来，扶邓大姐坐下。邓大姐表示歉意他说，“你一路辛苦了！我没有到门口去接你，请原谅！”

邓大姐是巧稚早已熟悉了的，但象这样亲近的、家庭式的与她团聚在一起，还是头一次。巧稚心里感到一种欣慰，幸福的暖流洋溢在心头。她关心地询问邓大姐的病情，邓大姐说：“在你们这些医生、护士们的精心治疗下，恢复得很快。你们医生护士，都非常辛苦！一个手术下来，全身是汗，所以总理说，你们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

总理对巧稚说：我们见面的次数倒不少，只是没有细谈过，我们对你关心得很不够！”

巧稚忙说：“总理工作那么忙，国家有多少大事等着您去处理，我这么

个普普通通的医生怎么好意思给您增添麻烦呀？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够多的了，只是自己年纪大了，希望再为我们妇女和孩子们多做点事，不要辜负了你们的希望！”

总理亲切和蔼地赞扬林巧稚：“你为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你为妇女儿童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壮年，现在又在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晚年，大家都要感谢你的。”总理似有歉意地对巧稚说：“我和小超对你关心得不够哇，不过，你自己也得关心关心自己！”

巧稚心里非常明白，自从周总理认识了自己以后，就象兄长一样处处事事惦记着自己。此刻，深为总理挂牵着自己的晚年而感动。她望着邓大姐，含蓄地一笑，说：“谁让你们对我解放得这么晚呢？要是再早解放几年不就好了嘛！”话音未落三人都一起哈哈地笑了起来。

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下进行，巧稚原先那种拘束的感觉完全消除了。她放开胆子向总理提出了问题：“我心里还有个问题，一直想对总理说说，”她边说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邓大姐。

总理微笑地问：“是不是入党问题？”

巧稚惊奇地几乎从藤椅上弹起来，说：“总理，您的心可真细，明察秋毫呀？”总理笑了，邓大姐也笑了。

巧稚望着他们，想了想后说道：“过去我是信基督教的，从小就受到教会的影响，思想中旧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我自己也觉得，昨天还是个基督教徒，今天又来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样做对党的影响好不好？”

总理听完，耐心地对她做了解释，告诉她信基督教也不会影响她与党的关系，党是一直信任她的，相信她的！入党不入党都不会改变党对她的看法。而且表示她留在党外，还能起到在党内起不到的作用，党相信她一直是坚信共产党的！

巧稚听了，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如释重负，她高兴地望着总理说：“我的思想包袱算是彻底地放下了！今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好我自己的工作了！”

说着话儿，天色已近黄昏，总理和邓大姐留下巧稚和他们一道吃便饭。他们边吃边谈，巧稚又告诉总理说：“你赠送给我的咖啡，我非常喜欢，可是现在我不能自己喝，因为大家都需要热量，我就把它分给科里的医生护士了！同志们还嘱咐我代他们谢谢您呢？”

总理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巧稚回头对邓大姐说：“不过，您托人送给我的那些鲜花，我可没有舍得再分给别人。”说完，巧稚一看天色不早了，便起身告辞。

总理亲自把巧稚送到大门口，临分手时，总理再三鼓励巧稚要注意向中医学习，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总理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应当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来！”

巧稚从庐山回来，又象往常那样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着，奔走着。每当她忙碌了一天，疲劳来袭击她时，总理的形象立刻出现在她的眼前，总理比我岁数大，还日理万机，忙于国事，我不过看几个病人，还谈得上累吗？想到这些，巧稚觉得自己仿佛年轻了许多，身上充满了活力。巧稚曾向很多人说过，她最爱听总理的话，因为总理讲每句话时，好象都摸透了你的心。

1965年11月1日，巧稚刚刚从湖南巡回医疗回来，就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届妇产科学学术讨论会。周总理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笑容可掬地一

面招呼大家：“请坐，大家坐嘛。”一边走到林巧稚身边，远远地先伸出手，关切地问候：“林大夫，你下乡辛苦了，听说你在岳阳工作得很出色，那里群众都在感谢你……”说着就坐在巧稚的身旁，总理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林巧稚提出的“把计划生育的科研与临床密切结合的整体规划方案”。并对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提出殷切的期望，他意味深长他说：“我们要象春蚕一样，把自己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献给国家，献给社会！”这句闪光的名言，从此深深地印在她的心田里。她时时用总理的这句话，鼓励自己，鞭策自己。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巧稚在风雪凄迷的胡同里，忧愁郁闷地走了几年，任凭狂暴的风霜雨雪的无情抽打，任凭无边无际的波涛的不停冲击，她毫不退缩。“文革”中，尽管局面混乱，她还是组织几个学生成立计划生育科研小组，承担了两个国家重点科研课题。

忽有一天，巧稚从妇产科病房实习大夫的岗位上走回家来，刚到A楼的门口就使她感到惊奇。往日，吵吵嚷嚷的造反司令部今天忽然变得静悄悄的，空无一人，连门前贴的那些标语和大字报也不见了。正当她惊奇未定时，侄女懿铨走了出来，将她拉到楼梯口悄声他说：“造反司令部已被限令搬走了，这楼又全部归我们了，听说是总理下的指示，说是外事活动的需要！”

巧稚的满脸愁云一下子被吹散了，她打开本来就属于自己而又多日不敢正视一眼的会客室旁门，深深叹了口气说：“又让总理操心了！”

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周恩来总理象一棵屹立旷野的擎天大树，用自己的身躯，遮挡风雨的猛袭，蔽护着身旁的柔枝嫩叶、幼树弱草。林巧稚，也是总理悉心照应的一员。巧稚脑海中闪出了总理和蔼可亲、为国操劳的身影，心中涌出一股热流：总理呀，总理，你那么忙，工作那么繁重，我们整个国家的担子都压到您的身上，您还想到我这么个林巧稚！

1969年4月中旬，院革委宣布“解放”巧稚，“五·一”节后，她的名字又出现在出席天安门观礼的长长名单里。

1971年2月6日，林巧稚接到通知，要她和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骛大夫一道参加一个会议。在“文革”洪流滚滚的岁月里，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无疑是异乎寻常的“政治待遇”。等到她赶到会场上才知道，当时医务界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总理要亲自接见全国22个中西医结合有成效的代表，并听到他们的汇报。

巧稚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总理了。当总理健步走进会议厅时，林巧稚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随着人们热烈地鼓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紧紧盯着总理的身影。她多想走上前去与总理说上几句话啊！可是不能！她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总理接见了那22个有成就的科研项目的代表，并让他们一一做报告。在听完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于大夫汇报了他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宫外孕的情况后，总理向坐着的人群问道：“林巧稚大夫来了没有？是我请她来参加这个会的！”巧稚激动地站起身来回答。总理又问：“你们都是怎样治疗宫外孕的？都要开刀吗？”等巧稚回答说：“开刀的多！”总理听了，用商量的口吻说：“多吸收一些老中医的长处，可以不可以呀？”

巧稚爽快地回答说：“可以！”总理爽朗地笑了，然后风趣地说：“你们大家听见了没有？她说可以！”

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人们热情地向巧稚鼓起掌来。林巧稚望着总理的笑脸，心头顿时荡起一股暖流。她明白了，总理让她来参加今晚的会议，还

有更深的意义：他的话语，他的举动，是特意讲给某些人听，做给一些看的。他在用这种特殊方式，扩大她的影响，改变她的处境……巧稚在心底感叹：“总理啊！您的心胸真是博大无边！”

总理的关怀很快就见成效。林巧稚在多年受冷落之后，又重新被人重视；她的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又似乎被人承认，恢复了一些应有的待遇。于是，在送往迎来的国事活动中，又出现了她矫健的身影。

不久，总理又叫人通知巧稚，要她接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这是党和国家给予她的信任！如果不是总理的安排，她，一个普通的大夫，又有所谓特务嫌疑的人，能够有资格去接受这位显赫的外国客人吗？

1972年底，又经周总理批准，年逾七旬的林巧稚作为中华医学会代表团的副团长，接受了访问美国的任务。这是继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后，我国第二个访美的团体。同行的大多是我国有声望的中年医学家。林巧稚是团里唯一的女性和长者。

周恩来总理要亲自接见出访的全体成员，临行前一天深夜11点，总理详细询问了出访的准备工作，对有关问题作了许多具体指示。还说刚收到我国使馆从华盛顿打来的一份电报，那儿将有一股寒潮，要大家带够御寒衣服。那时，总理已积劳成疾，身染重病。看到总理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仍孜孜不倦地为国操劳，甚至连这样规模的一个代表团他也要叮咛嘱咐，关怀备至，巧稚心疼极了。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林巧稚含泪与总理握手告别，她几乎是强忍眼泪说：“总理，您更要多保重啊！”

从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生活的最后一年多，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其间，他动了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经受了肉体上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但是，尽管病魔缠身，却夺不去他为人民鞠躬尽瘁的耿耿忠心。他仍然夜以继日地处理许多党和国家的大事。

1975年春天，林巧稚借去瑞士参加会议的机会，寻到了1954年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的住址。她在那里，满怀对总理的敬仰和深情，特地拍摄了几张照片。回国后，她得知总理病重的消息，怕打扰总理，托人将照片送给总理表达了她的问候和敬意。在医院中的总理看到照片，很感愉快，说林巧稚我的地方确实就是他当年住过的。林巧稚惦念总理，总理也关心着林巧稚。他特意托邓大姐去了解林巧稚的身体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出门有没有车子等等，当听说巧稚平时出门没有专车，便特意让国务院管理局给她配了一辆专车。

林巧稚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放出了悲沧的哀乐，随之传来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林巧稚顿时就感到天旋地转，象跌进了悲痛的冰川里。两天后，她自己做了一朵小小的白花，佩戴到胸前，颤颤微微地走上了十里长街，汇入到成千上万哀痛的人群中……

清明前后，巧稚又不顾关心她的人的好心劝告，置身到悲愤的人海之中，她亲眼目睹了那动人的场面，看人民群众对总理深厚的爱戴之情，她兴奋，她感到欣慰。但就在她为清明节的所见所闻兴奋不已时，4月5日夜，一伙人搜查了她的办公室。在那里，有她和妇产科那些年轻正直的同志们安放的总理遗像。第二天上班，当她听说了夜间发生的事情后，气得浑身发抖，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步子，激动的情绪溢于言表：

“我真不明白，悼念总理有什么罪？现在全国几亿颗心都在滴着血，流着泪，可是有人竟要伸出手来堵住要痛哭的人的嘴巴。……”

她不顾一切地吐出心中的怒火，她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总理离去了，但是那圣洁的火焰依然在她的心灵里炽热地燃烧着。

复杂的斗争，确实磨炼了曾经决意与政治绝缘的林巧稚。回忆起总理逝世后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情景，她胸中似有一股激流在奔腾。她从小信奉上帝，但上帝究竟是什么样的？谁也没有见过。而在天空门广场，她却看到了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他的崇高的人格，受到了亿万人民的崇敬，成为世人的楷模。

思念与岁月俱增。这天，林巧稚独自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收藏的所有周总理的照片都找了出来。她一边整理，一边凝神遐想，越想越激动。

20年来，巧稚总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在支配着她。她不停地思索；探究意识中这股纯洁高尚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什么？今天，她终于惊悟了，她突然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顾不得许多，她连忙给刘士廉打了个电话。这位当年曾在自己身边的共产党员，如今已是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刘士廉进得门来，看到老人桌面上摆满了总理的照片，很是奇怪，忙问：

“林大夫，有什么事？”

“还记得20年前我在这屋时给你说过的话吗？”巧稚不等刘士廉坐定，就激动地说：“我说，我总觉得心里有一股很强的精神力量，却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今天我明白了，我找到了那股精神力量的所在。我心中的上帝就是他！”

林巧稚说着，手指指向桌面上的总理的照片。

“他！”刘士廉凝望着照片上总理那慈祥的目光，立刻明白了林巧稚的意思，连连向她点头。

“从解放到现在，我是总理一点点带起来的。”林巧稚靠在沙发上，眼噙泪水，深情地回忆起往事。

“他对我始终象兄长一样，是那样信任我，那样器重我，了解我。记得解放初，至少有三次，总理在和我谈话时，突然问我：‘你还信上帝吗？’他第一次问我时，我确实愣住了。我想，我不能说假话，应该诚实地回答。可是，我正要答话，总理却把话题岔开了。我心里明白，他是怕我难堪。他呀，对人的了解真是深透！我的思想脉络，我的心底变化，他总是看得那样准，点得那样透。我做了几十年大夫，可我要说，就思想而言，他是最高明的医学家！”

“多少年来，总理当面交给我不少任务。他让我向中医学习，把中西医结合的事搞起来；他让我带徒弟，培养青年人；他让我总结经验，写成书留给后代……每一次，我都象学生接受老师的作业一样郑重，也为任务的沉重而忐忑不安。可是，一想到总理的信任和嘱托，我心里就感到无比充实，有了勇气和力量。

“信上帝是可笑的。现在连孩子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我确实深信不疑过。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其实，我信上帝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寄托，追求一种高尚的做人准则。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他实在称得上世上的表率、楷模……”

林巧稚站起身来，一边收拾桌上的照片，一边又说：“我真后悔，自己

没有单独和总理照过一次相，留作永久的纪念。后悔啊，后悔的还不只这件事。也许，我是该入党的。……这20年，我经历了许多事。共产党做事让我佩服。现在我明白了周总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就是我一直认为的人类社会存在

的那种支配人一切的精神。多少年来，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

林巧稚激动地说着，不由得热泪直流。她向人们袒露的是一颗灼热赤诚的心啊。

1983年4月22日凌晨，巧稚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坦然地离开了人间，带着欣慰的微笑。总理曾说过：“我们要象春蚕一样，把自己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献给国家，献给社会！”巧稚把总理这语重心长的教导一直铭记在心里，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她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 忘年交——周恩来与齐白石

著名绘画艺术大师齐白石，是湖南湘潭人。1863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生靠刻苦自学，在艺术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53年荣获“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55年国际和平奖获得者。但是，在解放前，他经历的封建专制、军阀割据、国民党统治的各个时期，绘画、治印从未受到过政府的重视，他只能以此当作赖以谋生糊口的手段。

1948年冬天的战火使寒冷的北平城处于一片惊慌和混乱中。86岁高龄的齐白石此时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他看到那些达官贵人纷纷南逃，感到未来的社会可能比现在好。可他对共产党缺乏认识，而近来街上又流传共产党有一个名单，名单记着北平一大批有钱人的姓名，进城后，共产党将按名单杀人，齐白石的名字也在名单上。白石对此说法，淡然置之，他认为自己不是有钱人，再说他的钱是用心血换来的，听说共产党提倡自食其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何况自己已到风烛余年，只求温饱，断无奢望。然而时局如此动荡，战火不知何时能熄，未来又怎么样，他心中一片茫然。

一天早饭过后，齐白石坐在躺椅上，正在构思做画。北平艺专校长、著名画家徐悲鸿带着一身寒气推门进来。白石看到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朋友，在这关键时刻来看自己，十分高兴。徐连忙站起来，招呼悲鸿坐下。

徐悲鸿问了老人的生活起居，又看了挂在室内的新作，移位到白石的身边，告诉白石，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北平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极大，共产党不愿战火破坏这个文化古都，双方正在谈判。并悄悄说：田汉秘密来到了北平，捎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及共产党对北平文艺界人士的关怀和期望，希望大家留在北平。还说：“我们全家不走，北平艺专的许多先生也不走，等待解放。”白石听后，心情有所好转，相信悲鸿不会骗他。

“这几天，北平城乱得很，兵痞、特务横行，你老人家可要注意啊！”悲鸿将要走时对白石说：“解放了，一切就好了，你的画会得到更多的人的喜爱。”白石很感激徐悲鸿带来的消息，实在太好了，他留在北平的决心更坚定了。白石老人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悲鸿。

几天来，北平依然十分混乱，隆隆的炮声不断从远处传来，白石的脸上又带上了愁容。同乡黎锦熙来看他，见他这幅样子，便笑着说：“你老也害怕吗？”

“炮火连天，风声鹤唳，能不怕么？”白石回答说。

“不要怕，周恩来先生来信问您好哩！”黎锦熙说。

“你说谁？周恩来？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共产党谈判能手吗？”白石老人又一次听到周恩来对他的关怀，问道。

“对！就是那个周恩来。他不单谈判内行，搞军事、经济、文化艺术也很内行。就是他让我代他问您好呢！”白石十分惊喜，没有想到周恩来先生会惦念着他这个穷画家。黎锦熙还谈了些共产党的政策，白石最后放下了心。

北平解放后，受苦难煎熬的穷苦大众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白石看到这一切，激动不已，挥笔一连画了十几幅画，他要用自己的笔铭刻这一历史的时刻。

由于周恩来对白石的关怀，接收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沙可夫、诗人艾

青、画家江丰在画家李可染先生陪同下，到跨车胡同 15 号住所看望白石老人，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慰问。随后，又聘请白石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发给他教授的最高工资，居美术学院之首。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白石老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席由国家领导人主持的招待会。回到家里，他感到由衷的欣喜，几次对家里人说：“我没有想到我会参加这样盛大的招待会，比起旧社会来，真是太不一样了。”新中国的诞生，使他心情舒畅，好像年轻了许多。

1950 年秋，周恩来总理偶然从接近白石老人的人士那里了解到，跨车胡同 15 号齐白石的住房年久失修，又破又漏，且有坍塌的危险。便命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加以修缮。除部分房屋翻盖外，其余的也粉刷一新，并在南院打了一个三米多深、两米见方的渗脏水的大坑，解决了几十年来脏水无法排泄的困难。白石对此由衷感谢，这是他一生没有见过的事，自己未花一分钱，房子修好了，解决了生活上的不便。

恰巧此时，白石的长子不幸病故。老年丧子，白石老人不胜悲痛。总理知道后，即派秘书带花圈来跨车胡同吊唁，并送来人民币 500 元（合现值）的赙仪，表示慰问。并派修善房屋的工程队，在西郊魏公村靠近白石塘 20 米远的地方，为白石的长子修墓立碑。这对白石老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慰藉。

白石生于 1863 年农历癸寅十一月，1953 年是他 90 整寿。他在 75 岁时由于听信星相先生的话，将年龄增加两岁，叫做“瞒天过海”，以求消灾祛病。因此 1951 年便在家里做了 90 生日。1953 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齐白石补庆 90 大寿，并由木偶剧团作了专场演出。中华全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以及中央各文化单位的各方面人士参加庆祝会，人们纷纷向老人间好，祝福，会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庆祝会开到热烈时，周恩来总理赶到了会场，大家都起立鼓掌，大厅气氛达到了高潮。总理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径直走到白石老人的身旁，俯下身来亲切他说：“衷心地祝贺你 93 岁寿辰。祝你健康长寿。”白石老人和客人们听到周恩来总理的祝词，都会意地笑了。对于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专程前来，白石老人喜出望外。他异常兴奋地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说：“谢谢！谢谢！太不敢当了。”说着，眼眶里闪烁着泪花。

“您是人民杰出的艺术家，您为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周恩来总理亲切地说：“您得到这份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仔细地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艺术创作。“听说老人家近来画兴很浓，画了很多题材新颖的作品。解放后生活安定，没有顾虑，愿意为人民为祖国多作一些贡献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是 90 高龄的人了，今后要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周恩来总理关切地嘱咐道，还风趣他说：“我还等着为您做百岁大寿呢！”白石倍加高兴，回家后依然笑嘻嘻的。

在新中国的艺术长廊里，白石老人挥笔邀游。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来访的人也越来越多。1955 年秋天，周恩来总理为了使齐白石老人能有一个舒适宁静的环境，能在饭后茶余悠然散步，颐养天年，又能使来访的客人不致感到拥挤，便委托文化部和全国美术家协会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作为白石的住宅。这里院子宽阔，前后左右都有走廊，北大院植有紫藤、葡萄，南跨院还有芭蕉、斑竹。清风习习，相映成趣。但仅修

理费一项，据说就花了几万元（当时的人民币——编者注）。同时还配有秘书、看护、传达、保姆等五六人。白石一生从未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他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几次对前来探望的朋友，指着修饰一新的房子，感慨万端地说：“我多么希望能活动 120 岁，多给人民贡献点薄艺，于心才安。”

1956 年 4 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在斯德歌尔摩召开，会上确定了 1955 年度全世界四个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我国的齐白石就是其中的一个。9 月 1 日傍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会议大厅，联合举办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的仪式。大厅里灯火辉煌，热闹非凡。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门负责人，文化艺术界的著名作家、诗人、画家、及各界学者、名流，纷纷汇集到这个大厅，向对维护和平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大师齐白石老人祝贺，祝贺他获得了这份崇高的荣誉。人们个个兴高采烈，笑逐颜开，为齐白石的光荣感到自豪，为中国人民自豪。授奖仪式十分隆重、盛大，各方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齐白石老人满怀激情的致词，引起了阵阵掌声，这时，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总理，赶到会场，握着老人的手，衷心祝贺他获得这崇高的荣誉。白石老人激动不已，久久凝视着总理。

住在宽敞、明亮的雨儿胡同住宅里，白石老人感到满意和欣慰，他不停地挥笔作画。可是日子久了，一向喜欢和家属在一起的白石老人，不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他希望搬回跨车胡同，和家人一起欢度晚年。于是在 1956 年春天，一个和煦晴朗的中午，白石老人由儿子良迟、良己陪同驱车来到中南海，准备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总理，更想使总理理解他的要求。不巧，由于事先没有联系，总理去政协礼堂开会去了，不知何时回来，老人一听，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见白石老人突然而至，知道一定有什么急事，便十分亲切地招待老人坐下，端上一杯清香可口的茶水，请他们耐心等待，尔后去和总理通电话，告诉老人和良迟、良己说：“请各位稍等一下，总理开完了会就回来。”

20 多分钟过去了，突然门开之处，周恩来总理裹着一身寒气，进屋来了。总理那两道浓眉下的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放射着亲切的、智慧的光芒。他一见白石老人坐在那里等候，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就朝着老人走了过去。

白石和两个儿子一见总理，都激动地站了起来。总理紧紧地握着白石老人的手：“让您老人家久等了，忙着开会，又离不开。”说着，他轻轻扶着白石，“请老人家坐下来，请坐，本来我要去您那儿的。”

白石刚落座，总理又亲切地同良迟、良己紧紧地握手。接着，总理在老人身边坐下来。家庭般地、无拘无束地同老人及良迟、良己亲切交谈起来。

这时，午饭时间早已过去了。总理因为开完会，急着赶来见他们，所以午饭还没有吃。当他知道白石老人他们也没有吃饭时，便立即嘱咐秘书给弄饭来吃。

总理带着歉意，解释说：“真对不起，没有约定，只好请你们这些‘不速之客’吃面条了。”

工作人员很快端来了面条，放在桌子上。周总理赶忙站起来，亲自先给白石老人端了一碗，然后又分别给良迟、良己各端了一碗，风趣地对老人说：“今天我们只好同甘共苦了。”说着，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白石老人刚来时多少带有的愁苦的情绪，被刚才总理的话语，乐观而坚毅的情感一扫而光，显得特别高兴。他边吃边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说：“要的，要的。”

吃着，吃着，总理突然想起了什么，低吟起来：“不独老萍知此味。”……微微停顿了一下，总理又拉长了语调：“先人三代咬其根。”大家一听，又大笑起来。原来总理吟的是白石40年代画过的白菜图的题诗。这些诗和画充分展现了白石淡泊明志、不忘过去苦难生活的感情。谁知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看到了，而且能朗朗上口。这情景深深地感动了老人，老人十分振奋、开怀，笑得前仰后合，银丝飘逸。总理也高兴地大笑起来。在欢乐、亲切地气氛中，总理同白石老人一起吃了这难忘的一顿饭。

饭后，白石老人把要搬回跨车胡同的想法告诉了总理，总理就知道白石老人这次来，一定有什么难以启口的事，为了让白石老人心情舒畅，他一直未问，现在听到白石老人的话，非常体谅老人的苦衷，随即答应说：“我现在就送您去。”周恩来总理亲自搀扶着老人，走向早已等候在门外的汽车。

白石老人和良迟、良己为总理那坦诚、质朴无华、平易近人的态度深深感动了，感到十分过意不去，总理这么忙，怎好麻烦他亲自去送。他们一再劝总理不要去了，总理执意要送。他说：“老人家来一趟不容易，况且我本来也想去看看。”说着就上了车。秘书跑出来，提醒总理要穿大衣，免得着凉。总理说：“我晓着齐老先生的家，不远，不用穿大衣。”

车沿着中南海松柏交映的小路行驶着，总理望了一眼前面的司机说：“开慢一点。”司机点点头：“请总理放心。”车出了中南海，汇入到了车流人海之中，急驰而去，拐了几个弯，到了白石老人的住处。等车刚停稳，总理就下车，亲自开了车门，搀扶着白石老人下了车，走进屋。

谁都没有料到周恩来总理会亲自送老人回来。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白石老人还没有落座。就叫家里人赶快买东西来招待。不一会，一盘新鲜的大苹果端到了画室。总理马上削了一个，递给白石老人，老人忙摇摇手，风趣他说：“请客人先用。您也是‘不速之客’，我们没得准备，对不住，对不住。”总理一听，边吃边笑，接着说：“今天款待我吃苹果，满不错嘛，比您过去‘寒夜客来茶当酒，好多了。”老人一听，又笑得前仰后合。“寒夜客来茶当酒”是白石老人30年代画的一张画，这画许多人没有见到，即使见到了，也不会记得这句话。可是总理却看到了，且对此用到恰处，老人怎能不为他对一个老画家了解得如此透彻而倍感亲切。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天渐渐地暗了下来，白石老人与总理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宝贵的时光。将近傍晚时分，总理起身要告辞了。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家属们说：“老人是国家的人瑞，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又说：“你们不但要好好照顾老人，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然后走近老人，弯下腰，亲切地拉着老人的手说，“告辞了，老先生，请多保重，我还会来看您老人家的。”又说：“您今天想回跨车胡同，我送您来，明日想要到雨儿胡同去，我再接您去。有事打个电话，我就来。”

老人依依不舍，深情地拉着总理，坚持挽留他吃了饭再走。“公务在身，不由主啊！”总理风趣地说。

白石老人见总理执意要走，就让家人搀扶着，蹒跚地送总理到了大门口。

总理和老人再次拉了手，一再嘱咐老人要注意休息，然后才上了车。车开了，总理还探出头来，招手、点头、微笑。

望着远去的汽车，白石老人细细地回想着总理关怀爱护之情，心潮澎湃，激动万千，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他见过清王朝的顶戴大官，民国时的风云人物，外国的要人，然而，象周恩来总理这样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质朴无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他在敬爱的周总理身上，看到了这光辉的品格，崇高的形象。

回到室内，白石老人的心依然不能平静，口中不断地低吟：

暮年逢盛世，  
搭帮好总理，  
老骥珍伏枥，  
报国志千里。

晚上，在明亮的电灯下，白石老人研墨调色，十分经意地画了一幅红红的大牡丹画，表达了欣慰的心境。第二天早上，他精心地挑选了一幅得意之作《荷兰鸽子》，专程派人送到中南海，送给了周恩来总理。这是裱在瓷青色绫子上的一幅六尺横幅，裱得也相当精细。画画和赠画，这是老人抒情寄意的老习惯了。

了解了白石老人的生活起居情况，总理对搬回跨车胡同的白石老人更为关心，尤其对饮食方面，他特别嘱咐全国美术家协会和白石老人商量，每天由西单曲园酒楼为白石老人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老人想吃什么，便做什么，曲园记帐，国家付钱。后来考虑到这样做有一定的麻烦，又改成由国家每月发给老人生活费 500 元（合现值——编者注），交家属代办伙食。每逢端午、中秋、春节还另送节礼 500 元（合现值——编者注）直到老人谢世为止。

1957 年 9 月 13 日，白石老人由于感冒，身体不适，虽经中西医治疗，病情仍无明显好转。15 日，周恩来总理通知卫生部派一位中医顾问驻家治疗。经过两天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仍无好转。9 月 17 日下午 5 时左右，白石老人被送往北京医院抢救，终因年岁太高，心力衰竭，这位丹青大师结束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多采的生命历程，安祥地躺在北京医院洁白的病榻上。噩耗传出以后，当晚 8 时起，文化部、全国美术家协会以及各有关部门的领导，美术界的同行们、朋友们和他的门生，先后来到医院向遗体告别，向这位画坛巨匠致以最后的敬意。络绎不绝的来人，一直到晚上 11 点多钟才渐渐静下来。这时门口又出现了一位高大的身影，家属们不由得站起来，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上这儿来呢？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瞻仰艺术大师齐白石的遗容来了。总理面色优郁，步履沉重。他先绕遗体一周，然后停下来，用双手轻轻掀开拂盖的白布，默默地端祥着。他似乎仍和往常见面一样，亲切地向白石老人问好。随后和白石老人的家属们——握手，慰问悼念。并问白石临终时有遗嘱没有？嘱咐家属一切照老人的意思办。总理走时，已是午夜 1 点钟了。

22 日上午，首都各界人士在嘉兴寺为这位丹青大师举行公祭仪式。因周恩来总理有要事，原定不来参加葬礼。当郭沫若刚要主持开始时，总理来了电话，说他要来，希望大会推迟一会。10 时左右，总理驱车赶到嘉兴寺，同首都各界人士 400 多人一起参加了向这位为和平事业、为了世界艺术的繁荣昌盛而整整奋斗了一生的艺术巨匠，表示深深哀悼的仪式。总理一直站在那里，直到灵车开走。

周恩来总理对这位艺术大师关怀备至，七、八年如一日。他始终是白石老人心中的光辉形象。人民总理爱人民，总理心中装着亿万人民，白石老人就是其中一位。他们二人交往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 总理与盖派创始人

1962年清明节前的一天下午，蒙蒙细雨倾洒在杭州城，两个撑着油纸雨伞的行人，来到了燕甫寄庐，叩响了这里主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人称活武松的盖派创始人盖叫天的家门。

盖叫天应声开门，只见总理和他的随从秘书站在门外等着，忙说：“‘宰相，进民宅，欢迎总理！’立刻迎进房中，边沏茶边说：“从前宰相出门，前呼后拥，又是鸣锣开道，又是鸣放鞭炮；你这个‘宰相’，怎么就带了一个人，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啊！看，肩背都被雨水淋湿了。”总理笑着说：“我是来串门的，看看你五爷（盖叫天五兄弟，他排行第五。——编者注）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武松》又要拍电影了，为了你往返方便，改在上海拍、由上海电影厂负责。”周总理又说。“在上海？那好。可是谁来……”盖叫天没有说“谁当导演？”四个字。“应云卫。”总理回答说：“认识吧？”

“应导演？同老先生是老朋友了！”盖叫天的夫人薛义杰高兴的说，并端来了一盘清明艾团，“你们边说边吃吧。”“应导演来？敢情好！”盖叫天咧开嘴无声地笑了。

总理队盘中拿起一个艾团递给盖叫天，自己也拿起一个吃了起来。两个人又说开了，总理从盖老的练功情况，一直问到饮食起居，盖老十分感动。总理要走了，盖叫天依依不舍地送至门外，他望着将消失在雨中的周总理的背影，又一次对夫人薛义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省高阳县西演村人。1896年8岁的他就进了天津隆和科班学艺，先学武生，后改习老生，倒嗓后仍演武生。10岁开始登台，并随科班流浪演出。11岁以“小紧斗子”艺名在上海演出。14岁开始用“盖叫天”之名，艺冠江南。为人刚直，气节凛然，曾多次拒绝到北京充内廷供奉，也不为反动军阀堂会演出，因此几遭迫害。解放后，其表演艺术更臻炉火纯青，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1950年文化部授予他“表演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56年文化部和中國剧协为表彰其杰出艺术成就，在上海联合举行“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会，”并授予荣誉奖状。他从事京剧表演艺术几十年，苦心钻研，演技高超，形成了“武戏文唱”的独特盖派艺术，驰名南北，遂有“江南第一武生”和“活武松”之称。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剧协主席等职。

总理这次看他，使他再次重温同总理交往的往事。

1949年上海刚解放，首任市委宣传部长兼文化局局长夏衍就亲自上门拜访，向他请教如何动员戏曲界投入革命建设事业中来。并转达总理对他的问候。“我从北京来时，总理特意嘱咐我，要我代他向您问候，并要亲自登门拜访您老先生、周信芳先生和梅兰芳先生等文化界老前辈。”听到这些话，又看到夏衍对当时在上海的文艺界代表人物的尊重，感慨他说：“老戏里说的‘良禽择木而栖’，‘明珠待价而沽’，这辈子交给共产党，也值得了！”

1951年盖叫天先生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有点拘谨。总理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我在30年代就是你忠实的观众。虽然只是神交，但是我自信对你是了解的。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希望你今后能了解我们。”盖叫天没料到总理如此和蔼，平易近人，且是戏剧爱好者，紧紧握着总理的手，眼望总理，张开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事后，周总理对当时主持戏改和剧协工作的田汉和马彦祥同志说：“盖老秉性鲠直，拙于辞令。他过去不愿和官场打交道，怕见那些官僚豪绅，所以他在旧社会没有一个靠山。今天对人民政府的干部，虽然没有隔膜，但是那种清高的态度，要慢慢改变过来，只要我们对开诚相见，他会真正理解我们的。”

1953年盖叫天出席第二次文代会，又见到了总理，总理关切地问起他在杭州的情况。盖叫天说：“我生活得很好，就是住的地方没接上电灯，不方便。”谁知他随口说的一句话，总理却记住了。等他开完会返回杭州，他住的地方已接上了电灯。盖叫天感慨的对家人和朋友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1955年，总理到杭州，第一次访问燕南寄庐，看望盖叫天先生。盖叫天向他提出要长期住在杭州。总理说：“杭州是你第二故乡，又有老屋在，自然应多住，不过上海的戏剧工作更重要，它是南方的文化中心，你真正成名在上海，盖派的形成也在上海。我建议你两边都住，以后上海要成立戏剧家的组织，你和周信芳先生都要出面主持。”

盖叫天说：“上海有梅兰芳和周信芳，他们的名气挺大，能号召。”周总理认真地说：“你和梅周三位，各有所长，在武戏方面，你是当仁不让的！”

上海文化部门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盖叫天在东湖路找到一幢石库门住宅，并有庭院，盖叫天才从住了几十年的淮海路宝康里狭窄的弄堂里搬出来。至此，盖叫天在上海也有了宽敞明亮，出入方便的住宅。

1956年，文化部以及上海、浙江文化部门联合在上海为盖叫天70寿辰和舞台生涯6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并颁布荣誉奖状。盖叫天激动万分，在大会上说出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和“活到老，学到老”两句名言。

盖叫天艺高，心也高，平时在艺术上不肯屈居人下。解放前上海成立伶界联合会，她就是不愿屈就，宁肯出钱资助而不愿隶属于任何人，为此得罪过国民党的文化官员。因此，1956年上海成立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公推周信芳担任主席时，周信芳考虑到梅兰芳、盖叫天都长期住在上海，论长序和辈份，三人不相上下，因此不愿应承。周恩来对他说：“梅先生今后长住在北京了，盖老虽对新社会的事很热心，但缺乏组织才干，该你来担任。”同时，他也托人转告盖叫天，要协助周信芳挑起重任。盖叫天说：“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57年，浙江剧协分会成立，请盖叫天担任主席。盖叫天说：“总理知道我，我能号召，可没那细功夫！”周总理对他说：“浙江你应该领衔，具体工作，由副主席来帮你操办。”“我演戏呢？”盖叫天问。“这不妨碍演戏。每年演它几回，为戏剧界示范，把盖派艺术推广流传。”周总理说。盖叫天不再推辞，做了浙江剧协分会主席，之后，处事的态度也平和得多了。对此他说：“这是受总理的影响，他老人家就是平易近人。”盖叫天也常在某些节日和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中演出。

这年秋天，盖叫天发了脾气，而且一时谁也劝不住。原因是苏联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华。总理陪同他到杭州访问，为了让他看一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戏剧，特地安排了上海越剧院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此事被盖叫天知道了，他向有关部门提出要伏老演出，并且说：“伏老是苏联的英雄，我以中国古代的英雄形象来招待他，这是中国老演员的心意。”当时文化部门感到为难，因为考虑到伏老在杭州



的时间很短，不能多安排活动，特意婉言谢绝。盖老很不高兴，又听说总理也来了，更有意见。此事被周总理知道了，他说：“这件事我亲自对他说。”

当周总理亲自到盖叫天家探望时，盖叫天再三要求为伏老演出，说：“总理，我有意见！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拿了国家的钱，为什么总不让我作贡献？”周总理说：“盖老，您是我国的著名艺术家，又是高龄了，我无权让您象年轻人那样经常演出。何况这次我是要您作为主人陪伏老。您是舞台上的英雄，接待他这位苏联英雄正合适！”一句话，使盖叫天怒气全消。“我还不老，你不是说我在台上功夫还很过硬吗？”周总理笑道：“既然你一定要演，我只好同意。伏老也一定高兴能欣赏到你的精彩艺术。但是我们约法三章，首先不要用高难度的技巧，不能翻跟斗。”“那好，我就来一个抢背就得了。”盖叫天马上让步，答应总理。总理看着盖叫天说：“演一出《打店》。20分钟之内，一定不能超过。保护您的健康，我有责任。”盖叫天非常高兴，“好吧，我一定遵命”。并歉意地说：“我刚才没有弄明白，太性急了。”

演出非常成功，盖叫天和伏罗希洛夫元帅、总理都由衷的高兴。在祝酒会上，总理提到如何把盖派艺术用影片拍摄下来供后人观摩、借鉴，盖叫天说：“我想试试看，把那几出精彩的折子串起来，中间该省略的，就一笔带过。”

“这要拍几集呢？”周总理问。

盖叫天思索道：“我想，按一般影片那样两小时一部，该拍上下两集。”

“这很好。”周恩来总理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件事记下来，回京后告知文化部。

第二年，文化部即着手研究。但因盖叫天先生后来健康欠佳，就拖了下来。

1959年，盖叫天先生在上海见到周恩来总理，向他反映说：“我很想为人民多做点事，要到外地为工厂、农村和部队演出，没有班底。”“浙江不是有京剧团吗？杭州京剧团不是挺不错吗？”周恩来总理说。“可文化部门说我年高了，不能到处跑，怕我太辛苦。”盖叫天叹息着：“在旧社会为活命演出，如今生活不愁了，光这样养着不行，我想改几出戏来演。”

周恩来总理就让秘书告知浙江文化部门，提到盖叫天先生想改编他过去的拿手戏《乌江恨》的事情。浙江文化部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盖叫天组成了一个5人改戏小组，又从全省各地调来各剧中的主要武戏演员一起参加演出。

事后周恩来总理向盖叫天先生祝贺，并指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潜力很大，有些戏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盖叫天先生受到鼓舞，提出不少剧目修改的计划。但是当时浙江戏剧界并不完全支持盖叫天先生的所有想法。盖叫天先生又向周恩来总理反映。

“你主要想改哪几出戏？”周恩来总理问道。“总理，您也知道，我过去成名，主要就是在短打戏里演活了两个人——武松和黄天霸。现在不是讲民族团结吗？黄天霸为清朝在江湖上立了安清帮，这也是满汉团结。”

周总理沉吟片刻后说：“黄天霸这个人虽是虚构的，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印象太深。他是为清代的官府镇压人民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当时是清人进关夺了明朝的天下，有个侵略与被侵略的问题。在清代初年，民心不肯归顺，这和今天满汉团结不是一回事。我们要历史唯物地看问题。此外，

当狗腿来镇压人民，这也不足为训。”盖叫天先生说：“这我知道了。可我还有一人物想把他翻过来。”“谁？”周恩来总理问。“《铁公鸡》里的张嘉祥。这个人打过洋人，本领挺大。再说，现在闹剧目荒，能上演的好戏更少。《铁公鸡》这部戏很有号召力，把它兜底翻过来，不挺新鲜吗？”

周恩来总理深知盖叫天先生为丰富上演剧目，为剧种站得住脚跟的美好愿望。但是他还是婉言相劝。周恩来总理认为：中国戏曲里的传奇人物，有的是历史人物，也有的是虚构的传奇人物。但是不管如何，一旦变成艺术形象，在观众心目中生了根，就不能任意改它。他举了潘金莲、秦桧等人物的例子，认为不必为了保留传统而硬去改它。

盖叫天先生虽然对周恩来总理的话很信服，但是他心里就念念不忘把黄天霸和张嘉祥这两个人改编过来。“我是可惜这两本戏里的精采表演，因为我不演了，里面精彩的表演艺术也要失传了！”

“我赞成把它化在其它戏里，继续保存和传授下去，但是不能恢复《铁公鸡》那样的戏。作为总理，我不便开口，作为朋友，我这样劝你！”

这种诚恳、真挚的感情，感动了盖叫天先生。从此他再也不把心思放在这上面。

转眼到了1961年秋天，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京电影制片厂着手拍摄盖叫天先生的《武松》舞台艺术纪录片。导演选定了崔嵬，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拍摄计划。

“崔嵬的水平和资历是可以担当这个任务的。盖叫天先生也会接受。不过他们之间的合作，文化部和电影局要多关心。”周恩来总理说：“盖老为人很正直，但是心高多做，不肯随便屈就的，这要向崔嵬打好招呼。”

崔嵬专门为此事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听说老先生有点脾气，不好侍候。”

“也不是这回事。盖老很自信，也很自尊，你要不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生了气，脾气是很大的。”接着周总理把1957年盖叫天先生要为伏罗希洛夫元帅演出的事告诉了崔嵬。崔嵬听后，说：“我的性子也很急，和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我一定学习总理的工作作风，把工作做好。”

周恩来总理说：“盖叫天有句名言，叫做‘试试看’就是他常道的‘我在台上试，你在台下看，我练得顺手，你就看得舒服；不行，咱从头再来。什么事都是试出来的。’这很有哲理性，什么事试试再看，可以逐步做好。”

“对，我‘试试看’吧。”崔嵬答道。

盖叫天先生偕夫人薛义杰和小孙女张明珠，由浙江省文化局派的两个艺术秘书陪同，高高兴兴地到了北京。

导演崔嵬和盖叫天先生一见如故，两个人性格都很开朗，说话坦荡。崔嵬拿出拍摄计划认真征求盖叫天先生的意见，盖叫天已听说过崔嵬的艺术经历，笑着说：“崔导演，从今儿个起，我听您的！”

爽快正直的崔嵬见盖叫天先生这样干脆，自然放心大胆地去安排分镜头工作了。

崔嵬一走，盖叫天先生兴高采烈地对夫人说：“剑鸣娘，你看，中央对我多重视，总理多关怀我，派了这样老资格的大导演为我导戏。人家当过一个大区的文化部长，比咱们浙江的文化局长大得多，并导演过《小兵张嘎》等高艺术水平电影。你看他那爽气劲：‘您放心，咱们准能合作好！’还会合作不好吗！”

“事情刚刚开头，还没数码呢！”薛义杰深知老爷子的脾气，遇事过于

自信得有些天真。

“怎么会没有数码？共产党对我盖叫天的感情，加上总理这样的知心朋友，还能没有数码！”盖叫天先生胸有成竹的说。

这样，盖叫天先生和崔嵬开始了合作，两者都抱着极大的热心，尽量保持平和的声气，想把这电影拍好。可是两人是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各自都对自己的艺术了解甚透，而对对方的艺术了解甚少，开拍不久就陷入僵局。崔嵬根据电影艺术的需要，必须调整和变换角度，要盖叫天先生按他的要求做；而盖叫天先生对崔嵬的作法，十分不理解，认为无法施展他成套的表现程式和形体上的造型艺术。双方各持己见，都觉得有理，终于发生了冲突。

“崔导演，您把我几十年苦练出来的玩意全给拆了，散了，我还能拍下去吗？”盖叫天先生十分委屈，郑重的提了出来。

“老先生，您应该体谅我们的电影艺术，不能迁就您的舞台。”

崔嵬直话直说，伤害了盖叫天先生的自尊心。

“难道你让我的艺术，迁就你的电影？”

“盖老，怎么拍好电影，我比您有发言权。”

这下可激怒了盖叫天先生。“好，你发言吧！”他解下武松的罗帽，走出摄影棚：“我累了，先歇了吧！”拍摄只好暂停。

盖叫天先生回到住处，大声嚷着：“不拍了，回杭州！”

崔嵬回到休息室，心里也挺难受。这个心地坦荡容易激怒的血性汉子，觉得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接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总理，我干不了啦！”

周恩来总理听完崔嵬的汇报，心平气和地说：“崔嵬同志，你是在和盖叫天先生合作。他的经历和地位，他在艺术上的见解和受旧戏曲的深刻影响，不用我说，你也能理解。和他合作不可能是轻松的，要没有困难，怎么选上你呢？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你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和盖老合作，要注意方式方法。”

崔嵬听完这一席话，不再说什么，只想向盖叫天先生认错，努力去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盖叫天先生在夫人的劝说下，也觉得自己性子太急了，没有从崔嵬的角度考虑问题，于是想给崔嵬多讲讲戏。

双方都有克己修好的愿望，却没有找到真正的立足点。因此，两人合作拍摄延续了一段时间，又“崩”了。

最后，文化部请示周总理。总理权衡再三，让文化部传达他的意见：因北京气候寒冷，暂时请盖叫天先生回南方过冬，待明春再排；并且让夏衍等文化部领导出面，在新侨饭店为盖叫天先生饯行。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没有忘记盖叫天先生拍《武松》影片的事。他抽时间找了戏剧和电影方面的人士，再次提出了这个任务：“盖老年事已高，我看他的演出，常为他担心，70多岁的人在台上打出手、翻跟斗，会有危险的。他的艺术，趁手脚还灵活时要留下来。《武松》影片要抓紧拍，要抢时间。”他又说：“他和崔嵬是一对直性子，都是犟脾气，不必硬凑合了。另外找导演，谁合适呢？”

大家公推应云卫，并建议改在上海拍。周总理说：“那要和上海打个招呼，还要把任务向应云卫讲清楚。”并嘱咐文化部要及时办。文化部的同志

说要早些告诉盖叫天先生。

“不忙，我就要陪外宾到南方去，我亲自去告诉他。”周总理说。

这就是开头周恩来总理冒雨拜访盖叫天先生的事由。

在上海拍摄《武松》，开头也不是很顺利，但应云卫并不急于开拍，而是吸取崔嵬的教训，先从盖叫天先生的生活情趣入手，陪他上澡堂，听书，逛城隍庙，甚至为了却盖叫天先生 60 多年的心愿，陪他去南市侯家滨、金家坊寻访当年在戏里打小旗（龙套）的启蒙师傅。同时，常同盖老聊戏。

“应导演，你算是了解我的！”盖老不胜唏嘘地说。

“主要是您信任我，指点了我。”应云卫说。

“我看主要是周总理了解我们俩，才让我们合作的。”

应云卫铭记周恩来总理的嘱咐，在把舞台演出本改成电影分镜头本时，尽量多和盖叫天先生商量，并且在充分发挥盖派艺术的同时，用妥善的办法，采取灵活的手法，坚持和修改自己的创作意图。盖老也深深的总结自己同崔嵬合作的教训，逐渐的改动自己的表演，以接近应云卫的要求。拍摄在进行期间，总理又亲自关怀他们俩人的合作，他经过上海时，特地召见了应云卫，问他的拍摄进程。应云卫——答复，并聆听总理的教诲。

片子终于完成。“老爷子，说起来我是导演，其实是您在培养我！提高我！”应云卫兴奋地说。

“能拍好这部片子，一靠周总理关心，二靠你应导演耐心，按我的性子，只怕是不会拍得成功的。”盖老感慨地说。

1964 年春天，周恩来总理看了样片，高兴他说：“应云卫完成得不错。”又深沉地指出：“看来，艺术水平是一回事，工作方法又是一回事。但是方法包括在工作能力中，两者结合，能力就大了。”周恩来总理与戏剧艺术大师盖叫天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使我们看到：一个伟大革命家在平日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以他那宽广的胸怀，装着亿万人民的苦乐……

## “我来你你的入党介绍人”——总理与程砚秋

1949年的春天，是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在人民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古都显得更加娇美。自从解放军进了北平，程砚秋先生的心情一直非常舒畅。一天，他格外高兴，因为这个晚上他就要去怀仁堂演出《锁麟囊》了。下午，午睡起床后，看看镜中的自己，他决定出去洗洗澡、理个发。

程先生离开家后，家里只剩下夫人果素瑛和徒弟王吟秋。整个院子静悄悄的。这时，家里养的一条小狗忽然尖叫起来，叫声打破了深院的寂静。程夫人和王吟秋抬头从玻璃窗望出去，只见屏风门旁的走廊上站着三个身穿灰色制服的人。徒弟王吟秋想：大概又是来号房子的。他开门出去，把三位让到了饭厅。这时，其中一位身材魁梧、黑发浓眉的中年人向他问道：“程先生在家吗？”王吟秋回答说：“我师父出去了。”听说程砚秋不在，中年人便对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说：“给他留个条吧。”年轻人打开手里的公文包，取出一张小白纸条。中年人接过纸条伏身在饭桌上写了几句，然后交给王吟秋说：“程先生回来；请把这条纸条交给他吧。”王吟秋接过纸条便把他们几位送出了大门。关上大门以后，王吟秋展开纸条一看，不禁呆住了！只见上面写道：

“砚秋先生：

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此致敬礼！周恩来。”

不多时，程砚秋先生回来了。看了这张纸条，他笑得合不拢嘴，接着就埋怨王吟秋道：“你怎么连茶都没有招待招待？”王吟秋吞吞吐吐地承认：“我还以为他们是来号房子的呢？”程砚秋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说：“我见过多少国民党的大官员，我看不起他们。像解放军这位大首长如此礼贤下士，少见少见啊，可惜没能亲自会会。”

晚上6点，程砚秋先去北京饭店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宴会，席未终，他便匆匆赶回家做准备，然后乘车到了中南海怀仁堂。

绕过走廊，经过花木扶疏、景色幽静的小院，程砚秋到了后台。稍息片刻，他便开始洗脸化妆。这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张瑞芳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程砚秋。一见总理进来了，程砚秋急忙站起来，对总理说：“对不起，我手脏（手上有胭脂）不能和您握手。刚才您来家看我，失迎得很！”总理笑着说：“哪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邓颖超同志，这位是张瑞芳同志。”大家彼此含笑点头示意。程砚秋四下环顾了一下，抱歉地说：“后台乱七八，坐都没有地方坐。”总理说：“你忙吧。”便同邓颖超和张瑞芳同志到前台去看戏了。月送总理离去，程砚秋内心非常激动。

这一晚，程砚秋演的《锁麟囊》，嗓子特别好，行云流水，抑扬顿挫，演得非常精彩。从这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中，程砚秋感受到了周总理那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更从周总理身上认识到我们党的伟大。

紧张忘我的工作使程砚秋感到愉快，朋友们的支持鼓励使他感到幸福，但与此同时，他也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这源于他对自己的不满足：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他希望自己能艺术上和思想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

1956年冬，程砚秋随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回国途中正巧与周总理同乘一列火车。周总理是在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取道莫斯科回国的。总理见

到程砚秋很高兴，两个人立刻热烈地交谈起来。

火车上的谈话，使程砚秋非常激动。一回到家，他就兴奋地对夫人说：“这次出国我个人有两桩喜事，一是在列宁格勒见到了三儿子，”“第二件喜事恐怕你就猜不到了。”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慢条斯理地说：“总理在火车上找我谈话了！总理问我怎么不入党啊？我说我缺点太多，不够资格。旧社会养成的个人奋斗，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加上生活散漫……总理鼓励我说，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嘛，总理还说了好多，他对我程某人是太了解了，连我自己没有想到的细小进步，他都注意到了。我说没有介绍人呐，总理当即表示：‘我来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要好好努力才对得起总理对我的爱护和信任呀。”程砚秋又讲起在北京站下车的时候，贺老总来接代表团，周总理把火车上谈的事情告诉了贺龙，贺老总高兴地走过来握着程砚秋的手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作你的第二个介绍人。”讲到这里，程砚秋对夫人说：“这真是我平生最激动的事啊！”

1957年秋的一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给程砚秋的家打了一个电话：“邓大姐请你和爱人一起来吃螃蟹。”程砚秋答话说他马上去中南海。正在程砚秋换衣服的时候，周总理却亲自来家里接他们来了。

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中南海。邓颖超、贺龙夫妇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一见面，大家都觉得特别亲热。寒暄落座后，工作人员端上了丰肥的大螃蟹，贺老总斟满两杯酒，一杯递给程砚秋，一杯举在手中对程砚秋说：“来，祝你成功！”席间，周总理向程砚秋询问了戏剧界一些名角儿的近况，又谈了一点别的事情，然后催促邓颖超说：“今晚天桥剧场有戏，你们几位先走吧，我们还有些事要谈，晚一些去，”说着就起身同贺老总和程砚秋一起进入了另一个房间。这天看完戏回到家里，程砚秋和夫人果素璞坐在屋里，回味着这愉快的一天，谁也不想去睡。果素璞到底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问程砚秋：周总理和贺老总单独给你谈了些什么？程砚秋说：“谈的是关于入党的问题，我说我现在还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总理问我自己觉得怎样，我说觉得比以前有进步了。他们两位都笑了，并说你自己说自己进步不行，得别人说你进步才行呢。”这之后不久，总理和贺老总分别给程砚秋写了信，正式同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给程砚秋的信是这样写的：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现。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程砚秋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他的夙愿实现了！

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程砚秋满怀信心要以更好的行动报答党和周总理关怀的时候，病魔却在悄悄吞噬着他的生命。1958年3月9日，程砚秋被心肌梗塞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在程砚秋逝世之后，周总理更加关怀程派艺术的发展。提起总理关怀程派艺术，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那还是程砚秋先生在世时候的事。有个叫赵华的女孩很小就失去了父母。1946年，她20岁时参加了共产党，为了纪念她的新生，她便改名“江新熔”。解放后，在她去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周总理派人接她去参加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演出宴会。宴会之后，周总理的秘书把她带到周总理身边，梅兰芳、程砚秋先生也都在座。她为总理和梅、程两位先生清唱了一段程派《三击掌》，大家都很赞赏。唱毕，总理高兴地对程砚秋先生说：“程先生，你一辈子没收过女徒弟，今天，我介绍江新熔作你的弟子，我当这个介绍人。”说着，总理又回过头对江新熔说，过去你是山东的“梅兰芳”，今后要做山东的“程砚秋”了。梅先生和程先生听了，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总理又问江新熔名字的含义，江新熔回答说，她是党领着走上新路的，部队是个新的熔炉，所以叫新熔。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连说：“起得好，起得好。不过，我看把熔字去掉火字边，加上草头，芙蓉的‘蓉’岂不更好。”程先生也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以后，江新蓉就在程砚秋老师的直接培养和指点下，刻苦学艺很快就有了明显的进步，程派的风格也更成熟。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她清唱的《三击掌》、《玉堂春》和《骂殿》选段，获得了金质奖章。这几个唱段，在她出国前，程先生都给作了反复的加工指导。

程砚秋先生的不幸逝世，使总理非常悲痛。1959年北京举办纪念程砚秋一周年演出，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还具体指示并亲自参加了这一纪念活动。他请程派弟子赵荣琛、王吟秋、李蔷华、江新蓉、侯玉兰、李世济，还有程派鼓师白登云和琴师钟世章到家里座谈、便餐。那次会上，总理很风趣地说，全国6亿人就只有你们6个人会演程派戏，这太少了。他提议要抢救程派艺术，搞一个程派剧团，把程派艺人和乐队都调来。饭后，总理、邓大姐还与大家合影留念。不久，“北京市青年京剧团”成立了。

1960年8月的一天，周总理请程砚秋同志的夫人果素瑛同志吃饭。这天，梅兰芳先生来了，齐燕铭同志来了，还有几位程门弟子和唱程派戏的演员。因为大家来得早，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就清唱助兴。程夫人唱了一段《文姬归汉》中的“整归鞭……”梅兰芳唱了《玉堂春》中的“来至在都察院……”邓颖超同志也欣然而至，并且兴致勃勃地唱了一段戏。刚唱完，总理就哈哈大笑地与大家一起热烈鼓掌。邓颖超说，你们应该请总理表演，总理年轻的时候演过话剧，大家一听连忙请总理唱一段，总理笑着摆手，气氛十分活跃。吃饭的时候，大家也是无拘无束，象是在自己家里一样。以后，每逢程砚秋先生的忌辰，总理都要亲切地会见程夫人和程派传人，细致地过问剧团演出情况和培养后继等问题。

周总理对程砚秋无限关怀和对程派艺术的爱护，令人们尤其是程派弟子终生难忘。

## 周恩来和张学良将军

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是对中国现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和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都有接触；他与中国现代社会许多上层人物都发生过关系。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交往的时间前后加在一起不过8天9夜，在岁月的长河中短得微乎其微。然而周恩来同志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给张学良指出了人生发展的前途，而后又思念张学良达40年之久。真可谓情长谊深。

### 一、延安，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1936年3月，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经过曾被红军俘虏并经过教育愿为抗日救国出力的东北军619团团团长高福源的牵头联系，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同志在陕西洛川进行了会谈。继而张学良提出，由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他商谈，地点定在当时仍为东北军防地的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中共中央对此建议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后，复电张学良将军表示同意，并告之委派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全权代表与他进行会谈。

4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从瓦窑堡专程冒雪赶到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将军作彻夜长谈。周副主席与张将军过去并不相识，这是头一次见面。

张学良对这次会谈，思想情况既复杂又矛盾。因为在两年前他从欧洲回国时，从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那里学到一点经验，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象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各派力量的意志集中起来，才能抗击日寇应付国难，因此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他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大官僚集团。

张学良在彼此寒暄之后，首先就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很坦率地说了出来，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主义道路，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前一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副主席见张学良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周恩来同志开导张学良说：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亡，谁就是千古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张学良听了这一席话后就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接着张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副主席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张学良将军也很激动。周副主席稍稍停了停，说道：“旧帐，我们不愿意再算了。在抗周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张学良非常高兴地说：“对啊！抗日是当前急迫的事啊！”

对这次会谈，张学良感到非常满意，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一下解决了，他觉得心情豁然开朗，充满信心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红军与东北军还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



这次会谈最大的成果，是达成了联蒋抗日的协定，中国共产党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作了让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副主席与张将军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了表示对抗战的支持，张学良将军当即拿出2万银元送给红军，会谈结束返回西安后又拿出20万元法币托中共代表转送红军。对周副主席托他购买无线电器材和医药的事也一口答应。

经过了彻夜发自肺腑的长谈，10日凌晨4时双方握手告别，临别时张学良将军亲自将一本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地图赠送给周恩来副主席手中，以作纪念。

周恩来同志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才能以及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言辞风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印象极为深刻，终身难忘。他事后曾说：“美髯公周先生，的确是位伟大政治家，共产党有这样的人物，必将成大功。我很钦佩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他提出的办法，是切合实际可行的。尤其令人敬重的，是他那种虚怀若谷倾听客观意见的作风，例如他认真细致地考虑我提出的红军不要向河北省进军，可以取道绥远与傅宜生（傅作义）合作，把兵力增加千百灵庙战线上，以扩大抗日战果的意见。在延安会谈中，周先生给我指明了历史发展趋势，这对尔后的行动，是有巨大价值的。天主堂我结识了美髯公，是很有收获啊。”

延安，这次具有历史的会见，完全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的，它不仅使张学良将军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对于他本人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收获。

## 二、由“西安事变”引起的三哭张学良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长城内外大片国土沦落敌手，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及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强烈要求蒋介石放弃反动政策，接受中共的联合抗日的主张。对于他们的呼声，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而且逼迫张、杨及所部进攻红军。在多次“苦谏”、“诤谏”、“哭谏”均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于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逮捕了蒋介石以及几十名蒋帮军政大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早晨，张学良、杨虎城就打电报给位居陕北的中共中央，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后出现的事宜，特别希望能派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团长。为了表达张、杨两将军能深切盼望中共代表团早日到达的心愿，还特别提出可派飞机去延安接送代表团。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义举。同时决定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同志率领，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奔赴西安。

12月17日天近黄昏的时候，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同志走出机舱，乘坐汽车来到市区，下榻于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当晚举行宴会欢迎中共代表团之后，即与周副主席进行了彻夜长谈。

周副主席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

针；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热忱给予充分肯定。阐明了中共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一）蒋介石的被捉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兵败就擒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这次只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军事手段把他捉来了。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二）西安事变后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好的前途是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答应这些条件放他回去，有利于发动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提供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

周恩来同志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精辟透彻的分析，紧紧地抓住了张学良的心。张学良虽也想和平解决事变，但仅仅是一个想法，远没有周副主席讲的那样清楚、完满。现在通过交谈，张学良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清楚了，对逼蒋抗日的信念坚定了。他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同志大公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卓越才能更是十分钦佩。他感到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就有了主心骨。真正作出最后的决定，还是在和周副主席交谈之后。

在周恩来同志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张、杨和各方面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张学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认识不足，“对蒋的背信弃义缺乏警惕，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在没有通知周恩来，没和杨虎城商量的情况下，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飞离了西安。

直到4时左右，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孙铭久通报消息，周恩来同志方知此事。当时周副主席正在办公室与代表团其他同志研究工作，孙铭久推门进来，张口就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周恩来同志极为惊讶：“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久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恩来同志十分焦急地说：“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孙铭久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即刻带着孙铭久乘车疾驰机场、想阻止张学良的行动。但到机场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同志仰望天空，眼流热泪，连声呼唤：“张副司令，张副司令。”后来周恩来同志叹息地对人讲：“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去南京前夕，在出席重庆文化界举行的话别茶会上，有人提起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10年鱼的人，他这10年钓鱼的日子不容易过的呀……。”别人听了这番话都十分难过，周恩来同志的眼内更是闪出了悲凉的泪花。

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同志亲自请在京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参加当年西安事变的诸位同志，在北京饭店举行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张学良的四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因当时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发表了经过篡改的《张学良西安忏悔录》，情不可抑，激动万分，在给周恩来同志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同志感怀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不幸遭遇，热泪潸潸而下，邓颖超同志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同志深情的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

### 三、数十年的思念

从西安事变以后的数十年间，周恩来同志一直惦念囚禁中的张学良。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有一天在会议上，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发言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这番话使在座的一帮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个个闭目阖眼，满脸羞惭，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同年，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严正地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

1956年，周恩来同志在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大会上，再次高度评价张学良将军说：“无论张学良将军是死是活，我们中国共产党都评价他为千古功臣！”

1949年5月5日晚，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饭店举行便宴，迎接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从国外胜利返回。宴会上，周恩来同志谈笑风声，整个大厅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谈笑中，有人提到《参考消息》上登载张学良处死的消息。虽然，后来查明这个消息是错误的，但当时却引起了周恩来同志强烈的不安。他那愉快的面色顿时消失了，疑虑和痛苦的神情涌上了眉梢，两条又粗又重的眉毛紧紧地皱在了一起。沉默了好长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我们不应当让张群跑掉，不然，可以拿他作为人质来交换张学良将军。”

1961年周恩来同志在召集东北军与西北军旧部开座谈会时说：“张学良将军不是孤身一人在台湾坚持苦斗，全国人民和他在一起，不会忘记他的功绩。”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的亲朋故旧也给予了多方照顾。

1958年秋，周恩来总理到北京东四八条访问张学良二弟张学铭，见到张学铭的夫人朱启筠时，总理问道：“你认识赵四小姐吗？”朱启筠回答：“我和她从小同学，很熟。”总理听了很有感慨地说：“赵四小姐，聪明贤慧啊！”谁都知道，赵四小姐名叫赵一获，她不惜抛弃优越条件，“自投罗网”，甘愿做一只比翼鸟，几十年一直与张学良相依为命，患难相从，始终不渝，这些已成为佳话，传为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美谈，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慕，事迹十分感人。周恩来同志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说明是对她个人的赞扬，而且也表达了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的深切关怀。

1952年为了解决京津两地张学良家属的生活问题，周恩来同志特地指定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经手，由全国政协出面将北京的张家产业承顺王府作价购买，钱款按张学良的家属人数平均分配，每人一万元。对于在海外不能回来取款的，也把应得的份额存入银行，待以后支取。

以后，周恩来又多次接见海外回国探亲、参观、访问的人士，多方打听张学良的情况，对他的下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冤屈、打击和摧残，这里也包括了张学良的亲属。张学良的四弟、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的张学恩被残酷迫害致死。周恩来同志闻讯后义愤填膺，几经周折，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为他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平反昭

雪。

1974年在审订参加庆祝25周年招待会的拟见报名单时，周恩来同志不顾癌症的折磨，在医院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坚持提出名单上加上张学铭的名字，并着重指出：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故邀张学铭出席有必要。”

历史是公正的，凡是对国家民族作过贡献的，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对于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的交往，早在1946年张学思就说过：“前一时期，有人告诉我，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军委会上，仗义执言，严厉指斥国民党政府不放他出来，我深受感动。如家兄知道此事，必为他得到这样一位知己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由衷的愉快和安慰！”张学思的这段肺腑之言如被张学良将军听到，他也会感到无比欣慰的。

## 相遇贵相知——周恩来与马寅初

1976年1月，寒冷的冬天依然笼罩着北京城。凛冽的北风，发出阵阵深沉的哀叫，行人们迈着沉重的步履，默默地走着。望一望人们的脸上，总看到他们的眼中闪着伤心的泪。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所住宅里，一位耄耋老人，静静地坐在轮椅上，面向墙壁。墙上挂着镶有周恩来总理像的镜框，四周披着黑纱，黑纱上缀满了白花，老人一会凝视着总理的遗像，一会闭目沉思，泪水不断地从老人脸上流下。

这位老人就是94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人口学专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

看到老泪纵横的老人，儿子轻轻地走过来，在老人身旁，极其温和地劝慰道：“您不要过度伤心，否则会伤了您的身体。”

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老人无动于衷，只是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我要向总理告别。”

“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可您已90多岁了，下肢瘫痪，行动很不方便，再说您近日又患病，小便十分频繁，去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恐怕不太适宜。”儿子耐心的回答道。儿女们是不愿让老人看到总理的遗容，怕他过度悲伤。

“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马老十分固执地说。

儿女们看到老人执意要去，也就不再说什么，只好顺从老人的心愿了。

马老又面向墙壁，件件往事涌上心头……

1882年，马寅初出生于浙江。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15年抱着使祖国富强的信念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富于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的马寅初，长期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义愤填膺。1939年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抨击时弊；同时，又以他那犀利的笔锋，无情揭露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引起了四大家族的恐慌和痛恨。11月24日，在重庆大学的大礼堂里，马老又作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货币》的演讲。马老面对前来听他演讲的人，慷慨激昂，开门见山地劈头就说：“我最近提出一种主张，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你们赞成我的主张吗？”人山人海的大礼堂内外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马老的演讲犹如喷射的火焰，把整个山城都点燃了起来，滚滚烈火向统治者冲去。从而引起了反动当局慌慌不安，他们极为忌恨。这样危险就日益逼近了马老。鉴于马老的威望，他们不敢冒然采取强硬措施，来对付这位驰名中外的经济学家。于是就派专人恳请马老与他们“合作”，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老对此嗤之以鼻，严辞拒绝。利诱不成，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但这些都不能使既敢怒又敢言的马老“就范”。国民党当局遂急不可待地施行暴力迫害。1940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手逮捕了马寅初，投进息烽集中营囚禁。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同重庆各界人士一道设法营救马老。《新华日报》即刻以迂回的方式把马老被捕的消息分布于众，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山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声援。周恩来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各种关系会同各

界人士极力呼吁营救。1941年3月，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为营救马老早日出狱，准备在30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两报刊出，就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慌，下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3月24日在周恩来的授意下，《新华日报》登出了一则消息说：“立法委员、重大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今年欣逢六秩大庆，重大全体同学为庆祝热心抗日救国之前辈起见，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假该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并于当晚进行游艺，望各界马氏知友责临参加庆祝。”国民党政府为了制止这次活动，蒋介石还亲自下“手谕”严禁重大师生召开“马寅初祝寿会”，并威胁要用法律制裁。到那天竟采取减少汽车班次，破坏交通，实行断电，不许使用大礼堂等恶劣手段，阻碍这次祝寿会。3月30日晚上，重大进步师生冲破重重障碍，祝寿会如期举行。各界知名人士，报社记者纷纷前往，有的人竟徒步30余里赶到重大。寿堂改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只好寿烛高照，反更衬出祝寿的气氛。寿堂的正面悬挂着“明师永寿”四个金字横幅，周围的场上挂满的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送来的一幅幅寿幛、寿联和字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合赠送的红绸子对联，上面用苍劲有力的楷书写着：“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落款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鞠躬敬祝。”广大的与会者都说周恩来等人送的这幅寿联好，文化矍烁，寓意精深。年轻一点的人就问，不知该作何解释。有人在旁说：“马老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有20余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今天重大的同学和其他高校同学一起，勇敢地投身到民主爱国运动的激流之中，不顾当局的阻碍为明师祝寿。正可以说是‘桃之夭夭，其华的的’。可惜的是，今天寿堂之上却不能见到老寿公，让人感到非常遗憾，所以就写成了坐帐无鹤。因为龟和鹤都是被人们用来比喻人的高龄的。下联说的是马老此时此刻正远阻关山，孤零零地囚坐在异地他乡，身边无亲无友，只能以琴书为伴。“龟”字一语双关，用得恰到好处，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马老必能胜利地归来！这龟与归是同音字。”这幅寿联给身陷囹圄的马寅初教授和营救马老的民主人士及重大师生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更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

第二天，重庆各家报纸有关庆祝马老60寿辰的报道，都被新闻检查官扣押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对此采取了一个特殊斗争方式，他们在头版的显眼地方：登出了一个有边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60寿辰之稿2篇，奉命令免登。”既向广大人民报道了祝寿会这样具有强烈反抗情绪的活动，同时又揭穿了国民党通过新闻检查压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弄得国民党内那班专搞文化摩擦的专家们也无可奈何。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下令于1942年8月释放了马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也不准任何大学聘请马老教书。这样马老虽已出狱，却仍无任何人身自由。不久，马老写了篇文章、试投国民党各报，均披退回，不予发表，马老是教书不成，投稿无路，再度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得知此事，马上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的许涤新同志：“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新华日报》派一名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家中访问，并取来马老的文章，由许涤新同志和那位记者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把马老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说：“写得很好嘛！明天《新华

日报》以一个版面一次登完！”并指示《新华日报》的同志给马老最高的稿酬，这是对马老生活困难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接济手段。马者得知这一切，深为感动，为自己有周恩来这样的朋友——在自己危难中能鼎力相助而感到欣慰。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真为老百姓说话。这件事，也大大鼓舞了山城各界人士，特别是文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从此，《新华日报》的记者经常到马老家采访，马老也经常参加《新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有一次，董必武和王若飞同志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国事。马老即席发言说：“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1944年11月，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并就建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协商谈判，周恩来同志乘飞机从延安到重庆。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听到周公又来重庆的消息，无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一天上午郭沫若匆匆来到马寅初家，进门就叫：“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马老也被来客的这种欢乐情绪所感染，连忙问道：“什么大好消息？”郭沫若用手指有节奏的敲着书案吟哦道：“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快要解之日了！”老马闻听此讯，精神为之一振，站起身来搓了搓手，又坐下来，静听郭沫若为他诉说外面的一切。

“周公说他将要尽一切努力，要求国民党尽快地恢复你的自由”郭沫若最后说。

马老听到这里，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见郭沫若起身要走，便拉住他，随即取出一瓶老窖来，两人畅饮起来。不久，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好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人身自由。马老恢复自由后，更加积极投身到反蒋斗争中去。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日渐亲密一步步走上民主革命阵线，成为享有盛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8年底，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马老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帮助下，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北上进入了解放区。1949年9月，马老应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出任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从此，他俩又开始了新的合作。

1951年9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校教育为目的的教师学习运动。马老想邀请周恩来总理来北大为教师学习会作一次报告。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北大的学习运动，欣然应允，支持马老的工作，并亲自和马者研究，商定题目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听讲的对象扩大为京津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地点在北京怀仁堂。9月29日，怀仁堂里坐满了来自京津地区高校的教师，有些老师，当时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来的，以为政府总理亲自讲话，足见问题之严重，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会议开始了，周恩来总理身穿普通灰布制服，脚穿一双青布鞋，来到会场。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竟从他自己的家庭、身世讲起，讲到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在党的领导下，革命胜利了，胜利之后又如何抵制了各种旧传统势力的袭击，正确地处理了个人、家庭和革命的关系。总理指出，知识分子要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总理的报告使不少人的紧张情绪消失了，感到句句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周恩来总理共讲了5个多

小时，最后亲切地鼓励大家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人民的立场，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马者坐在桌旁仔细地听讲，并详细地做了笔记。周恩来总理讲完后，马者兴奋地对大家说：“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对于推动我们的政治学习太重要了！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周总理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率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用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它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要求，而且还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动了学习改造的过程。”擅长演讲的马寅初先生，从心中佩服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风度、口才和技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常对人提起这次演讲。他认为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犹如和煦的春天，开启了人们的心扉；恰如微微细雨，滋润了人们的心田。这个报告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对于1952年进行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55年，马老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实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一向治学严谨的马老，为了慎重起见，先在人大浙江小组征求意见。在当时，盛行的是苏联的人口新观点，认为人多力量大，谈控制人口是不受欢迎的。有的代表认为马老不识时务，有的代表主张对马者进行批判。周总理得知后，阻止了对马老的批判。马老认为人口问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继续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1957年4月27日，马老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人口问题的讲演，这是马老解放后公开进行的学术讲演，阐明关系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生存和幸福的人口问题，反对人口愈多愈好、社会主义社会永远不会有人口问题等教条主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之后，他又征求了潘序伦、陈达、竺可桢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把讲演稿修改加工整理成一篇《新人口论》的专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5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此时，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暴风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也有不点名批判马老的文章。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对马者进行批判。有人主张干脆把马老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许涤新同志请示周总理，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总理出面制止，马老才幸免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十年浩劫中，红卫兵抄家天天发生，许多人被扫地出门。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原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先生一家始终未遭浩劫，这不能不使马老感动。

1972年春，病魔侵入了90高龄的马老的身躯，大便出血。多方诊断，认为马老患了直肠癌。癌，这个人类尚未降服的“凶恶敌人”，曾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何况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染上了它呢？

怎么办？医院方面经过研究，认为马老已90高龄，不宜再动手术，决定放射结合药物治疗。马老的儿女和马老考虑，癌细胞扩散发展到后期，必会夺去病人的生命，而到晚期，病人的痛苦更不堪设想，所以极力要求手术治疗。马老对自己身体体质有信心。他自小酷爱体育运动，中年以后，主要锻炼方法是爬山和冷水浴。在75岁高龄时，他爬香山“鬼见愁”健步如飞，连他的30多岁的儿子都跟不上。长期不懈的锻炼，造就了他强壮的体魄。因此，



他敢要求在 90 岁上施以大手术治疗。医院仍不同意动手术，双方各持己见，不能决断。最后，马老夫人率子女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手术治疗请求报告，报告很快转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在详细看了治疗方案和请求报告后，当即批示：“本人有手术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以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会望告。”由于有周恩来总理批示，手术治疗方案最后定妥。考虑到马老年事已高，手术分两次进行。为了集中力量，总理还批准从天津请来三位大夫，其中一位就是脖子上挂过“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两个月前还在扫厕所的天津人民医院院长金显宅大夫。又从协和医院请来麻醉医生。在第二次手术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指示三点：“手术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手术中要慎重细致，手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马老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癌病魔，渐渐康复起来。一次，他的一位老友来看望他，马老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重庆救我一次。这次动手术，又救了我呀！”

1975 年春节期间，积劳成疾、病势日重的周总理，在病榻上仍关怀惦念着马老的身体，特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吴蔚然大夫和卞志强大夫专程到马老家，代表总理看望马老。两位大夫嘘寒问暖，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生活起居、家庭成员、困难请求，逐一详问，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体，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位大夫最后再次代表总理向马老致慰问之意后，才告辞离去。

半小时后，两位大夫从总理住处打来电话说，总理已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这就是说，两位大夫回到总理处，即刻向总理汇报了马老的情况。可见总理的急切关怀之情！

大夫在电话中告诉马老的家属：“总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老吃什么药？唉，刚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啦。”

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五个字：“周总理无私。”

和总理交往中感人的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他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儿女把轮椅推到桌前，马老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没有喝汤。晚饭结束后，整个晚上也没喝水。第二天早上马老又忍住渴没喝按惯例端到面前的稀粥。接马老的汽车来了，两个孙子把马老抬到汽车上。在儿孙们的帮助下，马老终于来到了北京医院的吊唁厅。老人家一见安眠在苍松翠柏和花束环绕之中，神态安详的周恩来总理，泪水模糊了双眼。他想扑上前去，无奈双腿瘫痪，动弹不得，而且连鞠躬都难以做到。老人执意要向周恩来总理遗体行礼，他的儿孙们只好费劲地扶起他，用手按低他的手，一下、二下、三下。

马老坐好后，又在总理遗体旁默哀，望着周恩来总理那刚毅、坚强而又和蔼可亲的遗容，饱经沧桑的九旬老人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总理啊总理；您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危难之中的救命恩人啊！大恩大德，没齿难忘。正寄希望于您，盼望健康长寿，怎知您竟先我而去呢？我的挚友啊，我多想你能起死回生啊。儿孙们赶紧扶住马老，向前缓缓推动轮椅，围绕总理遗体转了一圈。老人不忍离去，又要儿孙们推着再转一圈，才离开了吊唁厅。老人家泪眼朦胧，极力想扭头再望一眼……



## 知音——周恩来与李四光的交往

1971年5月3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间小屋子里不停地奏响着低沉的哀乐。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著名科学家、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告别仪式”正在举行。许多人在房前的院子里肃穆地站着，面向小屋，默默地哀悼。屋里密密麻麻地站着2、30个人，面向遗体，默默地悼念。周恩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郭沫若等领导人和李四光的家属都在那里。悲痛欲绝的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抬眼望见悲伤中的总理，不由心头一热，泪水再一次从脸上流下。在这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一切正常的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就连死人应有的追悼会也只好用“告别仪式”来代替。总理能够亲自参加，足以使这个告别仪式成为一个庄严隆重的追悼会。这既寄托了生者的哀思，也了却了死者的心愿。

哀乐暂时停了，主持人郭沫若正要说什么，总理走上前来，站在扩音器前，停了一会儿，沉痛地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可是早上来时，我收到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信……说到这里，总理转过头来问道：“李林同志来了没有？”“来了”李林回答。总理又接着说：我在休息室里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就用李林同志的信作悼词，他们都同意了。我现在就念这封信。说完，总理从衣袋里拿出那封信，慢慢展开念起来：

敬爱的总理：

我父亲突然去世，使他未能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也来不及留什么话，这是极大的遗憾。我作为他亲生的女儿，觉得有责任向总理，并希望通过总理向我们伟大的领导毛主席表达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忱。……

敬爱的总理，我父亲老想找您谈一谈我国科学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想到您太忙，不忍心打搅您，他总想找一个机会再和您谈，他有许多话要对您讲，但是遗憾的是还没有来的及讲，他就去世了。在他的遗物中找到这样一个纸条子，上面写着：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还是走资本主义陈腐的老路……”

总理念到这里，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大家：再继续大声地念着下面的话：

“把地球交给我们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作燃料烧掉，不到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宽恕的。”……

当念到信中最后一段关于李四光对总理的敬意时，他停了下来，把信叠好放进了口袋里。

在信的最后李林这样写道：

敬爱的总理，我父亲经常给我说：您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经常每天工作20多小时。

他对您是十分敬爱的。他还提到邓大姐，邓大姐对我们一家都很关心，我们是非常感激的。

我们衷心感到党组织对我们的关怀和温暖。

他还希望总理多保重身体，为我国和世界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林

1971年5月2日

追悼会结束时，周总理走到门前去，大声问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听见了他念的信没有，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把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了。并强调大家要记住李老的最后一段话。

然后，总理缓步走向李四光的家属，后面跟着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理走到李四光夫人许淑彬的面前，紧紧握住了她的手，低沉而有力地对她说：许大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总理默默地和家属一一握手，最后看见了李四光的秘书周国钧同志。总理打量了他一下，轻声问：你是？周国钧同志回答道：“我是秘书”。总理握住他的手说：“请把李四光同志遗留下来的资料好好地整理出来。”

这一切无不使在场的同志激动，他们看到了党对科技战线和科技工作者寄予的深切期望和关怀，同时，勾起他们对总理和李四光交往的回忆。

出身贫寒的李四光历经磨难，刻苦钻研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杰出的地质学家。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此后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很长时间内，他为此而感到痛苦和迷茫。

抗战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对李四光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讲给李四光，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本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但在同周恩来谈话之后，情不自禁地对亲人说了许多话。他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从1948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他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9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为安排保护李四光回国，亲自写信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驻苏联大使王稼祥。

吴文焘并告王稼祥：

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向捷克当局文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周恩来

11月15日

听到党和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毅然决然拒绝随蒋介石迁移台湾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大半年的辗转跋涉，终于回到了获得新生的祖国。

李四光回国不久，就赶到北京，本来自己年迈多病，担任地质所所长还

合适，领导上让他出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他恐怕辜负了党和政府的重托，准备让领导再作考虑，他一到，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他：共和国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你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李四光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当即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并马上请几位与他共同工作的同志找材料，查情况，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找有关人员商议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走进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总理已经跨进了房门，一把攥住李四光的手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呀！

李四光完全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这么忙，会亲自来看望他。他紧紧拉着周总理的手，仔细端详着总理，热切地说：总理，你比前几年胖了。周总理两手在胸前一抱，开朗地笑着说：不过，我听说，你回国来心脏病又犯了。这可要抓紧时间，请医生看看。还有，许大姐，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也要好好检查检查，这和在重庆那会儿不同了，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医院啰。

周总理又指了指写字台上的地图、资料说：你们在一起，真是一谈话就离不开本行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李四光想，周总理现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抽出时间到这里是不容易的，就此向总理汇报、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

周总理认真听李四光讲完，说：我们的事业正在进行，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

李四光详细地向总理讲了回国的经过和在国外的见闻，最后又讲到地质工作上来。他说：可惜过去搞地质的太少了。旧中国顶多有200多个。有的还因生活无法维持改了行。总理说：是啊，蒋介石摧残科学家，压迫知识分子，有些有本事的人，也被他们糟蹋了。我们要先把这些专业人员集中起来，把队伍整顿一下。你看，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来当一段时间的主任，等到条件成熟了，再成立地质部？总之，我们要尽快地开展工作，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总理又问他关于中国地质构造的特点、地质力学的理论，几年来国外科学的发展和英、法、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情况等等。他称赞李四光不盲从外国权威、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把朴素的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又委婉地要求他，今后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他说：地质力学对传统地质学是一场革命，要发展地质力学，必须以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呵！总理的话如春风化雨，点点洒落在李四光的心田里。

时钟已过8点，长安街上万家灯火。总理起身告辞。总理的汽车已经远去了，李四光的内心仍激动不已。李四光的夫人后悔地说：看，我们多不懂事！时间这么晚了，也没请总理吃饭。李四光这才看了看表。他早忘记了时间。

60多岁的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全力投入工作，勤奋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回国的20多年里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切与他同周恩来总

理的交往以及总理对他在政治、生活、工作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有密切的关系。1952年在周总理提议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开始了直接在总理领导下的工作。此后，李四光忘我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步步崛起，为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

1957年初，李四光患肾脏病，组织上送他到杭州疗养。3月的一天，阳光明媚，春风宜人。吃过早饭，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到院子里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停在山坡下的竹林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车来，顺着小路登上山坡，健步向他们走来。啊，是周总理！李四光和许淑彬喜出望外，快步迎了上去。

“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李四光紧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总理拉着李四光的手，边走边风趣地说：这次我可把他们（指警卫员）给甩掉了。原来总理这次是陪外宾到杭州参观来的。他忙完公事后，就向交际处要了一辆车来看望李四光。

进屋坐定后，许淑彬想总理这么忙，一定还没有吃饭，她站起身来，轻轻地向门口走去。

“许大姐，你不要走，一块儿谈谈！”总理想起了李四光的身体和病情。看到他精神很好，两人就亲热地谈了起来。

总理先谈了当时国际上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些事情。接着告诉李四光，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内很快要整风了。这次要动员党内外力量。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要李四光考虑一下，有什么意见尽可以提出来，帮助党搞好整风，总理还问李四光，自己对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些什么想法？李四光看着总理亲切、热情的目光，听着他诚恳、晓畅的谈话，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激情。久已盘旋在心底的许多话，象破闸而出的激流，立即向总理倾诉出来。

李四光为人正直，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很早就想要求入党，但又深深感到自己的条件不够。他惭愧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几十年间，在无数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里，自己不曾投身于革命队伍；又觉得现在无论从阶级觉悟、世界观的改造和对党的事业的贡献来讲，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再加上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因此，对是否提出入党要求，一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

听了李四光的心里话，总理诚恳地对他讲：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总理又说：入党是自愿的。要李四光好好地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和他所在单位以及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等中途悄悄退出的许淑彬来请他俩吃午饭时，他们才发现已是中午时分了。

这时，恰巧总理的秘书也找来了，请总理赶快回去，说有要事需要处理。李四光夫妇本想让总理吃了饭再走，可是现在不能强留，只好放行了。

总理走到了门口，忽然看见李四光4岁的外孙女，正在草地上玩，就走过去把她抱了起来，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小女孩抱着总理的脖子，天真地看着这位黑头发爷爷，亲热地叫了一声“周公公”。总理高兴地笑了，先用胡子扎了扎女孩的脸，又亲了亲她；然后转过来和李四光夫妻

笑着说：“你们二位只有一个女儿，你们的女儿也只有一个女儿！”

李四光夫妇看到总理这样喜欢孩子，想起总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历，眼睛禁不住渐渐地湿润了。总理和邓大姐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们虽没有一个亲生的儿女，但是，全中国的儿童又都是他们的孩子！总理的言传身教，将永远铭刻在李四光心中，总理那爽朗的笑声慈祥的面容，使李四光增添了无穷的勇气。他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总理的殷切期望，要将自己的余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党，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这次谈话不久，李四光因病住进了医院。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肿瘤，需要动手术。刚住进医院，李四光心情有些沉闷。就在此时，总理来到了他的病房。那天，总理披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笑呵呵地走进门来。一进门，总理就掏出手绢，擦着头上的汗，连声说道：好热，好热！又解开外衣，脱下毛背心交给警卫员，然后坐在李四光的病床旁边。

春天仿佛伴随着总理一道来到了这小小的病房里。屋里空气立即活跃了起来。总理先详细地询问了李四光的身体情况，并安慰他要安心治病。接着又高兴地和他拉起了家常话，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笑声不断从病房传出。快乐气氛感染了李四光，他的心情也渐渐轻松了许多。当李四光问到总理工作这样紧张，您的睡眠怎样？总理说，他睡觉全靠安眠药，吃下去就能睡，有事情或到时就有人叫他起来。

李四光沉默了片刻，极力抑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诚恳地对总理说：“总理这样忙，还要来看我，以后，以后请不要，不要花时间来看我……”

总理依旧热情地和李四光交谈着。时间陪伴着笑声过去了。总理起身要告辞，李四光望着总理，还想要说什么，但又不愿再占用总理宝贵的时间，总理看到站立在旁边的李林，严肃地对她说：党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父亲的身体。

在手术的前一天，周总理又来到李四光的病房，鼓励李四光要有信心战胜疾病，病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没有战胜它的勇气。总理还说，他相信李四光一定能顺利地做完手术，战胜疾病。虽然总理这次只坐了短短的15分钟，可却给了李四光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他与疾病斗争的必胜信心。后来李四光才知道，总理这次到医院来亲自审阅了手术方案，询问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及处理方法，最后才批准了这次手术。对此，李四光是不会忘记的。

手术之后，总理第三次来到医院，看望李四光，要他安心养病，以便尽快恢复健康，更好的工作。总理又谈到了入党问题，李四光激动地对总理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总理建议李四光考虑是否请董老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董老和李四光是老相识而且最了解李四光，总理对自己如此关怀和了解使李四光万分感动。

1958年12月22日，是李四光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写道：“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70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入党后，李四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全心投入工作。1959年他完成了科学名著《地质力学概论》。接着，他又和其他地质工作者一起，在找矿、开发地热及地下水位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接见李四光，党中央、国务院对他在祖国建设中的卓越贡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63年12月20日，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到会的人大代表李四光听到这些，眼里涌出了激动的热泪。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激励他更加忘我地工作。

1965年2月19日，北京医院在给李四光检查身体时，发现他左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最后确诊为左髂骨总动脉瘤。根据李四光的身体状况，医院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同时，他们把李四光的病情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总理得知后，马上关照李四光不要太劳累了，还指示有关部门要减少李四光的工作、会议和外事活动，除非特别需要和经过他的同意，李四光才可以参加任何活动。之后，总理还特意请邓颖超代他几次探望李四光。对此，李四光深为感动。他对家人说：“党这样地关心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他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李四光出席了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抗震救灾会议。当时，总理考虑到李四光年迈体弱多病，关照他不必出席每一次会议，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有的可以听其他同志传达。但是李四光不仅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每一次会议，而且还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总理参考。在一次会上总理问：我们能不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预先知道地震的时间，那么就可以减少损失。总理问过之后，到会的人沉默了好久，才陆续有人发言。有人含糊其词，说这个问题不好办；有人直接了当地说：地震预报国外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我们更解决不了。最后，总理转过头来问坐在身边的李四光：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呢？李四光胸有成竹地说：“地震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因而是可以预报的，不过还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最后，他提出要立即进行与地震预测任务相适应的科学实验工作。听了李四光的发言，总理非常高兴，他说：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决心，有这样的志气！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接着，总理提出：“我们要发扬独创精神，突破科学难题。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录，我们要给后人留下地震预报的记录！”开完会后，李四光心潮澎湃，决心尽力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他开始了人生旅程上的又一次科研攻关。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很快在邢台地区建立了电台和地应力实验测报点。李四光顾不得自己体弱多病，坚决要求到灾区看看，在国务院的特殊照顾下，李四光实现了去灾区实地考察的愿望。他在灾区搜集的许多宝贵材料，为日后研究创造了条件。

1967年初春的一天晚上，他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到国务院小礼堂开会。原来有人根据近期北京周围地区小震活动频繁，向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晨7点钟，北京将会有七级地震发生，要求国务院通知全市居民都搬出去住。总理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议气氛很紧张，总理在听取了各种意见后，又问李四光情况是否这样紧急？李四光从几个应力站的数据判断无异常现象，就对总理说，问题不大，北京不象有大地震马上就要发生的样子，最好不要发警报，天气那么冷，老人和小孩都出来过夜要冻病的。周总理信任李四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不发临震预报。会议结束后，为了照顾李四光的身体，总理让他早点回家休息，自己却和大家一起，坚守工作岗位，直到凌晨7点钟后，才放下心来。由于总理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



使人民群众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地质部参加会议的代表讲：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些，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要学习他。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虽经大夫们尽力抢救，仍处于昏迷状态。此时，医院领导认为动手术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就电话请示周总理，总理马上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可以照大夫的意见办，不过要问问家属。随后，总理又派来两名大夫，协助抢救。终因医治无效，李四光同志与世长辞了。总理得此噩耗，心情十分沉痛。在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状况下，总理仍旧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李四光的遗体告别，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 领袖·良师·知音——总理与几位艺术家的交往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始终关心我国文艺的发展，对文艺界人士的生活工作情况更是关怀备至。这里记录了总理对几位艺术家热忱关心、谆谆教导的几件事。

### 一、一杯茶水表深情

张权这个名字，对于音乐界的人士也许并不陌生。她是一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曾在美国纽约州伊斯曼音乐研究院完成了5年的进修课程，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同时她还通过了演唱从16世纪到近代各种流派的作品和世界著名歌剧这一严格的考试科目，从而获得了音乐会独唱家和歌剧艺术家证书。当时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劝她留在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但是张权谢绝了这些好意的规劝，她说：“我衷心感谢美国的老师们和朋友们的帮助。现在我已完成了我的学业。我愿回到祖国去，为我的同胞歌唱，把我的音乐知识贡献给祖国的音乐事业。”正是带着这种信念，她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条件，于是1951年10月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祖国。

祖国刚刚解放，周总理十分重视和关怀每一个从国外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当张权回国后第一次演出时，总理就亲自去剧场听她歌唱，并热情地鼓励她要永远为祖国歌唱、为人民歌唱。正处于艺术鼎峰的张权得到总理的赞扬，更加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演出中去。

但恰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打击落到了她的身上。

1957年，张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章中对她所在单位的领导在工作中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的作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并且如实地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结果她因此受到了批评，被戴上了“左派”的帽子。从此这位著名的歌唱家，被赶下首都舞台，并下放到哈尔滨歌剧院。更令她难过的是，她的丈夫，一位歌剧院的合唱指挥，也因为“右派”问题而被送到东北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不久竟病故在那里。她的女儿也因是“右派”的女儿而受到种种歧视。张权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

正当张权被“右派分子”的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党中央、周总理向他伸出了抚慰之手。

1962年春天，在哈尔滨的张权意外地接到通知：周总理特邀她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重新恢复了她的政治生活。

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周末舞会上，张权被许多老朋友硬推到台上唱了一首《绣荷包》。在北京舞台消声匿迹4年，今天有机会重返歌坛，张权心情非常激动。正当她以无限深情唱出自己心声的时候，周总理来了。张权的歌声一落，总理就鼓着掌走到台上，亲切地握住张权的手，意味深长他说：“好久没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张权热泪盈眶：多么好的总理啊，他总是和人民心连着心！总理又邀请张权跳舞，利用这一机会详细地询问了她几年来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他说：“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接着又问起她家人的情况，当听到张权说她爱人去兴凯湖农场3个月后就病故了时，总理不安地停住舞步，然后急忙转换了话题问道：“孩子们都好吗？她们之中有没有可以学你这一行的？可送到音乐学院去学习。你要好好培养她们啊！”总理一番体贴入微的话语，令张权感动不已，她忍不住问总理：“我当了右派，不能当左派吗？”总理听了张权的问话，不禁笑了起来说道：“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总理的回答给身处困境中的张权以巨大的鼓舞，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关怀重新激发了张权对祖国、对人民音乐事业的责任感。她在学习了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联系中国歌剧界的现状，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她认为：新歌剧是一朵花，应该集中力量，重点实验，既要普及，更需提高。她还具体建议：东北三省应集中力量在气候宜人的哈尔滨市成立一个歌剧院。张权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总理的重视。在一次周末舞会上，总理一见到张权，就高兴地对她说：“你的意见我看到了，很好。你很大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要大胆关心。”几个月之后，周总理又一次接见了张权。一见面，总理就关切地问道：“歌剧院怎么样了？”接着就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张权什么都不想，就想搞点歌剧。大家努力把力嘛！”在总理的过问下，张权所在的哈尔滨歌舞团正式改制为歌剧院，张权也终于在这里一展歌喉，主演了民族歌剧《兰花花》。

由于总理的关怀，1962年11月，张权再次回到北京，举行了十场独唱音乐会，并获得了圆满成功。

在一次演出中，总理亲临观看。他身旁坐着罗瑞卿和王震将军。两位将军谈起张权的情况，很佩服张权的爱国思想，并对她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总理都听在耳中，记在心上，事后他亲自指示当时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和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宴请张权，表达了党和政府对一个艺术家的尊重和关怀。

1962年12月29日晚，文化部专门组织张权、王昆、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等11位女高音歌唱家在政协礼堂演出。正当张权演唱第二支歌时，总理赶来了。歌声一落，总理立即端起一杯茶水，亲自送到台前，递给台上的张权。接过茶水，张权感到自己手中沉甸甸的份量：这哪里是一杯普通的茶水，它分明盛着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敬意啊！总理的心意，张权深深领会了。她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尽管她被禁止演唱，但张权仍暗自努力，当她受尽侮辱和折磨时，一想到总理的信任和鼓励，她就又产生了斗争的勇气，正是靠着这种坚强的精神支柱，张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经过组织上认真复查、文化部批准，撤销了划张权为右派的错误决定，恢复了原来的文艺级别。同时，为她的爱人平反昭雪。

张权终于回北京来了，但一直希望张权回京的周总理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每当站在总理的遗像前，张权就仿佛听到了总理亲切的话语，就仿佛看到总理端茶给她时的慈祥面容……

## 二、谆谆教诲，亲切关怀

严凤英是著名黄梅戏演员。她第一次见到总理是1958年1月。当时，严凤英正在庐江下工矿农村，为工人农民演出，周总理也恰好来到合肥。有一天晚上，严凤英所在剧团领导接到电话，要他们为总理演出。一听是为周总理演出，严凤英不免有点紧张，一路上心里惴惴不安。

演出开始了。严凤英一上台看到总理慈祥的面容、和蔼的微笑，顿时有了勇气和信心，很快入了戏，把《打金枝》里的升平公主演得成功。

戏演完了，总理上台接见全体职员，并合影留念，大家都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总理，可总理却把年岁最高的老艺人丁永泉让在正当中的位置上，又左右看了看，亲切地喊道：“那个骄傲的公主呢？”他们把躲在后面的严凤英

引到总理面前，总理让她坐在自己身边，拉着她的手，象长辈关怀自己的子女一样，问长问短。严凤英这个从不低头认错的犟姑娘此时却禁不住“啾啾啾”掉下泪来。接着总理又详细询问了她的年龄、家庭情况，并亲切他说：“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那晚，严凤英激动得通宵未睡。

1959年春天，剧团到上海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演出。总理观看了严凤英的《女附马》。见到严凤英，总理亲切他说：“我们又见面了，是老熟人了！”严凤英听了心里暖乎乎的，临分别时，总理又说：“我们到北京再见吧！”

严凤英听到“北京再见”这句话一下子愣住了。曾希圣同志看她那个样子，笑着对她说：“傻瓜，总理是叫你到北京参加政协会去！”

从此以后，她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亲聆总理的谆谆教诲，这使她的视野更开阔、精神世界更充实、创作源泉也更丰富了。

1962年，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陈铁军和周文雍的事迹并说他很受感动，很想写成一个剧本，严凤英听了立刻找人写戏，她要来演，以了却总理的心愿。

1963年春天，严凤英又见到了总理。总理问她：“黄梅戏好不好演现代戏？”严凤英干脆他说：“行！黄梅戏的特点就是生活气息浓，善于贴近农民生活。”总理又问她：“演现代戏，看戏的人少了，怎么办？”严凤英毫不犹豫他说：“只要有一个人看现代戏，我也演！”总理高兴得大笑起来。

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下，严凤英不仅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艺术生命得以旺盛成长，而且思想上也不断地得到提高。

1963年4月的一天，总理把严凤英、袁雪芬、张瑞芳等几位同志请到家里做客，想和大家谈谈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因为同来的客人中严凤英最小，所以她就去帮邓大姐做饭。

邓颖超同志边做饭边和严凤英谈心。邓大姐说：“今天很对不起大家，菜准备得不多”，又悄悄对严凤英说：“总理这个月的工资用完了”，说完又特意关照：“可不要对别人讲呵，讲出去影响不好！”凤英深为总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此时，她感到在总理的身边，自己的灵魂也不断得到净化。

总理不仅关心严凤英的艺术事业，在工作上给她引导和帮助，同时也非常关心她的生活，特意叮嘱严凤英有事给他写信。考虑到自己工作忙，来往信件多，不能及时看到严凤英的来信，特意给她写了秘书的姓名，叫严凤英把信寄给他的秘书。

总理关心黄梅戏，关心严凤英。在严凤英去世后，总理在最艰难的环境里还多次询问严凤英的死，邓颖超同志也关心地问起严凤英，并且说她是个好同志，她的艺术事业要好好地继承和发展。

### 三、永恒的怀念

红线女是一位粤剧女演员，原名邝健廉，广东开平人。广州沦陷期间随马师曾剧团在广西各地演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学习京剧3年。40年代末又涉足影坛，至50年代，共拍摄过70多部影片。

1955年国庆前夕，红线女随香港回国观光团到北京观礼。在国宴上，周总理看见了她马上问道：“你是从香港来的？”红线女回答说：“是，我叫红线女。”周总理说：“啊，知道了，欢迎你们回来看看，”又举起酒杯对她说：“欢迎你到各地去看看，多看看。”根据总理的建议，红线女随团一起参观了新中国许多地方，亲眼看到新旧社会的不同。

这次观光使红线女的思想得到很大的启发，她决定抛弃香港所得，回内地来工作。1956年，红线女到北京演出《搜书院》一剧。在演出的第二天晚上，总理自己掏钱买票来看他们的演出。虽然剧场不大、空气不好又异常寒冷，可总理却坚持看完并在戏终场后走过黑暗的楼梯通道来看望剧组的演员，他对红线女说：“你是拍电影的吧？”红线女说：“是”，总理听了微微一笑说：“看得出来，你唱得不错。你的表演，内心活动很细致，这是电影演员表演的长处，你使用了，很好。可是你现在是戏曲演员，是在表演舞台艺术。舞台和镜头前的表演艺术，要求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舞台表演艺术较夸张，你要注意用戏曲的表演手段，在舞台上把内心活动表现出来。”红线女听了不禁暗暗佩服总理的广博的学识与敏锐的观察力。

1957年，红线女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参加第1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周总理在细致地审查了节目内容之后，还亲自和程砚秋先生研究红线女的独唱演出穿什么服装更为合适。总理强调民族特色的重要性。这以后，总理也多次关心粤剧的演出，而且只要有时间就和演员们见面谈心，给他们以关心和鼓励。

1961年，红线女同粤剧团在广西南宁参加一个演出晚会。在晚会上她演出了《刘胡兰》大庙斥敌一节戏，周总理也坐在观众中。演出结束之后，总理笑着对红线女说：“总的感觉，戏还是不错的，你演刘胡兰的气质还可以，不过你太纤弱了，生活气息也不够，应该到北方去接触接触生活。反映现代题材的戏，是要下工夫搞好的。”

本着总理的这一精神，1963年至1964年间红线女到农村生活了两年，这使她获益非浅，为她后来排演现代戏《珠江风雷》打下了基础，继《珠江风雷》之后，红线女又演出了现代戏《山乡风云》。这个戏总理在广州就看了3次。1966年1月，此剧又赴北京上演，周总理又看了首场演出和最后一场演出。

多次的接触和交谈，使红线女对总理十分爱戴和敬重，心里有什么话总愿和总理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线女对“文革”很不理解，在一次和总理谈话中，她谈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感受，总理说：“有些事情，我们是有责任的。”谈到粤剧发展方向问题时，总理又说：“粤剧是要改革的，什么工作也要改革，改得不好，再来改。不改，就没有新的生命力了。你们粤剧要使用地方特有的语音，又使地方语言文字化，这是有助于全国文字统一的。作为戏曲工作者来说，这个责任，应该说是不轻的。当然，这个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紧。贵在坚持。”

总理不仅从工作上关心艺术家，同时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红线女更是有切身的体会。

1960年的一天，总理来到红线女的家里做客。一进门，总理就向红线女的母亲问寒问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红线女的母亲为了招待总理，特意烹做了梅子菜烤猪肉。总理品尝之后连连说好，称赞红线女的母亲手艺象梅县的家乡菜一样好。老人听了心里非常高兴，脸上笑得象一朵花儿。这使红线女感到总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因为连年不断地紧张工作学习，红线女长期严重失眠、身体虚弱，极易休克和晕倒。总理通过邓大姐关心她的健康，让她开完全国政协会后留在北京治病，休养身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线女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1966年，她虽然在名义上是“解放”了，但实际的工作却是拉大幕、

烫戏服、扫大院、卖饭票，当起了勤杂工。她多次要求演戏，但都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时候，又是总理帮助了她。1971年秋，由周总理亲自点名、红线女才得以参加一个文艺晚会的演出。当总理和外宾上舞台来向演员祝贺时，红线女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总理握着红线女的手说道：“好好学习，要经受得起考验。”正是有了总理的关怀和鼓励，红线女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所以她对总理的感情也十分深厚，对总理的健康也十分关注。1973年间，红线女有机会又一次见到总理，她看总理的脸色不大好，人也非常消瘦，就很自然地谈到了总理的健康。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听了相视一笑说：“没有什么问题，中央让我休息一段时间，现在不就好了吗？”邓颖超又笑着说：“你们关心恩来同志，就象他关心你们一样。现在好了，你可以唱一段给总理听了。”红线女欣然从命。总理听她唱完之后问道：“主席曾经写过座右铭给你吗？”红线女回答说：“是的。”然后又请求总理也给她写几个字作为纪念。总理说：“假如我不死的话，一定会给你写的。”红线女听了不禁呆怔了很久，长时间地感到不安。

1974年，总理住进了医院，红线女只有通过给邓颖超同志写信向总理问候。一次她在信中提到工作中困难很多，但她正逐渐认识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的含义。邓大姐说，总理知道健康也懂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很高兴，希望健康能坚持到底，同时，红线女也知道总理在医院还看了粤剧青年们到北京演出的录相。总理在病中还坚持工作，他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使红线女很受鼓舞。

1974年国庆节前夕，红线女收到周总理署名的国宴请柬，真是激动不已，当总理缓步来到宴会厅时，骤雨惊雷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宴会快要结束时，红线女大步走到总理身边和总理紧紧握手说：“总理呵，我们可真想您呵！”总理立刻接着说：“我真想见见你们。”红线女举起手中的酒杯，深情地祝总理身体健康，但是她请总理千万不要喝酒，总理说：“谢谢你，这杯是开水，不怕的。”离开总理，红线女还在默默为总理祈祷，她衷心地希望总理能够健康长寿。

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作为主席团的一名成员，红线女有幸又一次见到总理。她跑上前去急忙问总理身体可好，总理泰然自若地回答说：“还好，谢谢。”大会闭幕那天，邓颖超同志又把她带到总理跟前，她请总理千万珍重，总理向她点了点头。红线女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1976年1月8日早晨，当红线女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她竟哭倒在收音机前。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晚上，她们全家人都围坐在总理曾经坐过的地方，互相回忆总理对他们的教导和亲切关怀。红线女还一再请求省委让她进京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但却未能如愿。

“四人帮”垮台后，又有人想借机整红线女，当时她真想一死了之。但后来她终于认识到：党的优良传统是实事求是，人死了，事情搞不情，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样她怎么好意思去见总理？！想到总理曾给予她的关怀和鼓励，她更积极地生活和工作，最后她的问题也终于得到澄清。

追忆总理，红线女说：“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心中。”她决心在晚年更努力地工作，以感谢总理的关怀，她说：也只有这样，才是对总理永恒的怀念。

## 周总理与宗教事业及宗教界人士

提起宗教，人们总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在如何同宗教界人士打交道方面，敬爱的周总理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吴耀宗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信奉基督教，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对于这样一位宗教界知名人士，周恩来同志与他有过多次交往。

早在 1938 年 5 月，当时身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汉口代表周恩来与因公到武汉的吴耀宗进行了会晤。这次谈话虽只有一个多小时，但却涉及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周恩来同志不仅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而且向吴先生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初次见面，周恩来同志给吴耀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吴耀宗感到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对未来充满信心。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此后的第 4 天，在四川讲学的吴耀宗在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再次见到周恩来。当时，正是民族斗争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同志指出：抗战已经进行了 4 年多，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详细阐述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次谈话使吴先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一切爱国人士可以信赖的力量。

1943 年 5 月 25 日，吴先生在重庆曾家岩第三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次会见持续了将近一整天，是周恩来同志与吴先生进行的最长的一次谈话。那天除了谈论形势之外，又谈到了宗教问题。当时，吴先生根据自己的思想，对周恩来同志谈了看法。他认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同志听后，坦率地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并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他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族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流，不仅没有妨碍党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反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谊。吴耀宗先生把这一席话看做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和鞭策。

中午，周恩来同志留吴先生一起共进午餐，饭后，周恩来同志亲切他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你是否愿意略事休息，再继续谈下去？”征得吴先生同意后，就在会客室里，临时搭起了一个铺，让他小憩一会。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吴耀宗非常感动。

下午继续长谈时，周恩来同志详细回顾了党的历史。他对吴耀宗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对宗教界人士更加关怀，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吴耀宗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 10 年间，曾 14 次出国参加世界和平

会议。每次出国前，周总理都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接见他，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做出判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重要指示成了吴耀宗国外活动的指导原则。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周总理亲自找吴耀宗等宗教界人士到中南海作了3次长时间的谈话。其中一次，从晚上8、9点钟开始一直延续到翌日黎明。总理听到了反映各地执行宗教政策中的一些问题的汇报，还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发表了诚恳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还特别对基督教进行了分析，指出：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向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为此，中国广大人民对基督教是很有意见的。基督教的问题不是由政府出个布告就能解决得了的。如果基督教能变成我们中国人民自己办理的宗教，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启发和教育，中国基督教发起了一个“三自革新”运动，在周总理的建议下，他们将《革新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宣布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掩护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宣言》得到了十几万人的签名。中国基督教事业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周总理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在国内，周恩来同志曾指出：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所以宗教问题不象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但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你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无意在这里同诸位展开有神无神的争论。我们认为，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

谈到宗教和宗教界的许多重要问题时，周恩来同志指出：宗教界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和爱国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

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我们决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会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主张，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立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

周恩来同志还在国际场合向世界人民讲述了新中国政府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一贯政策。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有人对共产主义，对新中国的政策有误解，甚至有歪曲的言论，例如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对此，周恩来同志在大会庄严的讲坛上发表了气势磅礴、正气凛然的讲话。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拥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



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周恩来同志最后引用中国的一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欢迎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实地考察，并表示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同志不仅从政治上关心宗教界人士，而且从许多生活问题上关心他们。

赵朴初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49年他从上海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总理请大家吃饭。他拿到请帖后，想到这是许多人在一起开的宴会，不会照顾个人的饮食习惯。自己是个佛教徒，只好准备吃“肉边菜”了。不想，在签到时，旁边有工作人员说：“赵朴初先生，给您准备了素菜。”一句话，使赵朴初感到周恩来同志对别人关心如此细致、体贴入微。

赵朴初先生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词是很有名气的，可是赵朴初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还是周恩来同志亲自介绍的呢。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赵朴初先生对中国作协负责人说：“作家协会应当吸收他为会员。”过了些日子，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同志一见到赵朴初就问：“你现在参加作协没有？”赵朴初回答说：“还没有。”周总理当即对在场的有关同志说：“你们拿表来，我作介绍人。”事后，夏衍同志曾羡慕他说：“赵朴初同志很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他参加作协的。”

帕巴拉·格列朗杰是西藏僧俗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本人从1956年10月至1975年元月，20多次见到过周恩来同志。总理的亲切教诲，对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成长和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72年春天，帕巴拉·格列朗杰到北京治病。有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听取传达文件，坐在会场边上。传达结束后，周总理见到了他，健步走到他的面前，亲切地拉着他的手问：“你什么时候来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事情？”帕巴拉·格列朗杰想到周总理在百忙中还这样关心他，连忙口答：“我一切都好，请总理放心。”尽管他什么困难也没向周总理提，但细心的总理还是想到了他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会长都是藏族人，听汉语有困难。在以后几次传达文件时，专门派了翻译坐在他们俩的后面，为他们翻译传达的内容。

用帕巴拉·格列朗杰自己的话说就是：“周总理对我苦口婆心的教育，使我万分感动，牢记终生。周总理对我的关心、爱护，我至今仍感激不尽。”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为中国藏传佛教的领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共产党。

那是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到北京，共同协商。4月27日，班禅一行45人到达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欢迎。当晚，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大师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参加重要的政务活动。虽然他当年只有13岁。

在饱经革命烽火锻炼、功勋卓著的共和国总理面前，13岁的班禅一脸稚气，更加显得年幼。那天，班禅大师一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庄重、潇洒、飘逸。总理则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整洁、朴素、气质不凡，白衬衫虽然是

旧的，但大师注意到，是刚刚洗过的。

为了表达崇敬之心，班禅大师向总理献了一条质地极好的洁白哈达。然后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谈，到班禅在京的活动安排；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到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总理都谈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总理也没有忽略。年幼的班禅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总理谈话的深刻含意，但他显然十分佩服总理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起初他那种紧张和拘谨的情绪消失了，宾主之间，变得十分和谐和融洽。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总理，不但是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和尊敬的导师、长辈。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总理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总理止步，伸出左手，请班禅大师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两个人互相谦让一会儿之后，总理挽着班禅的左臂，并肩进入宴会厅。席间，周总理不断地给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而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讲话，但活佛这一特殊地位形成了他特殊的心理素质，他懂得礼仪，在这种场合下，他彬彬有礼，非常得体。班禅转动着那双聪慧的大眼睛，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在观察。而周恩来总理又是他注意的中心。总理那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给班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连总理说话的声音都是那么入耳，那么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从那以后，班禅大师和国内外参加难以数计的各种大小宴会。但 1951年 4 月 27 日同周恩来总理的第一次会见，以及当晚在中南海举行的小型宴会，对他的成长和以后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个人认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见以后，周恩来总理和班禅大师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友谊，班禅大师始终把周恩来总理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

周总理每次接见班禅，除对西藏及宗教事务作重要指示外，还非常关心班禅大师本人的情况，多次委派有关领导同志上门看望并征求他的意见。特别是“文革”期间，班禅大师身陷囹圄。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多方设法营救，并提出应让班禅大师早日出来工作。虽经“四人帮”百般阻挠，此事未能实现，但以后每当班禅大师提起，都激动万分，深切地感受到了总理对他的亲切关怀。

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我们看到其中有两篇是致达赖喇嘛及班禅大师的。信中除重申了党的政策外，一篇中提及赠送黄缎 2 匹，电影片 6 部；一篇谈到出国访问事宜，请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这深刻地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对西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关怀和对他们的尊重。

从周恩来同志身上，宗教界人士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看到了党对宗教人士的尊重和关怀，因此，他们也更加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重和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的祖国才更加团结统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因此更加欣欣向荣。

## 悠悠故乡情

怀着对亲人的眷恋，对故乡的渴望，这位大地之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远静静地躺在了祖国大地上。他仿佛听到了，听到了家乡人民的声声呼唤，听到了家乡水渠的汨汨流淌；他仿佛看到了，看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看到了儿时放的风筝，儿时的伙伴……是啊，乡情悠悠，乡意浓浓。“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

### 总理的乡情

1958年7月的一天，江苏省淮安县委副书记王汝祥受县委委托，准备“走后门”，上京见周总理，要点钢材发展地方工业。没想到总理接见他时，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但在分手时，总理又说：“我和你的事还没有完、改日再谈。”王汝祥听后，心里忐忑不安，两天来心上总象压了块石头。“改日再谈”，这一定是总理批评他不远千里来开后门吧。第三天，他忧心忡忡地穿过如茵的草坪，总理已在办公室大厅外等候了。

“吃好了吗？”总理老远打着招呼，拉着王汝祥在客厅藤椅上坐下。王汝祥局促不安地搓着手低着头，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想起那天来见总理时，自己没有将来意和盘托出，而是转弯抹角地以汇报家乡情况为由暗示故乡的困难，而总理却一语道破：“你是来找我这老乡走后门的吧？”王汝祥的脸上又觉火辣辣的。不知这次等待他的是什么？想到此，王汝祥更心神不宁地抹了把额上的汗水。

总理早已体察到老王的心境，他带着歉意他说：“老王，这次你来，我招待不周，仅让你吃个便饭，你一定要嘀咕我这老乡小气了。”

“不，不，总理，那天我吃得很好。”

总理摇了摇头：“你们在下面招待客人可能比它丰盛，我这总理不自由啊！国务院有待客标准，我不能例外。”

王汝祥听罢，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总理谈到对自己旧居的处理时说，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特殊，该怎样处理就怎么处理。当听王汝祥讲到近年出现的耸人听闻的咄咄怪事，大搞生产“捷报”的谎报，把粮食亩产以5000斤逐渐增加时，总理面色严峻，感情激动他说，“干劲要鼓，但要实事求是。”接着又谈到当时执行政策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目前，改造讲得多，团结讲得少，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推心置腹地同我们交谈……”

谈着谈着，总理象要摆脱和暂时忘却那些纷繁的政务似的把话题一转，微笑着说：“老王，老乡之间可不兴贿赂。”

“贿赂？！”王汝祥心中吃惊不小，想起这次进京，带一盒家乡土产茶馓子。旅途上，自己冒着炎日，汗流浹背地拎着这盒茶馓子，唯恐受挤受压。到京后，便托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转交给总理。想象着总理大口地吃着故乡的茶馓子，会连连赞不绝口的。可总理讲是“贿赂”，王汝祥低头嗫嚅他说：“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请总理尝尝。”

“尝尝？整整一大铁盒子哩！不准请客送礼，国务院有规定。”

“这……”王汝祥语塞了。

看到这情景，总理抬手摸了摸鬓角，哈哈大笑：“看，都把我当成黑脸包公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位从家乡来找我的父母官，好吧，我也只好破例地来个执法犯法了。”

总理十分感慨他说：“离开家乡太久了，连你这父母官都不理解我了！”说罢，又轻声地问道：“文渠没有堵塞吧？”“没有。”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着大锣，满街满巷吆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从文渠划到河下去，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了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涮涮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谈到童年，总理娓娓叙来，神情专注。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变得年轻多了，王汝祥见总理对故乡如此情深，便说：“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您老该回去看看。”

总理微微点头，仰躺在藤椅上，微启双目，充满感情他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梦见自己在文渠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饭都顾不上吃，觉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放放风筝……”总理说着，说着，双眸湿润了，完全沉浸在缠绵的思乡深情之中。

王汝祥不忍打断总理的回忆，他深情地打量总理。王汝祥忽然发现，总理两鬓斑斑，瘦削的面孔铁青，一刹那间显得那么疲倦和憔悴。想起曾听总理的婶娘讲过，总理少年时“乌眉大眼，天堂饱满，身体很结实”，王汝祥心头一震酸楚，极恳切地相劝道：“总理，工作再忙，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微笑着未加置否，沉默了一会，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的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事你听听，你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激流中，把船划到了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们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王汝祥听了这话，胸口顿时象一股强烈的漩流在激荡：自己是个打游击的出身，年轻时是抱着找出路的思想参加革命的。解放后，自己这“者革命”有时还怀有一种功臣的荣誉感；而总理自幼投入革命，戎马多年，出生入死，到现在还感到渡船才走了一半，还要为他毕生所追求的事业鞠躬尽瘁！相比之下，这差距……王汝祥倏地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双眼酸涩，忍不住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望着总理，一句话也说不出。

为打破沉默，总理递过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字同志收”，总理说：“扯到现在，没人正题，你从者远来，我不能让你空手而归。我这淮安人也得尽点淮安人的责任。这封信你交江苏省委，你们的困难尽量请他们帮助解决。”

王汝祥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对开“后门”，吃“小灶”，王汝祥深感给总理带来的麻烦，想不到，总理并未过多责怪，还牢牢记在心里。怪不得总理对自己说：“我和你的事还没有完。”王汝祥接过信，高兴地连看都没看，就小心翼翼地把这封沉甸甸的信札放进口袋。总理的乡情，比金子还贵重。这时候，王汝祥只恨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没能尽快改变淮安的落后面貌，还要让总理操心。

总理看着王汝祥装好信札，又用商量的口吻说：“老王，我有个不成熟

的看法，上次，你说你们打算把全县的旱田全部改为水田，我看这不一定妥当，要照顾群众的习惯和情绪，旱作物也有高产的。”总理的话更引起王汝祥一阵内疚和不安。

转眼3个小时过去了，王汝祥起身向总理告辞，缓缓走出客厅，又回头望着总理，许久舍不得离开，总理站在台阶前，也沉默地凝视前方，好象在深情地看着家乡那汨汨流淌的文渠，又象在牵拉着家乡那飘在白云间的风筝。王汝祥百感交集，再次请总理有机会能回去看看。总理没有忘记家乡人民的请求。1960年，总理从上海开完会，准备回故乡一行。正好毛主席来电要他赶回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原订回乡的计划未能实现，他在飞机经过淮安上空时，紧贴机窗，目不转睛，眷恋地俯瞰故乡的土地。他多想实实在在地捧一把故乡的泥土，喝一口故乡的水，偿还多年的夙愿啊！机组的同志没惊动他，让飞机减速低旋，转了好几个圈了。总理察觉后说：“毛主席在北京等我们哩，全速前进吧。”

总理始终没有回到故乡，但他的骨灰不是已经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了吗！他的浓烈的乡情，已经融会在故乡人民的心田里。

周总理的“小老乡”

——总理与“海政”演员杨桂林

一连数日，每当门外邮递员的车铃一响，杨桂林总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出去，询问有没有寄给她的照片。是什么照片让她这样惦念，急切想得到呢？这不得从一次演出说起。

1959年的一天，绿荫掩映的钓鱼台礼堂里，正在进行着精彩的表演，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首长都来观看演出。台上，一位扮作“红领巾”的部队小演员，以她那娴熟的动作，洒脱自如的演技，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周总理悄声问身边的同志：“她是谁？”

“她就是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杨小亭的二女，‘海政，文工团演员杨桂林。”

周总理欣喜地点点头。“噢，这孩子长这么高了！”

演出结束后，总理来到演员中间，他一眼便认出了演伞技的小演员杨桂林，亲热地握着她的手，鼓励她：“小老乡，你演得不错！”

桂林愣住了：“怎么，总理也是天津人？”

“哈哈！”总理爽朗地笑了，“我嘛，就算个半吊子天津人吧！”

桂林恍然在悟。天津——桂林的故乡，正是周总理早年投身革命的地方。那时，总理和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领导过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难怪总理对天津一往情深，风趣地自称是“半吊子天津人”，而称自己是“小老乡”呢。

周总理拉着“小老乡”的手坐在一张沙发上，关切地询问她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小老乡”，无拘无束地和总理拉着家常。总理还勉励桂林姐弟几人，要象他们的父亲那样，做一个既有精湛技艺，又有高尚艺德的杂技演员。

忽然，总理诙谐他说：“记者同志也不抢镜头了，要是能给咱们照张相该多好啊！”大伙先是一愣，继而明白过来，一下子簇拥在总理身边。在欢声笑语中，记者摄下了这幸福的一瞬。桂林站在总理前边，甜甜地笑着。难怪她这么急切盼望这张照片。可希望一次次落空，许多天过去了，邮递员并没给她带来什么。莫非日夜操劳的周总理把这件小事忘记了？

总理又看演出了。桂林可不客气，当着众人，劈头就问：“总理，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话一出口，她又暗自悔恨自己太冒失，跟总理这样说话太失礼了。

总理非但没怪她，反而认真地思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小老乡？”左思右想，还是想不起来，他问道：“我哪句不算数？”声音是那么平和。

“您不是答应送我相片吗？”

“噢！”总理笑着问道：“噢，相片不是送到你们海军司令部了吗？”

“可是并没有给我呀！”桂林还不让步。

总理当即指示周秘书：“再给她洗一张6吋的，要布纹纸的，洗完后当面交给桂林同志！”杨桂林这才满意了。

那天，桂林刚从外地回来，照片就送到了。周秘书如释重负地说：“桂林，我可完成任务啦！”杨桂林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一张多么珍贵的照片啊！看着照片，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回忆起件件往事：

旧社会，杨小亭一家生活很苦。身怀绝技的杨小亭的师妹“天凤娘”婚后双双登台，却糊不住全家的嘴。没办法，杨小亭一家漂泊四方卖艺。大女琪林，二女桂林，儿子宝林，几岁就粉墨登场，给父母演些小配角。1946年，杨家老小在张家口演出。正在那里视察的周恩来，陪同美国代表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观看了他们的节目。那精彩的表演，使马歇尔目瞪口呆，赞不绝口。谢幕时，周恩来拉着杨小亭的手，鼓励他说：“人家在夸我们呢，要继续努力呀！”

全国刚解放，总理就请杨小亭参加中国杂技团的筹建工作。1952年5月2日，杨小亭正在中山公园“五色土”坛上演出，周“总理来了，为了不影晌台上台下，他就坐在阴凉的砖地上，饶有兴趣地观看。周总理工作那么忙，还一次次地派车把杨小亭接进中南海，让他为中央首长演出，与他共商振兴杂技事业的大计。总理就是这样，心里装着全中国、全世界，也装着这样一个饱经风霜的艺术之家！

桂林抚摸着照片，思前想后，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做个优秀的杂技演员。每次下部队，她都吃苦耐劳，真有一股不怕掉肉的拼劲。有一次，桂林和战友们刚从海防前线回来。总理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小老乡，你怎么这样瘦，是不是病了？”桂林只好实话实说：“我们下部队8个月！”总理听完，环顾一张张削瘦的脸，心疼地对有关领导说：“经常下去是应该的，但每次时间不宜过长。”还有一次，总理听说：“小老乡”在练走钢丝，问她怕不怕，有没有保护措施。“小老乡”满不在乎他说：“不怕！用不着什么保护！”“要有保护设施！”总理急了，“告诉你们领导，在钢丝下设一张安全网，一定要保护好演员！”有总理的保护和关怀，杨桂林和演员们真感到幸福。

20多年来，“小老乡”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如今，她早已是一位既通杂技，又精魔术的多面手了。和她同在一个部队的弟弟杨宝林，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大型古彩戏法，而且还有创新。1964年，全军文艺会演，他曾荣获“优秀节目奖”和“优秀演员奖”，姐弟俩都曾荣立三等功，人称他们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杨家姐弟”。对一个演员来说，观众惊奇、赞叹、陶醉，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享受！

每每遇到困难，想起总理的关怀和鼓励，杨桂林便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每每要泄劲时，想起总理的期望，人民的瞩目，她便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是的，自己的演技不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人民。自己呈现给观众的应该是美的艺术，美的心灵！

周总理重逢黑子表妹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那天晚上，庐山疗养院礼堂的灯火通明，圆舞曲的乐声随风传遍浓密的松林。开了一整天会的周总理，正和一位26、7岁的女青年轻松而娴熟地跳舞。女青年叫陈珍华，是庐山管理局会计。她有些拘谨地笑着问总理：“我想提一个人，不知总理还记得吗？”“哪一个？”“小名叫黑子。”总理感到十分意外，又高兴地问：“黑子？你知道她吗？”又问：“是你的什么人？”“是我爱人的母亲。”陈珍华答毕，圆舞曲的乐声也正好结束。

总理既高兴又有些激动地挽着陈珍华的手走进休息室。侍卫长成元功也陪同走了进来。总理说：“我们坐下来谈谈，小成，请你把她的名字和工作单位记下来。”总理呷了一口茶又向陈珍华说：“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爱人叫钟则朱，他在庐山植物园做会计。”

“你们什么时候到庐山工作的？”

“1959年，以前就在庐山工作了好几年，后来去南京工作了几年，这是第二次来庐山工作。”

总理关切地问道：“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住在芦林植物园宿舍，”

“你母亲身体好吗？”

“她身体不太好。”

“过几天我要去看望你母亲，先代我向她问好。”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陈珍华刚上班，便接到庐山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周总理今天要到你家来看望你母亲……”因为电话里没说清楚具体时间，陈珍华也不便问，就立即向组织请了假，并打电话告诉丈夫立即回家等候。

61岁的“黑子”万贞站在自己小房间的窗口，仰望汉阳峰上的白云翻腾。她戴着用绳子套着耳朵的老花眼镜，穿着一身已洗得泛白的黑色衣裤，衣服袖口处还有几个补丁。她那稍长而微宽的脸庞上，前额较高，眉毛宽而略浓，鼻梁挺拔，嘴形略瘪。白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发夹把它紧紧拢着。看上去，是位敦厚、老实而有些老态龙钟的人。这时，她回想起童年时代，在淮安外婆家中和七哥（周恩来在大家庭中排行第七）一起生活的情景。

当时，外婆家请了一位教书先生，自己和七哥，还有怀芝姐姐（万怀芝是黑子的堂房姐姐），在一起读书。七哥书读得最好，他从小天资过人，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8岁时候，“黑子”不想读书了，便逃学，一个人躲在花园静处玩耍。母亲知道后，差点挨打，多亏七哥出面才劝阻住。后来七哥去日本，临行前她还做了布袜子给他。自此分手，一晃就是几十年！“难怪人也老了。”她一面想，一面喃喃自语道。

钟则朱、陈珍华和7岁的儿子振庐及弟弟建华都怀着既兴奋又激动的心情等待总理的到来。谁都不忍去打搅沉缅于回忆中的母亲。

大约下午1时左右，总理在老占和成秘书陪同下来了。一见面，总理和钟则朱握手时便说，“我是来看你母亲的，不能有任何个人要求。”

“七舅放心，不会有的。”钟则朱答道。

总理进入客厅后，就向黑子住的房间走去，这时陈珍华已把黑子搀了出

来，总理双手握住黑子的手，满怀深情他说：“妹妹，你好啊！”

黑子含着泪珠微笑着仔细端详着总理，激动他说：“七哥，我们几十年没有见了，真设想到，在庐山见面。”

总理的眼角有些湿润，他说：“整整50年啰。”

大家落坐后，总理又问：“你身体怎样？”

“不太好，时常发病，天热好些，冷天就不行了，就是怕冷。”

钟则朱和陈珍华把刚沏好的庐山云雾茶端到总理、老成、老占和母亲面前。陈珍华补充说：“妈妈天冷就不能起床，这个毛病不能饿一下，也不能吃得太饱，受了凉也会发。”

总理看着黑子表妹并指着陈珍华笑着说：“她还知道你的小名子呢。”

黑子笑道：“我和他们说过的。”

总理揭开茶杯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朝着钟则朱问：“云雾茶是你们带去北京的？”

钟则朱说：“是的，去年出差去北京，母亲叫带点云雾茶给舅舅们尝尝。我去风宇（总理的胞弟）舅舅那里看望了几次。”

总理稍带严肃他说：“以后不要带东西了，不要加重你们的负担。也希望你们要模范地遵守中央的不请客、不送礼的规定，千万要注意影响。”

总理一面说春，一面又朝向他们的孩子振庐，问：“你们几个孩子？”

“两个。”钟则朱答道：“这是大孩子，还有一个小女孩在扬州，叫振宁。”这时陈珍华已把振庐拉到总理面前，要他叫舅公。

总理摸着振庐的头，笑着问：“上学了没有？”

陈珍华帮孩子回答：“刚上学。”

总理又扶着振庐的肩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长大了争取当解放军，保卫祖国。”

振庐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跑到一边去了。

总理又对钟则朱和陈珍华说：“你们有了两个孩子，以后要注意节育了。女孩子怎么在扬州呢？”

陈珍华说：“我们前几年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工作，振宁是在南京生的，后来我们又回庐山工作，就把振宁留在扬州老家了。”

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黑子”，老人忽然两眼呆滞，接着眼睛和嘴也紧闭，双手紧紧抓住沙发布，还有些发抖，整个人好象在痉挛似的。

总理一惊，但很沉着地问：“是发病吗？要不要赶快请医生来？”

“不用找医生，是老毛病。”“因为妈妈今天太高兴了，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钟则朱赶忙一只手拢住母亲的肩，另一只手给母亲由上而下反复抹着胸口，不到两分钟，老太太吐了一口气，眼睛睁开了，人渐渐恢复了正常。

陈珍华端起一杯水给母亲喝了一口，总理递了一支烟给妹妹，要她顺顺气。

黑子已经一切正常，她朝总理及老占、成秘书说：“没有事了，刚才让你们受惊了。老毛病，日本人来的时候就有了。”

总理仍不放心，关切地问：“要不要让她休息一下？”

黑子说：“不要紧的，这个病说发就发，说好就好，没有关系。我们兄妹难得见面，还是大家谈谈。”钟则朱、陈珍华也说：“不要紧了，七舅放心。”



总理又看了一眼黑子，感到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才继续说：“你们知道万家（是总理的外婆家。总理的生母万氏是万贞的姑姑，又是舅母，万贞的生母周氏是总理的姑姑，又是舅母。）还有哪些人？还知道哪些亲戚？”

钟则朱说：“万家绪生舅舅在扬州。十三姨娘万怀芝以前在扬州，抗战后就搬去上海。1937年，我随母亲到过外婆家里，见过二舅舅、四舅舅、六舅母等，还有陈家姑婆婆和陈家小姨娘，四舅舅家在运河上工作。”

在谈了一会大家族情况后，总理又关心地问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转向成秘书说：“小成，记一下，回北京后，帮我寄点钱给他们。”

总理转向黑子笑笑说：“儿子、媳妇对你好吗？你想吃些什么？”

黑子说：“他们待我蛮好，你放心。我想吃些油条泡开水，平时就是粮食不够吃，不知怎么搞的？”

“这几年受天灾人灾的影响，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粮食是紧张些，以后会慢慢好转的。”总理说。

总理又问：“你们吃饭怎么办？”

陈珍华说：“早餐我做饭，中午则朱做，我在牯岭街上吃。”

“你们烧煤还是烧柴？”

“单位集体修林时，分些柴，有时也上山砍点杂柴烧。”

“庐山的木炭也不少，每担3元6角。蔬菜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自己种一点，上半年种马铃薯、南瓜，下半年种点青菜，不过大部分是珍华从街上买回来的。”

“七舅，看看我们收获的马铃薯。”陈珍华边说边引总理到卧房里看了床底下储存的马铃薯。

“在什么地方种？”

陈珍华又引总理到窗口，指着下面的一块菜地说：“就是那块地。”

总理很兴奋他说：“我教你们，最好要把菜地边沿用石头砌好，要挖排水沟，防止雨水冲刷。”

总理站在窗前把开会的地方指给他们。

当珍华给总理加第三次开水时，总理说：“不要了，不要浪费开水，我要走了。希望你们永远在基层，好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争取进步。你们以后到北京来玩。”

总理又兴奋地握住黑子表妹的手说：“妹妹我走了，要多保重，有机会来北京玩。”

“黑子”万贞含着泪望着总理说：“七哥多保重，要注意身体，问候七嫂。”

“黑子”坚持要送总理等人下楼，被总理劝阻住。于是，则朱和珍华送总理、老成、老占到楼下门口。黑子、振庐和建华在楼上窗口，一直目送周总理的车慢慢消失在万绿丛中……

## 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同几位普通人的交往。

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不从不居高官而自傲，总是勤勤恳恳地为人们服务。他不但拥有大批上层人物的朋友，而且也深深地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许多接触过总理的人都把他奉为知己，异口同声他说：“总理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 一、我们都是人民代表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有一次，周总理作为代表去北京饭店参加小组讨论会。保卫科的同志得到通知，便到门口准备迎候总理。当车子快到饭店门口时，恰好另一辆小汽车开到了门口，刚要停车，保卫科的同志连忙挥手示意让这辆车子开过去点，好给总理的汽车让路。

在许多人看来，这件事不足为奇，或者以为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周总理却不这样认为。当时总理下了车就问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你干嘛把人家的车轰到前面去了？那车上坐的是谁呀？”这位同志回答说：“是一个省的代表。”周总理说：“我是代表，人家也是代表呀，快去把人家请回来！”

周总理站在饭店门口，等那位代表下了车，立即主动地迎上前去，向他问候，并和他亲切握手，请那位代表先进门，然后自己才进饭店。

### 二、“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1954年冬，周总理听说北京市的交通拥挤，广大职工上下班很不方便，心里非常不安。为了亲自了解情况，在一个傍晚下班时候，总理从北京图书馆门前乘上公共汽车，后又乘有轨电车绕了大半个北京城。

当时车上非常拥挤，乘客们看到总理和他们一起乘车，都非常激动，车厢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许多人站起来争先恐后地给总理让座。周总理非常客气地让大家坐下，自己却自始至终地站着。一路上，总理亲切地和周围的同志们谈心，询问是那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生活怎么样，上下班在路上要用多长时间等问题。乘客们都非常感动他说：“总理工作那么忙，还来和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我们过意不去啊！。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总理体察民情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北京城。事后，总理指示有关部门立即研究解决市内公共交通问题，增加了汽车数量，开辟了新的线路，十字路口设立“安全岛”。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的公共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总理亲自乘坐首都的公共汽车，并非只有这一次。

1958年9月26日，晚上10点多，五路公共汽车发出了最后一班车。到天桥站时，正赶上剧院散场，许多乘客上了这辆车。售票员车前车后，忙着收钱售票，照顾乘客。这时，坐在中部单座上的一位乘客主动买票。当售票员把票递过去的时候，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不禁大声喊出来：“周总理！”其他乘客听到喊声都不约而同地朝这边看来。周总理非常慈祥地微笑着，亲切地注视着售票员，轻声问道：“小伙子，怎么样，工作累不累，行车习惯了把？”售票员刚说“不累”，周围乘客二双双热情的手就伸向了周总理，大家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向总理问好。周总理笑着向乘客们点头致意，车厢里一片欢腾，人们互相转告着：“总理在我们这趟车上！”司机师傅知道后，两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精力更为集中。车子在平稳的速度中行驶着，到了北海站，总理要下车了，售票员想搀扶总理，但周总理已健步走下车来，

伸出温暖的大手说：“你们辛苦了。”售票员紧紧地握着总理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呆呆地站着，竟忘了说一句问候周总理的话。

周总理乘公共汽车的动人情景，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三、“这真是咱们贴心的总理啊！”

北京低压电器厂的工人刘秀新有一件珍贵的衬衫。衬衫珍贵不是说它用料讲究、质地华贵，而是它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

那是1972年8月3日的傍晚，刚学会骑车的刘秀新骑着自行车上了街。忽听身后汽车喇叭响，心一慌就急忙跳下车。正站在快车道上。汽车司机赶紧刹车，但还是把小刘的衬衫给刮破了，后背还蹭破了一点皮。这时小汽车的车窗帘打开了，一个人透过车窗关切地往外看。小刘一见是周总理！这时司机下车问她：“同志，碰着没有？”小刘红着脸忙说：“没事儿，没事儿。”

当时还有紧急任务的周总理随即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下车，要办好三件事：第一，马上用别的车送她上医院检查；第二，不要告诉她车里坐的是谁，以免她不安，更不许批评她；第三，给她买件新衬衫。

陪同小刘到医院作检查的工作人员是总理的保健医生。他为小刘做了细致的检查，刚查完，医院的电话响了，原来是周总理不放心，特地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听说没大事，只是擦块皮，这才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一位国务院的干部急匆匆地赶来，拿出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要小刘收下。小刘不肯，她说：“我的衬衫破了，不怨司机，怨我呀！怎么能让你们买新的呢？”可是这位干部一定要让小刘收下，说：“你不收下，我完不成任务，领导要批评的！”

小刘明白了，这是周总理送来的衬衣。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庄重地收下了这件衬衫。

第二天，总理又派人到小刘家里看望，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小刘全家倍受感动：“这真是咱们贴心的总理啊！”

小刘一直保存着这件珍贵的衬衫，并把它当做自己前进的动力。

#### 四、周总理与清洁工人

清洁工人时传祥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解放前，他从山东老家逃荒要饭来到北京，靠掏大粪养家糊口，受尽粪霸的欺凌和压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后，他在平凡的掏粪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表彰。时传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过国家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的亲切接见，还被周恩来总理请到家中做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一伙连时传祥这样一个苦大仇深的普通扫粪工人也不放过。借口他和刘少奇握过手，照过像，就给他戴上了“工贼”、“粪霸”的帽子，打成了“反革命”，遣送回乡，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不久，他就被逼得精神失常了。

1973年8月20日，周总理听取工作汇报时，关心地问起时传祥的近况。当了解到时传祥的情况时，总理十分气愤他说：“难道‘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周总理当即指示北京市公用局党委书记，要党组织派代表把时传祥请回来，给他平反，向他道歉，为他治病。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北京市公用局的领导专程来到山东时传祥的家里，紧紧地握着时传祥的手说：“总理非常关心你的病情，派我们接你来了。”时传祥当时嘴虽已不能说话了，但激动得眼泪却夺眶而出。

## 五、周总理与理发师

20 年多年来为周总理理发的是北京饭店的特级理发技师朱殿华师傅。提起总理尊重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作风，朱师傅可以讲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

有一天，周总理连续工作了 20 多个小时，顾不上休息，又要赶到机场迎接外宾，因此总理请朱师傅尽快给他理发、刮胡子。正在刮胡子时，周总理突然咳嗽一下，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下巴划了一个口子。朱师傅当时非常紧张，急得满头大汗，忙说：“我工作没做好，真对不起总理。”

而周总理却笑着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时没跟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呢。”一句话说得朱师傅十分感动。刮完了胡子，周总理拿了两个馒头就上车去飞机场了。临走时对邓颖超同志说：“你陪老朱吃饭，我走了。”

望着总理渐渐远去的背影，朱师傅的眼睛湿润了。

有时候，总理太忙了，就约朱师傅到家去给他理发。一次，朱师傅因事迟到了几分钟，下车便跑，让总理看到了，他心疼地责怪朱师傅：“老朱啊，这么大年纪了，不要跑嘛。”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工作日理万机，可对同志对部下却处处关心体贴。

在总理逝世前两个月，朱师傅最后一次见到总理。那时，周总理已经起不来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坐起来刮胡子，朱师傅不依。总理说：“那你大弯腰大累了，可以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刮。”病情都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可总理心里还在替别人着想。过了一段时间，朱师傅算了算，已经有 20 多天没给总理理发了。于是几次托人捎信，要求去为周总理理发。身患重病的总理知道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老朱给我理了 20 多年发，现在看到我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让他来吧！谢谢他的一番好意。话虽简短，却字字千钧。

总理逝世后，朱师傅知道了这一切，在为周总理遗体整容时，不禁号啕大哭，嘴里不住地喊：“总理，总理啊！”后来到清明节前后，朱师傅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上面有人追查，问到朱师傅：“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你知道不？”“不知道”。“你天天到那去是什么用意？”朱师傅听到这，怒不可遏，大声他说：“我想总理，我想总理啊！”六、“叫我老周就行啦”

河北省武安县伯延村有个叫张二廷的人。这个张二廷虽说是个老贫农，但人却是个直率而又乐天的人。

1961 年 5 月 3 日，周总理来到了伯延村。在这里居住的 6 天里，总理的足迹遍及村子的角角落落，从生产到生活，他都作了详细的调查，真正了解到了群众的全部疾苦。

有一天，总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张二廷也参加了，这个心直口快的人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总理听了却非常高兴，因为这正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

座谈会结束后，周总理又来到了张二廷的家里。一进院子，总理就大声招呼道：“二廷，二廷，在哪屋住呀？”

张二廷一听：“哟，这不是总理么！叫我的名儿怎么这么亲哪！”他急忙跑出去，眉开眼笑地对总理说：“快，总理，快到屋里坐。”

“哎，以后别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啦”总理笑呵呵地说。

“这可不中，这可不中”二廷连连摆手。

“中！”总理笑了，二廷也笑了。

两人手拉手进了屋，往炕头儿上一坐就拉起了家常，“老周”和二廷说啊说啊，两人彼此都觉得聊得挺对心思，以至于谈到很晚还觉得没说够。

第二天上午，老周又来了。刚一进门，就亲热地叫：“二廷，二廷啊！”咦？没有答应，再一看，嗨，敢情二廷还穿着衣裳在炕上睡觉呢。

老周轻轻地拍了拍二廷：“二廷、醒醒，昨儿累了吧？”

二廷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一瞧：“哎，总……哦老周，是你呀！”

老周说：“今儿下午有个会要你参加，我就是给你送这个通知来了”说完就要走。

二廷急忙拦住：“哎哎，再坐会儿嘛”

老周说：“不打扰你了，休息吧！”说完转身离去了。

张二廷是快50的人了，妻子又于去年过世，他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总理在聊天中了解到这些以后，心里非常难过，于是跟二廷商量道：“二廷啊，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四个孩子，你养两个，我帮你养两个，长大以后，再让他们回到你身边，怎么样啊？”

二廷说：“好是好哇，可你这么忙，光国家的事就够你操劳的了，一天到晚，比我们干庄稼活儿还累，我怎么能再给你添麻烦呢！”

几天的接触、聊天，总理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二廷呢，也非常喜欢这个知心的老周。

老周要走了，他最后一次去看望二廷。二廷眼里泪花光烁，不住地说：“老周哇，你有空儿可一定回伯延村看看啊！”

老周说：“你放心，有机会我一定来，就是来不了，我也会派人来看你的。”

从那以后，一年、二年、三年、一连五年，年年总理都派人来看望伯延村的二廷。”

第六年，也就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总理也无法派人来看望二廷了。

张二廷呢，却还是朝北京的方向望着、望着，念叨着老周这位知心的朋友，默默地祝愿老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 同窗情——周恩来与王朴山、常策欧的友谊

吉林省革命博物馆珍藏着这样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人物相同，姿态相似，景物也一样，而时间却相隔近四年，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与同窗好友在一起拍照的。照片上右边的是周恩来，左边前坐的是王朴山，后立者是常策欧。

1913年8月，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当时，他只有15岁，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并不沮丧，相反，他更刻苦地学习文化，因此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他“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的豪爽性格，班上的许多同学都乐意与他交往。常策欧是他的同班同学，且两人同住一室，两床相对，正可谓朝夕相处；王朴山虽和他们同级不同班，但三人因志趣相投，所以总是学习上互相切磋，品德上互相砥砺，思想上相互交流，因此三人友谊日增，情同手足，入学不久，三人便一起拍下了第一张友谊之照片。

很快，第二个学期又开学了。周恩来和他的学友更忙了。他和常策欧等同学，共同发起了“敬业乐群会”，他本人担任了该会的智育部部长、讲演团干事和会长，并主编《敬业》杂志，王朴山则担任编辑。他们共同研究各种学识，为挽救内忧外患的祖国探求道路，并引导和组织同学团结互助，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敬业乐群会”成为南开校园里很有影响的进步爱国团体。共同的学习和战斗生活使周恩来、王朴山、常策欧三人在感情上更加亲密，在思想上更加一致。

1917年春，周恩来、常策欧等人编辑南开第10次第2组毕业同学录，他们两人分别为同学录作序。在同学录上，除刊印毕业同学的照片外，还附有各人的小传。这些小传都是由相互熟悉、了解较深的同学执笔的。常策欧写了周恩来的小传，周恩来也写了常策欧的小传。

夏天到了，近四年的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在踏上新征程的前夕，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再留一张合影，于是三人又来到那家照相馆，按照前次的位置、姿态，并把第一张照片放在中间，拍下了第二张照片。这两张照片生动地记录了他们与日俱增的友谊和始终如一的救国抱负。

从南开毕业以后，周恩来和王朴山先后到日本留学。开始他们都在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以后，王朴山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在异国他乡，周恩来同王朴山交往更为密切。王朴山自幼体弱，经常因病辍学，周恩来就给予他细致的照顾和关怀并鼓励他锻炼身体。当时，王朴山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诗句：“从来事业须精神，百炼当成铁石身；旋转乾坤新世纪，中原日日待斯人。”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决心，回答挚友的关怀。王朴山于1922年前后回国，初时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在东北屯垦公署任职，遗憾的是，王朴山不幸于1930年病故，享年才34岁。1962年，周总理到长春视察工作时，特意接见了王朴山在长春的子女，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常策欧在离开南开学校后，进入清华求学。这期间，他与周恩来书信往还，继续保持联系。1919年秋，常策欧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1920年12月，周恩来赴巴黎勤工俭学。当时正值寒假，周恩来决定利用假期到伦敦看望常策欧，并考察英国社会状况，于是便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周恩来和常策欧两人住在常策欧的公寓里，从天下大事到求学问题无所不谈。1922年1月，周恩来再次赴伦敦看望常策欧。

在假期，常策欧也到巴黎看望周恩来，平时就靠通信联系。旅欧期间，周恩来寄给常策欧的信共有 100 多封，但可惜的是，这些信大部分被毁于十年浩劫中。在保存下来的几封信中，我们抄来了下面的一封，这是 1922 年 3 月 25 日周恩来写给常策欧的信：

“醒兄（常策欧字醒亚）：

两次寄来报信，均收到。

《Times》（《泰晤士报》）既如此减价，便请先代定一月直接寄弟处好了。

书目承示知多种，谢谢。

贝氏《柏林指南》已买得。

柏林天气，前数日亦甚冷，且曾飞雪两日。今日略见晴明。伦敦如何？

报请快定！

匆匆。询近好！

恩来

一九二二·三·二五”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和常策欧两人关系之密切，联系之频繁。

解放后，常策欧在天津北洋大学担任英语教授。这期间，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多次被邀请到总理的家中做客。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岁月，都感到亲切。

1953 年常策欧不幸病逝。在他生病期间，总理前往他的家中去探望他，在他逝世后，周总理也亲自看望和慰问他的子女。

周恩来、常策欧、王朴山三人的合影照片，一直由王朴山的家属珍藏着，后来才将它赠给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

这两幅照片，忠实地记录了他们三人之间珍贵的友谊，也充分体现了总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纯真品质。总理这种身居要职仍不忘故交、联系群众的作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 共和国总理与北洋政府代总理——周恩来与朱启钤的交往

北洋时代曾任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与周恩来总理有过不少交往。

朱启钤先生出生于 1871 年。晚清时曾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部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 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坚决跟党走，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好事。象朱启钤先生这样经历复杂的人物，在他的晚年有如此大的思想变化，是与他同周恩来总理的交往密不可分的。

解放前夕，朱启钤先生寓居上海。1949 年国共和谈时，章士钊先生以李宗仁政府和谈代表团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和谈。周恩来授意与朱启钤交往很深的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朱启钤，劝说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或台湾。章士钊先生，在和谈之余两次写信，交由金山同志派人设法送往上海。第一封信因送信人中途牺牲，未能递到，朱启钤只收到第二封信，后留在了上海。北平和谈破裂后，章士钊留在北平，住在东四八条住宅。

上海解放后，周总理即派朱启钤先生的外孙章文晋同志将朱启钤接到北平。此后，朱启钤亦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与章士钊先生前后院，一直到 1964 年去世。

朱启钤来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作为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他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等人商量后，决定把已经跑到香港的 18 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由于有几条轮船已被台湾当局扣留，经过努力，除“中兴号”7000 吨客轮仍留在香港暂营客运外，其余 9 条货轮全部召回。同时，朱启钤还将他珍藏的歧阳王（明初大将）世家文物共 56 件捐献给政府。

周总理对朱启钤很关心。朱启钤来京后，总理请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因他对古建筑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又让他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顾问；周总理还先后安排他为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总理对朱启钤不仅关怀而且尊重。50 年代初，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根据总理的指示，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请朱启钤和他的儿子朱海北去参加市政府在旧司法部街老司法部内召开的座谈会，参加会的还有雕塑家刘开渠等人。会上，朱启钤发表了以下意见：

（一）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

（二）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

（三）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

（四）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当初（约民国二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经我手在改建新华，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这些建议，有关部门经研究大都采纳了。东西“三座门”开始并没有拆除，后来由于有碍交通才不得不移走。

1957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先生的住处，向章老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而后由章老陪同又看望了朱启钤先生，寒暄落座后，



总理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通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先生知不知道。朱启钤先生说：“民国二年，我任内部务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北戴河属于临榆县治）。”总理打趣地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

话题扯开后，总理详细询问了朱启钤先生的起居，并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总理接着又问：“送给你的《参考消息》，收到了没有？”朱启钤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字太小，没法看清楚。”总理说：“这是专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时指示秘书，以后给老人的文件一定要用大号字印刷。朱启钤的长子朱泽农同总理握手时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总理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朱沛（其谱名朱沛，字泽农）。”总理马上说：“五班的。”当总理听说其兄弟子侄等多就读于南开大学时，他便同他们谈起了南开时代的许多往事。在谈话中，总理甚至连当年南开宿舍的式样，某些教职员的外号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对总理的惊人记忆力赞叹不已。

当时在场的还有朱启钤的女婿章以吴和夫人罗婉容（章以吴原娶其女朱淇筠，朱淇筠病故后续娶罗婉容）以及他的幼子朱海北等。章以吴也是总理南开时代的同班同学，总理称他“以吴兄”，并说：“我记得，你比我大一岁。”章以吴依照念书时的习惯，称总理为“老学长”。罗婉容原先是护士，1950年曾随同上海口腔专家韩文信大夫到北京护理过总理，所以总理也认识她。当总理听说章以吴和她已经结婚时，就问：“你们结婚为什么不请我喝喜酒？”接着又说：“好，你们不请我，我请你们。”后来总理和邓大姐真的请章以吴夫妇全家吃了一顿便饭。

章以吴当时正由平凉人民银行退休回来，生活并不富裕总理问他：“你有什么困难？”章不肯说，总理说：“不要客气嘛！”章说了实际情况。后来，根据章在解放前的资历，中央统战部把他推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总理和大家在一起时一点架子也没有，始终谈笑风生。朱启钤先生请总理抽烟时，总理说，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吸过一个时期，因为太费脑筋，后来就戒掉了。他又说，他爱喝酒，茅台酒能喝一瓶。出于待客的礼节和对总理这样一位贵客的敬意，朱启钤执意要家人上茶。而总理随行的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向家里人摆手，示意不必送茶。由于朱启钤年事已高，眼花耳聋，没有看清这些情形，所以仍在不断催促“上茶”、“上茶”。家里人对此左右为难，他们既了解朱启钤的心情，也理解保卫人员的职责。最后，出于对总理的一片敬意和对朱老的无奈，只得将茶和糖果放到了中间的桌子上。没想到总理亲自走过来，坦然自若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总理的这一举动解除了尴尬的局面，全家大为感动。总理刚来时，全家人既喜悦，又有一点“诚惶诚恐”，好象与总理有种无形的距离感。当看到总理那样坦诚，这种拘谨的气氛和心情一下子消失了。总理的平易近人，待人亲切和对人的信任，象一股暖流温暖着朱启钤全家人的心。

朱启钤耳聋，在和总理谈话时，经常打断总理的话，总理总是耐心地对反复加以解释。当总理谈到黎元洪时，朱启钤听不清，几次问总理。耐心地一次比一次提高声音回答，还笑着解释说：“大总统嘛！”每当朱启钤打断总理的讲话时，家人就向他摆手，示意不要打断总理的话。总理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总理这种善解人意的做法，给朱启钤

一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朱启钤先生当时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在谈话中他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了文盲啦？”总理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先生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给你详细介绍介绍。”朱启钤在葬俗上思想较旧，担心死后被火化，在与总理告别时，他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家里人听到他提这样的问题，忙去阻拦，但总理又一次制止了他们。等朱老先生说完后，总理对着他带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老先生听到总理的承诺，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

总理告别离去时，和朱启钤先生家人及工友一一握手，并风趣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

通过与总理的交往，朱老深深佩服总理的为人及领导艺术，他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1961年朱老90岁生日时，总理送来了一个大花篮祝贺。几天以后又在全国政协二楼小礼堂为朱老举行一次小型祝寿宴会。除朱老家属外，章士钊先生和张学铭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其余应邀作陪的都是70岁以上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在祝酒时，总理说：“今天在座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祝寿（朱启钤号桂辛），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在宴会上，朱老家属表示感谢总理的照顾，总理说：“不要感谢我，我是代表党和毛主席来给大家祝寿的。”席间，朱老的继夫人许曼颐问邵力子先生：“邵老，傅先生怎么没有来（指邵者的夫人傅学文）？”总理听到后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要请夫人们都来参加。朱夫人提得很正确。”在朱老家属集体向总理敬酒时，总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朱老说：“好呀！那就请总理订个日子吧！”

1961年12月7日是总理约定到朱家作客的日子，朱家从北京饭店订了菜，自己家里又做了几样贵州风味的家乡菜和总理喜欢吃的“狮子头”。等待总理到来。总理因为上午在大会上作报告，怕朱家等得着急，让邓颖超和章文晋、张颖夫妇先到，邓大姐解释了总理晚到一会儿的原因。12点半时，总理和孔原、童小鹏都来了。因为下午3点还要参加一个会议，因此当吃完饭大家请总理休息一会时，总理说：“不休息了，坐坐就行了。”总理作了一上午报告，嗓子有些发哑，但他仍陪朱启钤家人谈了一会儿话。朱启钤先生说，他平生没到过老家，一直希望等贵州的铁路修通后，回家乡看一看。总理听后鼓励他保重身体，还说通往贵州的铁路即将建成，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回家乡看看的。最后总理和邓颖超还与朱启钤全家合影留念，朱启钤先生特别高兴。后来，他将手书的“松寿”绉丝小条幅，亲自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总理，作为纪念。

1964年初朱启钤先生患感冒，不久并发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当时总理正出访亚非各国，当中央统战部将朱老病情向远在国外的总理作了汇报后，总理立刻打回电报，请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尽力医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还代表党和政府到医院看望，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竭尽全力救护医

治。但终因年老体衰，朱启钤先生于1964年2月26日病逝。临终前，他还时时念叨远行国外的周总理。

鉴于火葬日益普及，而北戴河茆地又划作禁区，朱老先生生前又在京郊万安公墓买了寿穴。他去世后，全国政协征求朱家的意见，家属们经过考虑，觉得“老人生前已另有准备”，所以就没坚持安葬在北戴河，最后经总理批准，朱老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前，在嘉兴寺为朱老举行了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代表总理主持，总理送了一个鲜茉莉花做成的花圈。李部长在同许曼颐谈话时，一再表示了总理对朱老丧葬事宜的关怀。

由于党和总理的关怀，朱家的生活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十年动乱中，朱家也无例外地遭受冲击，朱启钤在八宝山革命的墓碑被“造反派”砸碎。总理知道后，指示中央统战部很快给朱家落实了政策，并重新修复了朱启钤先生的墓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海北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又把朱启钤先生生前居住的东四八条住宅，定为“朱启钤先生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周恩来总理与这位“代总理”朱启钤先生的交往，充分体现了爱国一家、革命不分先后的精神，是我党做统战工作的典范。

## 关怀与怀念——周恩来和于右任、屈武的交往

周恩来在同朋友们的交往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设身处地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实际的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对方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总是坦率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含糊、敷衍，对正确的意见诚肯地接受，对不正确的意见则进行人情入理的说服工作。他常对周围的人说：对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不要只看到他们消极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们要求抗日的一面。他还说过：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凡是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对此有体会，而于右任先生和屈武更有感触。

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他为人正直，敢于讲话，富有民族气节，但一直对蒋介石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屈武是他的女婿，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出于对抗日事业的热情和对于右任先生的爱护，在充分了解了于右任先生的为人及其基本主张、态度后，于1938年1月11日，当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时，特地请于先生书写了刊头，屈武自苏联回国后，又通过屈武多次去做于先生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右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从这次谈话之后，屈武在于右任先生身边生活了6年多时间。他一直是体念周恩来同志的苦心，本着周恩来的指示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问题，于先生一度确有所怀疑。有一次他问屈武：“据说我们的国军（指国民党军队）在前方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枝，他们不打鬼子，一味地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的企图什么？”屈武说，这纯粹是编造的谎言，还列举了各战区一些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的事实。当得知这些消息是屈武从王炳南和周恩来先生那里得来的时候，他非常担心，很不安地对屈武说：“你要当心啊！重庆到处是特务。”但对屈武提供的情况，他是相信的。此时他已有所察觉，的确有人在向他耳朵里灌输反共的谎言。

1938年冬的一天，周恩来找到屈武，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元老，他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后，曾派一个在上海活动多年的“cc”代表人物吴开先到重庆进行日、汪、蒋的联系工作，周恩来同志获悉后，立即要屈武告诉于先生，请他注意。于右任立即表示赞同，明确表示，决不能听任这些人去干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他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40年秋，王南宮在重庆中训团受训。结束后，于右任先生特地接见他和其他五位陕籍受训人员，谈话中除勉励他们关心民族、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办事外，还特别指出，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我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同心同德，共御外侮，绝不能存党派成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祸，作民族的罪人。这不能不说是我党争取工作取得的良好效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屈武把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和事变经过系统地告诉了于右任。于先生听后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他沉默了一会，叹了一口气说：“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确是他有心无力的苦衷。以后他听到周恩来同志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扣发《新华日报》而坚持斗争的消息，倍加赞誉，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正是许许多多的事实使他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和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种种努力。

于右任先生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贪污腐败的现象十分不满。他执掌监察多年，曾想运用此职权，做点澄清吏治、振奋人心的工作，但是那些贪婪成性的人，正是握有实权身居枢要的人，徒有虚名的监察院，又哪里能发挥作用。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件重大的贪污案件，被弹劾的涉及到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先生坚持要执行监察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坚持进行庇护。在气愤之下，于右任先生表示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抗议，他就离开重庆移居成都。他走后两天，周恩来同志知道了，他一方面认为“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但又耽心于先生的安全，建议屈武立即赴成都。周恩来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办呢？你应该赴成都去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还嘱咐屈武向于先生表示慰问，说：于先生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屈武赴蓉后，向于先生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于右任先生很感动，并叫屈武向周恩来同志转达他的“谢忱”。

在成都，于右任先生的心情一直不好。一天凌晨4点钟左右被恶梦惊醒，他叫醒屈武，带着极惊恐的神态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老蒋手持利刀，厉声对我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我要你的老命’，说着他就用刀向我胸部刺来……这个梦是个不祥之兆啊！”接着又说：“蒋介石的为人你不知道吗？他心狠手辣有什么信义可讲。”就在这天早饭后，张群奉蒋介石命令从重庆来到成都，说委员会派他前来慰问院长，并且要他迎接院长回重庆。而对监察院弹劾案的问题，只字未提，显然蒋介石并未改变他原先的态度。于右任先生由于夜晚的一场梦惊，心有余悸，便也乐得顺手推舟，又回到了重庆。周恩来知道后，很能体谅于先生的心境和处境，对屈武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由于有人在蒋介石面前告发屈武，说他暗地同共产党“勾结”，还参加了什么秘密组织（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简称为“小民革”），蒋介石非常气恼。1944年春的一天，蒋介石召见了屈武，“命令”他到陕西去担任建设厅长。屈武把这一情况及时告诉了周恩来同志，言谈中还流露出宁愿离开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不愿丢下那些对抗战有意义的工作。周恩来认真考虑之后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进行联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屈武在担任有名无实的建设厅厅长的一年多时间内，同周子健同志作些必要的接触，反映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的反共阴谋活动情况，此外还和杜斌丞、杨明轩等做了些地下革命工作。

在周恩来的帮助和多方面关怀下，于右任先生的政治态度进一步明朗、坚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好事，所以在抗战

胜利前夕的 1945 年 2 月 14 日，周恩来同志借重庆“特园”举行宴会时，特意邀请于先生出席，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正在人民欢庆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却积极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他急于要解决新疆三区问题，以安定大后方，于是派张治中先生为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行前征询屈武的意见，说如果愿意一同去，他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说说情，屈武举棋不定。周恩来知道后，对屈武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张治中的别名）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他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不断地帮助他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好作用的。”在蒋介石批准屈武去新疆后，周恩来又对屈武说：“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 100 多共产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请他到新疆后，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张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他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置之脑后淡忘下来，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到新疆后，屈武协助张治中释放了这批中共党员，从而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

1948 年冬，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败局已定。在形势逼迫下，蒋介石于 1949 年元旦发表了所谓“引退”和“求和”声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于 4 月初开始同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屈武也参加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一天，周恩来同志找了屈武单独谈话，以非常满意的口气表扬了他在新疆的工作。使屈武非常感慨。由于蒋介石方面没有丝毫诚意，和谈僵持不下。4 月 15 日，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15 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张治中认为于先生此时来北平没必要，所以回电：“请于暂缓来平。”并决定让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飞回南京复命并请示。

16 日清晨 4 点钟，周恩来同志找屈武谈话，说：“于先生北来问题的决定我都完全知道了。白天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过于干涉。”周恩来接着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来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在谈到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周恩来同志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回到南京后，屈武见到于先生，就把北平和谈经过和一些会议情况告诉了他，并且说：“看起来这个《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于先生说：“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那里不回来了。”屈武说：“这正是周恩来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屈武还把周恩来同志希望于先生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告诉了于先生。于右任对周恩来的关怀很感激，但他知道这

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他的周围已布满了特务，被密切地监视着，怎么可能让他留下呢？

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屈武为早日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返回新疆，协助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而此，于先生已不能左右自己的行动留在南京，被挟迫去了台湾，这也许成了他的终生憾事。

建国以后，屈武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还先后出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等职务，继续从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工作，因而同周恩来同志接触更多，更深地体味到周恩来同志对于参加统一战线的新老朋友的关心。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的多次谈话，使屈武等党外朋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周恩来同志说过：只要对人民做过好事，我们都不会忘记他。对于留居大陆的朋友如此，对于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台湾的和海外的朋友也是如此。

1961年，被挟迫去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通过他在香港的老朋友吴季玉先生，向北京章士钊先生透露了一桩心事，“今年是我妻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向总理反映了这件事。周恩来总理决定要屈武去西安，以女婿的名义为于老夫人做80大寿，并说：“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屈武在西安邀请了于右任先生的亲朋好友参加于老夫人的祝寿活动，于老夫人十分高兴。事后，屈武将祝寿的照片连同给于先生的礼物，托人辗转带给了于先生，并在信中说明了这次祝寿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濂溪先生”的支持（濂溪先生，是宋代名儒周敦颐的别号。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于先生称周恩来为周先生。在此暗指周总理）。于右任收到信、照片和礼物后，喜出望外，托人带回音信，让屈武向“谦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忱。那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于先生身在台湾，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关心如此细微的事情，不能不使于先生感动万分，而屈武作为于先生的亲属，更为感动。当屈武向周总理转达完于先生的谢忱后，总理点了点头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其实，这不仅仅是对于先生个人的问题，而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是对于先生为代表的那些热爱祖国人民的团结工作，里面浸透了周总理多少心血啊！在十年浩劫中，屈武在总理指导和领导下所做的事情竟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滔天大罪。他先隔离审查，后来又遭逮捕关押，直到1974年国庆前夕，才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而获得解放，重获自由。当晚，他参加了总理举行的国庆宴会。当屈武看到总理因国事烦劳和病魔缠身而神态憔悴的时候，他禁不住老泪纵横，愁绪万千……他忘不了几十年来总理对他的关怀，更忘不了在总理病情已极为严重的时候，还让人找他谈有关台湾的问题，思考着如何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早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周恩来对于右任先生和屈武先生的关注和关怀，在与朋友们交往过程中诚以待人的好作风，确实为后人在统一战线方面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 总理对老中医的关怀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医工作，提起往事，虽已都过去了许多年头，但很多已故老中医的后代、学生还都十分激动。下面几例小事，可见一斑。

### 一、“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

施今墨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 50 年代初第一次给总理看病，不免有些紧张。总理见状就象老朋友似地问道：“开的什么汤头啊？”施老回答说：“保和丸加减。”周总理笑了：“噢！原来施老先生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总理几句幽的话语顿时驱散了施者的忐忑不安。施者也就从这次起，把总理视为知己，心里有事总愿意找总理谈谈。

施者常对子女说，我这个人就是爱急躁，办一件事恨不得马上就能看到结果，而总理看问题全面又透彻，他帮助我提高了认识。

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前夕，美蒋特务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亚非会议胜利结束后，施老在北京又见到了安然无恙的周总理，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紧紧握着总理的手：“幸亏您没有坐那架飞机……”周总理望着施老，深沉而悲伤地说：“很多好同志遇难了，中国人民要记住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施老事后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短短的几句话在，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

“文革”中，施老受到了冲击，身患重病，还被抄了家，被勒令搬出原来的住房，实在无处可以安身。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向总理求援。当时时局动乱，周总理也处境艰难，施老对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抱多大的希望。不料三天之后，国务院就派人来了解情况，并按总理的指示把施老安排在一所公寓大楼里，同时还解决了施老治病、营养、日常生活等所需费用。施老这位 80 多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讲：“多好的总理啊！每天有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我们还要分他的心，唉！不应该啊。”

施老病危时，口述了一份数千字的关于对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对子女说：“我一生唯一的憾事就不能再见到周总理，诉说自己对他感激之情。”他让子女搀扶着，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写毕，签上自己的名字，再三叮嘱家人，要在他百年之后将此诗献给周总理。二、“知我者总理也”

孔伯华先生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周总理有过多次交往。

有一段时间，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医、中药重视不够，做了一些不利于中医发展的事情。每当这时，孔伯华总是直接向周总理反映意见，事情往往很快得到解决。例如，1952 年前后，医药部门发出两个通知，一是取消名牌中成药上的金箔，一是停止供应鲜草药。孔伯华知道后拿起电话便向周总理汇报，他说，金箔有镇静作用，有些鲜草药的作用是干草药所不能替代的，怎能一律取消而不问青红皂白呢？总理说：“孔老，不要着急，写个意见来，谈谈你的看法好吗？”意见书上报两天后，周总理就派人送来一封信，告诉孔伯华，有关部门已经撤回了原来的错误决定。

以后总理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成立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的问题。孔伯华不仅应邀参加了会议，还在周总理同意成立的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学术交



流委员会里担任了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孔伯华病后，总理知道了，立即派人前来探望，并带来了500元钱，转达周总理的意见：要孔伯华安心养病。临走时再三询问还有什么困难？连愿不愿意住院这样的问题都问到了。孔老的一个学生说，孔老师的病很需要吃点东北野山参。原来孔伯华自知病已不治，只是耽心在去世前不能完成总理要他整理出医案的任务。如有野山参顶着，还可延续一段时间。过了三天，周总理果真派人送来了两斤东北野山参，还附有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的一封信。望着这些东西，孔伯华泪水潸潸地说：“知我者总理也。”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孔老终于坚持完成了他的草名《时斋医话》。

1955年11月23日清晨，一代名医孔伯华病逝了。上午，方石珊、张孝骞、秦伯未等中西医专家来到孔家，秦伯未说：“我们是奉总理之命前来探望的，来迟一步，不想孔老已经作古。”下午3点，周总理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亲临吊唁。他向孔先生遗体默哀后，慰问了孔老的家属和学生，并对孔伯华一家人进行了妥善安置，孔伯华夫人由政协每月发给50元生活费。在对厨师、保姆等人也作了妥善安排后，周总理才离开孔家。孔伯华的一家人在悲痛中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他们感动地说：“作为国家总理，如此关心一位老中医，这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

三、“是一位关心中医的好总理啊！”

周总理不仅关心中医事业，自己有了病也常请中医诊治，许多中医名家都为总理看过病。

四川名老中医蒲辅周在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在临床上有丰富的经验，精通内、妇、儿科，尤其擅长治疗温热病。他应中医研究院邀请初到北京时，北京地区“乙脑”流行，患儿死亡率很高。石家庄用中药“白虎汤”治疗效果很好，可北京用此方疗效并不显著。于是有人请教蒲老。蒲老分析说，华北的气候一般比较干燥，石家庄采用了治温热的方法，所以比较成功，而北京今年的雨水较多，再照搬石家庄的方法就不灵了，应采用治湿热的方法辩证施治。按照蒲老的思路开方用药，果然奏效，病死率大大降低。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热情地称赞说，蒲老不仅是一位高明的中医专家，而且精通辨证法，真了不起。

1955年，我国最大的中医研究中心——中医研究院成立了。周总理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体现了他对中医事业的深切关怀。随着同中医界的接触日益增多，总理又说：“现在看来，我给中医研究院的题词，表达得不够完善，如果在‘发扬’前面加上‘继承’二字，可能就更全面了。”

周总理一贯重视培养中医接班人的问题。给周总理做保健工作有十多年的高远辉是蒲老的学生。50年代末期，有一次他随蒲老为总理看病，正当蒲老搭脉诊治的时候，周总理把另一只手伸向高远辉说：“你也给我搭脉嘛！总不实践，怎么能把老师的经验继承下来呢？”1961年11月，他又要求中医研究院的领导，为每位老中医配备五名徒弟，为中年中医配备三名徒弟。带徒弟的办法是中医的传统方法，周总理深知中医内情，所以提出了这些要求。

周总理还特别关心名老中医的医案整理和经验总结。蒲老的著作，在总理的指示下，人民卫生出版社只用了20天就打出了大字清样20本。夜深了，总理还在翻阅蒲老的经验总结，并亲自作了批示，要求有关人员和部门组织

修改出版。不久，《蒲辅周医案》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周总理知道后非常高兴，蒲老也异常激动，他深情地说道：“真是一位关心中医的好总理啊！”周总理对老中医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每年蒲老到外地休养的时候，不是总理亲自探望，就是由邓颖超同志代表总理去探视。每到这时，蒲老总是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总理却说：“你为我们的保健负责，我们也要为你的保健负责呀，彼此不是一样吗？”

蒲老晚年的时候，身体每况愈下。总理说：“蒲老，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一般的病我请你的学生看就行了。我也转告其他中央首长，不要轻易惊动你。你能健康长寿，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嘛。”

在总理心中，名老中医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四、“总理是多么可亲可敬啊！”

1984年7月6日故去的赵炳南，生前是北京中医医院的大夫。他是中医外科、皮肤科专家，曾为总理多次看过病。提起周总理，赵老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赵老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55年为朱老总看病的时候，刚到中南海，总理就出门迎候赵老，问寒问暖，问他多大岁数，行医多少年等。最后，总理讲，治病要“安全有效，积极谨慎，中西医结合，与病人商量。”赵老事后说，总理一点都没有架子，不知道的真看不出是个那么大的官。

从这以后，赵老经常见到总理。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赵老去为总理治疗脸上、耳朵上出的老年性疣。总理和赵老拉起家常，总理问：“你有几个孩子？”赵老回答：“8个。家兄留下4个女孩，我是3个男孩，1个女孩。”赵老又说：“总理，我有8个孩子，你的儿女是6亿多（当时我国人口是6亿多），我也是你的儿子。”总理连忙摆手说：“不能这么说，你是我的朋友。”

赵炳南这位老中医，饱经沧桑，经历过清王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等时代。中医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他是外科大夫竟被人称为“瞧疙瘩的”。民国十三年，他给退位的宣统皇帝看病时还要双腿下跪请安。如今新中国，人民政府给他发下了中医师证书，为他配备了徒弟，请他到医院、研究所当顾问。现在，一个国家的总理，亲切地称他为朋友，赵老怎能不动情呢？！他说：“总理是多么可亲可近啊！我一想起总理离开了我们，心里就难过。”说到这里，原来已悲戚的赵炳南老大夫，不由恸哭失声，老泪纵横。

那时自然灾害严重，看完病，总理常请大夫吃饭，给他们增加营养。赵老是回民，总理说，照顾少数民族，上的都是牛羊肉。

还有一次，总理出访14国，回来后闹皮肤病，赵老作为中医去参加了会诊。头一次约下午5点，因总理有紧急会议改约在第二天下午2点，后又因总理会见外宾，将会诊推迟到第三天上午9点。这天，总理8点45分就提前到了，一边热情地握着大夫的手，一边歉意地说：“很对不起，你们工作很忙，你们还有很多疑难病要治疗，耽误你们时间了。”那天，总理是清晨5点钟才睡的，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总理的工作实在太繁忙了。出访期间与外国领导人会谈，一谈就是5、6个小时，汗水流到下边，形成了皮炎。赵老和其他大夫一起密切合作，很快把总理的皮肤病治好了。

1971年全国中西医结合会议期间，总理接见会议代表。赵老走上主席台，总理拉过椅子，让他坐在对面。周总理一看赵老面熟，可一下子又想不

起来。赵老说：“您还记得不？出访 14 国，皮肤病……”总理说：“啊！对，那次皮肤病治得不错。”总理还问赵老多大岁数了，赵老回答：“72 岁。”总理亲切地说：“你走道挺灵俐，满精神嘛。”下台后，有的同志问赵老：“你到台上怎么这么自然？”赵老大声地说：“我见过总理多次了，对总理有敬意！”

## “程思远先生回来，我们也欢迎”——记总理同程思远的一段交往

1956年4月26日，在一趟从广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坐着一位目光深沉的中年人。他就是刚刚从香港回国的前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程思远先生。提起程思远，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李宗仁。是的，从1926年到1949年，除中间出国4年外，程思远始终跟随李宗仁左右，戎马倥偬，是李宗仁的决策层人物，在后来李宗仁归国的问题上，他也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但这还要从他同总理的交往谈起。

列车在奔驰。车窗外，春回大地，万紫千红，而车窗内的程思远却始终陷入沉思之中。对于此行，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有兴奋也有焦虑；有对过去的悔恨和一个失败者隐隐的惆怅，也有对新生活的强烈向往。总之，“吉凶未卜”的忐忑不安一直搅扰着他的心。

28日，列车载着程思远缓缓地驶进了祖国的首都北京。他，一个海外游子，终于回来了！

5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为宴请海外华桥、港澳同胞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协礼堂举行了盛大酒会。程思远应邀出席。下午3时许，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来到了礼堂，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正在同张治中先生谈话的程思远立刻把目光转向总理。只见总理先同大家一道鼓掌，然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在他的示意下，沸腾的人们很快安静下来。总理用他宏亮的声音向大家致祝酒辞，接着又端起酒杯逐桌向大家敬酒。当总理来到程思远身旁，张治中赶忙向总理介绍，可总理却已经热情地握住了程思远的手说道：“欢迎你回来！我们算是老相识了。不记得么，1938年在武汉我们见过面的。”听了总理的话，程思远很有些吃惊。他没想到，事情过去了18年，已经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竟还记得当年他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国民党青年军官。这真令程思远感动不已。他急忙更紧地握住总理的手，回答说：“记得，记得。”总理又问：“你今年多大了？”“47岁了。”“身体蛮好嘛！”“是的，在海外我常常游泳。”总理又问：“你这次回国有什么打算？”“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程思远回答。总理听了笑着说：“我希望你多走走、多看看，回去以后也会多一些谈话的资料。”说到这儿，便回头招呼1949年国共和谈时担任国民党代表团顾问的刘仲容先生（国共和谈破裂后留在北京）说：“请你们陪程思远先生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见刘仲容笑着点了头，才又转身对程思远说：“这里不便多谈，过两天我们再好好谈谈。”说完，举起他手中的酒杯同程思远碰杯，呷了一口，又健步向其他人群走去。

四天后，周总理又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

飞驰的轿车将程思远带到了中南海紫光阁前，程思远看到周总理已经站在门前迎候他了。

随总理一同走进宴会厅，轻松、愉快的午宴和谈话便开始了。总理说：“我提议，大家为今天的日子干一杯！因为这是建国以后，我们党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你们说，值不值得庆贺？”大家都笑了。举杯庆祝之后，总理又谈到了当时的形势和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亲切、融洽的气氛。

午饭以后，周总理又在客厅同程思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强调，我们党的主张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要团结对外，以诚相见”。他说，

我们欢迎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和台湾人民来大陆参观访问，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要求回到祖国安度晚年的，政府在学习上、政治上也会妥为安排。他还列举了翁文灏、卫立煌、王普涵等回到祖国后得到亲切照顾和关怀的事例为证。

悄然中，红日已经西坠。五月温暖的阳光将柔和的光线洒进会客厅，使宾主之间的谈话笼罩在一片平和、安宁的氛围中。

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周总理的接见和宴请使程思远非常感动。他说：“总理日理万机，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同我谈话，并且态度诚恳感人，令我终生难忘！”事后，当时在座的黄绍竑对程思远说：“总理对你如此重视，使我也深为感动。”

几天后，程思远这位下了很大决心要来试试共产党来去自由的冒险家，在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礼遇之后，怀着一种难以平静的心情，回到了香港。

几个月过后，总理又亲自派人到香港看望他，问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同时还向他传达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这使程思远再次感受到了总理对他的关怀。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程思远应邀再次回国参加庆祝活动并到东北参观。庆祝活动结束后，他又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1959年10月25日下午3时，周总理仍在紫光阁设宴招待他。

席间，总理微笑着问道：“这次到东北参观有什么感受啊？”程思远急忙回答：“了不起！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成就，实在是伟大之至。”总理却诚恳地请他多提意见。

会见结束后，总理亲自邀请程思远在第二天早晨与他共同参观游览北京密云水库。

10月26日来到密云水库的这上一天，艳阳当空、疏云淡抹、群山苍翠、碧波荡漾，面对眼前美好的景色。程思远却不禁生出一种飘零之感，想到自己如一片水上浮萍，漂泊无定，双眸不禁掠过一丝凄然的神色。

他神色之间的这点细微变化，也未逃脱总理的眼睛，他走到程思远身边，亲切地说：“李宗仁先生要回来，我们欢迎，程思远先生回来，我们也欢迎。这一条，适于海外所有人士。”程思远说：“十分惭愧，总理在56年对我说的话，我做得非常不够。”总理却安慰道：“不要这样说”。几句话，使程思远如释重负，一颗忐忑的心终于平复了，他一下子觉得眼前的天更高水更阔……

总理又谈到了海外人士回国后在生活、工作上如何安置的问题，程思远聚精会神地听着。此刻他做为一个还生活在香港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已经由衷地接受了总理所提出的一切。他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希望海外人士归来的。

同周总理在密云水库游艇上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程思远先生生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那原本彷徨的心终于坚定了，他下决心要和过去的一切决裂，走向一个充满光明的新世界。

这以后，程思远又分别于1961年、1963年、1965年三上北京，每一次都受到了总理的接见。在1963年11月15日的接见中，总理还关切地问起了程思远家人的情况。当得知程思远有一女，名叫林黛，是香港著名的电影明星以后，对程思远说，祖国文艺事业的发展，需要很多人材，如果林黛愿意回来，我们欢迎她为祖国的电影事业贡献力量。程思远说：“谢谢总理的关

怀。”这次会见，一直谈到东方欲晓临别之际，总理一直从紫光阁送程思远到台阶下的汽车旁，并说：“我很忙，明天不能给你送行了。”真是殷殷嘱咐，关怀备至。

深深感受到这些温暖的程思远，也以行动报之。他将每次与总理谈话的经过都写信告诉李宗仁，向李宗仁先生转达总理和党中央的关怀与来去自由的声明，最终促成了李宗仁回国的壮举。

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终于回到了祖国。8月13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设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总理应邀出席。家宴结束之后，程思远走出傅宅大门，见总理站在他的车旁，向他招手。程思远急忙走上前去，总理问：“石泓（程思远的夫人）同志什么时候到北京？”程思远回答说：“后天。”

总理又说：“石泓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她回来后我们请她，表示我们的谢意。”总理这种巨细弗遗的工作作风，程思远非常感动。

弹指间，历史又翻到了1972年。这年美国尼克松访华，程思远应邀出席了欢迎宴会。宴会上，周总理逐桌祝酒时，他对程思远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让我们互祝健康吧！”然后，用他那亲切的目光看了程思远一眼，才向前走去。程思远当时并没能理解总理谈话中所包含的深刻内容和无限深情。实际上，那时总理已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程思远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宴会上的匆匆一见，竟是他与总理的诀别！为此，他非常后悔，后悔没有和总理多说几句，以致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要知道，是总理的深明大义及和蔼可亲给他添了一份回国定居的勇气和决心呵！

而今，这一切都已成为程思远最珍贵的回忆。在纪念总理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是多么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啊！今天回忆总理，总理的谆谆教导又仿佛在我耳边萦回，那亲切感人的话语，我将永志不忘。他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献出全部力量。

## 周恩来与徐悲鸿

提起绘画大师徐悲鸿，人们很快会想到他那笔下的千骑，豪迈奔放、忍辱负重。的确，徐悲鸿以其善画马而家喻户晓驰名中外，然而周恩来同志是徐悲鸿的知音却鲜为人知。

1956年，一位外国艺术鉴赏家访华，他请周总理在自己珍藏的一幅徐悲鸿奔马图上题字留念（这是徐悲鸿1953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画的一幅奔马图），周总理欣然应允，随即在画上题写了“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并注明此为徐悲鸿的画马诗句，还签明了题写的时间、地点：“1956年10月4日于北京”。周总理那遒劲、浑厚的题诗墨迹，不仅体现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功力，而且表现了他对徐悲鸿绘画艺术的理解和尊重，同时也说明了总理对徐悲鸿的高度评价和对我国艺术事业的关怀和支持。

周恩来比徐悲鸿小5岁，他们1924年相识于法国巴黎。在巴黎公社墙前，他们曾合影留念。自此后，直到抗战胜利，俩人再没见过面，但对于徐悲鸿的生活和工作，周恩来始终密切地关注着。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声中，徐悲鸿本着艺术家的良知，在国统区的报纸上曾公开撰文，赞扬解放区富有朝气的木刻。他大义凛然，拒绝为蒋介石画像，也不肯加入国民党，被讥讽为“独特偏见，一意孤行”。这些，周恩来同志都一清二楚。

1945年的初春姗姗来迟，气候仍十分寒冷，当时的政治空气也令人窒息。艰苦的抗战仍在进行，敌战区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后方已陷于混乱，贪官污吏横行；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民怨沸腾……此时，徐悲鸿在重庆嘉陵江畔一间简陋的木板房里，高血压和肾炎久治不愈，心情抑郁烦闷。2月5日，郭沫若受周恩来委托专程看望了他，还带来了延安的红枣和小米。

“悲鸿，这是周恩来先生从延安带来的，他托我送给你，并嘱我转致他的问候，关照你注意劳逸结合。他实在太忙，不能亲自来看你，十分抱歉。”

“周副主席！”徐悲鸿看着这红艳艳的干枣和金灿灿的小米，苍白的面孔顿时泛出光彩，十分感动地对郭沫若说：“请代我向周恩来先生致射。”又对妻子廖静文说：“静文，我想中午就喝这红枣和小米熬的粥，它对治我的病会有奇效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值国共谈判陷于破裂的边缘，徐悲鸿准备就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当时，许多朋友劝阻他北行，认为北方很不平静，南京是国民党的首府和政治中心，一个著名画家应该留在南京。对前途不无担忧的徐悲鸿北行途径上海时，恰巧在郭沫若家遇到了周恩来同志。这是俩人自巴黎相见后的第一次见面。俩人追忆起当时见面的情景，周恩来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记得当时你不停地素描，还摘了两片树叶，悄悄夹在画夹里……”徐悲鸿不由地说：周副主席，你的记忆力可真惊人！我觉得你比以前更精神了。周恩来又关切地询问了徐悲鸿的生活近况和今后打算等，听说他要去北平艺专，立即兴致勃勃地说：“好啊！应当去。”分手时，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徐先生，我们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大众培养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话虽不多，却在徐悲鸿的心里播下了美好希望的种子，给他以很大的鼓舞。

为了办好艺专，徐悲鸿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他顶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

中央教育部的压力，解雇了一位低能的国民党特务教授，同时聘请了许多有教学能力和思想进步的画家来艺专任教。徐悲鸿的种种办学活动，引起被国民党特务控制的艺术训导处的不满，他们象污泥池里常要泛起泡沫一样，也不时鼓噪起“倒徐活动”。一身傲骨的徐悲鸿，反而更加藐视国民党反动当局，激起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办好艺专的决心。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徐悲鸿又坚决地抵制了国民党要学校南迁的企图。

在一个停电的夜晚，徐悲鸿的好友田汉经过化装后，从解放区悄悄来到北平，他带来了很多人兴奋的消息，特别是他还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咐。田汉异常激动地说：

“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你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地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

听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悬念着北平的文化界，悬念着自己，徐悲鸿万分感动，这些亲切感人的话语就象乌云里漏出来的阳光，徐悲鸿顿感热血沸腾，他更加急切地盼望着黎明的曙光。次日，徐悲鸿和妻子廖静文一起。专程看望了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希望，消除了他的思想疑虑，使他留在了北平。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人民迎来了1949年的春天——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个春天。徐悲鸿在他坎坷不平的生涯中，掀开了最美好的一页。

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徐悲鸿步履轻盈、满面春风地来到宴会厅。在欢宴上，周恩来穿过人丛，走到徐悲鸿面前。他容光焕发，紧紧握住徐悲鸿的手说：

“悲鸿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徐悲鸿兴奋得一时没说出话，只是连连点头。周恩来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徐悲鸿身边，询问徐悲鸿的健康，询问艺术界的情况。周恩来是那样温和、亲切、平易近人。在听完悲鸿简短的叙述后，总理带着沉思的神情说：

“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

总理接着说：我们胜利了，人民把建设祖国的新任务交给我们，你看，假如把艺专改为美术学院，你就任院长好不好？驾轻就熟嘛！很多工作会压在你肩上，我想你不会拒绝吧？……不过，我记得你患有胃病，你应该去检查，治疗，我们有自己的医院和大夫了嘛……

徐悲鸿在他一生的风风雨雨中，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愉快和欢畅，他时刻萦念的灾难深重的祖国终于站起来了！他看着谈笑风声的周恩来，心想：为了今天的喜庆，这些最优秀的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革命队伍，奋斗了多少年啊！他多么想能再和周副主席谈谈，可是，周副主席那么忙……。不料，宴会将要结束时，徐悲鸿收到一张便条：“悲鸿同志，请稍留步。周恩来。”徐悲鸿一阵心热，这正是自己所盼望的啊！

宴会后，周恩来和徐悲鸿很随和地在一起交谈，周恩来说：“你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也吸收了西画的技法，融汇中西，使它和民族的绘画相结合，别出新意，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徐悲鸿赶紧说：“周副主席，在艺术问题上，我也是在学习、探索，离时代的需要还差得很远呢，你的评价太高了。”周恩来接着说起他很喜欢国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说它代表当时重庆政治气氛，反映了时代的脉搏。

欢宴散去许多日，徐悲鸿那颗兴奋的心还平静不下来，后来他以异常兴



奋的心情，画了一幅很大的奔马图。画面上题写的词句是：“百载沉痾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3月，徐悲鸿被邀请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前往布拉格，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5月，悲鸿回到北平后，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一幅记载着光辉历史的画卷——《当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拥护世界和平大会以后》。随即又参加了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

在制定国歌的讨论会上，徐悲鸿提出的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认为这支歌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精神继续前进，亦能增强民族的自信，且节奏鲜明。其他同志也赞成，不久，《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便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

不久，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徐悲鸿又当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被总理亲自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周恩来在三次面谈中要他“把北平艺专办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的热切期望，以及对其创作给予的许多亲切关怀和指导，成为鼓舞他埋头苦干的强大力量。他在美术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以旺盛的创作热情继续作画，画毛主席，画战斗英雄，画劳动模范……

正当徐悲鸿以强劲、饱满的热情，永不疲倦地奋力工作时，由于极度劳累，他患了脑溢血症。1951年7月21日凌晨，一辆呼叫着的急救车，划破寂静的晨空，驶向中央人民医院……

周恩来知道了徐悲鸿得病的消息，立即指示：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由院长钟惠澜先生任组长，医疗小组要尽最大努力抢救悲鸿同志。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周恩来在百忙中时刻关心着徐悲鸿的病情。深夜，刚入睡的钟惠澜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噢，周总理，我是钟惠澜，按您的指示，经医疗小组的努力抢救，徐先生已经脱离一危险……是，是，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注意。”由于总理的关怀，徐悲鸿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医护条件。

第二天上午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同志来到了中央人民医院。他带来了周总理送给徐悲鸿的一束生意盎然的鲜花。徐悲鸿慢慢睁开眼睛，当护士低声告诉他：“这束美丽的鲜花，是总理送来的。”徐悲鸿微笑着，眼睛也湿润。以后，郭沫若又受周恩来委托，前来医院探望徐悲鸿。本来总理准备亲自去看望的，由于医生耽心徐悲鸿激动，影响血压，才没有去。

病情一天天好转，徐悲鸿住院3个多月了。他刚能下地走动就急于出院，态度坚决，钟院长见劝阻无效，无奈请示总理，才同意他出院。消息一传出，徐悲鸿乐了，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周总理了解我。”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开幕前夕，总理在中南海那间朴素的会客室里邀徐悲鸿亲切交谈。徐悲鸿谈了美术界的情况；谈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也谈了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周总理点头表示同意，并微笑着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他思索了一会儿，继续说：“国画以后也不一定叫国画，对其他画种来说，有唯我独尊的意思。”

徐悲鸿说：“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叫它彩墨画。”

周总理含笑点点头。随后，徐悲鸿又谈到画家的品德问题和美术教育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从事美术教育的人，在品德上也应能为人师表，不能因为

有画家的头衔而品德上可以打折扣。尤其是在国土沦陷时期，画家的民族气节应当是首要的。因此，徐悲鸿认为，任命美术院校的领导时，应当考虑德才兼备的人。

周总理完全同意徐悲鸿的意见，频频点头。当时，徐悲鸿的身体十分虚弱，告辞时，总理谆谆嘱咐他保重，并亲自送他到汽车旁，搀扶他上了汽车。

9月22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第一天下午的会议上，周总理象往常一样，迈着刚健的步履，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会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徐悲鸿一直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总理向代表们作过渡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中间休息时，他陪伴周总理到休息室。周总理担心他身体不好，劝他不必听完，可以先退席回去休息。但徐悲鸿怎能舍弃这样精辟动人的报告呢？当时，周总理还不知道徐悲鸿是从早晨就一直参加大会的。

当晚，徐悲鸿因脑溢血复发被送到北京医院。总理得知后，立即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去医院督促治疗，又亲自派医生会诊，但已无济于事。徐悲鸿不幸于9月26日晨逝世，享年61岁。

一代艺术大师就这样带着对艺术的热爱，对生活的渴望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

当天下午，周总理到北京医院向徐悲鸿遗体告别，极其沉痛地对周扬等同志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至晚开会？以后决不容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的声音带着微颤，既沉痛又严峻，他又缓慢地转过身来，嘱咐身边的周扬同志，要他守候悲鸿的遗体入殓。

同年12月，全国美术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周总理亲临参观。指着挂在遗像两侧的徐悲鸿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廖静文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并嘱咐在出版徐悲鸿画集时，将这幅对联印在前面，指示要筹备徐悲鸿纪念馆。随后，周总理逐一鉴赏徐悲鸿的作品，如同一个鉴赏家一样，用热烈而严格的眼光进行分析。他对徐悲鸿的作品融化了古今中外的一些技法很是欣赏，认为徐悲鸿的油画和素描也有民族色彩。他还对身边的同志讲解了画家创作于30年代的巨幅油画《徯我后》：徯我后”这句话出自《书经》，意思是人民在暴虐的统治下渴望得到解救。“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人民受难，徐悲鸿针对反动统治，通过这幅画抒写了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总理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

1954年，经总理批准，在徐悲鸿故居建立画家徐悲鸿纪念馆，总理为纪念馆亲笔写了《悲鸿故居》匾额。

1957年7月，总理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又一次高度评价徐悲鸿的创作，说：“徐悲鸿的作品能够融合中西，是他自己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

“文革”中，徐悲鸿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周总理亲自出面说：“在画家中，徐悲鸿是政治上过得硬、站得出来的”，“真正有点硬工夫，而且有正义感的是徐悲鸿”，“徐悲鸿就是没有对国民党屈服”，“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主席对他有一定的评价，但有些人压他，这不对。”从而维护了徐悲鸿作为杰出的人民画家的光彩夺目的形象。

后来，北京市地铁施工，拆除了位于北京站附近的原徐悲鸿故居纪念馆，不久，便进入“砸烂一切”、“否定一切”的时期，哪里还谈得到恢复？徐

夫人廖静文不忍看到徐悲鸿的遗作失散、损坏，于 1973 年写信给毛泽东，表达了她的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愿望。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办，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即写信给当时国务院办公厅主要负责人吴庆彤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同志。信中说：

“庆彤同志阅转吴德同志：

再将廖静文同志来信及主席批示送请阅办。

廖所提的不是悲鸿故居，而是徐悲鸿纪念馆。在 1965 年夏，因修地下铁道就将纪念馆拆除。它所收藏的悲鸿作品，美术文献和一万多件美术图片多分散各处，而悲鸿墓碑也被坏人捣毁。请你们分别查清，并与王冶秋同志或文化组议定恢复方案，进行筹办。

所查情况，望告。

周恩来

1973.7.16

别附复廖一信，请吴庆彤同志持往洽商（地点在来信封面上）。又及。”

周恩来写给徐夫人回信说：

“廖静文同志：

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于 7 月 15 日已批交我，要我派人查明恢复。先此奉告，并烦国务院办公厅吴庆彤同志与你洽商。

周恩来

1973 年 7 月 16 日”

后来，周恩来在病榻上还多次询问，恢复徐悲鸿纪念馆，办得怎么样了。这不仅反映了周恩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祖国艺术事业的重视和为保护国家珍贵艺术遗产所作的努力，也反映了他与徐悲鸿之间的友谊。

由于周恩来的直接关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新的徐悲鸿纪念馆 1982 年底建成，1983 年 1 月底开始对外开放。这座座落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西侧的艺术大殿的恢复，曾经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

人民慨叹徐悲鸿的绘画，人们赞叹徐悲鸿的为人和探索精神。在人们缅怀这位艺术大师的同时，周恩来同志与他交往的故事必将作为佳话广为流传。

---

王冶秋（1909—1987），安徽霍邱人。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 周总理与老舍

1961年6月10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里谈笑风声，周恩来总理正在接见末代皇帝溥仪及其家族，欢迎嵯峨浩从日本归来同溥杰及其家人团聚。

周恩来总理从容地向客人们一一介绍作陪的人员，当介绍到老舍夫妇时，说：“现在介绍一下满族的杰出人物老舍先生。他是一位名作家。辛亥革命后，若讲自己是满族人就会受欺侮，受歧视，所以他不愿意讲。他有许多著名作品，如《骆驼祥子》、《龙须沟》等等。老舍夫人是位画家，中年学画，拜齐白石为师，现在和陈半丁、丁非等画家合作绘巨幅的国画。”听到这样的介绍，老舍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向客人频频点头，表示致意，席间，周恩来总理非常感慨、风趣地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座到了一张桌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要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老舍又一次听到周恩来总理这感人肺腑的话，倍感亲切。他深深体会到这位良师益友做统战工作的高超艺术，暗暗下定决心：在今后的岁月里，深入生活，为创作出更好的人民喜爱的作品去广泛的收集材料。同时，此话也道出了周恩来总理与老舍之间深切交往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是老舍接触最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他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高尚情操，使老舍崇拜得五体投地，敬佩万分，从心眼里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他那对朋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充分的信任，使老舍感激不尽，为有这样平易近人的益友而感到自豪；他那杰出的才华和非凡的能力，使老舍惊叹，从这位良师益友身上，老舍汲取到无穷的力量。他们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本来是小说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凭着爱国者的满腔热血，投身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中，参加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广泛组织全国文艺界人士，进行抗日宣传。老舍及其文协的工作，得到了当时领导大后方抗战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殷切关怀和大力支持。邓颖超同志为文协题词：“精诚团结，贯彻始终。”老舍对此感到无比兴奋，深有体会地说：“这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是实行全面抗战的精神。”

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寻下，老舍为宣传抗日开始写作话剧，并尝试着写相声和大鼓词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曲艺作品。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帮助下，老舍及其所领导的文协力团结广大爱国的文艺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许多贡献。那时，老舍深深体会到：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中，象一棵挺拔的参天大树，坚定自若。每同周恩来同志相遇一次，都增加一份敬仰之情，老舍感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周恩来同志成为老舍最敬佩的人。

周恩来同志信任老舍，关心老舍，在许多方面都给他帮助。他亲自看老舍编的戏，给他的话剧提意见，介绍他认识许多戏剧界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常说：“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由他出面最好！”每次回延安，周恩来同志都向延安的同志们详细介绍老舍的近况。回来后，又向老舍讲革命圣地延安等地的新闻，给他介绍各革命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

相结合的各种情况和可喜成就。他吩咐《新华日报》社，叫报童夜里去给老舍送报，以减少特务对老舍的纠缠。他有时约上郭沫若、老舍、阳翰笙一起去陶行知推荐的“世界第一”的四川面条……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21日，文协在重庆张家园举行了最后一次联欢会和告别会。到会的人很多，有周恩来、郭沫若、叶圣陶等人。老舍做主席。他讲完话，把周恩来同志请出来，他说：“周先生还是八年前在武汉文协成立时来过的，今天文协改名，他恰好在城里，他又来了，请他给大家介绍延安的文艺概况吧！”老舍在周恩来讲完后，举起酒杯：“延安文协和这里的文协，几年来都是很亲密的，合作的，这是可庆贺的事。希望大家能和北方的朋友见面，那一定更亲密了。”他劝大家痛饮。老舍从自己的实践中找到了真理，成为党的好朋友。

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面对荟萃一堂的作家们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他马上让阳翰笙同志通知有关方面请老舍早日归来；还嘱咐曹禺快给侨居美国的老舍写封信，让他回来写作。老舍接到信后，不顾手术后身体虚弱，立即登船启程。1949年底，老舍排除了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1950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老舍被选为文联主席。7月14日中午，总理宴请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总理关心地问老舍有什么创作计划？老舍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打算马上动笔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总理听了很高兴。当老舍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进行实地采访时，总理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等着看你的好戏。”总理的宴请和鼓励象春风一样，使老舍感到无限温暖和喜悦。他感到新中国为他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无限美好的前景，使他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

《龙须沟》上演后，总理接连看了几次，他很喜欢这个戏，还向毛主席推荐。在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老舍夫妇应邀前往。当晚，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早就来到怀仁堂。毛主席入场后，总理拉着老舍走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毛主席高兴地和老舍握了手。演出之后，总理先送走毛主席，然后上台和演员见面，代表毛主席向演员和导演致射，祝贺演出成功。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布景和道具。听说导演和演员为了把戏排好演好，不怕脏不怕臭，去龙须沟体验生活，交了许多朋友时，总理满意地连连点头，然后站在布景中，高兴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我也来到了龙须沟。”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着这位文艺界的明星。在老舍回来后的十几年创作里，总理对他写的《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和《宝船》等几十部话剧几乎都亲自看了，并且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每当老舍的一出新剧刚刚上演不久，常常会听到老舍对剧院的同志们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反映解放初“五反”运动的话剧《春华秋实》就突出了体现了他们之间的合作。

《春华秋实》对老舍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因为戏中的主人公，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老舍都下熟悉。同时，动笔写的时候，“五反”运

动还刚刚开始，无法顶见运动的全貌加上政策性很强，怎样写才好，很难把握。光注意政策吧，容易写成政治报告，或者写成活报剧；如注意了故事性，却又容易忽视政策的完整性。老舍用了很大工夫去写，大修大改达十多次，先后用了10个月时间。总理在排演过程中，多次到现场指导。有一次，他看完彩排，专门把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约去，询问所演的某一场戏是否合适。这位演员回答说：“是有点别扭。”经过细心观察和调查，总理才委婉地告诉老舍，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启示他作适当修改。这件事，使老舍感动极了：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老舍的戏遭到的往往是禁演和打击，而今天，却是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给予他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

《春华秋实》有一稿，以违法资本家被送进法院而告终。总理觉得这样处理不能反映党的政策的全貌。他约老舍和导演谈话，向他们详细讲解了党在现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不能因为强调了对它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经过斗争它还有接受改造的一面。老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把结尾反复作了改写，终于使这个戏有了正确的政策性和完满的结尾。

1956年总理看了《西望长安》之后说，我们国家内部就出现过骗子，他们代表了阴暗面，对他们这些骗子就是要充分的揭露。

1957年老舍那部被誉为新中国话剧创作独具匠心、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社会主义现实杰出《茶馆》发表了。总理一眼就看出了它的非凡价值，他十分喜欢，坚决支持公演。他在看了《茶馆》第一次彩排后与北京人艺的演员们谈话时说：《茶馆》写得气魄宏大，艺术性高，演员也演得精采，我很欣赏第一幕，它写的最成功。还说，《茶馆》对青年们来说，是个好教材，用形象的东西表现出旧社会的可怕，增加他们的感性知识，引起他们对旧社会强烈的愤恨。这比单纯的给他们讲道理效果好得多。1963年《茶馆》再度上演时，在幕间休息时和闭幕之后，总理两次指出，《茶馆》这样的话剧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茶馆》这次上演时虽然增添了学生运动的场面，但是还不够，还要再加强；而且认为究竟在近代史中选哪几个环节搬上舞台最有典型性，也还值得好好研究。

1957年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样子》由著名导演梅阡改编成话剧在北京上演，总理先后看过三次。1957年12月8日，总理还专门约了老舍一道去看。总理很称赞扮演虎妞的舒绣文同志，说她演得好，并关心她有徒弟没有。后来，青年演员演虎妞的时候，总理又约老舍去郊区剧场专门看了一场。

具有丰富人民性和相当高艺术性的昆曲《十五贯》在浙江演出后，获得好评。1956年4月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轰动全国。在于它具有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伟大现实意义，总理建议老舍将这个剧改编成京戏。总理说：毛主席指示全国都要看这个戏。老舍愉快地接收了这个改编任务，并于当年完成了改编本，发表在《北京文艺》上。

1958年，老舍一口气写了三个喜剧：《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总理对这三个剧都很喜欢。随着台上的喜剧情节，总理自己那发自肺腑的大笑，是那样强烈地感染人，坐在他四周的普通观众，店员、民警，都和他一起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是对新生活的赞美，是对新社会的热爱。1959年3月8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来看《女店员》。总理风趣地对李先念副总理说，这个剧，你得看，你管财贸呀！因为是妇女节，上台会见演员

照相的时候，总理说，今天我不能坐在中间。大家推邓大姐坐中间，邓大姐执意不肯，她把《女店员》中的齐母、余母、王二婶拉到中间坐下，摄下了一张欢乐的合影。那个时候，总理曾对在繁忙的工作中非常劳累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你们去看老舍的戏，都去笑一笑。

周总理不仅是老舍作品的知音，还是他生活的益友。总理经常光顾老舍的住处“丹柿小院”，同他谈创作，聊生活。1959年的一天下午，总理又出现在老舍的小院子里，“老舍先生，近来身体可好？”总理关切地问。当老舍夫人胡絮青告诉总理前些日子老舍得过一场严重的气管炎时，总理马上要胡絮青详细谈谈情况，并问：老舍进过医院吗？现在痊愈了吗？听完胡絮青的回答，总理说，我现在要批评你啦，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胡絮青不好意思的承认，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总理很严肃地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随后，总理和老舍畅谈起来。过了很长时间，总理喊着胡絮青的名字，嚷着饿了，亲自下厨房找饭吃。老舍夫妇早就想请总理吃饭，可是，他们时拿不出东西来款待总理，看到总理找东西吃，感到很尴尬，周总理看到这些，笑着说，你们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当总理看见胡絮青在匆忙中端上了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干鱼之后，笑着对她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不会炒菜。”还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艺座谈会。会上，老舍谈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住些日子，周总理说，你年纪大了，边疆地区条件比较艰苦，怕不适应。话讲完后，总理感觉自己打断了老舍的话，表示歉意，要老舍继续说下去。老舍提高了声音：“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周总理深深地望了老舍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老舍这种耿直的脾气。

正当老舍尽情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新生活，准备为人民贡献更多的精神食粮时，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老舍残酷迫害、横加摧残，这位语言大师以特殊方式，舍身反抗，离开了人间。中国文艺界一颗灿烂明星消失了。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良师益友——人民的总理没有忘记他，总理几次询问和调查老舍被害经过，并关心他的家属。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理让王昆仑同志去老舍家里看望胡絮青同志。1977年春节，邓颖超同志又一次让王昆仑同志关照胡絮青同志。这一切，不仅使老舍的亲属感到温暖，就是熟识老舍的朋友和喜爱老舍作品的人，也无比感动。总理与老舍的友谊也将永驻人间。

## 良师·益友·同志——周恩来与邹韬奋

周恩来的朋友遍天下，他广交朋友的故事众所周知，人人乐道。

邹韬奋，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在与周恩来交往的过程中，他为周恩来耐心的劝导、推心置腹的交谈，诚意的帮助所折服。他信赖周恩来，推崇、敬重周恩来。长期的共同斗争，他同周恩来结成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当他在遭受敌人通缉，隐名埋姓流亡的途中，在癌症的疼痛折磨中，心中一直铭刻着“周恩来”的名字，时常提到“恩来同志”、“恩来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弥留之时还这样说过：“恩来同志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可以说，在走向革命道路过程邹韬奋思想的进步发展是与党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的关怀、教育、帮助、鼓励分不开的。

邹韬奋同共产党早就有了接触。但是，直至1938年在武汉，邹韬奋才有机会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见面。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并且负责南方局文委工作，邹韬奋同周恩来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邹韬奋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已在那里等候了。一见面，周恩来首先伸出热情的手，和邹韬奋紧紧地握在一起，高兴地说：“欢迎你，邹韬奋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啰。”坐下后，周恩来又诚恳地说：“见面就是朋友啰。当然，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一番。”他关切地问过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后，向他分析形势，介绍我党根据形势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周恩来爽朗亲切，诱导启发。他精辟的分析，透彻独到的见解，给邹韬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除了认真地听取邹韬奋对形势的看法和工作汇报，详细询问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外，还非常仔细地问了文化界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关切爱护地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有知识，又很爱国。你要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道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嘛。”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周恩来表现得怒不可遏，作了严厉的斥责。他的一席话，说得邹韬奋心里暖烘烘的，感到方向更明确了，干劲平添很多。他们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神情严肃，充满激愤，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钟头。临别时，周恩来紧握着邹韬奋的手，情深意切地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邹韬奋希望周恩来方便时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这次接见以后，邹韬奋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钦敬景仰，称他是自己最钦佩的朋友。他与周恩来有许多直接来往，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周恩来的关切和帮助，并从周恩来那里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

周恩来时刻关注着邹韬奋的事业，他经常挤出时间阅读邹韬奋的著作及其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评价，赞扬邹韬奋培植起来的生活作风。1938年在汉口的时候，有一次就创办一张新报纸的问题和党内的新闻工作者谈话，



周恩来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的《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事，这就是方针。他特别推崇邹韬奋的名著《萍踪忆语》。邹韬奋曾记述：“周恩来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谈及《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还有比这本书搜集资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虽承他过奖，但在当时为着搜集著作材料，不以视察美国东部为满足，特冒着相当的危险往美国南部一行……。除东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不但考察城市，而且深入乡村，所以自问是很费了一番苦工的。”毫无疑问，周恩来的关怀和推崇，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艰苦奋斗的韬奋以无比的鼓舞，使他在斗争中增添勇气，在敌人面前更加坚定顽强。

邹韬奋对党所领导的敌后解放区的民主建设十分向往。1938年10月，当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时，邹韬奋曾跟林伯渠商量，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生活书店分店，为解放区军民服务，他的要求得到党的支持。毛泽东提出书店工作的方针，由周恩来亲自作了具体安排。周恩来不仅在重大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上给书店以及及时的指导，平日也常挤出时间到书店工作人员中去进行工作。在武汉，他到过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大家，鼓励他们多为抗日救国出力。武汉失守后，在重庆，能经常看到恩来出现在生活书店管理处每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妙趣风生的政治报告。他总是面带笑容，象谈家常一样，纵论当前政治形势，国共两党谈判情形，每次都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一次茶话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国民党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之情。我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上老大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引起哄堂大笑。他又谈到共产党的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事件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叫‘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又是一阵会心的微笑。这场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而又富有说服力的讲话，使大家感到心里亮堂，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每次讲完，周恩来总要同邹韬奋细语片刻，然后邹韬奋站起来宣布：“周先生很忙，要先走了。”在热烈的掌声中，邹韬奋伴送周恩来离开会场，目送他的汽车远去。

1939年到重庆以后，他们来往更加密切。在当时著名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经常出现邹韬奋的身影。他经常到这里来向周恩来请教政治问题，并从周恩来处得知党中央的最新指示，特别是有关国统区文化工作的各种决定。有时候，邓颖超出面邀请邹韬奋偕夫人一起到家里“作客”，到达以后，她便陪邹夫人沈粹缜在自己的房间叙话，让邹韬奋同周恩来在客厅畅谈。

在撰写时评遇到困难时，邹韬奋总是首先想到向周恩来请教，而周恩来总是谦虚地和他一起讨论，共同分析，还字斟字酌地为他修改文章，以商讨的口气建议他有些话应该说得隐讳婉转一点，以便进行更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正因为邹韬奋从周恩来那里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认识到它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组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政党。所以他不仅多次对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还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要求。

抗日战争一开始不久，在武汉，邹韬奋就曾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与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邹韬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到重庆后，有一次在曾家岩五十号同周恩来会见时，邹韬奋又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仍然要求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做工作，并且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邹韬奋从此自觉地同共产党人密切配合，共同作战。以后，在谈到入党问题时，邹韬奋回顾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邹韬奋对周恩来怀着无限敬仰的情愫，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历史实践证明，周恩来纵观全局，高瞻远瞩，做出邹韬奋留在党外做工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邹韬奋的特定岗位和特殊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敌人对邹韬奋的迫害达到了顶点。2月份的一个晚上，邹韬奋偕夫人一起去曾家岩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是他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界的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邹韬奋开始有计划地疏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去。生活书店领导中心转往香港。2月25日凌晨，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重庆，于3月5日飞抵香港。在这里，他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和党采取完全一致的态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所进行的宣传工作，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注。1942年1月，由于国民党的通缉，邹韬奋经党营救到了东江抗日根据地，被迫隐居梅县乡下。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从那里再转赴延安。邹韬奋欣然同意，9月下旬便离开梅县，途经上海，辗转进入苏北解放区。不幸，这时他已患了癌症。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邹韬奋同周恩来结成了真挚的革命情谊。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消息传到延安，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深表哀悼。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他被迫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1日，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在重庆举行邹韬奋先生追悼会。周恩来、邓颖超送了挽联，对邹韬奋奋斗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并表达了深深的悼念。挽联写道：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倍独裁，那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府，准备反攻，驱逐日寇，正待吾需努力，哲人今逝世，倍令后死伤神。

邹韬奋虽死了，但他的数百万字的著作，将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被后代永远珍视。1945年9月12日，周恩来又给邹韬奋家属发了慰问信，信中写道：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的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所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

1949年7月，在纪念邹韬奋逝世5周年时，周恩来同志又为之题词：“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既是对邹韬奋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赞场，又是对所有知识分子殷切期望和极大爱护。

## 情系松花江畔——总理与陈沂

陈沂是一名知识分子干部。1958年3月，他被错整，下放到齐齐哈尔市郊区劳动。

陈沂在黑龙江的松花江畔度过了21个春秋，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苦，自不待言，而这甘甜每每咀嚼起来，陈沂都会怀念起敬爱的周总理，因为，这份甘甜的产生更多地源自总理的关怀。

在离开北京后的艰难岁月中，陈沂无时不想念总理。因为过去在北京时，有什么难办的事，有什么想说的话，找到总理，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可现在又到哪里去找总理诉说自己满腹的冤屈呢？每念及此，他的心情都倍感压抑。有一次，这位经受了长期锻炼的老同志竟在野地里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1963年夏天，周总理陪同一位朝鲜领导人到东北参观。陈沂从报纸上知道了总理已经到了哈尔滨，但他想，以他当时的身份是不可能去看总理的，而周总理来找他，他更是连想也不敢去想。一天傍晚，陈沂正同爱人马楠路过中央大街时，看见一个车队从身边经过，陈沂说：“那是总理的车队。”两个人默默目送总理的车队离去，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可谁知晚上9点多钟，他们一到家，孩子们就急切地说：“爸、妈，你们去哪了？刚才交际处派人来，说中央来的客人要见你，11点前一定要把你们找到。”

陈沂一听是中央来的客人，立刻想到是总理，不禁欣喜异常。他不停地看表，只嫌时间过得太慢。等交际处的车子一来，他们迅速上了车，向总理的临时驻地奔去。

总理见到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你这些年受苦了！”只一句话，就令陈沂百感交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这份理解，这份体贴，是何等的珍贵呵！他激动地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来回答总理，只把千言万语都凝聚在对总理的默默注视之中。

总理说：“刚才在街上我没有看到你，是小超看到了你，她指给我说，那不是陈沂同志吗？我回来就要他们找你，11点以前一定要把你找到。”

陈沂问：“那大姐呢？”

总理回答说：“她等不及，上火车了。”

陈沂说：“一会到火车上去看她。”

总理给陈沂转述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告诉他主席引用了司马迁受到宫刑后写出《史记》等史实，同时，又热情地鼓励他要经得起打击，要鼓起生活的勇气，在逆境中奋斗，为人民做出贡献。

接着总理又问：“你这些年去过北京吗？”当听他说没去过以后，总理又对他说：“应该去去嘛！去看看首都，看看首都这些年的变化，去看看你的老首长、老战友。”

总理又问了这些年在下面的情况，陈沂简要地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嘛，这很好呀！在上面工作一段，到下面去工作一段，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就更好做了。”

最后总理问陈沂还有什么要求，陈沂说：“如果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还是愿回军队去。”总理说：“好嘛，我回去跟肖华说一声。”总理又勉励马楠：“这个时候，更需要你们夫妻象在战争年代一样相爱和相互支持。”

离开总理，陈沂的心仍然难以平静，一回到家中，他马上把见到总理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孩子们，一家人都处在极度兴奋之中，深深体会到了党的关

怀和温暖。

总理回到北京后,马上请陈毅同志告诉总政对陈沂的问题进行甄别。1973年,总理收到陈沂的信后又具体指示有关同志解决陈沂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虽然总理一再指示,陈沂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具体的落实。尽管如此,它仍使陈沂不断看到新的希望,他的一家人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21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算短暂。正是有了总理的关心,才使陈沂及家人在21年艰苦的生活中,心始终与党牢固地连在一起,更坚定地生活下去,最终迎来了光明的今天!

## “别怕，你的过去，我们了解！”——总理与画家刘海粟的交往

早在 20 年代，刘海粟在上海就结识了周恩来。那时，刘海粟先生不过 30 岁左右，但由于他的家世，也因为他本人的年少有为，使他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这些人里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有艺术家，而他独独被周恩来的风采和学识所吸引。在后来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刘海粟先生这样写道：“当时我和他（指周恩来）相交很浅，更谈不上相知，但是我对这个不满 30 岁的青年，已到了崇拜的地步。虽然后来因生活变迁，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可是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却越来越清晰。”周恩来身上那股奇特的魅力使刘海粟感到，这是一个意志坚强、信念坚定的人。

刘海粟和周恩来再次见面，是在十几年以后。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刘海粟又是在上海见到了周恩来。两人畅谈了分别十多年后的时局变迁和人事沧桑。周恩来高兴地对刘海粟说：“你年轻时是翩翩佳公子，现在到了壮年，却壮健得象头雄狮。希望您在艺术界真正成为亚洲的雄狮！”刘海粟说：“谢谢！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去做。”后来，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开始，周恩来不得不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托人带口信给刘先生，要他多注意身体，并希望能很快在上海再次见到他。

三年内战以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宣告蒋家王朝的最终覆灭。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在这如此繁忙而重大的时刻，周恩来仍然没有忘记刘海粟先生。他辗转托人带信到上海，希望刘先生能留在国内，不要到台湾去。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刘海粟的心事。对于去留的问题，他已经思虑了很久，亲友们也一直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他的许多远在海外的亲属都怕他在国内吃苦，坚持要他走；他自己的子女也大多在国外。一方是祖国——他的母亲，一方是子女——他的骨肉，两方面都是这样难以割舍。是周总理的话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对夫人夏伊乔说：“听周恩来先生的话，留在国内，我心安理得。”

就这样，刘海粟先生留在了国内。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因此，1949 年建国以后，当刘海粟先生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已成为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紧紧握住刘海粟的手说：“别人以为您心爱的子女都在海外，不会留下，我知道您更心爱的，还是自己的祖国。”刘海粟先生听了，非常感谢总理的知遇之恩、引导之情。总理非常关心刘海粟的艺术事业。1953 年周总理在北京约见刘海粟，两人从晚上 11 点谈到第二天凌晨 1 点多。周总理鼓励刘海粟挑起美术教育的重担，并希望艺术界要齐心协力，为新中国多培养一些人才。当有人告诉总理说刘海粟与徐悲鸿有些隔膜时，总理严肃地说：“不要相信外面的传闻，刘先生和悲鸿都是艺术家，过去又有一段缘份，他们之间的情谊，外界凭猜想是猜不透的。我们还要依靠这两个人的团结合作，把新中国的美术教育工作抓起来。”他又诚恳地对刘海粟先生说：“刘老，你和悲鸿都是从反封建中战斗过来的，为美术教育事业冒过风险，过去也有较深的友谊。悲鸿近年来患病，住院很久，感情容易冲动，你要谅解他。”总理推心置腹的一席话使刘海粟非常激动，他马上回答说：“总理，您放心，悲鸿的性格和性情，我是了解的。今后，只要我们彼此多体谅，谣传就会不攻自破！”总理高兴地说：“你们两位团结一致，你们美术教育工作就好办多了，人才也会多培养出来。”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徐悲鸿在北京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是北平艺

术专科学校)院长,刘海粟担任了南京艺术学院(前身是中央大学艺术系)院长。周总理亲自关怀两院的艺术教学,并使刘海粟和徐悲鸿进一步地互相团结、互相促进。由于周总理的领导艺术,这两位画坛巨匠在艺术教学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不断有所创新。遗憾的是,徐悲鸿先生在正当盛年之时因病离开了人世,而刘海粟先生也遇到了不少坎坷。

1957年的反右斗争波及到了刘老,使刘海粟处在困境中。在这种时候,周总理给予了他很大的关怀。当他了解到刘海粟在政治上失意的情况下,仍能毫不气馁,一如既往地看书、作画、练字时,他语重心长地对刘老说:“这也好嘛!艺术家有更多时间从事艺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认为:暂时减少一些社会应酬,多集中一点时间,可以有更多时间从事艺术创作。他又热情地鼓励刘老先生说:“希望您更加豁达,更加朝气蓬勃。目前有这样悉心进修的机会,应该珍惜它。”当时,刘老先生感到,自己复杂的经历恐怕在日后会惹很多麻烦。总理对他说:“别怕,你的过去,我们了解!”一句话使刘海粟顿时热泪盈眶!他一下子觉得自己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整个人立刻轻松了许多。他想:有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他激动地对总理说:“总理,您放心,我的心情很乐观,我决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但是,又过了十年,一场更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老先生的家被抄10余次,字、画被抢、毁一空,刘老自己也被强迫拿着扫帚,每天在街头巷尾打扫垃圾。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极左思潮对他的冲击,象潮水一样,铺天盖地地向他冲来。他的家属怕他年逾古稀会顶不住。刘老说:“不要紧,想起周总理的话,我顶得住,我应该遵照他的嘱咐,更加豁达。”于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天天写诗、作画。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里,刘海粟从未提及也不愿提起当年认识周总理的事,他怕总理会因他受到牵连。但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他如何能负荷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还是周总理下令保护了他。总理在毛主席面前谈到了刘海粟的贡献,毛主席作了指示,刘海粟才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多亏了周总理,刘海粟才更坚定了生活的信心也增长了青春的活力。

1976年1月8日,是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到噩耗,刘老难过极了,他一生中很少流泪,即使在饱尝羞辱和冤屈的日子里,也不曾掉过一滴泪,可总理逝世的消息,却使他伏在桌子上,象孩子那样抽泣不已。从1月8日开始到12日,整整四天,刘老茶饭不思、伤心至极。他的一位朋友来上海看他,他见面就问这位朋友:“几时举行追悼会?”得不到肯定的答复,他心里更加难受,心中像有火在燃烧。这是对总理的思念之火,也是对那些搞倒行逆施之人的愤恨之火!这股燃烧的激情促使他饱蘸笔墨,在整张纸上挥就了一只矫健的雄鹰。雄鹰蹲在虬松上向下俯瞰的姿势,使整个画面充满磅礴的气势。画好后,他又题诗一首:

“空谷古松起怒涛,苍鹰突出霜崖高。四顾九霄动矫翅,八荒六月六寒飚。时而眈眈作俯瞰,两眸炯炯察秋毫。时而掉头踵欲下,奋然振翮风萧萧。落笔虽惨澹,肃杀气不灭;戴角森森爪如铁,回若愁胡毗欲裂!朔风吹沙秋草黄。安得驱骑臂尔走,长捋万里,骁腾博鹜桀,长空洒尽妖禽血!”

这首诗淋漓尽至地表达了他的爱与恨。1978年,这幅作品拿到北京荣宝斋去裱,反响很大。胡厥文、齐燕铭、夏承焘等刘老的老朋友都题了诗,《文汇》和《文化娱乐》月刊发表了这幅画与诗的介绍文章。但是,刘老说:“这

还不能表达我怀念周总理之万一。”

是啊，刘老怎能不怀念总理，是总理的关怀和勉励才使他渡过了昏暗的岁月，迎来了他又一个光明的、艺术的春天！正如刘老自己说的那样：

“我已经是 90 老人了，但是我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画家，我的求知欲和创造力还是很旺盛的。因为我要始终保持周总理对我要求——更加豁达，更加朝气蓬勃……”



## 总理的家宴——同日本友人的一次交往

十月的北京，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万里如洗的碧空，使人的心情也象这天空一样开阔。正是在这北京美好的季节里，松崎君代，这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国际乒坛上享有盛誉的女球星，作为周总理的特邀客人来到北京观摩“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

这一天的上午11时半，一辆汽车徐徐地停在了中南海西华厅前，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已经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迎候客人了。松崎刚一下车，总理就健步迎上去同她握手，并向她介绍了邓颖超同志。松崎向总理深深鞠了一躬，轻声说道：“能够再次见到您，聆听您的教诲，是我最大的幸福。但您的工作这么繁忙，还抽时间——”“你是我特意请来的贵宾，当然要接你到我家来叙叙家常，”没等松崎说完，总理就接了上去，朗声说道：“今天，这就是你的家，你要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要客气。”在旁的邓颖超同志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虽是切次见面，但几年前我就从电视里看过你打球，因此，已算是老相识了。”邀请做陪的客人陆续到齐，周总理便请大家入席。

餐桌上已摆满丰盛的菜肴，虽没有山珍海味，浓浓的情意却温暖着在座每一个人的心。

周总理紧靠松崎的左侧而坐，不断地用他那不大灵活的右手往松崎的碗里夹菜，并连声说：多吃点、多吃点。可此刻的松崎却呆呆地坐在桌前，成串的泪珠从面颊上滚落。这个被总理誉为有“大将风度”的球星，在乒坛上曾身经百战、叱咤风云，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善于控制住自己情绪的年轻姑娘，此时却激动得不能自己。她想到了自己在国内的遭遇。一次，她和另外几个乒乓球运动员参加国际参赛后凯旋归来，一位政府要人要接见她们，大家高高兴兴地去了，可这位要人只淡淡地说了声：“你们辛苦啦，”然后就再也无话可说了，结果场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位官员只是为了拍这个镜头，才让他们去的。松崎自己虽然为国屡建战功，但挂拍以后，却一直连个固定的职业都没有找到。联想起这些，再面对此情此景，如何不令她激动万分呢？

这时，邓颖超同志忙笑着说：“松崎小姐是恩来的客人，其他几位也是老朋友，今天理应由我下厨房，但不巧，这几天身体不大舒服，只好麻烦厨师做了这顿便饭。为了表示一点心意，唯有恩来平时最喜欢吃的这碗家乡菜‘狮子头’是我亲手做的，不知合不合各位口味？请各位尝尝。”说着，就往松崎的菜碟里夹了一个又圆又大的“狮子头”……

丰富而又气氛热烈的午餐结束了，宾主又回到会客室里。大家边喝茶、边交谈。闲谈中邓颖超同志关切地问起松崎男朋友的情况，松崎不好意思地红了脸，邓颖超同志见状忙笑着说：“大姑娘怕难为情，不愿意当众公开自己的秘密，是很自然的。我收回刚才的问题，你也不必勉强‘坦白’了。不过，将来如有机会，欢迎你未来的丈夫也来中国看看。”说着，便拿出两条早已准备好的大红绣花被面送给松崎，并对他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在我们中国，大红象征喜事临门和吉祥如意。预祝你将来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正当松崎忙着接过邓颖超同志送上的礼物时，周总理又说道：“听说你是囚国岛上贫苦人家出身，你父亲在当地制酒行业干了几十年。你回去后，定要替我向他问好，并请他尝尝我们中国的第一名酒，”周总理从他身后的

柜子里取出两瓶茅台，送到松崎手里，松崎赶忙接过这珍贵的礼物。

这不寻常的礼遇远远超出了松崎的想象，再加上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作风，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用泣不成声的语调向总理表达了最诚挚的谢谢，她说：“您是中国的总理，却这样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不但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本人，还想到了我年迈的父亲……，您的每句话，每个举动，都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坎上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忘不了中国给我的荣誉和恩情……”

松崎这出自肺腑的话语，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为之感动，一时间，客厅里一片默然。

乒坛名将获村伊智朗不愧为“智多星”，见此情景，他立即巧妙地转换了话题：“总理可能还记得1961年北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闭幕那天，您曾送我一瓶茅台酒。我带日本后，一直把它视为珍宝，放在书架上，始终舍不得喝。一般亲朋来访只告诉他们这是中国的周总理送的礼品，不准乱摸乱动。只有个别知心好友来访，才忍痛让他们尝一点。一次，几个人争着要喝，一不留神把酒瓶摔破了，半瓶多酒正好洒在我心爱的球拍上，我为此伤心了好久。此后，我又参加过多次比赛。每当我处于劣势，眼看就要败阵时，我都稍停片刻，使劲地用鼻子闻闻残留在球拍上的茅台酒香味。说来也怪，这时我就会回忆起您的音容笑貌，仿佛听到您就在我身边呼叫：‘获村，顶住！’‘获村，加油！’于是突然之间，我就觉得犹如百万援兵从天而降，信心倍增，反败为胜……”

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在场的每个人都被获村的话逗乐了，总理高兴地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要不然，我多买几瓶茅台酒，分洒在中国乒乓球小将们的球拍上，就万事大吉了！获村先生，你不但球打得好，还是一个难得的外交家哩！不过，现在请你不要心急，我早已作了准备，等会儿给你和长谷川先生各赠送一瓶茅台酒。”总理这几句幽默风趣的话，使在场的客人笑得更欢了。

时间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悄悄流逝，总理看看表，转过头对长谷川先生抱歉地笑了笑，说：“因为今天小松崎是主宾，所以没能多听听你的意见，不知你是否有什么事要对我说。”长谷川先生笑了，这位日本乒协内最早主张同新中国交往的老朋友，用他那发自肺腑的话语表达了他对总理的崇敬，他说：“近十年来，我率领日本乒乓球队转战各地，先后走访20多个国家，也曾见到过多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但不用多久，他们就从我的印象中消失了。唯有您，一直留在我记忆中。我想，这除了您个人高尚的品德外，还因为您是文明之乡、礼义之邦中国的杰出代表。中国有您这样关心体育事业的领导人，实在太幸福、太令人羡慕了。”

周总理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但认为他过奖了，接着又问他对今后的中日乒乓球队交流有什么设想，长谷川说：“我还是几年前的那句老话，现在，中国男女队的实力都是世界第一，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更严格地训练日本队，为夺回世界冠军而竭尽全力，”他又诙谐地补充道：“不然，我是死不瞑目的啊！”

听了他的话，总理表示高度赞赏，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任何一个团体、个人，如果在强者面前甘居落后，就很难有所作为、有所前进。周总理还希望中日两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在赛场上是互不相让的对手，在平日交往中要是知心朋友，为中日两国人民在其它领域的交往带个好头、立

个榜样。

家宴就要结束了，大家都很依依不舍，总理请大家合影留念，在一片道别声中，总理把客人一直送到车上。在汽车临开动前，总理又殷切地告诉松崎，你什么时候愿意再来，就写信告诉我或体委的荣高棠。他说：“对你，对所有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中国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松崎重重地点了点头。

松崎会记住总理的话的，其他的人也会记住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记住这次家宴的情景。

## 周恩来与斯诺

1936年夏的一天，在陕北的百家坪，埃德加·斯诺与周恩来邂逅相遇，从此揭开了他俩友谊的篇章。

埃德加·斯诺是我们大家早已熟悉的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和记者，中国人民的久经考验的老朋友。1933年至1938年，他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936年，他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刁难和封锁，到达他久已向往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调查访问，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十分高兴地见到了早就想访问的周恩来。

提起两人的相遇，还很有一点传奇色彩哩。

这天，斯诺刚刚到达百家坪，这时忽然一个姓卞的青年军官骑马急驰到他身旁，好奇地端详着他，然后对陪同斯诺的一位苏维埃工作人员说：“我刚和一队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象这个人一样！”

斯诺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捉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逃身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自党吗？”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的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

‘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

周恩来和斯诺交谈了几分钟，在了解到了斯诺的身份和意图以后，就替斯诺安排了住处，并请斯诺第二天早晨到他的驻地去。

第二天一早，斯诺就来到了周恩来的司令部，这时周恩来正伏案看电报。

见斯诺进来，周恩来便热情地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说到这里，周恩来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周恩来的话使斯诺当时有一点惊奇和怀疑。他认为周恩来的话说得太理想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后来的事实使他改变了他原来的这一看法。

这时，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将电报推到一边，便立即动手替斯诺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周恩来把一张纸交给斯诺，纸上开列着为时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周恩来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需要92天！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斯诺嘴上虽然没作声，可心里对这建议却是有保留的。但实际的结果是，他花的时间比周恩来建议的还要长得多，而且最后他还舍不得离开！

这次谈话使斯诺对周恩来深感兴趣。在他后来写的《西行漫记》中，他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印象：“他个子清瘦，虽说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亮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的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他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周恩来给

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它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象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从以上斯诺这一段翔实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细节，想象出周恩来对一位初次见面的国际友人是如何地热情而又诚恳，也可以看出斯诺对周恩来确实“深感兴趣”。这次见面为他们今后几十年的友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考虑斯诺要步行去保安，路途太遥远，便送给斯诺一匹马，并亲自为斯诺第二天早晨动身做准备，同时还发一个电报给在保安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干部，告诉他们斯诺即将到达那里。这种极为热情的关怀、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度负责精神，使斯诺这个美国友人十分感动。

在1936年的这次访问中，斯诺也见到了“博学多才的女性”邓颖超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利用自己享有的治外法权，将正在北平西山养病的邓颖超同志，坐火车秘密护送到天津。那时，敌人曾扬言，如果捉到周恩来夫人可获得一大笔奖金。斯诺帮助邓颖超同志脱离险境，是中美人民友谊史中一件动人事例。

在抗战期间，斯诺还曾多次见过周恩来，他深深感到：“在抗战期间的重庆，绝少中国人能象周恩来那样在美国官员的心目中留下那么良好的印象。他的言行具有令人心折的吸引力。他文雅而又坚强。”

1940年冬，蒋介石又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上旬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真实地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结果被蒋介石政府强迫离开了中国。

物转星移，时间的指针在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指向了1960年。这一年的6月，斯诺得到了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在这北方收获的季节里，斯诺第一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为了这张护照，斯诺争取了10多年。他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他要继续探求这个具有“东方魅力”的国度；他想亲眼看看星星之火已经化作的燎原之势；还有，他也要收获在昔日峥嵘岁月中与那些为正义事业英勇奋斗的杰出人物共同播下的友谊的果实。

斯诺的愿望实现了。

1960年8月30日这一天，北京郊区的密云水库波光粼粼，一艘漂亮的游艇悠然地漂荡在水面上。周恩来总理和斯诺在游艇内促膝长谈。专程陪同一位外宾游览水库，泛舟长谈，这在周总理还是第一次。这是因为，斯诺不是作为美国的记者，而是作为总理的老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接待的。周总理给予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帮助。在这次来华期间，斯诺从北到南参观了19个城市，访问了各行各业的人，包括末代皇帝溥仪。他可以用相机随意拍下任何事物，毛泽东主席也亲切会见了斯诺。

周恩来与斯诺，这两位老朋友，面对宽阔的湖面，悠悠的流水，都感到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从艰苦卓绝的长征到延安窑洞的灯火，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直到夕阳染红蔚蓝的湖水，峭壁披上深紫的衣装……

对于斯诺，故地重游，自有感慨千般，但他毕竟是一个富有理智和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 40 多个问题，一共谈了 12 个小时，在餐桌旁，斯诺仍不放松，他询问总理能否非正式地或正式地讨论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譬如：就军事基地而言，中国可否允诺在美国撤兵后的一个预定时期内，不派遣军队或武装力量到台湾去，以保持台湾暂时的中立。

周总理回答说，这些问题实在属于外交范围，“你”总理指着斯诺说：“并非美国国务卿，而我亦非中国的外交部长。”

“我不是国务卿这一点将无人争辩，”斯诺回答说。“但你这句话的下半截的真情，我却不信服。”听到这里，周总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谁敢肯定呢，你将来可能成国务卿的。”

“不，”斯诺说道，“在我一生中也不会。”

“你是一个悲观记者。”

“非也，先生，一个乐观派才是真的。”

周总理还向斯诺谈及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尼克松先生、肯定迪先生。他认为杜勒斯政策的遗产，把美国置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上。由于美国在世界各地拥有 200 多个空军基地，“美国现在就象一个满手持着鸡蛋的人。他不能移动，否则全部都要失去。”美国的手伸得太长，因而失去了集中优势去完成可得到的目标的机动性。

“拳头打跳蚤是打不着的，”周总理将手指散开，按在台面上。“你看，你一只指头也不能动，否则跳蚤便逃去。这样的一个人对其他未入他陷阱的跳蚤，基本上是毫无抵抗力的，这些跳蚤可以随意移动，择地而咬。”说到这里，他突然将两手用力一拍，“这样，”他说，“才是捉跳蚤的方法。”

总理向斯诺坦诚他讲述了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斯诺写下了 1 万 1 千字的记录。根据这次谈话以及这次来中国的其它采访所得，一部象《西行漫记》一样轰动的著作《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问世了，它又一次使西方重新认识了中国。

1964 年，斯诺第二次来到新中国。这年年底，总理又一次在自己朴素的住宅里接见了斯诺，与他交谈的时间长达 4 小时之久，斯诺发现周恩来身体很好，但头上却已出现了几缕白发。

“坦率地讲，作为总理，我并不完全掌管中国的经济建设……我学会了一些东西，但学得不怎么好……经济发展规律极其复杂。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但还有更多的经济发展规律有待我们去探索。在过去的 15 年中我们干了不少好事，但我们也做错了一些事。”

这时，斯诺又向总理提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他说，什么时候中国将象他们宣传的那样赶上英国的工业生产？周总理说：“赶上英国已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问题……我们的工业现代化也不能仅通过增加几种工业品产量的办法来实现。”

这次谈话象以往一样，同样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报道中，他这样写道：“他（指周总理）的言谈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的强烈厌恶，同时他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几十年的努力，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

第二次新中国之行，斯诺又搜集了许多资料，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这是一次大丰收呀！丰富得都来不及清理！回到瑞士后，我要马上把这些谈话整理发表，在当前的反华合唱中，好让世界如实地了解中国。”在

回瑞士的飞机上，斯诺突然发现装资料的皮包不见了。顿时，他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着急地搓着两手，带着哭腔说：“这是我的生命呀！要是丢了，我还怎么能报道中国呢？我将是多么对不起毛主席、周总理啊！”当一位服务员帮他找到皮包后，他激动得一下拥抱住了这位服务员。

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这年8月，斯诺在北京的一次乒乓球比赛场上见到了周恩来。斯诺看到总理的“头发开始渐渐地变白，身穿一件夏天的运动衬衣，一条灰色宽松裤，下面是白色的袜子和凉鞋。”两位老朋友互致问候之后，总理向斯诺谈起了美国的政治，并就当时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同斯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

10月1日，国庆节，斯诺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游行。周总理把他和他的夫人洛伊斯领到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由此产生了轰动世界的新闻：中国愿意接受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紧接着在斯诺的帮助下，美国医生代表团应周总理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尼克松访问中国。至此，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在中美建交的历史上，周恩来总理和埃德加·斯诺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以个人的友谊为纽带帮助两国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几个星期后，周总理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总理对斯诺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形势，谈到了中国进口粮食的原因，也谈到中国需要引进外国技术等问题。

有一次，周总理与斯诺的会面从晚饭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晨6点，到最后斯诺也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了，他低声对总理说：“我应该让你去睡一会。”总理听了却仰面笑道：“我已经睡过了，而现在我该去工作了。”

周恩来与斯诺这两位老朋友就是这样，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讨论不完的问题……

1972年，斯诺准备再作一次中国之行，但由于病魔缠身，终未如愿。1972年2月15日凌晨2点20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周总理不胜悲痛。

按照斯诺先生的遗愿，1973年10月19日上午，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周总理亲自拟定了简短的碑文，并抱病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了安葬仪式。斯诺夫人及女儿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周总理充满感情的声音：“斯诺先生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的，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将为所有的中国人民所铭记，而周恩来这个名字更会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景仰，人们还会记住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之间崇高的友谊。

## 总理与画家张大千夫人杨宛君的交往

知道画家张大千的人肯定不少，但知道杨宛君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杨宛君是张大千先生的第三位夫人。她原是北平城南游艺园的曲艺演员，1935 年和张大千结婚。在这以后的 13 年中，一直陪伴着大千先生游历、作画，照顾张大千先生的生活。1948 年，张大千去印度大吉岭，后又去南美。从此，杨宛君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张大千先生在离开大陆前夕，他把自己临摹的北魏和隋唐五代壁画全部交给杨宛君，并对她说：“这是我呕心沥血的成果，你要好好保管。如生活有了困难，可以用它补补。”但杨宛君却一直未动用过一幅。后来，四川省文化局怕这些艺术珍品霉坏，找杨宛君商量，想由国家代为保管。杨宛君在征得了张大千先生的同意之后，立即把 260 幅临摹画全部交给了国家。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总理得知了，总理非常赞赏杨宛君的举动，但也很担心杨宛君的生活，于是决定亲自接见杨宛君。

1961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杨宛君和她的表姐王清华来到了中南海小礼堂。总理一见她们，立刻起身迎接并亲切地问杨宛君：“你就是杨宛君同志？”杨宛君激动地点了点头。

总理又问：“张大千先生与你时常联系吗？”

“过去常联系，后来就少多了……”想起不愉快的家事，杨宛君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总理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便对她说：“你还是要和他多通信，争取他回国，回来观光也好。至于家庭纠纷，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接着，总理又问：“你献了 260 幅大千先生的临摹画，没有给予你鼓励吗？”

杨宛君回答说她是无偿献给国家，这也是征得了张大千先生的同意的。

这时，总理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我看你身体不大好，应该很好照顾你。我准备给齐燕铭同志一封信，他会过问这事的。”

时隔几天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燕铭就找到了杨宛君并对她说：“总理指示我见你们。他说杨宛君同志献出 260 幅张大千临摹敦煌画，这些艺术品价值很高。目前国家经济困难，如果说买也买不起。国家准备颁发 4 万元奖金给你们，其中 2 万元待大千先生来内地探亲旅游时用。”刘副部长又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好好看病，病好了再工作。”

听到这里，杨宛君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她想：总理日理万机，常常忙得吃不上一顿踏实饭，睡不上一个安稳觉，却还在关心着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艺人，这是多么好的总理呵！

想着，想着，杨宛君眼中的泪水不禁涌出了眼眶……



## 深情的关怀，无限的思念——访烈士子弟杨明和曹云屏兄弟

周恩来对革命烈士子弟的深情关怀，已作为佳话，留传于世。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收录了一束周恩来致烈士子弟的信札，读起这些感人至深的文字，使人们对周恩来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质更为敬仰。不久前，我们有幸拜访了“书信”中提到的曹云屏和杨明。

一谈起周恩来当年对烈士子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教诲，这两位昔日年少的烈士子弟，现已年过花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不禁激动不已，心中充满了对周恩来的无限思念和缅怀之情。周恩来对他们的深情愿意，历历如昨，犹在眼前。

曹云屏离休前任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现任中共广州市顾问委员会常委。他是烈士曹渊之子。14岁那年，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曹渊，1902年出生在安徽省寿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就跟随二哥曹少修参加讨袁之役。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一期学生。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给曹渊以很大的影响。不久，曹渊在黄埔军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曾亲自参加了接收他入党的党小组会，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同年11月，曹渊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党代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党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5月，应叶挺的要求，党派曹渊任铁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他随叶挺攻平江，战通城，大战汀泗桥，再克贺胜桥，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在围攻武昌的战役中，曹渊身先士卒亲自率第一营攻城奋勇队，与几十倍于己的敌人搏斗，不幸中弹英勇牺牲。曹渊全家得知他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但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曹渊的家庭成为共产党员开会、游击队员养伤的场所。曹渊的儿子曹云屏及侄子曹云青等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很小就从住在他们家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那里知道了父亲生前同周恩来、叶挺之间的友谊。

抗战开始，14岁的曹云屏、16岁的曹云青失学在家，当他们得知周恩来到了武汉时心里非常激动，急切的盼望能早一天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于是，曹云屏和堂兄曹云青给周恩来写信，请求帮助去延安。1937年12月信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信中说：“令尊曹渊同志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的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的敬意。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以家境贫苦虽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附来洋贰拾元，藉作来汉路费。”接到信后，曹云屏全家喜出望外，他在回忆当年情景时对我们说道：“说实在的，那时没有这20块大洋，到武汉的路费也真是非常困难。我的家一日两餐稀饭，哪里去筹借这笔路费呢？”当时曹云屏年仅14岁，家里人商定由他的堂哥曹云青伴同一起去延安。1938年阳春3月，他俩告别了灾难深重的家乡——安徽寿县，踏上了新的征程。4月底抵达武汉，住在日租界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5月1日，在八路军办事处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纪念晚会上，他俩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见到他们后，非常高兴，亲切地询问了他们家中和路途上的情况，并让办事处的同志给他俩换上有八路

军的臂章的军服。不久，周恩来亲笔给在西安的林伯渠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们的情况，细致周到地安排了他俩去延安的事宜。5月中旬，曹云屏、曹云青顺利地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第3期第25队学习。两个多月后的一天，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突然通知他俩去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石窑洞，他们赶到那里才知道，是周恩来回延安后专门打电话叫他俩去的。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俩学习及家庭的情况，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此后，周恩来每次回到延安，他们都去看望周恩来，向他汇报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周恩来在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殷切地希望他们健康成长，就这样，曹云青和曹云屏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到延安后的第二年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下了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志向。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曹云屏和曹云青正在安塞的延安边区中学学习，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前途不安。他们听说周恩来回到延安，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坦率地道出对形势的疑虑，关切地询问有关时局的情况。周恩来很侠义给他俩回了信。“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曹氏兄弟看完信后才得知周恩来坠马伤臂即将赴苏就医，尽管周恩来未能答复他们的疑难问题，但是他对烈士子弟的悉心关照以及待人处事的认真态度和周到细微的作风使他俩多年来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曹云青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长期的迫害和摧残，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和肝硬化。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拖着重病的身躯重新出来工作，直到1980年12月在锦州筹建电厂的第一线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曹云屏同志不久前从广州政府秘书长的岗位上退到第二线，还在竭尽全力争取为党多做些工作。他说，“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成长到今天，我永远不能忘却他的深情，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光辉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明原名杨宗锐，是烈士杨匏安之子。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之一。广东省香山县北山乡（现属珠海市）人。1921年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在一起工作。还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对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十分钦佩，直到多年后还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1927年杨匏安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后被派到上海坚持斗争，编辑党的刊物。当时，他家人口多，生活异常艰苦，但革命意志却无比坚定。一家老小经常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为党传递消息、放哨，个个都为革命出力。为了弥补家用，减少党的开支，杨匏安在夜晚除了加紧写作和翻译外，还要帮助家里人推磨做米糕，让他的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1929年，由于印刷所遭破坏，杨匏安被捕。周恩来曾大力组织营救并时常不顾危险，去看望杨匏安的母亲和家人。杨匏安被监禁8个月后，一度获释，后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党组织曾立即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营救，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但没有成功。1931年7、8月间在上海龙华伪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杨匏安牺牲后，他的母亲和妻子带着全家回到了广东老家，靠打短工和做手工活维持生计，孩子们先在街上讨饭流浪，后来进了孤儿院。但他们全家仍矢志不

移地坚信党的事业，努力为党工作。周恩来及党组织对杨匏安遗嘱十分关心，一直在多方设法找寻。1935年何香凝在广州将杨明从孤儿院接出来送到仲恺农工学校读农科。从此杨明便积极地参加了救亡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组织派他到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海南岛海口市电报局当事务员兼译电员，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和对电报局职员以及学生做救亡动员工作。1938年海南特委派他去延安学习，途中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得知后立刻就接见了。在没见到周恩来之前，杨明心想：“周副主席8年没见过自己了，可能已不认识或者忘记了。”没想到周恩来一见到他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不要介绍了，我认得你，长得更象你父亲了，连说话的神情都象。”接着，亲切地拉着杨明的手详细地询问了他们一家人的情况。周恩来对杨明说：“一二·八”事变后，组织上为了寻找你们一家费了很大周折，我除了托何香凝先生及一些同志找外，又亲自以周翔宇之名写信给你们的乡亲探听你们的下落。当周恩来得知杨明的祖母尚健在时，非常高兴，称赞她当年支持儿子搞革命，现在又支持孙辈参加革命，值得钦佩。当听到他母亲已病逝时，非常难过，叹惜她死得太早，说她为党做过很多工作，我们要时常记住她。周恩来一再叮嘱杨明不要忘记父亲在狱中作的“示难友”一诗，要学习父亲高尚的革命品质，继承父亲的遗志。当周恩来知道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是经组织决定派去延安学习时，高兴地说：“看来你们是长大了，到了延安就是回到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知识，今后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几天后，周恩来专门找人安排好了他去延安的事宜。还给了30元路费。1939年8月，杨明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曾给周恩来写信谈他的弟妹想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事。周恩来收到信后立刻给他复了信：“你的家已嘱廖承志同志料顾，缓急有助，不须挂虑。你的弟妹倘欲来此间，也可经找廖同志商洽，定能代他们设法成行。”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周密安排下，他们全家都得到了组织上的妥善安置。杨明的四弟被接到延安，六弟参加广东东江纵队，其余的弟妹和祖母则留在港澳机关，党组织派有专人负责照顾，1940年5月杨明在延安马列学院将要毕业时，周恩来询问了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杨明表示，想到前方去，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赞许了他的想法。但事后又考虑到他患有心脏病，就又专门写信劝慰他：“你毕业后应听党分配工作，最好能多学习一时期，你可向党提出请求，附上拾元，作你零用费。医治问题，我已函告张启龙同志。”杨明从信中的笔迹看到“你可向党提出请求”，这一句话是后加上的，他明白了周副主席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多学习一段时间，但应经过党组织批准，烈士子女不要搞特殊，不能打着“是周恩来的意见”去办事。杨明在后来的几十年工作和生活中，牢记着周恩来这封意义深长而又教育至深的信，始终和普通的干部一样，按照党的需要，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努力地为党工作。杨明曾任解放军通信兵部电讯科学研究所试验厂厂长、国务院七机部工艺材料研究所所长、航天工业部203所所长等职。他现在已离休，当对我们谈到这些情景时，依然象当年一样的动情。

周恩来一生曾对许许多多烈士子女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收入的几封信只是他一生中对抗士的怀念和对家属子女关怀的几例。然而，通过阅读这几封信，以及与曹云屏、杨明的访谈，我们更加领略

---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78页。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81页。

到周恩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同志的深厚感情。他的崇高品德、坦荡胸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 周总理关怀荣毅仁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老先生，每每在回忆他同周总理的交往时，眼里总是流露出他对总理深沉的敬爱。这不仅是因为他同周总理有过密切的交往，更是因为在那非常的年月里，他一家的命运，同周总理的关怀密不可分。

荣老先生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1950年5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的前夕。那次是毛主席邀请部分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吃饭，周总理恰好主持荣先生在座的那一桌。当潘汉年同志把荣毅仁介绍给总理的时候，总理热情地拉住荣先生的手说：“噢，荣先生，少壮派！”这是总理同荣毅仁先生说的第一句话。它是那么亲切，那么爽朗，使荣先生毕生难忘。

从此以后，周总理经常对荣毅仁和他的家属表示关怀。1959年国庆前夕，周总理通过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向荣毅仁征求意见，问荣先生是否愿意到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立刻表示同意并于这年的9月中旬从上海到了北京。

有一天，荣毅仁到北京饭店理发，很巧总理也到这儿来了。一见荣毅仁，总理主动同他打招呼：“你来啦，很好。”又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先生一听立刻明白了总理的意思：总理是怕他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多么体贴人的总理啊！他立即表示：“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不必半年在这里，半年在上海。”总理又关切地问道：“夫人来了吗？”荣先生回答说：“准备过了国庆节把家搬来。”总理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好！”

后来，当总理了解到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还没有工作时，便亲切地询问杨鉴清是否愿意参加社会活动，杨鉴清表示愿意。于是周总理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将杨鉴清同志安排到了全国工商联做家属工作。后来她又成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3年春天，荣毅仁因身体欠佳，回到了上海。一次，总理有事去上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后，荣毅仁邀请总理到家里吃饭，总理很痛快地答应说：“那好呀，明天去！”

第二天中午，周总理、邓大姐还有上海市委的几位同志准时来到了荣先生的家里。席间，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同大家聊着家常。当问起荣毅仁的子女情况时，荣先生说：“我的四个女儿都在楼上，刚才还躲在上面看你呢！”总理笑了：“叫她们都下来嘛！”孩子们高兴地跑下楼来，总理逐一问她们的年龄、名字和上学的情况。孩子们在总理和蔼亲切的话语鼓励下，渐渐都消除了紧张情绪，认真地回答了总理的问话。孩子们与总理的这次接触虽然短暂，但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却是终身最难忘的时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荣毅仁和他的夫人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生命都难以保障。在这最关键时刻，又是总理挺身而出想了许多办法保护了他们。按当时周总理的处境，他已非常不便同荣先生讲话，但他特意让邓大姐找到荣毅仁，邓大姐对荣毅仁说：“总理托人带过口信给你，希望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这时，荣毅仁才知道周总理托人带信给他的事。邓大姐又关切地询问了荣毅仁夫妇的健康情况，并说总理很关心、惦念他们。这使荣先生非常感动。每逢回忆起这段往事，荣老总是眼圈发红、声音哽咽。他说：“在那样一种非常的情况下，总理和邓大姐还那么关心着我们，要是没有总理的关怀爱护，我早就完了！”

荣毅仁者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仍然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工作着。他领导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 1979 年 10 月成立以来，已同国内外 100 多个企业建立了合资、合作关系。他表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周总理的遗愿，他要为此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 一张名单见深情——记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关心与保护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有一篇文章，名叫《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它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为保护党内外干部、特别是保护一大批党外朋友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周恩来同志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光辉写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等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狼狈为奸。他们蛊惑煽动青年娃娃们搞红卫兵运动，一批年轻、幼稚的年轻人在极“左”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放弃党的领导，肆无忌惮的打、砸、抢、乱揪，乱斗、乱抓、乱抄家的妖风席卷了中国大地，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外爱国民主人士被卷进了这场灾难性的漩涡。

1966年8月29日夜，大约30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搜查了著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开始了所谓的“革命行动”。30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汇报了红卫兵抄家时的蛮横行动，请求毛主席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毛主席收到了这封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就在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主席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周总理看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同志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劝阻红卫兵再来抄家；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在布置这些任务的同时，总理还立即想到了大批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他们也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保护。

就在8月30日这天，周恩来总理亲自动笔开列了这份著名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翻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451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名单是这样写的：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按：指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按：指全国政协副主席）

(4) 国副（按：指国务院副总理）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按：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名单上包括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围绕着对这批名单上的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搏斗。

从“文化大革命”一齐始，周总理就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开始

着手进行了对这批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

当时正是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正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总理马上派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赶到那里，向几位老先生通报情况，使他们有了思想准备。

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周总理多次找有关人员布置任务，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对被保护人实行多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周总理考虑，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性格倔强，不肯低头受辱，若呆在家中目标太大，不好保护。万一照顾不到，就会发生意外，从而给党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因此，总理委派忠于党的事业的可靠同志去做思想工作，说服、动员他们服从总理的安排。

9月1日，周总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病人”。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遵照总理的指示，不告诉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随同前往照顾，并且被保护人要用假姓名，周总理还特别嘱咐要秘密护送。到医院后，由部队的解放军同志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护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张治中先生的亲属回忆了这段历史：张治中先生从北戴河返回北京的当天，红卫兵就来到了张家，当时只是观察了一下，没有立即动手抄家。总理知道后对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说：“张治中将军是我们党难得的朋友，你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黄永胜只得被迫从北京卫戍区调了一个排驻守在张家周围。红卫兵来了几次，都被警卫战士挡了回去。就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放过，形势越来越紧张。周总理挺身而出，在红卫兵集会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随后，指示周荣鑫同志将张治中先生护送到301医院加以保护，并常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前去看望。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非常忧虑，几次向总理吐露肺腑之言，总理总是安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

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都是用这种办法保护起来的。对郭沫若也是将他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有所好转后才将他们一一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其它原因不能离家的人，总理则变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身穿便服，臂带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以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让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联系，请他们予以大力配合，傅作义、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人受到了这种措施的保护。

周总理还着重对宋庆龄加强了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只是每年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总理考虑上海是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形势非常乱，因此恳切地劝她住在北京来。宋庆龄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总理特别指示杨德中同志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总理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9月1日，周恩来同志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要尊重当时还担任国家副主席要职的宋庆龄。周总理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



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周总理接着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就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红卫兵冲击宋庆龄住宅的风波。

在周总理尽心竭力的关怀和保护下，名单上的13位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受到周总理保护的不仅仅是名单上的人，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样感受到了总理的关怀。

政协全国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钱昌照回忆说：在他家所在的居委会范围内，还有蔡廷锴，熊克武、李书诚（中共一大就在李家开的）三家。1968年底的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对钱老讲：“总理交待我们，这四家人不允许红卫兵闯进去。白天我们还好办，每天晚上就特别担心，只好扮成便衣整夜巡逻。”这时，他们才明白为什么红卫兵始终未冲进过他们这四家。

在那动乱的岁月中，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怪事，使得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心惊胆战，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不语，积郁成疾，终为不治，怀着不解和痛苦的心情离开了人世。周恩来同志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更加努力，不但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且在多方面关怀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予信任；对于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总理直到他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总理得知朱学范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7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他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在总理的指示下，朱学范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则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去世后妥善安排后事，对家属关怀备至，使党的温暖浸透了每一个家庭。

1969年，张治中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途。对于他的病逝，周总理悲痛不已。他当时工作非常繁忙，一方面要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一方面又要处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常常不能按时吃饭、休息。但他还是抽出时间亲自出席张治中先生的追悼会，并致悼词，使处于极度悲痛之中有家属得到巨大安慰。事后不久，张治中先生的夫人洪希厚也病了，总理知道后，多次派人前去探望。总理了解张治中一生廉洁奉公，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更没有积蓄，就特地嘱咐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对于周总理的一片关切之情，洪希厚非常感激，真到她1971年临终时，这钱都没动过一分。

1973年，傅作义病情严重，周恩来同志亲自劝他住院治疗，并邀请商震、赵浩生等一些海外人士回国，安排他们去医院会见傅作义，以使他精神振奋起来。

1974年初，正是周恩来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一方面，“四人帮”一伙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所指人人心中明；另一方面，他本人身患癌症，病情严重。但是周恩来同志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

益，全然不顾自己，傅作义病情逐渐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进行抢救，并常常在深夜找大夫，询问傅作义的病情，研究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作义作手术时，总理一再叮嘱大夫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4月，傅作义病情转危，周恩来同志闻讯后立即赶往医院。在病床前，他握着傅作义先生的手亲切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当时的岁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心里，有什么比这公正的评价更宝贵呢？老先生眼含热泪，点着头，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更加握紧了总理那双充满温暖的大手。

傅作义病逝后，总理拖着十分衰弱、沉重的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之后，邓大姐代表总理看望在极其悲痛中的傅作义夫人刘芸生。不仅解决了她的生活费用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也关心着她。

另一位民主人士黄琪翔于1970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上午11时给周总理写信报告这一不幸福消息，下午2时周总理就派人来进行慰问。又指示全国政协特为黄先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在《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各方面送花圈以示哀悼。当时正值林彪、“四人帮”猖狂之时，一般的民主人士都被当成牛鬼蛇神看待。能这样安排，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没有总理那样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这一切是无法想象的。

在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重大问题上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毫不让步，毫不妥协，利用各种机会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

1974年“十一”前夕，周总理病重在医院里，就参加国庆宴会人员名单，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及中央政治局。信中讲到：

“昨晚你交我的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静、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人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17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淑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有影响。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必要。”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排除各种阻力，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统战工作。他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共同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他坚持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民主人士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周恩来同志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战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正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一大批民主人士得以幸存下来，从而继续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周总理所起的作用，使许多朋友理解和谅解了我们党所出现的失误，增

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任，更加坚定了和我们党站在一起的决心。

## 周总理与科技工作者心连心

为实现我国的科技现代化，周总理十分重视和支持我国的科技事业。而对于科技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他始终用自己的言行最好地体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早在1950年8月，周总理就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鼓励大家“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而奋斗。”1956年，他又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他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1962年，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又一次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用自己的切身体会，亲切地指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重要意义及正确途径。在“文革”中，他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直到病重的时候，他始终关注着科技工作，亲自批示科技工作者的来信。总理与科学家心连心，科学家与总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总理亲切的教诲，诚挚的关怀，体贴入微的问候，怎能让有爱心的科技工作者忘怀呢？！

### 总理教授情意深 ——记周恩来、邓颖超和余灃夫妇

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国际免疫学会创始人之一、上海第二医学院余灃教授及夫人刘淑卫先生，是周总理、邓颖超的老朋友。邓颖超在天津中学读书时，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她常到同班同学刘淑容家，一起谈理想，谈志向，并了结了刘淑容的妹妹淑卫。后来邓颖超和周恩来业投身革命刘淑卫先生和余灃先生结婚，天各一方，但彼此心息相通。在国民党统治时，反共宣传甚嚣尘上。当时，周恩来、邓颖超是共产党要人，余灃先生是西医名大夫，为免除不必要的猜忌和麻烦，他们没有将关系外露。

抗战胜利后，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志到蒋管区参加国共谈判。1946年11月，和谈破裂，在返回延安前夕，委托正在上海行医的余灃先生保存三只皮箱。对皮箱里装的是文件？是书籍？还是衣服？余先生并不关心，对于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他也毫不在乎，心里只想着如何不负重托，使友人的皮箱安然无恙。在那时，收藏共产党要人的物件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但余灃先生毫不犹豫，妥为保藏。1949年“八一”建军节那天，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专程来上海请宋庆龄先生到北平，并探望老友，顺便取走皮箱。“我们又见面了”。邓颖超笑盈盈地说。“终于盼到今天了。”刘淑卫先生说。余灃先生说：“您临别时说，相见不远，过两年再见，真是不出所料。”邓颖超叙述了离别后的情形，对余灃夫妇代为保管皮箱表示谢意。当晚邓颖超邀请余灃夫妇去她下榻的上海愚园路寓所吃便饭，饭后，邓颖超亲自擦洗面盆。这似乎是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但给刘淑卫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感慨：这位幼年的同学辈，著名的共产党要人、社会活动家，竟一点架子也没有，始终保持着老百姓的本色。看似平凡，但在这平凡中又包含有多少不平凡啊。她对余灃先生说：“共产党人的作风就是好，这是共产党兴旺的征兆。但愿他们永远保持人民本色。”余灃先生对此深有同感，频频应和。

邓颖超转达了周恩来同志邀请余大夫去北平为中央首长检查身体的意思。余濬先生欣然答应。临别时，邓颖超送给余濬先生一本《白求恩大夫》。

1949年国庆后不久，余夫人偕另外两位大夫进京。邓颖超、廖梦醒到车站去接，周总理和傅连璋同志亲往北京饭店看望他们，共进晚餐。总理嘘寒问暖，关切地说：

“你们辛苦了，先休息两天，由傅副部长给您安排工作。”

余濬先生长期从事医学，对共产党的理论、实践、作风、传统等不甚了解。他与周总理虽为故友，但彼此见面机会不多，所以显得有些拘谨。

周总理说：“随便一些嘛。你们对党有什么看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余濬说：“解放军纪律好，长官（当时还不知叫首长）没架子。”接着他说出了心里的疑虑，向总理问道：“共产党来了，咱们当医生的还能当医生吗？”

周总理爽朗地笑着说：“是啊，我们党重视科学，凡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都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在座的傅连璋同志就是医生。”于是余濬先生便和傅连璋同志热烈地交谈起来，各自谈着自己的经历。

总理的关怀温暖着余大夫的心，党的信任激励着他。虽然总理关照余濬先生和大夫们休息两天，可他们却连夜安排起检查身体的准备工作，一切供诊断用的，化验用的仪器仪表也作了过细的检查。余大夫先后为周总理、林泊渠、郭沫若、马叙伦、李维汉等数十位领导同志检查了身体。他知道：这是党和总理的信任。不把这次检查身体搞好，不仅辜负了总理的重托，也对不起刚刚建立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上南下的列车，余濬先生脑子里仍不断索绕着周总理勉励的话语：“为人民服务”。他不止一次地阅读《白求恩大夫》。党对知识分子从不见外，充满信任，这种信任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精神鼓励。余濬先生回沪不久，荣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1958年瑞金医院抢救烧伤病人邱财康时，他主持了征服绿脓杆菌的噬菌体的工作，60年代初主持研究麻疹疫苗的工作。“文革”后，他不顾已80多岁的高龄，仍孜孜不倦著书立说，他的专业论著已有20本。他说：“要把‘文革’中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余教授在“文革”中被揪斗，他“懵”了，不知中国大地发生的变故应作何理解。自己毕生潜心研究医学科学，对微生物中千百种细菌可以搞得一清二楚，可对这动荡的社会生活，无论如何也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如此，他相信总理亲口对自己说的，共产党是尊重科学的。也许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罢了。后来，他发现被斗的尽是一些老革命、专家、教授、劳模，他猛然意识到，这所谓的“文革”，岂不是要毁我长城，毁我祖国。他震惊！当他从亲友中得知，周总理处境困难，于是就天天看报，寻找有关周总理的消息和他的照片，看到总理日渐消瘦的身体，他好揪心啊！他想亲自去探望周总理，再次为总理检查身体，可是不能。只能通过邓大姐多次向总理表示慰问。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举国悲痛。余教授全家彻夜痛哭，他透过泪眼，久久凝视总理的遗像……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昨天。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邓颖超关心地问，余濬先生来不来？当余教授随上海代表团到京，邓颖超将他接到中南海西花厅，热情地接待了他，老友相逢，畅叙了近几年的情况，彼此互道珍重。

周恩来，邓颖超和余濬夫妇，作为老朋友间的交往，表面上似乎既不非

常热烈，也不频繁，或许如古人所说：“君子之交谈如水。”实际上他们相互信赖，相互惦念，彼此之间的确情深意长。

### 红旗布满天空禾穗金光灿灿

1949年7月14日到8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向全国发出征求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启事中明确提出了对国徽设计的要求：（甲）要有中国特征，（乙）要有政权特征，（丙）形式要庄严富丽。

截至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寄来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其中有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余个方案以及中央美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先生的方案。这些方案均未被采纳。因此，在1949年9月下旬的政协全体会上，只通过了国旗方案和国歌词谱，没有公布国徽方案。1950年春，新政协国旗国徽评委会顾问、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营建系（今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及几位美术家受命设计国徽图案，以备进行多方案比较评选。他们先后设计了二、三十个方案作比较、讨论和改进。他们从政权特征要求出发，用齿轮、稻麦穗、五星、缎带做为题材内容，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根据政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提出的要求，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加进去，用以代表五四运动发源地，并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的特征。又从中国特征的要求出发，决定使用红、金二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我国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传统。还从形式上庄严富丽的要求出发，决定把天安门按建筑师的要求画成立面图，把象征我国政权的五星红旗用作天空背景覆盖祖国大地，端正地放在国徽图案的正中轴线上，庄严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的轩昂气质。从造型上，他们参考了各国国徽图案，并对我国古代的铜镜、玉璧，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进行了研究和借鉴。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1950年6月中旬的政协一届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完成了这一任务。

1950年6月20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最后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方案，当时送审的方案有二：一是中央美院设计的，一是清华大学设计的。两枚国徽的边沿部分大致相同：中心部分，中央美院方案的天安门是透视图，红墙绿瓦，大圆柱，前面是金水桥，鲜花上面是蓝天；清华大学方案同样有天安门，不过是立面图，而且推得很远，天上是国旗的五星图案。参加审定的委员们分成两派，一派以田汉为首，赞成美院方案；一派以张奚若为首，赞成清华方案。这时周总理来到会场，听取大家意见，他见李四光同志深深陷坐在大沙发上，凝视着对面墙上的国徽模型沉思不语。周总理便要李四光表态。李四光指了指清华的国徽模型，说：“我看这个好，天安门广场宽广，五垦红旗布满天空，够气派！”总理大笑表示赞成，最后，大家终于确定了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总理对稻穗造型提出了修改意见、对稻穗造型的设计，其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1942年冬天，山城重庆寒风凛冽，宋庆龄同志在她的寓所为欢送董老返回延安而举行茶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应邀出席。桌上摆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串颗粒饱满的禾穗，被炉火映照得金光灿烂。这时有人赞美说：“真象金子一般！”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周恩来当时抚摸着饱满的麦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图案时，周总理建议把禾穗画到国徽上。9月20日，毛泽东主席

向全国颁发了公布国徽的命令。1950年10月1日，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高高地挂上了天安门。和国旗一起代表新中国。国徽的设计直至选定，蕴含着多少人的努力，又蕴藏着多少人的智慧啊！

### 珍贵的泪水 ——周总理与“大地之娇女”刘恩兰

刘恩兰教授是一位在自然地理学、海洋学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闻名中外的女科学家，现在她担任国家海洋局顾问。刘恩兰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曾先后赴美国、英国留学，获美国克拉克大学自然地理学硕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由于她学识渊博，精通五国语言，在自然地理学等方面有颇深的造诣，被欧美同行们亲切地称为“大地之娇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怀着颗热爱祖国之心，建设家园之志的刘恩兰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回国后不久，她被周恩来总理推举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当时，刘恩兰只知道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杰出的干才，却始终没见过面。她更不曾想到周总理早已注意到她这个有开拓精神的女科学家。科学院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刘恩兰火爆脾气又发作了。她觉得工作进展太缓慢，因而力陈己见，激烈偏颇的言辞一古脑地甩向会议主持人，可是那位双目炯炯有神、风度翩翩、举止优雅、满脸青茬胡子的同志静静地听着，非但没有怪她之意，反而微笑地一边作记录，又不时投以激励的目光。待刘恩兰发言结束后，那人竟走过来，握着她的手说：“恩兰先生，您的意见很好。我十分欣赏您这种火爆性格，建设新中国需要它。”会后，当同事们用责备的口气说她不该那样对总理说话时，她才知道，会议主持人就是英名赫赫的周总理。她感到很懊悔，同时，又深为共产党人那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伟大气魄所感动。1954年，根据总理的安排，刘恩兰调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海道测量教研室主任。从此，“大地之娇女”又开始了她壮阔的海洋生涯。

1960年，正当三年困难时期，刘恩兰完成了从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基督徒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转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期间，这位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自然地理学家和海洋学家，“理”所当然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分子”，批斗后被监禁起来，拳头和棍棒使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此时的周总理，并没忘记她。在危难时刻，总理捎来口信：刘恩兰是海洋界的巾帼英雄，不准批斗。从此，她才重新获得了人身自由。总理的关怀，使这位身心遭受摧残的“大地之娇女”久久不能平静。

1976年1月，全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总理离我们而去。刘恩兰几乎逢人便讲：“他走得太早了，他走得太快了……”刘恩兰是位坚强的女性，她自己说：“我是个倔强的人，记事以来从未哭过。”但总理的逝世，使她流下了悲痛的热泪。在那令人难忘的日子里，这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大地之娇女”刘恩兰教授把珍贵的泪水献给了她最崇敬的人。

### 尊重与支持 ——周恩来两次会见李政道

周总理一生对劳动人民十分尊敬，他认为劳动人民和研究人员两方面都

重要，应该互相配合。他注重科学，注重科技的发展，他能理解知识分子的心，并尊重与支持他们的事业。

李政道，是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1971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2年后多次来中国探亲、访问、讲学，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接见，在与周总理两次会见时，他感到总理对人考虑得非常周到。考虑问题极有见解，令人佩服。

1972年10月，周总理召集中国物理学家进行座谈，这是李政道与总理的第一次长谈。座谈中，云南宇宙线实验室的张文书、朱光亚两教授提出了他们的新发现。李政道就此提出他们的估计方法尚可改进（因可能有或然误差）。中国物理学家完全同意李政道的建议，没提出任何争议，总理对两教授的发现很关心，对李政道的改进建议也很重视。总理对一些技术细节追问为什么，直至弄懂为止，很令科学家们折服。周总理十分注意基础科学的发展，当时高能物理研究所尚未建立，总理主张中国在这方面应花些本钱。经总理的多次过问与支持，高能物理所终于在1973年成立。会上，总理还仔细地询问李政道在美国的学生生活和研究方法，态度亲切，平易近人。

1974年李政道回国到祖籍上海，看到当时不但基础科学没有，教育也几乎完全没有了。便写文章向周总理反映。一星期后，周总理接见了李政道。这是他与总理的第二次长谈。

1974年5月24日，围绕教育工作召开了一次会议，“四人帮”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总理已病魔缠身，身体虚弱。周总理对李政道说：本来没有想见你，看了你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给毛主席阅。总理说完便把麦克风交给李政道。要他向大家说明他的建议。当时空气紧张，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李政道认为，既然上海人很重视芭蕾舞，任何时候都不能停，那么难道科技反而不如芭蕾？另外，培养科技人才也应择选优秀青少年，加以重点培养。他一讲完，有的人就质问道：“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李政道理直气壮地回答：“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会上情况复杂，气氛也不正常，许多人在私下议论，总理便出面制止，说：“不许开小会”。会上没有人能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结果他们表面上被说服，少年班可以试办。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总理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当时他自己身体不好，也知道说服他们很困难，但还是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总理的支持，种于是下了，可是还有人控制此事。后来由于主席的亲自关怀，此事才稍有进展。

周总理关心科技工作，支持科学家的事迹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 风暴袭来的时候 ——周总理对华罗庚的保护和支持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以他那带病的身躯，保护过许多干部，同时，也曾保护过许多知识分子，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就是其中之一。当浩劫的风暴袭来时，周总理看到许多科学家被错误地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他明确指出：“象华罗庚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保护”。了解到科技大学要斗争华罗庚，国务院立即要求科技大学的上级出面，说服劝止。有一天，华罗庚的办公室被盗，偷东西的人一不要钱，二不要东西，专盗科研成果——数学手稿，并且狡猾地连一个指纹也没有留下。这在当时是一宗重大案件。华罗庚认为，



这并不仅仅是关系个人的小事，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研成果，于是写信向领导反映，要求追查。总理知道后，很重视此事，立即批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其次，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周总理还指出：华罗庚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住北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也要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要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在当时全国混乱的情况下，总理的批示不仅保证了华罗庚的安全，而且为他提供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总理的关怀和精心安排，象一股暖流，温润着这位老数学家的心。

他不能忘记，早年自己漂泊海外，是周总理指点迷津，才得以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后，总理处处关心他，保护他。可以说，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绩，无一不浸透着总理的关怀。如今，自己身陷困境，无法进行自己的事业，又是总理伸出援助之手，这怎能不使他感激呢？

总理不但坚决保护华罗庚，使他免遭迫害，而且对华罗庚创造的现代化管理方法——统筹法和现代化实验方法——优选法，也积极地加以推广。周总理多次指示：华罗庚的优选法还是要搞的。为了让华罗庚的“双法”能够真正推行，总理还指示有关同志与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落实。从此，华罗庚就带着他的“双法”小分队，进隧道，入车间，下工地，跑遍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应用“双法”，使之在生产上发挥了显著效益。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直接服务于生产。当总理知道他们取得了很大成绩，科研与应用卓见成效时，又两次让国务院听取他们的汇报。总理的保护和支持，使华罗庚感念不已，终生难以忘怀。

总理逝世后，华罗庚非常悲痛，常常凝视总理的遗像，沉缅于对往事的追忆中。1980年5月13日，他到淮安指导“双法”推广工作时，特意来到总理故居，仔细观看了总理出生和童年读书的地方，以及总理劳动过的菜园、井台。他在总理19岁东渡日本留学时写的诗句“大江歌罢掉头东”的墨迹前，伫立良久，……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但总理的理解与关怀、保护与支持会一直影到现在，影响到将来。

### 信任·关注与情意 ——周总理与茅以升的交往

我国著名的建筑结构专家茅以升，在多次与总理的交往中，亲聆总理的教诲。他深感总理的关怀、信任，更深深眷念这份情意。

1949年9月13日，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夕，周总理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茅以升应邀参加。这是茅以升与总理的第一次晤面。茅以升刚走进会场，周总理迎面走来与他握手。茅以升很激动，赶忙自报姓名。总理和蔼可亲地说：“是科学家”，“非常欢迎”。入席后，总理与茅以升谈话，从上海的解放一直谈到旧中国反动统治下的教育和交通，他那敏锐的思路，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论断，令这位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惊叹不已。而当谈话中茅以升流露出一些习俗用语，如果说国立大学、国有铁路时，总理丝毫没有责备之意，而是用人民大学、人民铁路的字眼逐一纠正，使茅以升当即受到教育。这虽是茅以升与总理的第一次晤面。谈话，但总理的平易近人，善解人意，并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使茅以升感到象是遇到了阔别多年的知己，

亲切而又温暖。

周总理对于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效力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地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1951年秋召开的一次政务院会议，讨论铁道部提出的武汉长江大桥筹建方案，总理亲自主持了会议，还特别邀请茅以升列席参加。对于大桥的设计施工，总理问得非常详细。会后，他又对茅以升说：“你有造钱塘江大桥的经验，希望你对这座大桥多多出力。”

在总理身上，很好地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对科学家正确的政策。不仅使在国内的而且使国外的我国科技人员，感到了党的温暖。1956年9月25日，“北京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成立，茅以升被推选为会长，1957年5月10日，在总理亲自指示下，联谊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晚会，邀请当时留美学生家属和在京的历年留美返回的同学及其家属参加。到会的有各位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周总理也亲临参加。在晚会讲话时，他面对1000多名听众，号召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专家回祖国服务，还说：“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而且来去自由。”这个号召，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反响和心灵的震动。讲话后，总理又与到会者一起观看节目，并与茅以升作了长时间谈话。以后，周总理又根据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许多留居海外的科学家陆续回国，投入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中。

为庆祝建国10周年，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其中人民大会堂工程最为艰巨。当时为了集思广益，邀请全国建筑结构专家58人，组成结构与建筑两组，分别审查人民大会堂的结构与建筑设计。茅以升担任结构组组长。总理对人民大会堂工程非常重视，一再指示要保证安全。结构组审查修改设计完毕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指示说：“要茅以升亲自签名保证。”总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茅以升深受鼓舞，同时也体会到总理对自己的高度信任，茅以升立即签好名将报告递上。

为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总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无一不亲自过问。在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想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茅以升向总理建议：动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华裔专家返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周总理立即表示赞同，他当即责成茅以升提出动员专家返国服务的具体方案。1962年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广州召开会议，商讨制订科学规划的问题。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特地从北京赶来，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科学事业的报告，使参加大会的科学家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并备受鼓舞。周总理由于有事要赶回北京，临行前委托陈毅将他讲话中未尽之意向大会转达，当时恰巧茅以升在旁，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更感到总理对科学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

1975年四届人大开幕前，茅以升见到周总理，总理亲切地对他说：“你比我大一点吧，好象是大一岁半。”茅以升敬佩地说：“总理的记忆力实在惊人！”总理欣慰地笑了。这是茅以升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

每每想到与总理的交往，与总理的谈话、讨论问题时的情景，茅以升就感到身上有了力量。总理的信任与关注，使这位建筑结构专家体会到了党的温暖，这份革命情谊永远难忘！

##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纪实

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真诚。我将完成他们的愿望，为共和国的总理写两本书。然而，今天我听过那段感人泪下的叙说，终于忍不住抓笔，要先写下周恩来辞世前的一些片断……

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真诚。我将完成他们的愿望，为共和国的总理写两本书。然而，今天我听过那段感人泪下的叙说，终于忍不住抓笔，要先写下周恩来辞世前的一些片断……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卫士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们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先让我忙过这一段”——那是怎样的“先让我忙”，又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呵……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我们这些卫士初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邓大姐总要关照一句：“恩来走路快，你们要注意，别跟丢了。”事实正是这样，他的走路常常使人联想到紧急军事行动。这首先是因为他每天的活动安排，都是严密紧凑，以分秒计算时间。在一件事上误了时，就会牵连几件事甚至十几件事。现在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我们请李维信同志准备一碗面条。当然，总理在外吃饭喝茶都是交钱的。建国后，在中南海里居住的首长和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就这方面问题做过几次检查，没查出周恩来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任何违纪现象。

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大家立刻找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他不会说，不会动，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出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下陷下去……

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但心血翻呀翻，翻

上雍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然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站起身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很快便取来两块啡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象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十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女服务员来到李维信面前，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象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那就不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吧。”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受不了……”女服务员哽住了。

李维信拼命眨动眼睛，驱散泪水，终于用一种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

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将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赶到服务室，“总理要走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象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象他家乡出产的那种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总理……”

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一百七十斤重的山东汉子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现在，说周恩来是为人民累死的，大约不会有人发出异议。可是，为了顾全党初国家的大局，他将多少委屈、忧郁和愤懑深埋于自己心底，忍耐着不肯发泄？某些人对此也许是难于了解难于理解的了。

康生患了膀胱癌。那时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大事，周恩来仍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根大马棒。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医务人员悄悄向我们反映，说周恩来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咬牙切齿的，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不一致的”，“这个人就是右”。我们听到这个反映，马上向周恩来汇报：“总理，康生在背后议论你呢。你每天去几次，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听了，坦然一笑，只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几十年，从来没听他背后议论别人或者说什么人的坏话。他批评人都是公开的，背后说到同志都是说优点，让我们学习其所长。就是对康生这样的人，工作中时常有斗争，但背后从不犯一句自由主义。

就在这件事后，我听医生讲：康生发生了这种病，总理也应该多做这方面检查。做过几次检查后，小便里发现了红血球和癌细胞，并且立刻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实际上，周恩来在1972年初小便里就出现了红血球，2~3个，并且曲线有上升。保健医生是负责任的，每天查，直到明确诊断。）

说实在的，周恩来的身体曾是那么好，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会有什么危险，就是在发现了癌细胞后，由于周恩来的坦然自若，不动声色，我们仍

然没有什么明确的危机感，一切都隐在朦胧中。不是吗？总理仍然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倒下？

我产生明确的危机感是在 1974 年。那次周恩来陪外宾在广州，在飞机上，他静静地望着熟悉的机组人员，眼里闪出一种奇异的光芒。那目光太慈祥太动情了，既熟悉又陌生。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任何人望见周恩来此刻的眼睛，都会忍俊不住地产生一种孩子扑向父亲怀抱一般的冲动和欲望。然而，此刻我却生出一种莫名的惶恐，仿佛冥冥之中有什么神灵在作怪，心跳怦怦。

“来，我们合个影吧。”周恩来忽然轻轻一招手，“叫同志们都来，我想和大家一起合个影。”

机组的同志们高兴坏了，争抢着拥向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平时不愿照相，他总是让镜头瞄准毛泽东，自己尽量避开一边。

他主动要求照相，并且是和大家一道合影，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来呀，你们也来么，都来，我们一起合影。”周恩来又朝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召唤，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柔和。

大家簇拥着周恩来合影，几乎人人都是眼里含了泪。然而泪与泪不同。有人是激动幸福的泪。而象我这样知道一些情况的人，却是忧伤惶恐的泪。唉，我从来不曾象那天那么张皇失措。合影应该笑，我的嘴唇虽然咧开了，却半张着僵硬住，抖抖的控制不住。天上飘过了一团云，那阴影罩到了我的心上。不祥的预感从这一刻起，越来越强烈地朝我压迫下来。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周恩来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胱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三个月做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太重啊。我常常伤心地想：不管你们说什么绝症不绝症，总理说到底就是累死的！

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袖套。这袖套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袖套毫无两样，两边缝有松紧带，抓笔前必要仔仔细细戴好，戴好便开始伏案批阅。如今，他用手轻轻地、轻轻地将袖套抚平，再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又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恋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朦胧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嘴，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又查遍太行山周围一百八十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竟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关心手术结果？还是要感谢为他竭尽心智做手术的专家？……

医务人员把头俯下去，于是，听到了一阵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李冰，”周恩来的嘴唇翁动着。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并且飞快地眨动眼睛、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走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让壅塞的喉咙能顺畅一些透气。于是，压抑已久的泪水如决堤的小河流泄下来。“我没有把他保护好”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正象人们都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每次手术后，回到病房便又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让

别人看的就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拆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恩来就又开始夜以继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象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但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了一声：“不用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他在散步时，同我们几位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了话。分别指明我们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那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的。他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周恩来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待，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再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阜外医院专家陈医生，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不得已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成，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在医院，我们为周恩来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他一生注重仪容整洁，以他的风度和品格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巨大荣誉。

六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象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了，瘦弱憔悴，再不能象



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漾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了。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一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

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一恩一来！

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周围的同志们也跟着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然而，轻松只是一刹那，更大的担忧和痛楚便又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我们的总理实在病得太重了……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来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

参加过贺龙同志的追悼会后，他尤其爱听“洪湖水，浪打浪”。他思念他那含冤逝去的亲爱的元帅；他曾竭力想保护这位战友，却力不从心未能如愿。他为此伤感自责，因而也更加思念这位亲密战友。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

方同志去开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侯宝林、马季等同志的相声，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表演……

侯宝林仍然健在，有个情况他若知道了，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有一次，周恩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象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了，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周恩来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着痛苦，用疑问的目光向我们望望。

“让他跟你聊聊么。他词汇也丰富，又会滑稽，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恩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他是想起了侯宝林的相声，还是为我们冒出的这个念头而发笑？

总之他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铃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铃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经获得解放。一天，周恩来用细微的声音向我们吩咐说：“杨、杨秋铃出来了。你们，和电视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

不久，他们回答说，推说杨秋铃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我们提出跟随剧团到西安录，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可是后来还是没弄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

后来，我见到周恩来，小声汇报：“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铃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 13 次。

“13”是个凶数。

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 1975 年下半年周恩来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 3 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 2 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

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着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了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句，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然而，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记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聂帅在前边第一线，周恩来在后边亲自指挥全盘，我整天跟着他跑，忙得要死都不知忙什么？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恩来那么兴奋，从办公室里冲出来，我只会跟他跑跟着高兴，却不知高兴为哪桩？直到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向参加演出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同志们及记者们大声宣布，我才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着。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至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元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从广播里听到后，让我们去给买来诗词，并让我们读。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

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猛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

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地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出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给自己一个痛快了结……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整个病痛期间，没发一声呻吟，没流一滴泪；如果你一直在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的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索。在一次次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

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出痛苦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象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呵……

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上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来。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出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

“别管我，管全局”

老师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象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眶，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份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说出一声：“哎呀，你的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肯任泪水狂流。我们的总理，他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能够为他人良苦用心。他是不想让同志们替他分担痛楚，他宁肯独自去承担一切……

“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

房都能感觉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邓大姐与总理的婚姻，是所有世人的楷模。大姐看不下去，声音颤抖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人民离不开总理。

1976年1月7日，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周恩来基本上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鼻子里一直在输氧，陈医生定时将配制好的高蛋白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的胃中。

病房里清洁，但是也有一种不祥的阴森气氛笼罩。我的泪早已流尽，只觉得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因为在这最后的四、五天里，周恩来都是昏迷的时候多，基本不说什么事了，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所以，这一昼夜的宁静也并未使我马上想到意味着什么？

1月8日晨，大约8点左右，小高象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象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无可以睡到4小时；近十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二、三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我想起自己曾经造过周恩来的反。

那是1967年2月3日，我和周围的同志们凑在一起“密谋”，联名给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就用图钉钉在他办公室的门上——。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一九六七、二、三

我们有几十人签名，但我们的造反没有成功。因为总理所服务的对象是亿万人。如果说，人在醒着的时候才算有生命，那么总理在活到78岁时，他的实际生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百岁寿星！

我就是这样同我们的总理暂时告别，上楼休息去了。躺下不到一小时，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这么沉重慌乱，我本能地心里一阵颤栗，心立刻抽紧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却一样也做不出，竟如瘫了一般。我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攫住了……

“老张，老张！”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象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而收缩凝固，忽而膨胀翻滚，脑子忽而一片空白，忽而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抢救已经开始。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一双紧张的眼睛却又是失神地望望这个，看看那个；插不上手，也不知该干什么，上下颚骨唧唧地发起颤来。

片刻之后，我的心神定不一些来，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 20 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还在跳！那一刻，我的眼睛猛地睁大，一颗火苗在心房里砰一声燃起，闪烁出希望之光。我不敢眨眼，怕一眨眼那蓝色的脉膊会不再跳动。然而，为什么周围有人悄悄摇头，悄悄叹息？我惊疑地看着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膊”。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膊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

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了凉，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想把自己的热和血输送过去。可是，转瞬间总理的手掌也凉了，并且象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眼了，叫着：“大夫，大夫，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我匆匆地追踪抚摸，要寻回那热，找回那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我手已经抚到了总理的肩胛。我惊疑绝望地又叫：“张大夫，怎么，怎么凉到肩上了？”

张医生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我拼命地睁大了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切都象梦中一样，周围所有的人都浸入一种幽蓝的膝陇中，飘浮颤动。可是，我忽然听到了陈医生的声音。极宏大又极细微，极近切又极深远；象是在数数，象是在读秒。

“35、36、37、38……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声面，茫然四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早已不会说话，但我的心在疑问。

蓦地，我看到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绵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一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

“总理——！”

我哭出了声。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心脏停止了跳动。

是邓大姐的坚定刚毅、从容镇定给了我力量，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周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

脸，基本不麻烦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周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革命”中，全国大乱，北京饭店却一直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周恩来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就不行了。不怎么能上班了。据说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了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走，指导指导年轻人。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毛泽东像章，枕边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

然而，在周恩来病重和病危期间，大概因为毛泽东也在重病中，所以没有看望过周恩来，周恩来病重卧床期间，特别是他病危时从昏迷中醒来。抚摸毛泽东的像章或诗词。我心里就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身体好一些，能够到周恩来的床边坐一坐，对于他们几十年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呵！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做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同志们都在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汪东兴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工作人员最后说，主席不来了。

追悼会这时才举行。

那时，毛泽东重病在身，已经不能走动，说话也只是从喉咙内发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在这种情况下没来参加追悼会也是可能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哭喊声揪心裂肺。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来。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同志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976年1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上，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 胜利属于周恩来

[美国《时代》周刊，是亨利·罗宾逊·鲁斯（1898—1967）同他那鲁大学的级友布列顿·赫登（1898—1929）共同创办的。该刊特辟有“封面人物（或专题）特写”，使每期有一篇重要文章，从1951年起到周恩来去世为止，发表过六期关于周恩来的“封面人物特写”，这里选用1975年2月3日发表的最后一个特写——编者]

去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对他进行了一次粗暴、野蛮的诽谤运动。他越来越憔悴、苍白、紧张了。五月间他住进了北京一家医院，据说是患了心脏病。除问或在病房里会见国外来的贵宾外，医院方面几乎没有传出什么消息。只有两次他离开医院的庇护所，短时间戏剧性地出现在国宴上。西方分析家的意见是，政治上和生理上的病结合在一起，会不会宣告这是光辉灿烂、漫长的一生从此结束了呢？然而尽管表面上有许多挫折，中国这位风度翩翩、百折不挠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星期却在欣赏毫无疑问是他一生中最难能可贵的一次胜利。

月周恩来政治生涯中的许多情况相似，他这卓绝的一着也是在很不寻常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不是在他中南海办公室里，而是在医院一套病房里策划这次胜利的。突然之间，出乎人们意料，他出来主持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年来的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是两周之前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会批准了中共中央在同样绝密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当外国分析家上周拿到大会的发言稿、文件和名单时，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显得一清二楚了。虽然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共产党政策的橡皮图章，人代会的决定表明，中国那些常有纷争的各派领袖们对国家的进程和目标取得了10年来从未有过的一致意见。大会还表明，尽管有创造性的党主席毛泽东还高高在上，70年代却成为周恩来时代了。

老干部·自1949年10月1日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在70岁高龄再次连任此职，不是简单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除非发生突然的意外变故，周已使中国走上明显的温和与安定的道路，就是抛弃了试验办法，回到正常的工作，摒弃在1966年到1969年文化革命中猖狂一时的激进分子，恢复在这个时期被蛮横地、常常是被暴力赶下台的老干部的工作。

重新安排老一辈革命党人的工作，在许多方面说来，是公正的，也是适当的。说到底，是他们这些人把四分之一的人类在历史上最宏伟的政治运动中结成一支强大力量；是他们把支离破碎、厌恶战争、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孕育成为一个巨大的——不久的将来要成为强盛的世界大国——一个既是核俱乐部成员之一，又是出口石油的世界强国；也正是他们，就象周最近说的，“努力保障了人民能满足衣食方面的需求”。这样的成就是当今世界上其他幅员广阔、人口过多的农业国所无法比拟的。

艰苦生活·尽管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尽管作了脆弱的诺言，要把中国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繁荣的市场之一，中国还是象周喜欢说的那样，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可喜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国民总产值1050亿美元，还是远远低于意大利——一个在人口方面仅有大约中国八亿人口的7%的国家。

虽然用任何标准来衡量，人民的生活平均水平是匮乏和艰苦的，但是中国的进展所带来的利益的分享和困难的分担方面，大家的差异极微。工厂工

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是微薄的 28 美元，人民公社的农民的收入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生活的基本需求，如食物、医药、住房几乎花下了多少钱；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定羡慕得很：20 年来物价没有上涨过。但是“奢侈品”，如自行车或收音机，如果买，就要花掉几个月工资的积蓄。城市工人可能住在灰暗的宿舍里，简陋的两居室一套的住房。他们每周工人 48 生活上时，星期天到有树荫的公园去野餐，晚上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观看各种节目（充满革命色彩的歌曲和活报剧），或学学玩什么乐器，或者打打乒乓球。

中国 8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日子比城市居民过得随便轻松，可是要刻苦耐劳一些。一家人住在一起的要求还是比较强烈，在农村也比较容易一些。中国的许多传统价值观仍然在农村保存下来：重男轻女，拜祖先的习惯虽然很快地减少，但依然存在。如果家庭愿意的话，农民照老规矩可以搞出殡仪式，包括亲属戴孝，虽然党极力设法鼓励农民采取简易的火葬仪式。显然，当前的图景还不是一个经济大国有什么可夸耀的依据，而且中国还怀有更宏伟的目标。朝前看看毛泽东身后年代的中国，周恩来声言到本世纪末，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完成现代化之时，使他的国家“立足于世界国家的前列”。鉴于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走过很长的道路，谁也不能随便断定中国实现不了周的目标。可是还有一点，中国会捉摸不定地从安定忽然转到动乱，又从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虽然目前的势头具有希望，没有几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地位押宝，断定中国会有一个真正长期的安定局面的。

这个国家之不可捉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主席的多变性格。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革命家，心血来潮，每隔几年就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来防止官僚机构思想僵化，保证他称之为“不断革命”的活力长久不衰。他决心扫除特权阶层的“牛鬼蛇神”，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命令政府部长们去挖坑挖沟，甚至发动一个象文化大革命那样震撼了他那幅员辽阔的国家长达三年之久的政治运动。

拔河赛·还有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的激进分子。虽然周恩来和他的温和派同僚们清楚地显示了他们的力量，但是那些激进分子曾经取得过权力，也还会卷土重来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艾兹拉·伏盖尔说：“中国发生这些事情，从来胜利都不是彻底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拔河赛，有时朝那边拉去，有时朝这边拉来。这次象是往周那边拉了。”但是温和派队伍中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或者有任何软弱迹象的出现，激进分子就有可能东山再起。

尽管温和派面临种种威胁，但他们地位稳固，对付这个考验似乎游刃有余。他们有强大力量，其重要标志就是国务院任命的 29 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之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战争年代总理的老朋友，76 岁的叶剑英担任了关系重大的国防部长一职。另外一个好朋友，今年 67 岁的老革命李先念，受命总管财政和贸易。在文化大革命期中蒙受耻辱，一年零九个月前，由周恩来——可能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为之恢复名誉，重新工作的 70 岁的邓小平，继续在政坛上发挥他惊人的作用。他成为 12 个副总理中的第一副总理，以及党中央 6 位副主席之一，是在党和政府中同时晋升的唯一官员。至少在目前看来，他是周恩来的确定继任人。

非凡的手腕·比较起来，激进人物只获得一个部长职位。京剧《智取威虎山》作曲者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左派人物，如毛的爱山风头的妻子

江青或者她的同盟姚文元，不论在党或政府里，都没有提升上去。

甚至上海帮的那个张春桥，似乎要转变为温和派之一，几个月以来研究中国政情的人就曾猜想他会作此转变。上周在人代会上发表的报告，使人感到是一种奇怪的并列混合物。周恩来是最典型的温和派，他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却充满左的警句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赞扬；而被视为激进分子的张春桥，却避免使用左的口号，反而侧重“纪律与自由”。这不但是使人扑朔迷离的中国政治，而且也还是周进行交涉妥协的非凡手腕的绝好说明。毫无疑问，周给固执己见、常常想入非非、真正英明的统帅当了40年的参谋长，如果缺少一丝一毫的这种非凡的手腕，那是无法办得到的。不只一次，毛把汉学家们弄得莫名其妙，不懂为什么要突然改变政策，或者采取难以解释的行动。上周他又一次捉弄了他们——为什么他不参加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呢？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分析家说：“我拿到公报看时，看了又看——毛的缺席是十分惹人注意的。我们平素习惯于看到毛主席操纵一切，突然之间他却缺席了，令人不解。”总的说来，中国问题专家否定了关于毛缺席的两种极端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毛不同意两个会议所批准的政策——即“闹别扭”的理论。另一种说法认为毛已病危，被甩在一边了——即“无所用心的老天爷”的理论。毛已81岁了，从最近的一些照片上看来，显得是憔悴衰弱了。但是在党中央委员会开会之际，他还有精神在长沙接见马耳他总理康·明托夫；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他又接见了西德政治领导人物法兰斯·史托劳斯。不过，短时间内同来访的贵宾谈几句是一回事，而连着几天出席会议、紧张地在北京讨论政治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最可能的是解释是中国问题专家说的“躲进仙人洞”的理论。他们认为毛摆脱日常事务，在思索中国的未来问题。过去有过两次，毛从政治战线退下来：一次是在50年代末。当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显示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大跃进”错误；另一次是在60年代中期，当他担心官僚机构会扼杀革命时，他退下来计划发动文化大革命。

密歇根大学政治家迈可·奥申柏格说：“偶尔离开政治中心一段时间，不参与日常活动，这同毛的作风是很合拍的。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各派力量的错综复杂关系有时需要一个团结一致时期，甚至他本人在场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自然，在今后几个月里，毛也会对最近事态的发展表示不满。但是看来他的缺席是主动的，虽然人们把他看成是活神仙。他到底不能摆脱凡人的苦恼与限制。奥申柏格说：“我想他已对某种接班的办法表示同意了，因为归根到底他的事业成就最后还得看他的接班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外开放·还有一点，自从他的忠诚的总理把中国引导到温和的道路以来，毛已批准了周采取的许多主动措施。比如说，在外交事务方面，毛着重地肯定了周对外开放的作法，会见了陆续前来北京的外国领导人，包括老牌敌人如理查德·尼克松等。毛要是没点头，周是不可能推倒那堵把中国同外界隔开了20年的围墙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同10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将近15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来往。

同样重要的是，周表示不赞成那样口口声声地、但又仅限于口头上地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毛对此并无异议。诚然，周在人民代表大上做报告时用了些不能不用的词句，说美苏竞争“势必引起世界大战”，说“天下大乱”对世界革命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也着重说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是接近的，

谴责苏联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颠覆活动，甚至在边界上挑起武装冲突”。他向与会代表说明，同美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善”。上个星期他又回到医院病房之后，在同来访的日本议员保利茂谈话时，提醒他日本应该继续同美国密切合作，同时对苏联保护传统的距离。

在内政方面，周也小心翼翼地制定毛会同意的工作纲领。大会上批准的新宪法在上星期公开发表了，内容包括一些毛的理论，如“不断革命的理论”。新宪法仅有 30 条，比之 1954 年共有 106 条的旧宪法精练得多。这个宪法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时出现的大字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新形式。有一段使人想起美国的人权法案，说是要保证“言论、通信、集会、游行以及罢工的自由权利”。至于最后一句，对中国工人包涵什么意义，只能拭目以待，新宪法还允许有宗教信仰，并且更加典型地说，“有信仰宗教以及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自留地·可是有些方面，新的宪法包含一些与传统的毛的思想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只要不牵涉到“剥削别人”，中国人可以进行个体生活劳动。宪法还保证农民可以保持毛一度在大跃进期间废除了的自留地。张春桥有气无力地向人代会说明，自留地提供“必要的伸缩性”，但是很清楚，中国人只能承认尽管毛提出过关于建立无私的一代新人的许多说教，毕竟有些物质刺激是少不了的。

毛自己也许看到有些情况改变了，同意这些偏离正道的作法。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他最后一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公开露面，扮演真正活跃的角色至今，出现许多变化的迹象。最近去过中国的人注意到，同 1972 年比较，这个国家安静多了，也更从容不迫。同两年前的情况相比，过去随处可见的毛纪念章和毛的图象，现在少得多了。著名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现在差不多看不到了。毛还谴责对他的个人崇拜，指出这是已身败名裂的国防部长林彪搞的阴谋诡计。

种种迹象表明，在垂暮之年，毛在多才多艺的周恩来欣然附和之后，感到有必要制定比较稳定的工作程序，抛弃——至少改变一下——那种轻率的试验，以及为了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发动的吵吵闹闹的政治运动。周本着真正务实的风格，制订了一个似乎包括所有毛提倡而行之有效的纲领，也就是毛曾经这样或那样主张过的东西，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国家，同时避免产生一个享有特权的科技尖子层。在周恩来的培育指导下，中国在过去几年中采取了不少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激进改革措施——其结果是好坏参半。举例来说，五七干校，即把官员下放到农村进行为期 14 周的锻炼的地方，目的在清除他们的官僚习气以及“命令主义”作风。这种五七干校在全国有数百所，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干校不再是什么革命的突击疗法中心，而是经常性的训练营。用类似的标准来衡量，在高等学府里，文化革命的影响还是随处可见的。全部高中毕业生中，只有 16.7 万人，即 1.5%，被录取进大学（在美国，进入大学的有 150 万人，约为高中毕业生的 50%）。所有录取的大学生必须经过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批准，而委员会往往对中产家庭出身的子弟并无好感。在工厂里，还是鼓励工人们提出技术改革方案的。技术人员从车间选拔出来，送到工厂办的学校去训练。全国农村有 100 多万的“赤脚医生”。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资格浅，医疗设备也很差。“赤脚医生”也是文化革命的产物，他们被分配到生产队的小诊所里工作，给社员们提供最起码的医疗服务，这么一来可以

不必把有限的医疗经费集中花在城市的昂贵医疗机构上。

知识青年·正如周恩来向人代会说，农村有 1000 万年轻人，他们是在城市长大和受教育的，绝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相当于美国念过九年书的高中毕业生，他们这些人必须在农村进行两年的体力劳动，才能进大学。他们是历史上为数最多的流动人口。打发那么一大群一大群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农村去，表面上的目的是让他们把在城市学到的技巧和文化带到乡间去，其实不加说明的理由却是，要他们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无非因为在城市青年人多而就业机会少，可是在农村劳动力从来都是多多益善的。

虽然这个农村锻炼很适合中国的目标和要求，可是不少尖锐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由于不习惯农村的艰苦生活，有许多人往往适应不了。此外，许多农民瞧不起娇生惯养的城市年轻人；而城市来的年轻人反唇相讥，管他们叫“土包子”。结果常常是彼此没有什么往来，互相不了解，甚至更糟——打架、强奸等事时有发生。虽然北京方面对这些问题有足够的了解，派调查人员下去做精神动员，给青年人打气，处理各种事件，不少的年轻人还是不告而别，离开了公社。在香港的难民中，有不少是以前的中学生，他们冒很大的危险，在严密巡逻的海面上，游泳九个小时，偷渡到香港，为的是逃避农村的艰苦生活。更多的青年人索性溜回他们的城市，没有粮票购买粮食，不得已当个“黑户口”，不时偷点东西，以求生存。

革命的严格要求也产生了其他社会不正常现象。由于工作地区不同，夫妻常常是长期两地分居，其结果也许导致了卖淫的重新出现。访问广州和上海等城市的人已发现个别例子。工人们对于毛所憎恨的物质刺激的做法还是感到兴趣。这对左派意识形态专家们来说是个头痛的问题，但周的技术专家们并不觉得怎么坏。有消息说，武汉方面的产业工人最近闹事，要求提高工资。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去年曾经发牢骚说：“他们想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如果这样，那革命又为了什么呢？”

令人失望的一年·周恩来新的国务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就在经济领域里。尽管中国资源丰富，人民有非常之强的组织纪律性，但 1974 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通常总是长篇大论，列举经济领域的进展。今年只简单扼要地说了一句话“工农业总产值比 1973 年有了新的增长”。台湾方面发表的中共中央机密文件承认。基础工业的生产有所下降。美国分析家认为这些文件是可靠的。煤炭生产，比原定计划少了 835 万吨，短缺数额相当大。文件还指出，其他工业的减产“拖了整个国家的后腿”。

问题的一部分，自然是由于去年达到高潮的批林批孔——暗指批周恩来——这个运动造成了混乱，开群众大会、开动员大会、开学习会，使工人离开了生产岗位。据这些机密文件称，工人在提批评意见的借口下，提出增加工资要求，干部就离开职守，以避免卷进这场是非。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没有象西方大多数工业国家那样受到很大的冲击。正象周夸耀的，他们享受着“物价稳定”。两年之前，北京开始向日本和西欧购买成套设备，主要为了生产急需的化肥。这个采购之风一直吹到 1973 年，使中国贸易逆差出现不大不小的 8000 万美元这个数字，北京素来不愿意接受信用贷款的办法，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它委婉地称之为“延期付款”的办法来支付购买的设备，现在对外贸易的逆差，在 1974 年估计已猛增到 75000 万美元之巨。这样一来，中国方面只好推迟接受原向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订货。

经济的关键是农业生产。中国进口大量粮食，因为进口粮食给沿海地区比从遥远的内地转运更为合算；但是人民共和国的粮食是自给自足的。然而中国每年人口增长 1600 万人，目前至少用掉每年谷物生产增长 4% 的一半，勉强同人口增长率平衡起来。能有此结果确实不错了，可是并不理想，特别因为北京需要剩余农业产品（通过出口）换取外汇，提供资金，来支付建立规模更大的工业基地所需要的费用。

石油出口·因此，在如何分配很紧的国家预算时，北京作出关键性的决定。北京倾向于优先拨款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而把发展重工业和武器生产放在次要的地位，不着重武器发展，对同美国搞缓和是间接有利的。同华盛顿改善关系，使中国人放心苏联更不至于向他们进攻。

从一个石油进口国家转变为一个石油输出国家，中国在 1973 年作了一个经济跃进。中国还称不上是远东的沙特阿拉伯，但已经证明的储油量为 200 亿桶（沙特阿拉伯约为 1320 亿桶，美国约为 350 亿桶），北京希望有朝一日石油将成为中国主要的创汇资源，象其他石油输出国家一样，中国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在 1974 年，中国向日本出口了约 3050 万桶原油（比 1973 年增加了 430%），收入 44200 万美元。出口那么多原油给日本，不仅是为了赚取外汇，而且是为了使日本打消在西伯利亚开发天然气的意图。

经济发展成功与否，自然有赖于政治局面的稳定。周总理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既能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惹怒那些担心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左派分子。好在周恩来的长处正是善于在政治上穿梭于夹缝之间，他顶住风霜，不但 25 年以来一直当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并且在中共政治局担任委员达 47 年之久。可以说，他在政治上居于显赫的地位，连续不断地时间之长胜过其他任何人，连毛泽东也不例外。周恩来之所以能够百折不挠，是由于会掌握巨大的权力，而不给人以追求权力的印象。此外，他的才能一直同毛的任性而又富于幻想的才能配合得很默契。毛的天才表现在探索广泛的理论问题，不象周那样擅长管理行政大小事务。他们这种配合格局始于 1934 年开始的长征途中，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按理说，周的地位高于毛，但他在军事战略问题所引起的纷争中，接受了未来的“伟大舵手”的意见。

低姿态·周在长征中幸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在最后一千英里路上，有很大部分时间是靠担架抬着走的。后来在抗日战争年代，国共两方之间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他担任驻战时陪都重庆的中共联络代表，后来担任中国国防部长叶剑英作为他的副手。1949 年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周开始建立国家的政府机构，出国访问，主持不计其数的党的、群众组织的以及国务院的会议。他能在政坛上立于不败之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如何在毛把中国极力推向左的时候，保持一个低姿态。对于这个国家的务实派来说，这种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容易被指责为缺乏革命热情，当激进派的锐气冷了下来，需要收缩整顿时，总是周恩来出来，用他那无与伦比的行政手腕以及忠心耿耿的党组织机构，使一切恢复正常状态。周从来没有犯过积极反对毛这个致命的错误，大跃进失败了，是周——而不是“伟大舵手”——出来承担错误的责任；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他出席红卫兵组织的群众大会。但是当形势乱得出乎毛的意料时，周不声不响地把国家第一流的科学家保护起来，使他们的工作不致受到影响，或者防止到处闹事的红卫兵破坏建设项目。有一次，周自己的办公室被大群大群疯狂的红卫兵包围了两天，他

们大喊大叫，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臭后台，同反革命狼狈为奸”。他同拥有权力的军队司令员联合起来，这样一来，文化革命的领导者要对他进行攻击，就不敢造次了。

1969年以后，林彪不断活动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周此时退到了后台。去年，当他的务实经济纲领以及他使以前“靠边站”的官员恢复工作而受到激进分子的攻击时，他再度以低姿态出现。激进分子，如江青和姚文元，以批孔夫子和批林彪为名，发动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其实是含沙射影地、但目标明确地用来攻击总理的。这个运动提出了很多指责，其中之一实际上是针对周的，诬蔑他“举逸民”，指的是一年之前周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

至于毛是否同意激进分子血口喷人地攻击周恩来呢？这就不清楚了。但是无论如何，在运动达到高潮时，即8个多月之前，周就住进了医院，大多数分析家以及在这个前后会见过他的外国人士相信，他确实病了，可能是心脏病。可是此时住进医院治病显然是有好处：摆脱了日常事务，可以少给激进分子以可乘之机。尽管表面上他什么都不干，其实却在采取绝妙的措施，计划棋局上的每个步骤。当毛自己也从第一线上退下来，批孔运动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时候，周的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被扫清了。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新成立的国务院班子可以成为文化革命以前那样稳定可靠的政府；但是这将取决于各个派别是否能同心协力维持现状。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趋向安定局面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增长。假如又出现急剧的激进局面，或者出现破坏性、使用暴力来解决继承人的斗争，那么中国现在要遭受的损失远比前几年将会严重得多。北京在国际事务中已经取得了显要的地位，还获得了联合国安会理事会的席位，何况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抛弃了自给自足经济的理想，现在比起五六年前更加依靠世界经济。激进分子、温和派、部队方面都明白，如果再陷入混乱局面，中国自1969年以来所建立的一切将受到威胁。

关键时刻·虽然如此，前途不完全是有利的。尽管周恩来作了许多努力，头等重要的、平平稳稳的接班人问题还是个未知数——还是一个问题。一旦毛离开人世，权力宝座出现空缺时，各个派别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家安德鲁·内森·（该校教授，取中国名字黎安友，是《红都女皇》作者罗珊·魏特克的丈夫——编者）所说的，毕竟这些人“把一生献给了革命，对他们来说，革命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绝不会因为团结的需要而放弃为实现他们想象中的社会而停止斗争”。

也许不会，虽然周恩来的希望是，到了关键时刻，明争暗斗的各派能在目前北京领导层中的一个人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迅速地转到国家建设方面来；虽然毛泽东不时地要扫除“牛鬼蛇神”，也许这也是他的愿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许还有世界其余的国家——的前途如何，很可能得看这个愿望能否实现。

1975年2月3日  
[美]《时代周刊》

## 第一颗巨星陨落

[罗斯·特里尔的简介见第一部 111 页。周恩来去世后，特里尔教授曾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纪念会上讲话，哀悼已故中国总理。本文选自他 1978 年出版的《毛后的中国未来》一书第三章，“周恩来遗下的空档”，标题兹改如上——编者]

1976 年震撼中国的三颗巨星的陨落，其中第一颗——周恩来的逝世，使全国以及中国以外的人大为震惊。周恩来能力之强和任职时间之久，已经使他成为中国政治上的擎天柱。

这个噩耗在 1976 年 1 月 8 日的刺骨寒风中传开了，好似龙年的不祥之兆。他因患癌症不幸去世，享年 78 岁。当他的遗体从医院运往金碧辉煌的故宫去时（与事实不符——编者）沿途穿着大衣的群众泣不成声地目送那载着遗体的扎着黑色、黄色布花的灵车缓缓前进。

在 48 小时之内，好像神在把各种象征安排好，点出三大理由，说明为什么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即使在中国，新鲜事物总不能被完全掩盖，以致抹煞了内心思想的表露）。

首先，在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是共产党执政之后或以前。没有任何人的逝世引起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表露出来的悲痛，在另外两位红色巨人辞世时并没有这样的情况。

据目击者说，当送殡行列经过某一处时，有一大群中国人拥到马路中间，企图阻止灵车前进。他们怀疑把遗体火葬的计划不是周总理自己的意愿，而是江青和她的朋友们的主意。直到遗孀邓颖超出面向群众解释说火葬确实是周自己的意愿，那些关切的群众们才让灵车继续前进。

中国的人民群众相信周恩来。从来没有对他有过什么信任不信任问题。甚至毛泽东在晚年，据一般老百姓看起来，还不如这位具有钢铁意志同时又有人情味的周恩来形象更为亲切生动。邓女士对送葬群众的一番直截了当而立即生效的谈话似乎就是周的可信性的象征。中国几乎每一个人——只有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外——都认为失去了周恩来，中国的前景会暗淡一些。

第三，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仪式上宣布，周曾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这位直率的、不讲排场的人不要为自己建造华丽的陵墓，把历史冻结在花岗石里。这是他典型的姿态。周恩来做工作的姿态往往是同他所做的工作一样重要。

周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因而他显得高于中国革命中大多数其他人物；他是中国通向国际社会的桥梁；他是一个无私的人，其为人性格能够使倔强的人互相妥协。

2000 年前著名学者司马迁曾经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一个人做了什么，是如何做好的。一个领导人去世所产生的影响还要以他去世的时机来衡量。周恩来逝世的时刻使他的死对中国的打击重如泰山。他先毛泽东而去了。这有点儿出人意料之外——1975 年以前他一直没有象毛那样受到健康不佳的阴影笼罩——而他去世的后果倒真是象山东的那座大山，令人望而生畏。他本是中国革命的舞台监督，而当这场革命的导演毛泽东最后一次要交给他大任务时，他却已不能在场为毛料理后事了。

假如毛泽东比周恩来先去世，中国的政治就不会象今天这样的了。邓小



平与后来被命名为“四人帮”的极左分子之间的争端也许不会使中国在1976年那样地两极分化。如果周在1974年到1975年间没有因患癌症而病倒，邓的地位就不会升到那样高，以致惹起“四人帮”的嫉恨。而“四人帮”自己在毛去世后，就会失去为所欲为的权力之大半。有周在掌着舵，国家这艘船就不会向左或向右驶行太远。

所以，龙年中有四大重要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邓既然已不处于火线上，就不会被极左分子所害而下台。

“四人帮”就不会象1976年春天那样飞扬跋扈，——很可能他们也就不会象今天这样的身入囹圄了。

中国人民就不会由于清洗和反清洗的悲喜剧而对他们的正确性失去信心。

华国锋会仍然是政界默默无闻的二流人物，中国以外的世人不会知道他。

周恩来逝世的时间对于中美关系也是不利的。基辛格在1971年7月首次秘密访华之后的两年中，中美关系增强了，可是在1974年和1975年却没有新的进展——水门事件搞垮了尼克松。

首先，水门事件等于把尼克松的手脚捆起来，以致他不能向中国做什么表示，因为他怕这可能更加减少国会中那些本来站在他一边反对要求弹劾他的少数保守派议员。后来，到了1975年秋天（应为1974年秋天——编者）这位力主和中国建立关系的总统终于被迫下台了。

1975年12月，一位美国总统第二次访华。但是原来的尼克松——周恩来的握手此时已变成有气无力，捉摸不定的手碰手而已，尼克松已经下野，而周恩来则重病缠身。福特和邓小平在圣诞节前的会见，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兴奋气氛。

中国方面抱怨这种新的关系得不偿失。基辛格个人则对中国人有些失望，部分理由是他认为以前曾经同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打交道，而现在的对手却是率直的邓小平，是一种降格。周这次没有出来，最后肯定了中美关系将会继续停滞不动，直到美国大选之后，这种情况使福特在即将开始的总统竞选运动中更加动弹不得。

是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政治局才同意作出让步，使中美关系在1973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蒋介石的使节在华盛顿仍然是官方的“中国大使”，他和基辛格达成协议，在两国首都互设一个准大使馆。（美其名曰“代办处”），这原是中国人曾经发誓决不干的。

然而3年之后，政治局已经对美国开始冷淡了。不过他们在周恩来弥留之际，却把在圣克莱门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有一别墅在此，当时号称“西部白宫”——编者）隐居着尼克松请到北京去一次，好象让他衣锦荣归似的，而其实紫禁城里的铜狮子刚在几个星期前被福特的访问厌烦得鬃毛都脱落了。这种做法真使白宫方面目瞪口呆。至于周对于尼克松的二次访华究竟是否事前有所知或有什么看法，我们就不清楚了。

周之死还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的人事安排方面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空。总理一直致力于结束纷争不和的局面，而促进经济计划的实施。这就是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所作的最后一次伟大努力的关键所在。但是他遇到阻力。

特别是文化革命中的那些极左分子张牙舞爪地要把文化和教育拉到更加

左的方向去，总理病逝前两个月，他们又一次掀起一阵鼓噪“阶级斗争”的叫嚣——好象这是什么具有魔力的口令，一声呼喊就可以万事大吉似的。

1976年1月中旬，对周恩来的哀悼活动突然中止了，人们臂上的黑纱不见了，好象到了洗衣服的日子。报刊上不再刊登悼念的文章了，停止和开始同样的突然。公开谈话中穿插了一些同周总理的政策相违背的主题。事实上，周逝世后，权力很快就落到极左分子的手里。他还是死得过早了，没有来得及阻止那些极端分子的活动，图谋使中国无止境陷入“革命”之中。

诚然。周恩来的战友邓小平还在。但他缺乏周的政治上的熟练。中国等着看邓小平能不能顶住那些极左分子，坚持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路线，或者是否还得来一场对抗。

我回想起1971年我见到周恩来的情况。那是变幻多端的、重要的一年：同澳大利亚的关系（就是这个使我与他有了接触）；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林彪问题；还有周恩来开始感到“老了，疲倦了”。（正如他自己说的。）

澳大利亚保守党政府一直执行极端反对中国的政策。1971年春，中国忽然取消了一大宗小麦订购合同；反对党工党早就建议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的政府，并主张同台湾断绝一切官方关系。这时候工党利用政治上有利的局势，谋求派一个代表团去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打电话给我，要我敦促中国人同澳大利亚工党举行谈判。我和在加拿大及香港的中国朋友们联系，还写了信给法国驻北京的大使马纳克，这位驻华大使同各方面关系较好。

不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惠特拉姆访华，同时，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打电话给我说也欢迎我访问中国，并说希望我在惠特拉姆访华前几个星期到达中国。

在人民大会堂侧面的一个厅里，外交部的马毓真把我介绍给周总理。周身材较小，可是他在任何一屋子人当中似乎他总是出人头地的，他有一只手臂不太能随意活动，那是由于1939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的。他的眼神坚强如钢，可是有时候笑起来就闪闪发光。他的嘴长在脸的较下部位，嘴唇向前绷紧。一头黑发现在已经灰白。他的灰色上衣上佩戴着一枚刻了“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的举止坚定而有修养，可是他也平易近人地开开心，并且非常自然地接受新鲜思想。

周谢谢我在澳大利亚问题上给予的帮助。因为我代表澳大利亚工党提前到中国去，他管我叫“先行官”，他还感谢我帮助中国政府进一步了解美国的现状。他说：“我没有去过美国，可是你在美国住过，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我们本来不知道的情况。”这表现了周恩来依靠一个老百姓个人去办事这种令人惊异的坦率直接的工作作风，并且还当众表示谢意。他这种工作方法与许多其他政府依靠什么人物和公共关系去做工作是大不相同的。

周建议我仔细阅读《人民日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发表的社论。直到第二年，——林彪出走和死掉以后，我才充分认识到他这项建议的重要意义。周也许想到的是关于党必须指挥枪这段话。当时他和毛都正在同林彪作斗争。

后来，我参加了惠特拉姆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举行的一次会谈。外交部长姬鹏飞和外贸部长自相国也在座。这两位部长前几天已经同澳工党领导人会谈过了，澳方发现，虽然周总理面前没有记录材料，他都把白部长和姬外长同他们谈话的所有要点都包括和总结了。他总是从事实出发，从来

不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意见。他也提出广泛的历史性问题一般忙碌的政界人物很少提这类问题的。他回答了惠特拉姆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周没有试图掩饰双方意见相左的地方——有时候他突然用英语说：“Nono, no”，但他没有让小范围的异议掩盖了大范围的协议。偶尔他也直言不讳，比如有一晚会谈快结束时，他说：“我们期待着你们执行，并且履行你们的诺言。对于一个政界人物或者一个政党来说，履行诺言是至关重要的事。”

1972年12月，惠特拉姆先生果然当了澳大利亚总理了。中澳立即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所作的有关中澳关系的每一项诺言都实现了（包括继续在道义上支持澳大利亚的毛泽东主义者）。关于承认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在1971年7月双方达成协议的其它问题的实施计划都在1972年12月以来得到顺利执行。

从这次的经验中，澳大利亚人懂得了周恩来的以下几点：他遵守诺言。他不说违心的话。从我们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接触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受到国务院和外交部官员们的极大崇敬。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的时间甚至比毛泽东还长。他任总理2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则达半个世纪之久。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周恩来就在欧洲从事左翼政治活动，然而他一直活下来，1972年在北京欢迎理查德·尼克松。

周是一位很高的政治家，但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自从1935年以后，他就没有提出过一条自己的路线，来与毛的路线分庭抗礼。从那时候起，毛泽东是缔造者，周是舞台监督。假如这意味着周一直当第二号人物，从来没有可能成为第一把手，实际上这也成为中国领导层中一个忠心耿耿的，几乎在任何时刻都少不了的人物。

1927年，当毛泽东在党内失势时，周曾经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从那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始终是中央委员。

他为人稳重。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有时也改变自己的看法。在对待20年代一位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态度上就是这样：他本来是李立三的主要支持者，后来李失势了，他成了主要贬责李立三的人。可是周恩来从未被解除过党内职务，不象毛那样被解职了3次。他更没有象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样被清洗出党过。

周恩来为人象柔软的柳枝，在中国国内政治风暴中，他象垂柳那样弯曲起来，但把树根牢牢地扎在泥土里。这就是他能够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达50年之久的秘诀，他甚至能安全通过文化革命——虽然在1967年他有一个短时间被红卫兵围困起来——，而其他人几乎无一幸免。显然，他是一位调解能手。

周恩来是具有近似舞台上演员魅力的共产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在法国当学生和政治组织者时，就成为冲劲十足的活跃人物。20年代他刚到巴黎时，他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穿上他的最漂亮的上衣拍了张相片，然后买了一套明信片，把自己的相片翻印上去，给人以亲切感。一年之后，他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他对别的国家抱有深切的好奇心，脑子里常常思考世界每个角落的政治，在40年代和50年代，人家就说他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土布衣服上的一枚世界主义徽章。到了60和70年代，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屈指可数的伟大

国际性人物之一。——当中国将进入 80 年代的时刻，他的逝世真是一个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十几位领导人之中，唯有周恩来到过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他曾留学欧洲和日本，代表中国到亚洲各国去访问过大约 20 次，在 1954 年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他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代表毛泽东在对苏斗争中处理了许多事情。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9 年中，他 6 次出访莫斯科，而且在 70 年代与美国打交道时，他负责承担了几乎全部工作。

周认识许多美国人，并且喜欢和他们深夜长谈。他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当我告诉他在“在美国”时，他高兴地笑起来说：“这真有意思——到美国学中文。”周说美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美国青年反对越南战争的勇气给了他深刻的印象。甚至 1975 年他躺在医院病榻上沉疴不起时，还奋力反击那些对中美联系横加批评的中国人。

有一个美国人是周恩来不喜欢的，那就是杜勒斯。这位前国务卿在 50 年代竭力反对承认北京政府，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进行时，有一天下午，周发现杜勒斯当时正好也在休息室里，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周伸出手来，杜勒斯赶紧把双手放在背后，还转过身去。他对一名副手轻声说：“我不能”。

杜勒斯曾在 50 年代预言说中国共产党政府很快就会“灭亡”。到了 1971 年，周恩来认为杜勒斯是个“可笑的家伙”。因为杜勒斯的预言过去了 20 年了，——历经 5 位美国总统——周却仍然是那个拒绝“灭亡”的政府的总理。据我了解，他相信那时候杜勒斯式的傲慢主要是在苏联盛行。他说：“杜勒斯的继承人在莫斯科掌权呢。”声音中带着犀利的锋芒。

说也奇怪，周恩来任中国总理的 27 年中，华盛顿竟然始终没有能说服自己去正视中国内战已经结束现实而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毛一周时代日益接近尾声，到最后华盛顿还同台湾的国民党拉着手呢。

1974 年，周恩来在一次气氛紧张的外国专家聚会上讲了话。他感谢这些显得有点不安的专家们做的工作。由于文化革命中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为此表示道歉，并且重申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的目标。

在中国的外国人日子不好过，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有些外国孩子在学校里被人为地同中国孩子隔离，中国人同外国人结婚曾引起令人恐惧的轩然大波。周恩来带着感情谈到国际友爱。他说他认为不同国家的人民应当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不许那些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就如同不许有国际友谊一样错误。

有时候，他亲自出面干预，使相爱着的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结婚，尽管他的有些同事表示反对。他和政治局中许多人不同，他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国际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大公无私精神在龙年（指 1976 年——编者）有所衰退。相形之下，周恩来（对一位政治家来说）的纯洁动机就更加突出。

周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书香门第，他参加革命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从来没有靠政治吃饭，与职业政客不一样。他是为政治而活着，象有坚定信念的人那样。

所以他是无私的，对于树立他的形象和给予他特权总是一概拒绝。在毕生事业中，他和某些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从来不是“任人唯亲”的——他没有亲生的孩子。看来他做每件事情都是为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之中，并不象人们有时候想的那样在私生活问题都是干干净净的。然而周恩

来对他的夫人和 50 年的战友邓颖超从来都是忠贞不渝的。

至于虚荣心问题，周恩来不要虚荣的光辉事例使毛泽东相形见绌。两人对于宣传自己的早年生活的不同态度就是一个例证。多次有人建议把江苏省周恩来故乡他出生的房子保存，建立纪念馆，但每次刚一提出，这种计划就被周扼杀了。事实上，他索性不告诉人家他出生的房子在哪里。至于人们花好多钱把毛泽东出生的韶山村建成漂亮的纪念馆，毛却从来没有干预阻止过。

周恩来做事动机纯正，所以，他无所畏惧，早年他曾面临生命危险。他曾遭人批评。他感到失望在冷酷地拉扯他，特别是在长征途中和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中。但是他从来不谈这些事情，即使对相当亲近的朋友也不讲。挫折并没有在他心里产生自怜（江青心怀不满就曾产生了自怜）。

不自私的动机使周恩来没有压倒别人的野心，解放后。他眼看着刘少奇走到他前面去了。成了毛泽东的确定继承人，可是他好象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试图阻挠刘的晋升。同样地在 60 年代中期，他彬彬有礼地接受了林彪僭越到第二把手那种令人惊异的行动。他有中国君子的风度，虚心谦让。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 10 点钟（应是 11 点钟——编者），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睛，还认得出床周围的医务人员。据说他轻轻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这些最后的话，真是典型的周恩来语言。

在有些危急时刻，周总理必须使在中国政治方面的各种集团以及各种不同观点保持平衡，不过一般来说，他总是能够做到在那冲击毛周政策的两大股势力——左派和军队——之间保持平衡，有些领导人会采取行政压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周却花整夜整夜的时间去进行规劝，做说服工作。如果没有他这样的协调能手，如果没有他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是不可能领导好的，27 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政策一般都是毛的政策，可是常常总是周使它们得到贯彻执行。

周恩来待人接物、解决矛盾的精湛能力已有多年的历史（的确可以追溯到他童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十月革命。周当然出席了。还有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各中间派团体的代表也参加。（由于处在战争时期，即使是互存戒心的同盟国之间的人员接触也比较频繁）。

招待会进行到中途，突然苏联大使和周恩来都大吃一惊。在他们面前有一个蒋的高级助手正从公文包里抽出好多传单来，给每个客人发一张。周转眼就恢复常态，一面带着笑容走向那个人，说：“王先生，我看你是在推销书刊吧——让我来帮帮你。”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拿过来几份传单，做出随随便便的样子把传单内容很快地看了一遍。他这才放了心，原来那传单并不是反苏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仅仅是一般地反对日本的宣传品。重新笑嘻嘻地和王先生一起在会场上走着，帮惟分发传单，一面做出共同主持其事的漫不经心的姿态，低声说：“我是替王先生卖书刊呢。”这么一来，苏联人避免了一幕不好办的场面。

王先生的尊严也保住了。招待会继续进行。

1973 年，我在花园城杭州听人家说过关于灵隐寺的一段文化革命中的斗争故事。有两派红卫兵在西子湖畔一座佛教古刹的院子里互相争论不休。大家都同意“砸烂旧世界”这个口号。

可是一队大学红卫兵说，斗争必须是政治方面的，而另一队中学红卫兵却主张把这个古庙整个毁了。双方都同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打电报向周总理请示，并听从他的裁决。

周回电说，寺院不应当拆毁。他的答复很有意思，而两派红卫兵居然同意在这个问题上向他请示，这一事实也同样有意思。大家知道知识分子、政府工作人员和负责经济计划的官员们都敬重他。这个故事显然说明好斗的红卫兵也相信他的公正判断。

1974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对于澳大利亚副总理访问北京的安排上持不同意见，澳大利亚国防部坚持要澳大利亚飞机的机组人员穿他们自己的军服，在由香港到北京的途中以及在中国首都停留的时间都穿军装。中国外交部说那是违犯中国法律的。这次访问几乎要取消了。

事情传到周恩来那里。他说、这不过是件小事情，为什么不能来个折衷呢？机组人员离开香港时可以穿他们的军服，可是到达北京时就把军服换下好了。于是副总理启程访华的时间几乎一点也没有耽误。凡是要处理人们意见不同而相持不下的情况时，周总理真是一位解决问题的能手。

我在前边已说过。周是既重视纪律又具有魅力。他既坚定，又有屈能伸，这是他的秘诀。他教过许多中国干部什么叫做有原则性的调和。周恩来相信世界主义，但他决不是拿外表形式来代替实质内容。他擅长做协调工作，但这决不意味着他缺乏基本立场。他从毛主席那里，从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经验里，学到了他一直遵循的原则，尽管他不是总谈论这些。

一个领导人，既有原则，又地文化抱着信心，个人无私无畏，因而能够成为民族革命中的一个世界主义者，共产党内的一个协调者，艰苦漫长的征途上的一个欢快的骑士：那就是周恩来。

在台湾问题上，他在时间和方法方面向美国作了妥协，可是从来没有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上作过让步。（北京曾慎重地报道，在葬礼前夕，应他的遗孀邓颖超提出的请求，他的骨灰盒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省厅里陈放了一个晚上。）

他对于哪个帝国主义国家最危险的看法曾有过改变——最初他认为是美国，后来认为是苏联——可是他对帝国主义是世界大乱的根源以及必须支持中小国家的独立，这个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过。

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广泛地认为周恩来是20世纪最出众的政治家之一，同时在国内大家也认为他是一位坚强的、决不妥协的革命家。后来，在1977年初，“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国出现了“复周”运动，是毫不奇怪的。一年前，“四人帮”强迫人民突然终止对他的哀悼活动，而今天报刊上最后还是用最美好的词句来恰当地歌颂和追念他。华国锋政府将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从这里看出一点苗头。

[美]罗斯·特里尔

## 忠于祖国重人情

[狄克·威尔逊 1928 年生于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后来继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以汉学及研究中国出名，是新闻记者兼作家。1958 年至 1964 年任《远东经济评论周报》主编，继而任新加坡的新闻顾问。1973 年至 1981 年在伦敦大学任《中国季刊》主编。威尔逊著作甚丰，早年出版的书有《人类四分之一》、《新加坡——东西方的焦点》、《1935 年万里长征》、《毛——人民的皇帝》、《两虎相争——中日战争史》等等。1960 年周恩来访问尼泊尔之际，作者获得机会进行了所谓“独家”采访。他在 1984 年出版的《周恩来评传》第一章就以这次采访开始。本文选自书的结尾部分。出版者在扉页上说，周恩来“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的面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中国人。”

——编者]

人故去了，他的传奇于是乎诞生了。“四人帮”简直无法相信自己交了好运。最强大的对手，在半心半意支持他们的毛主席之前，先离开了人间。第一个战斗回合，就是如何处理遗体的问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使它消失掉吗？

“官方宣布，全国致哀六天。在当时情况下，六天是最起码的。这期间，一辆漆了蓝白色条纹的灵车，安放简朴的黑色灵柩，从医院开出来，经过北京的宽阔大道，后面只有几部轿车，坐着邓颖超和几位老同志。没有仪仗队，没有哀乐，只有肃穆的公民——据说有 150 万人之多——一传十，十传百，纷纷拥上街头来送别已故总理，气温已降到零下 12℃，寒风刺骨，在这个令人心情沉重的黄昏，人们黯然肃立在路旁，等候灵车经过。

垂挂着黑色和黄色长带的灵车，满载花圈，驶过天安门广场，沿着长安街，开向西山，到了夕阳已落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停了下来。

有谣言说，是政治局下令火葬的，不让周恩来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得到恰当的纪念，也许这是推翻他的政策的预兆。他的遗孀不得不从车里走下来，告诉人们是周恩来自己要求遗体火化的。没有宣布出殡日期，但是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带来了束束白纸做的菊花，表示传统的吊唁。向遗体告别仪式，只规定两天，也有一万宠幸的所谓“群众代表”被批准参加！（九个月后，为毛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规模就大不相同）。

周的骨灰盒送到故宫的大庙，在过去帝王祭祖的宠伟大殿里停放了三天。中外人士走进来，红和黄色的宽阔院落，登上石阶，在灵堂中安放的红漆雕刻的骨灰盒前，短时默哀。红漆雕刻的骨灰盒，用一面党旗覆盖着，后面挂了一幅周恩来 50 多岁时拍摄的肖像。

后来，骨灰盒被送到人民大会堂陈放。周毕生在那里工作过很长的时间。1 月 15 日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在会上对参加的官员及代表们宣读悼词，毛没有出席，这件事引人注意，虽然他曾经参加为陈毅和其他老同志举行的类似追悼仪式，并且在几周之前接见过十来位外宾。事后，他们都说他精神很不错。他还在这追悼会之后接见了理查德·尼克松，同他谈话长达两个小时。突然间，命令下来了，结束吊唁活动，并通知外宾不要搞悼念周恩来的仪式，“为了照顾毛主席的情绪”。

根据周恩来本人的意愿，骨灰最后撒在中国的大地、江河、湖泊——这是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解放出来的新做法。（就是台湾也没有被遗忘，部分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峡）。周自己特别嘱咐不要为他建立纪念碑。

邓小平在追悼会上宣读悼词，具有这样的意义：这是他销声匿迹前最后

一次重大公开活动，以后有好几年，他不露面。江青和她那四人帮有几次真想搞掉周恩来，但毛执意不肯，而对于邓小平，却没有什麼顾虑。关于搞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意见是，不管是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四人帮”的宣传机器立刻起劲地开动起来，他们说，在四个现代化的后面是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行动纲领。他们异口同声说，周是个“走资派”。但周的众多崇拜者在三四月间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悼念亲友时节到来之际，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显示了人心所向。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给已故总理一万多个花圈。党的宣传官员无可奈何地叫喊：“清明是鬼节啊。”说纪念死人是“过时的旧风俗”，不管怎么样，自己动手做的白色、红色、黄色的花圈，还是潮水般涌进广场。

广场里一首颂文这样说，“他没有遗产，他没有遗孤，他没有坟墓，他没有遗体。他的骨灰撒遍祖国的山河。他好象没有给我们留下什麼，但……他有千千万万的儿女后代，整个神州就是他的安身之处。”

霎时之间，纪念碑前花圈铺开盖地而来，堆放在纪念碑周围，达 50 英尺之高。在这次自发的纪念活动中，人们口诵或张贴诗词成千上万首，其中有如下几首：

千秋功绩耀寰宇，一代英名凌彩霞。  
遗恨艰难谁子负？烟波浩渺实堪嗟。

又如：

默默无私理江山，鞠躬尽瘁几十年。  
大功未成身先逝，留下遗恨多少言。  
松涛花潮万民祭，何惧风霜历循环。  
擎旗继来藐虫雀，愿尽势血送公眠。

又如：

九霄云上英灵在，岂容鬼魅染尘埃！  
魑魅魍魉难持久，日刀同辉君长在。  
青山处处埋忠骨，总理恩德撒四海。  
年年清明扫墓日。子孙万代祭恩来。

到了 4 月 5 日，激进分子受不了了。他们派人到广场捣毁花圈，用武力把这自发的纪念活动镇压下去。一时看来，是“四人帮”取得胜利了，但不是到处如此，因为出了一个以前比较鲜为人知的，从省领导层调上来的华国锋。毛既没有选中邓小平，也不要四人帮正在弹冠相庆的张春桥，而看中了华作为折衷的总理入选。到了下半年毛主席自己也从政治舞台消失时，温和派同右翼力量联合起来，把激进分子完全排除出去——从此在意气风发的邓小平强有力领导下和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下进行工作。

周逝世一周年时，成千上万的人捧着垂挂了黑边的总理肖像，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他誓表忠心，有的人高声呼喊：“周总理还活着！他就在我们中间！”



常常有人把周恩来说成是一个中产阶级才华出众的学生，因为偶然的机  
会，走进了马克思的营垒，后来就毕生孜孜不倦地给他的阶级同志们贯彻执  
行极端的政策，但是就权力而言，他从来没有威胁到他们的最高地位，因为  
他心理上感到自己不能单独管理一个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里，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因为他老于世故，又  
有西方城市人的风度，在某种程序上，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又甘愿退让几分，  
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虽然在举行秘密会议时也许不尽然。

但是，这个人整个面貌是比较复杂的，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寻找解答。  
这个时期，周的独特经历，可以部分地说明后来他在中国政坛上的独一无  
二的表现。棋对周恩来的活动，有人公开地讲他们的意见，英国汉学家詹姆士·  
麦克唐纳就此精辟地评论说，周的外交才干不仅仅是出于中国文化传统，“  
必有其他的由来——也许可以从他早年的生活得到答案。找到这些答案，我  
们就可以找到周自我克制的根源……以及他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理由”。

象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周是一个大家庭教养出来的。在这种环境里，他  
和他的双亲只不过构成一个小单位，因此，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大家相互  
支持，有足够的力量使人人有集体安全感。出了什么事情，总有人伸手援助。  
可是，在家庭的保护下，周却遭遇悲痛的损失和感到被摒弃，首先是生身父  
母在他不到一岁时就让他过继给叔父。他还没有机会承欢膝下，养父就去世  
了。到10岁时，生母和养母在短短的时间里也先后辞世了。由于中国家庭结  
构的庇护性质，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强行解释这一切，可能是不智  
的，然而，似乎明显得很，周在幼年时期一定对缺乏一个亲自关心自己的父  
辈人物，引为莫大的憾事。他可能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代感到愤恨，进一步  
这样猜想也未尝不可，特别对由于时乖命蹇，生父对他的教养没有负起什么  
责任（在两位父亲，两位母亲中对他关怀最不够的一个），而一直活到儿子  
已成年工作时，还在向他索要这要那，给他找麻烦。后来因性格的各种表现，  
如过于爱好整齐，过于勤俭节约，过于敏感激动，加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  
工作——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青年时期，周就成为一位爱国者和激进分子，善于调动别人为他的目的  
服务。有一次，他说：“你交朋友，为的是孤立你的敌人。”为了革命，一  
个要随时准备“干‘最低贱的勾当’”。虽然在中国以及在国外，他都以为  
人正直而享有盛名，可是同其他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国家权宜之计，他  
也会采用虚伪手法。例如：调整一下证据，显得50年代在中国领空击落的  
美国飞行员是在搞间谍活动，又例如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他把尼赫鲁引入歧  
途。尽管如此，按他的同志们的标准衡量，他是少有的正直的人。

激进和爱国的周恩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学说心悦诚服，认为这  
是改造社会最新颖最时髦的学说。周对于外部世界，一直是求知心切，比  
毛或其他中共同事们强烈得多。鲁西恩·派艾教授指出，“他在国外居住  
的时间，比他政治局所有同事们在国外停留的时间加起来还要长。”

周小时候，开明的养母，请来一位西方人教家馆。他在学校读书，吸收  
了西方的政治学说，还有意识地就读于受西方影响的中学和大学。他被西方  
思潮中最新滚派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住了，那是毫不奇怪的。周认为积弱如  
中国只有最好的良药才能拯救它。

周的一生不断从西方得到好处。他是在张伯苓博士得到西方协助的中学  
受教育的，后来又去日本、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苏联喝洋水。不仅如此，

他在紧急情况下，还曾利用西方在中国领土上享有治外法权的弹丸之地，来躲避敌人的耳目。最初在 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就利用丈母娘在天津法租界的房子召集学生会议，八年之后，他又在这位喜欢法国的丈母娘在上海法租界的家，策划革命活动；1938 年他在武汉吴德施主教家避过难，后来在南昌起义之后，短期利用过在英国国旗庇护下的香港。如果没有这种为了东山再起而循入帝国主义管理的的地方，就没有周恩来传记可写了。

再其次，就是周曾依靠过俄国人，例如：通过第三国际，他得到进行南昌起义的援助。作为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人，南昌起义是他生涯的一个高峰，他的无比的决心，留下自己的特征。就短期而言，南昌起义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加速了共产党起义活动而最后取得成功的进程。在周的悠长政治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居于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别人也这样看待他。

甚至在南昌起义之前，他曾经一再拒绝接受中共首要领导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听从陈独秀继任总书记，而没有同批评陈的入联合起来。使熟悉他的朋友们至为诧异，一年之后，他支持李立三，到了 1930 年，他没有参与批判李立三，改而支持诗人瞿秋白当领导。后来王明上台了。周在 1931 年支持他，可是实际上在幕后把持党的路线方向。甚至在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些人要选他当主席。位居毛泽东之上，他却拒绝了。实际上，正如在 30 年代他没有挺身而出，约束李立三的过左行动，致使资格比他浅的同志感到不快，在 60 年代，对于毛，又产生相同的情况。就后者而言，他可以托辞没有这样的权力，但就前者而言，确还有别的原因——心理上他总觉得难于向上级正式领导提意见，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法。

周恩来对自己的估计，是生来就是搞行政工作的材料，而不是在形式上充当人民最高权力代表。他有很好的机会看到后者的任期长久不了（在 1927 年到 1931 年期间、四年之内中共更换了 4 个领导者）。他是一个乐于夜以继日工作的人，他宁可用所有时间做有益于人的工作，而下愿做那种势必要整天勾心斗角的最高领导人。

在 1935 年遵义会议上，他作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毛的上司和批评者，变成毛的下属和支持者。这种不寻常的合作关系，后来决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整个活动范围和进程，而这些表现早就有苗头了。周在 1930 年底发生的“富田”事件（？）所持的态度，以及 1932 年宁都会会议上提出对毛的批评，表明他从来对毛提意见总是温和有节的。此外，他还找机会对毛表示赞扬，而不象有些恶狠狠的人对毛的批评，总带有报复性味道。因此，毛有理由对周的公平灵活态度表示感激，而后来毛也这样如实讲过。（作者似有误，如果指的是“古田”会议，那年代是 1929 年。如果 J 卜旁是福建事变，那年代是 1933 年。原文“Futian，’，或错了第一个字母，或错了第三个字母，错了第一个字母，可变成“Gutian”即古田；错了第三个字母，则可变成“pujian”，即福建。姑存疑，——编者）

遵义会议急需解决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很明显，毛的游击战争思想，在当时战争情况下，要比周的传统战争做法合适得多。但是在游击战的作法一旦完成了任务之后，或者情况使党进入一个比较愉快，或者更加正讷·的局面之后；周完全可以把毛抛仵的。长征后期到了四川省，张国轰的队伍同主力红军会师，就提供这种机会。然而，周最后还是支持毛，反对张。第二个选择的机会是 1943—1945 年，在延安进行整风运动，当时王明再次要争夺领

导权，然而，周却下支持他。张国焘和王明在早年是周的合作者。毛在中共权力圈子里又从来显得是个土里上气的人物，按周的气质和风度，他会觉得这样一个人不顺眼，甚至可笑...—但是，周还是对毛忠心耿耿。长征以后的这种情况，需要加以解释。经过一段勉强在一起的合作后，毛本身的权威以及他的令人信服的号召力，很可能给周以深刻的印象。

共产党人自从第一次在上海和南昌举行城市起义以来，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周亲身体会到中国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以及为什么农村革命比城市革命更重要，更加可取。没有比毛更适合的领袖来领导这场革命了。此外，周也可能认为，在政策和党的工作许多方面，毛比其他人成见少些。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就相辅相成，别的同志也看到遵义会议后，周让出了权力，在长征后期的各个阶段甘当毛的助手指挥军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要应付来自刘少奇和林彪方面对毛泽东最高权力的威胁。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副手，一生经历有起有落。周从一开始就是毛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支持毛反对刘，例如：1948年，在西柏坡研究是否继续对国民党作战，举行关键性表决时，周就和毛站在一边。1957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0年代后期关于文化大革命，他支持毛反对刘。在70年代他支持毛反对林彪。只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周反对毛的做法，直接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对大跃进方针在经济方面的不明智，持有如此强烈的意见，于是，一反常态，从各个方面组织反对力量，使大家协调起来，以致毛不得不让步。

但这伙伴关系，几经沧桑，还是保存了下来。事后诸葛亮，可以从中找出几条不成文的规律。其中之一，就是周同毛个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好，他只需要同毛的追随者搞好关系就行了。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以及1967年的文化革命中，周就遇到一些困难，基于同样的理由，显然周有权利，实际上有义务，防止毛退化成一尊神，由追随者中的压力集团顶礼膜拜操纵起来，事实俱在，周经常告诫党内年轻一代，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让毛，或毛的神话或形象取代应由他们每个人自愿履行的决策责任，这种劝告事例真是多不胜数。

当毛被奉若神明的时候，特别是如在1943—1944年整风期间，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这种劝告很容易被误解，给周招来敌人。

还有一条规律，那就是尽管周同毛会热烈争论，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同毛持相反意见，他从来不搞反对毛的非组织活动。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周从来没有自己的帮派，虽然他拥有为数众多，不是组织起来的追随者，必要时为了某一个特殊的目的而把他们鼓动起来，象1958年在武汉就是如此。有许许多多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是拥护周的，但这不是什么旧式的拜把兄弟的关系，而是出自对周的敬仰和感激之情，报答过去对他们的教育，指导和提拔。这种情况一直可以追溯到在巴黎的年代，那时，中国的留学生中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几乎都受到过周恩来的影响——他们后来在中国政府和部队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包括象邓小平和由周介绍入党的朱德。

此外；虽然周从来没有在战场上统率过一个军，可是在黄埔军校教过红军的大部分将领，在后来的年代又领导过他们，并给他们传授了军事理论，因此，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他从来不可缺少一个能为他效劳的部队朋友。在60年代后期，当个人的安危受到林彪的威胁时，他的这些同情者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这些部队朋友，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不管在任何问题上，或在任

何情况下都支持他人。他从来只要求他们凭自己的良心做事，而这在一个充满各种权力派别的党内，对毛泽东说来是很重要的。

周可以表明自己没有推翻毛的野心，他没有结成任何集团，他没有出版过什么“文选”（他去世后出版的选集是不引人注意，不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他一贯在公开场合称颂毛的为人与领导。埃德加·斯诺说他们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而阿兰·裴勒菲特说毛是圣灵，通过作为“罗马教宗的周恩来”行事。

所有在中共领导层中，曾经地位高过毛的人，只有周一人继续留在毛的圈子里一直保存自己的地位，要说毛信任周，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多少年来，他们越来越感到彼此在求于对方。周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活力，必须由熟悉农民生活和思想的农村领导人来提供。至于毛那方面呢，也需要一个能代表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说话的外交家。周不吹捧毛，但是对他性格的中间地带，能投其所好。毛为人一方面不信任阿谀奉承之徒，另一方面对可能出卖他的人又存有戒心。周能够巧妙地给他解除这些不安全感，而毛却为周提供了周孩提时代可能求之不得的一位坚如磐石、说一不二的父辈人物。

到头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承受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种种压力。周在中国政坛中的作法有极大的透明度，他做什么都清清楚楚地为着党的利益，而不是为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某一个人，所以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免遭批判，这就使他能经历了那场浩劫而幸存下来。陈伯达说过：“说周恩来的坏话，没人相信。甚至那位老人家也不会相信。”陈应该是了解情况的。

周同毛能不拘礼节。一个法国人回忆有一次会见毛，周就坐在旁边，随便翻阅报刊，显然没注意谈话的经过。这位外宾评论说，“不能想象有什么人坐在戴高乐旁边敢看新闻报纸。”

对周推崇倍至的背后，毛可也能嫉妒，羡慕周高人一等的本领，风度和知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缺乏涵养，不去参加周的追悼会。毛需要周，使用他，也欣赏他，后来甚至渐渐不感到周对他有什么威胁，但是毛从来也许并不喜欢周。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他可能觉得可以不做自己不真正喜欢，或者对他风烛残年无所裨益的事情。这仅仅是一种臆测，能是江青干的，是她设法不让毛参加，因为她有她的种种借口要这样做。

周恩来从来不犯这种错误：把政策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或者使自己站到反对派立场，或者使自己丢官受辱，而其实只要承认“错误”就能保住乌纱帽，也可能他有自我贬低的毛病，就是不向高处估计自己，因而他总是以改善他人的工作生活为己任。他讲的道理是，自己个人的成就无关宏旨，他又善于调动鼓励别人为他的理想服务。正如詹姆士·麦克康纳说过的，周有两个角色扮演得胜过别人，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而两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于此可以联系到周的行政工作这一方面，他有时喜欢做这种工作，而同时代的中国男子汉，却感觉迟钝地称之为“女人干的”工作”。

孩提时代的周恩来遭到过摒弃，也许这也使得他同情社会上居于少数地位的人，并且能同他们打成一片。引人注意的是他经常在这些少数人中找到朋友——如回民马骏，如基督徒张伯苓博士（都属南开中学的），以及在武汉传教的美国罗根、吴德施主教。没有第二个中共领导人象周恩来那样有那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朋友。而周同各国人士结交以及了解他们的文化的能力确是十分出众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说明，在谈到共产党要加速解决社会问题本身带来的

残酷手段时，周会显得手软或温和。早在 1931 年，在上海黑社会杀人不眨眼的这个大城市里，周就曾表明为了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对执行冷酷无情的死刑负起责任。在后来的年代里，达赖喇嘛发现周比毛更难对付。周的众多崇拜者仰慕他处世为人的礼貌和表现的现代化思想，因而对他负有领导责任的秘密公安工作以及庞大官僚机构的过火行为，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周对共产党的政策从不打折扣，除非政治局表示同意这样做，例如：在执行统战工作的几个时期——以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认可。

周确实有时候同毛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一致，如关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时机及先后问题——周有时想迅速一些，而毛却主张放慢些，或者是反过来也一样，分歧仅仅是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速度，而不是对共产主义本身有什么意见，对这个问题两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毛是个英明但又会犯错误的航海家，那么周就是个有耐心的水手长，他保证轮机正常运转，水手们各司其位，船上的饮食不断得到补充。

1964 年 11 月在一次讲话中，周恩来提到“不破不立”，预示混乱局面的到来，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衡量，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温和派”。后来，他有几次重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他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至关重要的宗旨。1965 年 4 月，他就向全国号召过，起来“粉碎资产阶级思想”，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是郑重其事的，甚至比毛还认真。比起来毛来，他在红卫兵身上花更多的精力，使他们的行动不越出轨道，按预定的目标前进。他无非希望红卫兵不要损害整个运动。

周顶撞毛时，比如在大跃进的 1958 年他反对的不是旨在增加生产的运动，而是由于相信这样搞法，会把政治资本放在毫无实现希望的指标上，并且过于仓促从事，会损害运动本身，周有理想，也讲实际，两者水乳交融，变化多端，但是会使两者各得其所。

理想主义意味着乐观主义，周是人，自然也会犯过于自信的错误，特别是在血气方刚的年代。在黄埔军校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意图是什么样，他显得过于乐观。1926 年关于中山舰事件，以及 1927 年的上海起义都措手不及，可以归结到同一个缺点，虽然我们足够的材料可以断定情况确实是如此。但是后来还是有许多例子足够说明他对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作了错误的判断。再举蒋介石这个例子，周在 1937 年（应为 1936 年——编者），西安事变中就对蒋作了错误的判断。

周想在 1946 年到美国去访问罗斯福（罗斯福总统 1945 年去世，作者有误——编者），但是这件事情没弄好。在 50 年代（应为 60 年代初——编者）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他也把尼赫鲁估计错了。再举一例加以说明，由于过于乐观之故，1957 年他拥护双百方针，没想到刘少奇和其他党员干部决不同意让非党人士攻击党的组织，在外交领域里，他过于乐观，认为安东尼·艾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编者）能够在金门危机及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上对杜勒斯施加影响，然而，他同时感到悲观，相信美国有进攻中国的可能。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可以用暗淡的色彩描绘一下，他牢牢抓住的意识形态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是不适用的。他把自己放在从属的地位，听从一连串共产党首脑的指挥。而这些人能力如何，往往值得怀疑。他甚至表现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如经济发展，已经选定的原则，同他的第一流贯彻能力配合起来，也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他在 40 年代已经认识到，除非等到千百万人民大众真正受到教育，改变自己的信念，决定走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共

产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他担任这个庞大国家的政府首脑之后，他感到对共产主义的各个目标，非同时齐头并进不可。

不过这可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周不能贯彻初衷，不能在有生之年真正把中国带进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使中国人民生活显而易见地改善，取得更高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水平，严格他说：这不是他的过错、毋宁说事情本身实在无法办到。在这样疆土辽阔，基础又那么差的国家要取得巨大进展，无论谁都会碰钉子的。然而周恩来不是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或者对不可避免的挫折吵吵嚷嚷，而是毅然守住阵脚，在共产党中国提供唯一的一支巨大力量，保证改革的方案进行下去。周是主张继续不断地进行改革，他不象刘少奇那样固执地扳着面孔行事，而从来总是高高兴兴，很民主地鼓动大家团结起来，帮助做好工作。

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卸任，以及邓的接班人一个一个接过工作又一个一个交班的时候，人们将首先缅怀周恩来的工作和为人，其次才是毛泽东或者任何其他人在这方面的成绩。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毛泽东有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之称，又兼两个角色于一身，但现在要加以贬低了，那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做法，即在周恩来死后把无可非议的“列宁角色”的谥号加在他头上——虽然他对党的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列宁是大不相同的。他去世后的几年，中国人民佩戴的周恩来纪念章，多于毛泽东或其他的纪念章。周恩来的中国，是一个很近人情，耐心细致，靠自力更生的中国。毛泽东则主张以巨大飞跃的步伐前进，往往使中国人最后倒退回来，在原地踏步。通宵达旦，连着几个星期大炼低质量、毫无用处的钢铁，或冲进市政府的办公室，威吓、侮辱、拷打一些干部，这些也许是令人兴奋得意的举动。但是到头来，这种活动不能产生值得称道的进步，更不能说能带来太平盛世。这样一比，周的不怎么令人兴奋但合乎情理的渐进主义就吸引人了。

周推销共产主义不短斤缺两。反而是毛泽东和与他持相同意见的人逾越正轨，在目的与手段之间丧失了平衡，违反自然规律，急功好利。他们妙想天开，以为引发人的恶性一面，就反过来导致人的善性一面。这不是共产主义，这是伟大狂的幼稚病，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这些人只是提供了他提供不了的政治领导而已。周恩来具有拿破仑式人物的丰富改革才华，兼有梅特涅式人物的政治坚韧性。

周恩来忠于自己的信仰，同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信守人情之道，并无二致。这就是他有别于本世纪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固然他确实没有了解尼赫鲁，正如同他没有了解赫鲁晓夫或柯西金一样，西方世界犯这样毛病的人，也不乏其例。因此，不必多所指摘。周恩来同外国交往，偶尔露出固有的沙文主义苗头，但这同他地位差不多的同僚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他了解外部世界见闻之广，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西方人在周恩来身上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可能：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同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文化上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进行合作。凡是同周恩来见过面的人，分手之后一定会感到将来同中国在一个单一国际社会合作的信心增强了。他给所有想法跟他相同的人留下两个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是在中国进行现代化，二是引导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负责的角色。就此而言，我们对周恩来选择的人生道路满怀感激，对他遗留下的中国存有希望。

[英]狄克·威尔斯

## 第一流交谊舞家

[美国有六个“两大”，都是影响舆论的组织。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大电视网：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两大电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两大民意测验系统：盖洛普和哈里斯；两大新闻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后者为《华盛顿邮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所拥有，发行量每周三百多万份，仅次于《时代》周刊，政治上倾向于民主党。——编者]

周恩来跳舞时有一种外交家的风度。他跳起华尔兹舞来简直完美之至——只是有时显得过分拘束一点。同他跳完一次舞之后，也许你愿意同俄国外科医生奥洛夫跳一次（当时延安有三个苏联人，奥洛夫是其中之一——编者），他是按哥萨克风格不断地顿脚的。可是你总想回到周恩来身边来的，这位数一数二的交谊舞家是那么节奏分明，那么潇洒自如。

——（已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即使在40年代后期，当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毛泽东领导的那一群俭朴的革命者时，周恩来就已经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人物了。当时，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人物——一个医治政治创伤的人，一个对外的中共发言人，马克思主义浪漫派中的一个务实主义者，那时候，他在共产党内的党龄和毛泽东一样，而他任政治局委员的时间比毛主席还长。自从共产党在22年前执政以来，周恩来担任过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只有一个重大的例外——他从未担任过国家元首。可是在上星期，这位长期在元首宝座后面掌权的人显然将成为一个日常掌管中国命运的人了。

当然，毛主义仍然是中国的非正式的信仰。但是近来中国人把毛主义看成例行公事了，而且那本著名的“小红书”也已渐渐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虽然研究中国专家们都认为周对于毛并不构成什么威胁，他们指出毛已经到他的杭州西湖别墅或在北京官邪闭门写作，全神贯注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操心，不再过问日常事务了。一位美国的资深分析家说：也许毛还是中国唯一的重要的人物。可是中国人的做法是要意见一致，我估计重大的决定是由毛和他的名义上的第二把手国防部长林彪，同周恩来一起作出的，再加上处于中心地位的军队的强大影响。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三头政治，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们相信，军队的压力以及毛自己对国内创伤的估计，促使他把管理政府的大权移交给周恩来。兰德研究中心的学者汤姆斯·罗宾逊写道：“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时势总是向毛泽东有所报应，那就是说，他所作的计划和所用的方法遇到阻力，而且至少在短时期内是不可克服的……就在这种关头，毛似乎总找周恩来收拾残局，那种残局是他自己过份高涨的革命狂热所造成的。”

最近这一次毛找周来并不是什么突然的发展。其实，这是由于毛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混乱之后，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已经令人痛心削弱的。因此，也象过去那样，毛认定改弦易辙的时机已成熟，应该摈弃那种急于现代化的冒进试验了。而周恩来正是为这种改变发出信号，并现身说法的理想人物。

权力：虽然72岁的周恩来从来没有掌握过象现在这么大的个人权力，但他在国家大事的方向问题上发挥重要影响，这可不是第一次。周出身富有的

家庭，按照中国问题专家埃德加·斯诺的话说：他是受儒教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得志而转变成激进派的。作为一个巴黎读书的 23 岁的学生，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回到中国后，他和毛泽东都热衷于领导这个羽毛初半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段时期，周是党内的军事方面最高的领导人，他和毛一起参加了现在闻名于世的长征——那次历时 12 个月、行程六千英里的行军是在国民党军队围攻时撤退出来的。由于毛领导了这次史诗般的大行军，他成了共产党的无可非议的领袖，而周恩来却由于看到在长征中人员的巨大牺牲（损失了出发时兵力的 90%），他的头脑清醒起来，他的工作由军事转到外交。

确实，他成了中国的才能卓越的外交家，而且自从人民共和国在 1949 年成立以后一直担任着总理职务。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并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全国较稳健的干部和军官中建立了权力基础，因而在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那样的动乱中，他能够岿然不动。真的，他这些年来适应能力之强，使人们有时候（背地里）称他为“不倒翁”。

忙碌：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周就象大多数经受过身体上和政治上的磨难的人一样，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大家称他是“北京最忙的人”，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政治局所在的中南海办公楼里或者在房子不大的家里从拂晓一直工作到午夜以后，和毛泽东不同，他从来不吸烟（尽管他有个奇怪的习惯，有时候手上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很少喝酒，并且把应酬看成是一种完成工作目的的手段。当年曾经是朝气（蓬勃的漂亮青年，如今他那军人特有的硬朗腰板儿和锐利炽热的眼神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周恩来的仪表堂堂，再加上他那比较深沉的声音（不象毛泽东和林彪那样）以及无懈可击的雄辩之才，真是相得益彰了。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具有超人魅力的领袖人才，“周是很难抗拒的，”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说，“他机智、有魅力，并且老练。他可以看着你，而这么一看，就把你争取过去了。”

这种说法也可以作为对周恩来的政治作风的恰当描绘。几乎完全凭他自己人格的力量，他巧妙地在中国最重要的人群中赢得了大批信服跟随他的人。军队喜欢他，把他视为安定团结的象征；政府干部们喜欢他，他曾使他们平反复职；人民喜欢他，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剧院和报社去视察，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差不多就象美国政客为了竞选到各地去演说似的。结果，一位研究中国的老手曾说：“周可能是中国当今最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人民尊敬毛，但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民大堂里的崇高的皇帝；他们却把周当作他们自己中间的一个。”

红卫兵：在文化革命期间，群众对他的爱戴真是帮了他的忙。那时候，毛的妻子江青领导下的横冲直撞的红卫兵和其他好斗分子威胁要砸烂周艰苦建造起来的体制，当他发现跟他们顶撞显然没有用时，他就巧妙地顺水推舟，让这些造反派自己闹得精疲力尽，他相信最后护旧力量总会反戈一击的。他运用自己谈判的才能使他的对手晕头转向，从而和他们达成谅解妥协，以保全他的支持者的面子和职务，并继续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的成就决不仅仅是保住了他自己的个人权力，这些成就使他能够证明中国无力施行毛的不断革命的政策——尤其是当中苏边界争端有可能升级为真正战争的对峙。这种危险，再加上日本实力日益增强，而美国则公开宣布要从亚洲撤退大部分军队，这一切使周恩来相信，中国必须重新实行比较活跃的外交。一位汉学家评论说：“中国人突然醒悟到亚洲



局势已经改变。他们必须能离间俄国人同日本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同美国的关系。而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上述三个国家以及许多较小的国家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成就：可是假如说中国的门户现在是部分地开放了，那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缘故，某些方面的成就也起了作用的。首先是中国已经从文化革命中喘过气来。虽然它在收入百分比数字上无法同新加坡或台湾等相比——更不用提日本了——但是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它的石油生产已能自给，去年的粮食总产量已达24000万吨，大大超过了前一次发表的1957年所创的18千万吨的纪录，它的棉花和棉产品产量是世界最高的。事实上，正如埃德加·斯诺访问北京后，上个月报告的那样：“使人很想给中国定出一个假想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字，要与一般人想象的较大的西欧国家的总产值数字接近得多。”

就这样，需要和机会相结合，使周恩来有机会能让中国同外界发生比较密切的接触。可是中国的这种新情况，虽然令人感到鼓舞，却不应当看成是完全解冻。周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有决心要解决问题。但他也是一位很忠诚坚强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另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说：“把周的灵活性解释为友谊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错误。他尽管可以象现在这样笑容满面，但是他根本上仍然是西方的死敌。”

不过，中国态度上的任何软化，在西方人眼中必须看成是值得欢迎的事情——情况大不相同于若干年前，当时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讽刺漫画的对象。而周恩来地位的提高——据广泛推测，在今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将接受一个把国家主席和总理的职务结合起来的职位——这就意味着，自从共产党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将能够首次同一位把革命热情与最古老的政治美德——务实主义两者平衡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了。

[美]《新闻周刊》  
(1971年4月26日)

## 鼎鼎大名造反者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作家、新闻记者。他的成名之作《西行漫记》于1937年问世，立即轰动世界书坛，成为所有想了解中国革命摇篮延安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风云人物必读的书。《西行漫记》再版多次，并译成各国文字。1944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称此书为“经典之作”。斯诺在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之后，于1932年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北平燕京大学教书，在白色恐怖年代曾掩护过进步学生。斯诺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70年代初对中美邦交的恢复，有穿针引线的贡献。本书选自《西行漫记》第二部分一节——编者]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

“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

他是用英语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住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粗粮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土豆。可是象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小伙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往下垂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小青年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个小伙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仆人。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那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大胆地看着我。“没什么，”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小家伙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窑洞，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

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地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的朱德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90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92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的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象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

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得到更多的了解。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象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1911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时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1919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一年（应为数日偏者）监牢。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1924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中山汇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周恩来26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当了加伦将军的亲信。那位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后来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1925年、1926、1927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28岁的青年，并未受到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有活动经验（他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同工人阶级素无接触），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是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共产党在三个月之内组织了60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

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二千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装力量。

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69万名工人派到进行革命的堡垒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京，从获胜的工人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府，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后来被监禁在南京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会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周恩来估计“上海大屠杀”死了五千人。他自己被蒋介石的第二师白崇禧将军（后来广西人的统治者）下令处决，但是师长的弟弟，曾经是周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帮助他逃脱虎口。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1931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的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括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他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象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象神气活现的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

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象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象个小姑娘。

[美]埃德加·斯诺

（根据北京三联书店 1980 年 1 月出版的《西行漫记》译文）

## 书香门第革命家

[理是德·尼克松，191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开国以来第37任总统，在连任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因“水11事件”恐遭国会弹劾，1974年8月被迫辞职。尼克松是美国共和党的著名人物，在60年代末曾在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长篇文章，示意同中国恢复关系，以结束朝鲜战争以来的两国对峙局面，北京方面也在1971年发动了“乒乓外交”。结果，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初对华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会谈，最后签署了“上海公报”，结束了他称之为“改变世界形势的一周”的访问。尼克松下野后，写过回忆录及1972年出版的《领导者》综合性传记一书。本文选自书中的第七节——编者]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打败了蒋家军队，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毛自视为2000多年前统一中国秦始皇帝的当代化身。他搞个人崇拜，被奉若神明。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不象毛那样过分自我尊大，他维护自己的威严，努力使经济起飞，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

三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我把他和蒋夫人看作朋友，不同于另外两人，我们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而在两人中，周的远见卓识更具有坚韧的耐久力。实际上，在我认识的人中，周是得天独厚的人，对权力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

1972年，我首次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曾派亨利·基辛格秘密到北京去，同洽谈如何安排此事。基辛格第一次暗地去中国，在北京停留了仅仅两天，却用了17个多小时周恩来直接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回来之后他向我汇报，说在他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相上下。

我们这些人有时候爱说一些过头的话，基辛格却很少在背后象这样地夸赞过人家。我同周见面，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基辛格对周的评价是如此异乎寻常地赞美有加。

1972年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我在最后一次祝酒时说：“我们到这里来已经一周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有些观察家感到这次戏剧性的访问，使我有点飘飘然，过高估计了它的重要意义。我则坚信历史会证明，如果没有采取这第一步，促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今天同苏联的力量对比很可能产生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影晌。人的因素和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外交上的突破，这体现于1972年的上海公报。首功应该归于一个人，就是周恩来。

周既是一个信仰中共主义的革命者，又是一个儒家君子，既是始终不渝的思想家，又是会权衡利害的现实主义者，既是内部政治斗争的能手，又是善得人心的和事佬，能力略逊一筹的人，如果担任这种错综复杂的角色，思想和行动上都会不知所措。而周对任何一个角色都能胜任愉快，或融会贯通好几个角色，而丝毫不会显得优柔寡断或前后矛盾。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在适当时机装模作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性格复杂，思想深邃

的人多方面的表现，也足以很好他说明他的政治生涯之所以能如此之长久和丰富多彩的原因。

作为一个刚毅无情的共产党思想家，他会抓住历史上任何时机加以利用，忍受政治上的挫折以及生活方面的艰难困苦。作为一个儒家君子，他的品德才干使他善于待人接物，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敬爱领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精明机智，善于对国内政治及国际外交的潜在力量作出准确的估计。他是内部斗争的能手，他的不露声色的行动，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后持续不变，一直延续到毛泽东以后的年代。他是一位杰出的和事佬，老成练达，彬彬有礼。一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在处处阴谋策动国家的分裂，而他知道怎么样维护国家的统一。

所有这些品德交错产生作用，使周恩来登上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而且他的政绩比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更为长久。

周恩来与众不同的为人，是我1972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最深刻难忘的印象之一。我同他举行很多小时的大型会议，又在非正式的场合见面，因之我很了解他，也十分尊敬他。“恩来”两个字，是“恩泽来临”之意，这个名字言简意赅地表现出他的风度及为人之道。他平易近人，却于无声处表现坚强，他举止温文尔雅，体态挺直而自如，显得既沉着又吸引人。在人与人之间和在政治关系上，他忠实地遵循中国一句格言，那就是从“不为己甚”。

周的外表，给我的印象是：对人热情，光明磊落，泰然自若，十分认真。在双方举行全体会议时，他有意显得矜持。他身穿裁剪台身的、整洁的灰色中山装，上边口袋外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静静地坐在会议桌我的对面。他稍向前倾斜，把紧握着的双手放在桌上，他的右臂显然不甚利落，那是长征路上（应为在延安——编者）跌伤遗留下的永久标志。他73岁了，往后梳的黑发，两鬓稍显银丝。他头发梳成一道波纹，不是中国人典型的发式，正如他的微黑的肤色，几乎象地中海中东人的肤色，不同于一般中国人。

在正式会议期间，他那雕塑似的外表不露声色。他听人发言时，头稍稍向旁倾侧，凝视我的双眼。有一次基辛格把周比作眼镜蛇，不声不响在突窥伺方向，适当的时机一到就猛然出击。我们常常引用形容19世纪伟大爱尔兰爱国者查尔斯·帕内尔那句话——他是冰冠下一座火山，此话同样适用于周恩来。

周好象不要等他的翻译把话译成中文就明白我的讲话了。这也不奇怪，他本来能大致上懂英文，也懂一些法文、德文、俄文和日文。有时候，他甚至会纠正他的翻译，以便能更正确地表达他讲话的细微涵义。他讲话不用提纲，也很少要助手参加讨论。他说话层次分明，逻辑性强，令人信服。为了加重说话的分量，他会压低嗓子，稍点点头来强调语气。

虽然由于体格瘦削而显得虚弱，实际上周精力旺盛，胜过不少比他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负担极期沉重——当时他既是政府总理又是外交部长——据说他起早贪黑长时间干到深夜，他经常在凌晨接见外宾，同他们一谈就谈到旭日东升，而他总象工作开始一样仍然是精神饱满、思想敏锐。

通过比较随便的大小宴会，参观游览，我们之间认识加深了，周的姿态不象以前那么拘束，面部表情也活跃起来。他经常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挥动他富于表情的双手，有时用一只手臂横扫一下，以强调一句话。或者作概括，两手一合，把他的论点梳成辫子，作出他的结论。在正式会场上对一些



俏皮话的莞尔一笑，此时就让位于社交场合的无拘无束的谈话，大家随随便便的，有时又会开怀大笑起来。欢乐使他的双眸闪闪发光。他大笑时，脸上的皱纹加深了，表明他从心底里感到惬意。

举行国宴时，周和我都用茅台而不用香槟，互相敬酒。按照我们的传统，在这种场合，大家喝的是香槟酒。茅台是用粮食酿成 60 多度的烈性酒。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喝过量的茅台酒，饭后点枝香烟，就会自我爆炸。有一次周划了一根火柴，放在酒杯里，来证明它的易燃性，那酒杯里的茅台立刻变成熊熊之火。

我们在宴会厅里到另外几张桌子去敬酒，同 50 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我注意到周小心翼翼地举杯向人敬酒，但仅仅让酒杯碰碰嘴唇而已。我们酒过数巡，回到桌子时，杯子里的酒几乎是原封未动，于是我们一饮而尽。茅台酒性是如此之烈，我大为惊奇。周说在长征路上他曾在有特殊意义的场合，一天喝过 25 杯之多。后来岁数大了，他限制自己不超过两三杯。记得我在什么地方看过一篇报道，说红军在长征途中开进这酒的产地茅台村，官兵把整个村子的茅台酒喝得一干二净，点滴不留。周有声有色同我讲起这件事时，象个江湖卖膏药的商贩，眼睛闪亮，说在长征路上茅台酒“能治百病”。

我们纵论政治、历史、哲学，范围很广，周完全在行。他是一位学者，后来成为社会的反叛者，可是从来没有丧失学者的锐利目光和深邃思想。他分门别类的意识形态，有时左右他的思维，导致他对历史事件的误解。比如说，在交谈时，他把在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中同殖民者并肩作战的法国军队说成是“志愿军”，实际上，除了个别人，如拉法那特将军外，这些法军是一支为了反对英国军队这个政治目标而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

此外，周还曾对我说，林肯进行内战是为了解放黑奴，取得内战胜利，是因为“人民”支持他。实际上，林肯确是屈指可数的真正历史巨人，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敬意提到他，但这位伟大人物进行战争不是为了解放黑奴，而是要把分离出去的南方各州拉回合众国。他的解放宣言是个策略行动，目的仅在反叛的各州解除对奴隶的束缚，而不适用于留在联邦内各州的奴隶。林肯坚决不动摇地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的首先职责是保卫联邦。尽管周是个忠心耿耿的革命家，他在古老的北京城内那些辉煌宫殿里一点也不显得同周围环境不协调。他工作生活其间。恬静自如堪与历朝圣贤相比，凡是在这里会见过他的人，谁也没想到他会是以征服世界，变革文化，改造人性为己任的政治运动领袖。奇怪的是中南海里的装饰，还是尊重中国历史的。宫殿式的办公室有各种摆饰和华丽珍贵的中国山水画，也有古代金、银、玉器等文物。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声嘶力竭的宣传标语，在这里连个影子也没有。

艺术品和装饰的精妙安排，同周恩来的为人以及处理国家事务的才干相得益彰。在我会晤过的世界领袖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能望其项背。这是独特的中国人性格，由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千锤百炼得来的。在我们谈话时就显露出来，周会小心地把字句的细微不同的涵义区别开来；在正式谈判时是如此，他会迂回绕过有争论的各点；在外交场合还是如此，他有时会通过似乎微不足道的琐事，传递意义重大的信息。

周以及同我谈过话的中共领导人，都特别喜欢向我提到乒乓球队的互相访问，导致了我国两国关系的突破。他们欣赏这个结果，也差不多同样欣赏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方法。例如，毛就说过。中国曾经坚持先解决所有

重大问题，然后再谈改善关系，这是“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后来我觉得你们是对的，于是我们就打起乒乓球来了。”

周还有一种罕见的本领，他注意细微末节，又不身陷其中。在我们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主人要邀请我们去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突然下起雪来，而本来第二天要安排我们去游览万里长城的。周离开他的座位一会儿，我以为他去洗手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安排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这条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干干净净。这是一件典型的事情。

我发现是周自己亲自召集挑选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的。他们表现矫健，高高的个子，衣饰整齐划一，队伍无可挑剔。晚上宴会乐队演奏的曲子，都是他精心选择的。我知道他对我的背景作了一番研究，因为他选了许多我喜欢的曲子，包括《美丽的阿美利加》就是我就职总统时演奏的那首歌曲。我们结束这次访问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他正要同周举行会谈，一位姑娘进来，递给他第二天报纸的大样，他就着手处理头版的版面。

就周恩来而言，有句谚语确有几分道理：传大出自平时注意细节的积累。然而他呈事必躬亲，却从来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周还具有明显的中国人特点，那是由于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享有几千年的文化优越感，因而对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可是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是得失参半的。

一方面，两个世纪以来，国家积弱，蒙受耻辱，对于在外交上遇到的侮辱，自然非常敏感，中国人对世界的态度，可以从亡友哈罗德·李几句生动的活看得出来。李毕业于牛津大学，长期居住香港，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了解。1965年我曾经问过他，如果美国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会作出什么反应，他回答直率、干脆得很。“你要承认我们？”中国人有点怀疑，反过来问你：“你完全搞错了。问题就是一个，那是我们要不要承认你。”1954年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足以表明周恩来对有损国家荣誉的敏感。当时周代表中国，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美国。杜勒斯曾对一位记者说，只有出现一种情况，他们才会见面：“除非我们两人的汽车相撞！”一个偶然的会，他们两人上午到会场比较早，下期而遇。周伸出手来要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了出去，完全使中国外交部长难堪。六年过后，当周同他的朋友埃德加·基诺提起这件事时，还有温色。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杜勒斯故意得罪人是可以理解的。在朝鲜战争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中国的“志愿军”之手；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久要同我们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大陆中国和苏联一致敌视美国。无论如何，我知道这个事件如何深深地得罪了周恩来。因此，在我第一次到达北京，从飞机的扶梯走下来到最后一级时，我就特意伸出我的手，趋前走向他。我们两人的握手，给这次访问留下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幅照片。

另一方面，同中国人的交往中，我们感到他们自信心强，会把平日洞察一切的能力，转而针对内部，却并不因此有什么顾虑。在会谈中，周提到要了解 and 克服内部的缺点。第一次举行会谈时，他注意到双方代表团平均年龄悬殊。他说，“在我们领导层中，年岁大的人太多了，因此在这要点向你们学习。”还有类似的例子。访问的后期，有一天要到十三陵去游览，为了一件事情，他向我们道歉。一个低级官员找了一批儿童来，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并且教他们在客人来到时，如何装模作样表示欢迎。他说：“有人找来一些孩子们，把十三陵装扮起来，做出骗人的假象。你们的新闻记者指出

这个问题，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想掩盖这个错误，当然也已批评了犯错误的人了。”在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我不禁联想到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觉得中国人对事物的态度健康得多。赫鲁晓夫赤裸裸地吹牛皮，显然是对自卑感遮遮掩掩。周的巧妙自我批评，是成熟自信确凿无疑的证明。虽然如此，我认为那基本上仅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而事实上中国人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与哲学最终会取得优势，有朝一日他们在这方面会凌驾于我们和任何人之上的。

周恩来的智慧才能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而其实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品质与他作为政坛上一个说一不二演员的品质，是相辅相成的。新闻记者弗雷德·伍德礼说周恩来“是难以抗拒的……他说话有风趣，英俊潇洒，机智得体”。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编者）承认在周面前，他自己“几乎完全丧失了不予置信或追问质疑的判断力”。派驻日本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说：“我应该说，他是我见过的所有知名人士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

见过这位无情的政治人物，并不为他的外表所蒙蔽的人，则给周恩来画了一幅不同的图象。在50年代曾当过主管远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曾经对我说：“别看他风度翩翩，他杀过人，又若无其事地抽根香烟就走开了。”（40年代末，罗伯逊曾是三人军事小组美方代表。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与国务卿杜勒斯一鼻孔出气，顽固反华，信口雌黄。——编者）

一位美国官员曾在40年代同周打过交道。他说：“你把他的姓念成Joe，而我就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叫Joe的人。（美国通俗用语，指张三李四，不摆架子的人——编者）。我曾经想过，也许我们可以把他离间出来。突然之间，我明白我错了。他不认为星期一就是星期一，除非这样对他有利。”

一个国民党高级谈判代表有一次说：“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也许双方都应该作一些让步。过些日子，我开始将信将疑，这个人尽管诚挚待人，是不是被他的政治偏见完全蒙住了眼睛了。最后我发现，他一句真话也没有……但是我终于明白他完全是演戏。他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演员。他有时会笑，马上又会哭，同时会使观众跟着又哭又笑起来，但这完全是演戏啊！”

当然这两种形象是搀杂在一起的。周从来都是按照他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利益行事的。而他跻身于外交使节和新闻记者中间，施展那讨人喜欢的本领，又往往会促进这种利益。假如他认为为了这些利益，要把承担的义务甩得一干二净，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一刀两断。在同我们的交往中，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周都忠实地执行两国签订的协议。然而这并非单纯出于友谊。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建立友谊的。

前面提到的白修德，当年在延安结识了周恩来，岁月流逝，现在写回忆文章，认为以前绝对信任周是信任错了。他把两种形象放在一起写道，周是“这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杰出人物之一，英明得很，也无情得很，有猫捉耗子的敏捷机巧本事，是深思熟虑，有通盘行动计划，能下坚定决心的人——然而他又会对人热情、厚道、殷勤、周到”。

既有儒家君子的品德，又具备列宁主义革命家的无情政治本能。周的为人最适合他担任的那个政治角色。象几种金属融在一起的合金，熔化物比之

个别成分要强得多。共产主义制度对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有利，但往往使谋求折中者遭殃。周的政治天才在于他既能在内部进行斗争，又能搞调和折中的工作。他在这两方面同样得心应手。

周的官僚家庭背景，使他出身和同事们有所不同。周家的根是生在古老中国的风俗人情的土壤里的，几个世纪以来，周家子弟就是读经书，考科举，在朝廷谋一官半职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周青年时期就同中国社会的哲学基础背道而驰，但他从来没有抛弃身上的文化印记，也没有这种打算，对中国的过去，他保持一定程度的尊重。凡是旧社会值得保存的东西他不舍弃。

同大多数接受共产主义的中国人不一样，周一同志承认他从旧社会以及他家庭得到过教益，不能忘记过去。1941年国共谈判的一个间隙，周同一些人谈话，那次谈判是为了恢复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听众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他说，就个人而言，也是义无反顾要打败日本，以便回乡给母亲扫墓。说到这里时，他把声音放得很低，听众的感情和他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我之有今天以及如将来能有所作为，完全是受先母教育之恩，而母亲的坟墓却在沦陷的浙江（应为江苏——编者）。我多么想回去给她扫一次墓呀——这是把生命献给革命和祖国的不孝儿子对他妈妈能尽的起码责任。”

也是在抗日期间，周的父亲（他似乎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给他现在已名闻全国的儿子写信要钱用。周立即照办，拿出微薄的薪金一部分给父亲寄去。他父亲1942年去世，周在共产党机关报上登了个讣闻。这是按家庭传统而做的一件事，可能他的革命同僚中有人不以为然。

在1972年我们的历史性会见之前许多年，周有一次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是美国的过错。他说，我们欢迎美国人来中国，但必须在互惠的基础上，他补充了一句，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着重他说，“这是孔子说的，而孔夫子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一个中共领导人引孔子作根据，似乎不怎么协调，但是对周来说，这样做是完全合拍的。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

这些品德使周在政治圈里处理个人的关系得心应手，并且有助于他同众多的对手共处了整整半个世纪。据一度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说，周在党内斗争能屈能伸，屡落屡起，以及善于折中调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是个“圆通”的人。张说，“在这方面他待人接物八面玲珑，善于结交朋友，从不走极端，从来知道应当如何顺应当前的局势。”

周的儒家品德，为他赢得了中国人民持久的爱戴。他是唯一众望所归的人物，赢得了“我们敬爱的领导人”这个美称，在中国政坛，他的名望形成一支无法比拟的力量。这在他辞世时变得至为明显。在电视荧屏上，观众看新闻。节目中见到极左分子，毛的妻子江青在向周的遗体告别时不脱下帽子，有失礼仪，广州收看电视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大声呼喊，“揍她！揍她！”

在追悼会上，周选拔的副总理邓小平赞美已故总理的一生，用词充满感情，以致这篇悼词成为政治争端。极“左”分子写大字报，要求毛加以谴责，说“定的调子要推翻”。虽然毛当时政治上同情极“左”分子，据说他的批示是“反周，民必反。对周的悼词所定的调子不能改变。人民不支持翻这个案”。

作为一个列宁主义革命者，周得运用无情残酷的权力。多年以后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认为“他的双眼比以前冷酷得多，变得可以置人于死地”。中

国历史上的政治纷争和统治是血迹斑斑的，但共产党统治的暴虐却自成一统。毛、周以及他们的同志，对千百万同胞的死亡，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以上照译原文，不难看出作者的反共立场，希读者监察——编者）

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周对这种残暴无动于衷。马克思列宁主义取的是宿命观点，认为历史必然地导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加速历史的进程。由于采取了这个观点，他们把道德伦理的考虑放在一边，认为他们犯的罪行，是为了使历史前进。

然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时，问题就来了。既不考虑道德伦理，也没有折衷调和的余地。这就只能诉之暴力。发生了什么争论，不可能两方都是正确的，而那错了的一方就是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罪大恶极，往往招来杀身之祸。

周恩来在推行政策以及运筹帷幄时，喜欢灵活机智，避免使用残暴手段。作为政府总理，他推行范围广大的经济改革，其中有些是有利的，也有不少是有害的，不象他的政治对手那样他们要求过多的改革，又求之过急，往往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激进分子要求的是过几天就实现大同社会，周反对急于求成，要贯彻执行的是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

中国政坛力量分合不定，周在其中运用权力不形于色，很有成效。他从来不给人一个印象，他要拥有比现在更大的权力。假如一个强硬派形成一股联合力量，而又得到了毛的认可，周也会同对手合作，虽然他厌恶他们的新政策，他会不露声色等待时机。直至这个联合力量内部分化瓦解，他的支持变成了举足轻重之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会转而赞成主张比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

但是如果他人有意将党内斗争升级、推向暴力的较量，周也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美国和中国宣布恢复邦交后，不久发生的情况，就提供了一个可怕的事例。可以看得清楚，红军领导人林彪在组织力量，反对举行两国首脑会议。周和他的同盟者加以反击。林彪眼看大势已去，就登上一架飞机企图外逃。我们举行会谈时，周告诉我，林彪的飞机向苏联飞去，但中途失踪了，他补充了一句，说后来一直找不到这架失踪的飞机。之后，他就微笑了一下。

60年代和70年代的头几年文化革命时期，也许是周在总理岗位上，承受折磨考验最严峻的时期。

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毛担心全国革命意志和活力开始削弱了，同时青年人不肯吃苦了。他认为中国只有在激变动荡之中才能保存革命价值观。他号召青年人起来对现有的制度造反，他说，“我们闹革命时，只不过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小伙子，而当时的政治家……却是年岁大有经验有家伙，他们有的是学问，可是真理在我们手中。”

许多青年人愤世嫉俗，本来就对没有机会上学，对经济情况感到不满，于是热烈响应，砸烂捣毁学校和工厂数以百计。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叫做“革命总是吞噬自己的孩子们。”哲学家林语堂评论说：“在中国是孩子们把革命吞噬了。”

红卫兵从毛那里得到的模糊任务，就是搞乱政治秩序和政治机构。作为政府总理，周恩来坐镇在这个庞大机构的最高层。文化革命高潮时，约有50万红卫兵把人民大会堂包围得水泄不通，实际上把在那里办公的周恩来禁锢起来。他用历来的沉着态度，同红卫兵头头举行了接二连三马拉松式的会谈，长达三天两夜之久，让他们充分鸣放把话说个透，有气出个够。不久，这一大群红卫兵终于一哄而散了。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归来，他对我说，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这是毫不稀奇的。他是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为了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希望，在革命中出生入死；他又是推行循序渐进经济现代化计划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他一方面同情文化革命标榜的宗旨，另一方面又明白中国的经济必须现代化，才能在今后几十年里满足——那怕是最起码的——人民生活及国防的基本要求。

“是创业者，不是诗人。”埃德加·斯诺曾经这样形容过他。红卫兵怒气冲天要把他精心建造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毁之于一旦，他当然感到无比苦恼。

中国将缅怀周恩来这位杰出和事佬，是他把党和国家捏在一起免于分裂的，但世界各国将最怀念的是中国这位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杜勒斯（梅特涅是奥匈帝国的著名外交家——编者）。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确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的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能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在外交领域里，毛放手给周相当大的决定权。关于一些具体国际问题，1972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对我说：“这些问题不在这里谈，应该同总理讨论，我们只谈哲理方面的问题。”于是我们的谈话集中在双方首脑会谈日程要接触的一系列问题，但仅从哲理的角度提出来，最有趣的就是后来我同周的所有会谈，他常常引用毛的指示，作为他在谈判中所取立场的依据。

周在两个带有关键性的外交大事中成为中心人物。这两个事件比起任何其他事件更起作用，导致了当今世界的均衡局势；一个是中苏分裂；另一个是中美和解。中苏分裂的纠纷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主要问题：在共产主义集团中究竟谁来当“老大哥”？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强国，苏联自1917年以来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并且决心保持这个卓越地位，中国也许是第二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毛和周当然不甘居于老二地位。

这个论资排辈问题，无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存在。当苏联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共产主义国家时，其领导人就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外交路线行事，因为中国要依赖他们的核保护伞。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核武器的垄断地位进行不那么巧妙的恫吓。在共产主义世界，苏联将手中掌握的这把保护伞张开在同盟国头上，同时还挥舞着一把利剑。因此毫不奇怪，中国人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他们要求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苏联方面最初勉强答应，后来索性取消了。

在形式上，中国领导人认为除非同苏联平起平坐，否则就等于向蛮夷之邦屈膝投降。1957年在莫斯科一次会谈之后，周恩来对赫鲁晓夫表示很不满意。他建议赫鲁晓夫学一点中国话，这样就不至于每次会谈非用俄语进行不可。赫鲁晓夫求饶说：“可是中国话太难了。”周狠狠地回敬了他一句：“难也不比我学俄语更难一些！”

两国分歧的激烈程度在1961年苏共党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尽管克里姆林宫实行了新的路线，阿尔巴尼亚还是顽固地走斯大林的老路，于是赫鲁晓夫借机提出对阿尔巴尼亚的谴责。作为中共正式观察员列席苏共代表大会的周恩来，反对赫氏这种做法。可能他是这样忖度的：今天谴责独立思考的阿尔巴尼亚，明天也许就会谴责中国了。

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强行通过集体谴责斯大林主义的决议。周随即在斯大林墓前献上一个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对这类事情从来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他最后一着是操纵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把斯大林的遗骸撵出列宁陵墓，周则悻然退出大会。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从此就弥合不起来了。多少年以后，周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幽灵已经进驻了克里姆林宫了。”

由于中苏分裂，中国在60年代感到孤立和被敌对国家包围起来了。我在最后决定采取步骤同北京接近之前，曾经试图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周恩来的地位。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真正的或潜在的敌人。

往东北方向看，他看到的是日本。虽然就军事来说，日本对中国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但是它的经济力量有着可怕的潜力，有朝一日要进行军事威胁，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朝南方看，他看到的是印度。在一系列的边境冲突中，中国军队连连打败印度军队，他实在瞧不起这些印度人。可是他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了苏联的支持能形成很大的威胁。

向北方看，他看到的是苏联。它有足够的实力在30分钟之内把中国具体而微的核武装捣毁个精光，而且在最近十年内增力日了三倍武器力量，在中苏边界陈兵40多个全部现代化师，对中国虎视眈眈。

往太平洋对岸望去，他看到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是势不两立的敌人；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环顾整个亚洲邻国和太平洋，他认识到只有一个美国，无论现在或者将来，对中国没有什么野心。尤为重要的是，只有美国这个国家具有抗击北方死敌的力量。

因此之故，和解的东风具备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当中谁喜欢谁的思想意识，而是因为保持这个微妙的势均力敌的力量对双方的利益甚为重要。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当周恩来接到我们的信号要重新建立关系时，他就象毛泽东的一首词中写的“只争朝夕”地行动起来了。

维·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时代的强硬外交部长。他曾经提醒过一位美国谈判代表：“你们如果嫌同我们办交涉难，好啦，等你们同周恩来打交道，就知道滋味了！”在我们同中国人办交涉时，发现周恩来并不象莫洛托夫所描绘的那样，并不是一个寸步不让的谈判者。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的敌人。但是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中国人，他认为他需要我们。

我们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我们的共同利益占更大的分量，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提或少提差异，不去添油加醋。中国领导人要把同苏联分裂所带来的敌意包围的影响尽量缩小。我们相信必须尽快结束对中国政府的“恶狠狠的孤立状态”；我们也由此看到一个机会可以通过三角外交关系对苏联进行包围压制。虽然两国恢复关系存在共同的利益。我们不得不在公报里阐明我们这种关系，以及解决许多技术性问题。

在进行谈判时，我明知要求周突然放弃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办不到的，但是我又知道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正如他对基辛格讲过的：“舵手要顺手推舟。”

我们讨论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驻军问题时，我知道这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方面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军以及、废除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我指出，我们的政策尽管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有所抵触，但它是符合中国的民

族利益的。我提到苏联人时说：“美国可以从日本领海撤出，可是还会有人在那里浑水摸鱼的。”我补充了一句，日本要么同克里姆林宫搞个妥协相安的办法，要么就重新武装起来。

我知道周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也许同意我的分析，但作为一个注重意识形态的人，他不能明明白白这样说。他的反应很巧妙，也十分典型。他沉默了一会儿，继而不加评论地变换话题，但是会议室里谁也不会误会他的意思，沉默实际上是认许。

我同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超过 15 个小时，此外在一起吃午饭，赴晚宴，参加其他的社交活动，我们又一同度过许多时间。有四件事情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持久精力，他的充分准备，他的谈判技巧，他的压力之下的冷静自若。

他的精力真是惊人。我注意到，在我们举行有些时间较长的会议，几个钟头下来，加上翻译的沉闷嗡嗡之声，双方参加者中年岁较轻的人不免昏昏欲睡。而这位 73 岁高龄的周恩来自始至终还是一样的敏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机警。他从不离题东拉西扯，从不故意拖延时间，也从不要休息一下。要是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公报某处有争论的措词，他不把难题交给他的助手，而是自己亲自同基辛格夜以继日地商量研究，理顺有争议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又精神饱满地出现象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似的。他喜欢做牵涉到重大问题的繁重工作。权力和责任心使他永葆青春。

他事前做的准备工作极其充分，堪与我会见过的任何国家领导人相比。他事先研究好各种问题，只是在遇到高度技术性细节时，才请他的助手加以解释。

基辛格提醒我，说周的谈判本领会令我感到惊奇，他可真说对了。我们绝大部分的谈判既包括形式问题，也包括实质性问题。我同毛会见后，周同我坐下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提出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有意巧妙地试探我的决心，看看我到中国来访问是否放弃了我过去所持的强烈观点。

“象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今天我们握手了。”他说，“但是杜勒斯并不愿意这样做。”

“可是你说过，你不会同他握手呢。”我针锋相对地回敬了一句。

“那倒不一定，”周回答我，“我会的。”

“好吧，我们来握手。”我一面说一面把手伸过会议桌，我们再一次握起手来。

周好象兴犹未尽，继续谈下去：“杜勒斯的副手比德尔·史密斯先生倾向采取不同的做法，但他没有违反杜勒斯纪律，所以不得不用右手拿起一杯咖啡。既然握手不能用左手，他就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膊。”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又加上几句话。“但是在当时，我们不能责怪你们，因为那时国际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的，而西方国家集团同样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懂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我们从那个老框框摆脱出来了，”我同意这一点。“我们按照每个国家的行动，对他们作出相应的估计。而不是囫囵吞枣地把他们拴在一起，并且由于他们有同一想法，就说他们懵懵懂懂。我要老实地告诉总理，因为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任职，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从那时期以来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随之有所改变。”



周恩来是坚强的，抓住一事不轻易放下，但是解决我们之间不同意见时，又有伸缩灵活性。公报中关于台湾那部分，双方立场相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想也不能抛弃台湾，他不想也不能放弃他对台湾那毫不含糊的要求。他想利用我们的公报重申这个要求。我们终于达成一个折衷方案，不用刺激的字眼，各自声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主要功劳应归诸基辛格和周恩来。周从来都是从大处着眼，他明白同美国建立新关系，比之坚持讨论台湾这个问题更为重要。

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戏剧性行为大不相同，周从不提高嗓子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让步。1976年我对周恩来夫人说，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她丈夫从来是坚定不移的，但却又彬彬有礼，而当他“手上拿了好牌”时，说起话来更是温文尔雅。这归功于他的涵养和经历，但这是成熟的自信的反映。不象俄国领导人那么样，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在他的助手面前逞威风。

周讲话不象毛那么富有色彩，但是有时候又会采取生动、形象的形式来说明他的观点。当我们在北京乘车从机场开往宾馆时，他用简洁的话说，“你从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彼岸把手伸过来——25年断绝了来往啊。”

周是有才华的诗人，有时候会用一首诗来解释一个实质性问题。有一次他提到1972年美国大选，并表示希望我获胜，他引用毛“卜算子——咏梅”这首诗。他说，“在这首诗里，主席的寓意是倡议者不一定是伸手示意者。待到山花盛开时，这些花即将在丛中消失了。”周又说，“你就是那个倡议者，也许看不到倡议的成果，但当然我们欢迎你卷土重来。”

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中，周又一次借诗发挥。他说，“在你楼上餐厅里，有毛主席亲笔写的关于庐山的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你来中国是冒了一些风险的。”（此外稍略，因作者引用毛主席诗词有误——编者）……周的思想带有诗的情调，毛也一样，这点在伟大的领袖们身上是不足为奇的。政治这个东西，在表现最佳时，是诗多于文。

中国内战期间，由周恩来同蒋介石以及美国调停人举行多次谈判，这对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十分必要的。他取缓兵之计，替红军争取时间以便积聚力量，加上他采取策略，假装要妥协，使蒋介石的美国担保人动弹不得。

台湾一位国民党官员甚至说，“假如内战期间，我们这一边有个周恩来，情况会大不相同。也许是毛泽东被赶到台湾去，而我们却在北京呢。”不管他怎么言过其实，这位国民党官员的话颇言之成理。他说，毛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被估计过高了，他单枪匹马是征服和统治不了中国的。至于没有周他能否做到，这却是一个疑问。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就是毛泽东并没做到：是周恩来同毛泽东合作，这才赢得了中国。

毛是农民出身，为了反对地主和军阀的压迫，起来造反，而周则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反对不平等和外国侵略。这两人代表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层，在共产党革命中联合起来了。

虽然他们的合作关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开端平淡无奇。1931年周前往毛所在的江西省革命根据地时，是城市暴动的失败者，他到达江西之后，很快就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多少年后，毛说在那个时期他在党内“完全没有发言权”。国民党军队把红军赶出江西，又迫使他们进行长征，于是两人就

研究走什么迂回曲折的路程，以及采取什么战斗策略。万里长征途中，周用全力在政治上支持毛，并帮助他登上了共产党主席的地位。这种相互合作的形式，42年来世人都很熟悉了。

一旦掌握了政权，这种合作形式徘徊于对抗与互赖之间。毛认为社会充满矛盾，处在经济动荡变化之中，他把斗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周比较讲求实际，侧重于选择斗争的时机，以达到某些具体目的。他运用他那过人的行政才能以及看来是用之不竭的个人精力，来驾驭中国五千万人的官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好他们，以便毛能超然物外，对国家进行思想领导。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周“在毛面前，象个笨手笨脚的秘书在侍候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风流倜傥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但是在毛面前，他总是往后站，也许这有点故作姿态。他心里明白，对毛的宝座有什么打算，那是危险的。

这不等于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没有彼此之间的忠诚和感情。毛对下属没有公开夸奖的习惯，但有两年事情足以说明这两位领导人的友情。文化革命期间。有些红卫兵把周说成“资产阶级的总后合，耍反革命两面派，要批斗审判他。”据说，毛这样回答他们的要求：“可以。条件是我陪他受审。”9年之后，周已病入膏肓，毛本已多年不露面，却特往医院看望，同弥留之际的病人最后几个小时在一起。除医院大夫外，毛是最后同周讲话的人（写来似娓娓动听，但不知作者何所依据，姑按原文翻译——编者）。

20世纪中国这两位伟大领导人不寻常的合作关系，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时和中美和解成功之际达到了最高峰。

周陪我进入到到处放着许多书籍的毛的书房时，我想起几天以前离美来北京在白宫宴请马尔罗的情景[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是法国著名作家，著有《人的命运》一书，描述中国革命——编者]，马尔罗对我说：“你将同一位巨人打交道，但这巨人将不久于人世。”我同毛没进行谈判。他只是在打量我，我也在打量他。他想了解我对世界局势所持的观点，看是否同他的观点有合拍的地方。他了解，美国富裕了，人民是否变得吃不了苦，是否在越南所遇到的困难，削弱了我们的意志。

他身体虚弱，看来很明显。我进屋时，他的秘书必须搀扶他站起来。他说话不利索了，对我表示歉意。周说，是因为患过支气管炎，但我看实际上是中风的结果。他皮肤没有什么皱纹，但呈灰黄色，近乎苍白。脸部显得安详，但没有什么表情。双眼冷淡，但有时炯炯发光。双手似没有变老，不是坚硬，而是柔软的。可是高龄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方面原来限定这次会见在15分钟左右。毛对所谈的问题兴致勃勃，就延长到一个钟头。我注意毛开始显得累的时候，周更频繁地看手表。

他们两个人的差别令人瞩目。周的外表，说话的神气以及行动起来，都象个很修养、文质彬彬的外交家。毛则是粗壮的，朴实的、有吸引力。毛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就是到了暮年仍被人认作领袖。但周却是这个董事会的主要执行董事。

毛举止随便，说话爱简略，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他讲他的意见，心平气和，语调平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辩之材。

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他也喜欢语惊四座。“你们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他笑着说。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喜欢右派分子，”

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分子——共和党是站在右翼——说希恩首相也是右翼。”我加上戴高乐的名字，毛有点迟疑，说戴高乐另当别论。却又说，“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我比较喜欢右翼人士执掌政权。”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我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

他常常用贬低自己的办法，侧面说明一个观点。在我们见面之初，摄影记者在拍照，我们说说笑笑。基辛格说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规定学生阅读毛的著作。毛回答：“我那些文章没什么。我写的东西没什么教育意义。”我说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又改变了世界。毛回答：“我没能改变世界，我只不过在北京郊区改变了几个地方。”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去，毛的健康状况变得严重得多了。他讲话时，听起来象一连串单音节的哼哼唧唧的声音，但他的头脑还是清楚敏捷的。他听懂我的每句话，但对答时，话却吐不出来。要是他认为译员没听懂他的意思，他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想说的话。看他这个样子令人难过。不管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谁也不能否认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始至终是个在顽强战斗的人。

在越南忍受各种惨痛遭遇的年代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规避了自己的责任。毛问了我一个关键性问题：“和平是美国唯一目标吗？”我说，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我告诉毛，“必须是有正义的和平。”

我们同共产党中国人打交道时，必须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党人，深信应当为自己的利益和理想奋斗，乃至牺牲生命是在所不惜的。如果我们高谈阔论地回答毛的问题而只着重谈和平和友谊的必要，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甚至更糟的是，他们会把我们当作傻瓜。归根到底，他们会说，如果和平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肯投降就随时可以实现。总之，我们必须同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讲个清楚。我们也有愿为之奋斗的价值观。

毛的震颤性麻痹症日益恶化，使他的一切动作更加僵硬起来。他的一举一动本来不给人以优雅的感觉，到了82岁高龄，他那种农民的踉踉跄跄的走路步法，变成了蹒跚地拖着脚往前移动。象邱吉尔一样，到了耄耋之年，毛还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会见结束的时候，几个秘书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帮他陪我走到门口。电视照明灯光和录像机忙着记录下了我们最后一次握手时，他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同我告别。

“毛外表上痉挛性的举动是不会使人误解的。”罗斯·特里尔在他题为《毛》的传记里写道，“他内在的均衡——要是这东西存在的话——是来自对立面的冲突。他‘既是老虎又是猴子’，他这样剖析自己。他无情的一面和空想的一面交替出现。”不象周那样，毛没有把性格的多方面交织在一起，而是随兴之所至，自己被拉到不同的方向去。

作为政府各项政策的最后决定人，毛会心血来潮，感情用事。他深夜工作，第二天起来较晚。象斯大林一样，他不时在清晨不同的钟点召唤秘书、助手，询问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他从日常的工作脱身出来，长时间独自思考问题。他又会召集各项政策专家来问长问短，消磨好几个钟点，然后走到花园里征求警卫员对上面这些政策的意见。

马尔罗对我说过，在毛身上“有点巫师的味道”，是一个“理想附在他

身上，而且被这个理想迷住”的人。毛设想的中国社会，是类似大家庭这样一个组织，当有人通知他，他的长子已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时，他的反应是平静的。“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他说，“我的孩子牺牲了，这同别人的孩子牺牲是一样的。”但是倘若毛身上的那个猴子被这个理想迷住了，他身上的那个老虎就会在中国闹翻了天来实现这个理想的。毛要的是来自人民中间的自发行动，但是他只允许符合这个理想的自发行动。如果同他的意见相反，他会运用法律制约，或运用严酷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他的目标。终其一生，他似乎从来没有理解一个真理，即强制只能产生少数人掌权，只能压抑主动性，使自发行动化为乌有。

作为中国革命中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是通过远见卓识的战略，灵活机敏的策略以及残酷的暴力，在历史上留下他的足迹的。他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确定农民大众，而不是产业工人，作为革命的阶级。他修改了列宁主义，把士兵组成军队，而不是靠叛乱者结成密谋集团，来进行革命。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统治同秦始皇的血腥统治相比的人。秦始皇的专制，在历代帝王中，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你们以为只要说我们象秦始皇就可以侮辱我们了，但是你们搞错了，我们比秦始皇厉害百倍呢！”

光靠远见卓识以及强硬心肠，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还得要有能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坚强意志。就毛而论，他的魅力来自坚强的意志，我同他会见时，我总感到他的意志似乎是血肉之躯的特征，他最生动的诗词，是在长征路上以及其后的战役中写成的。当他歌颂战斗激情，特别是残酷的斗争时，他指的似乎是意志，正如别人指的体力。具备这个品质，他就能够激励同志们挑起象长征那样史诗般的重担，因为似乎有了这种品质，就使得他以及他的同志们所向无敌。

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讲时用手一挥，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他说，“我们共同的]391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隔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比你同他来往的历史，要长得多。”1953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清楚地表示，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也指中国大陆。

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这也许是巧合，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都是东方人。毛仅出国两次，1949年一次，另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晤的。蒋也仅仅离开过亚洲两次，1923年去过莫斯科一次，1943年作为四强之一到过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两人不时摆脱日常政务，长时间深居简出。毛利用这时间作诗；而蒋则在山间散步，吟诵古诗。两人都是革命的。毛反对父亲的专制和整个社会制度。蒋反对满清的腐败以及对外屈膝。顺便一提，他反叛的象征姿态——剪掉辫子——比毛早7年。

他们差异既有表面上的，也有深刻的地方，毛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象一大口袋上豆被人漫不经心地扔在那里，蒋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脊骨象是钢造的。毛潇洒自如，谈笑风生；我同蒋见面几次，从来没见过他有任何幽默感。毛的书法龙飞凤舞，字里行间，不拘一格；蒋的书法笔画端正，四四方方，格局分明。讲得深刻一点，他们把中国看成是神圣的，但表现有所不

同。两人都爱这国土，但毛要清理掉它的过去，而蒋则要在上面进行建设，取得胜利，毛简化了中国的繁体字，不仅仅是为了促进识字运动，而且是为了扫除每个繁复字体的历史涵义。蒋败走台湾时，在逃亡船上腾出空位，运走达 40 万件古董文物，却把差不多数目的对他忠心耿耿的助手和官兵遗留在大陆。

我同毛第一次见面时，他提到蒋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把共产党领导人叫做“匪帮”。我问他，你叫蒋什么呢？他大笑，周恩来接过去回答我“一般情况，我们叫他们蒋介石集团。在报章上。我们有时叫他匪；他也反唇相讥叫我们匪帮。总之，我们互相谩骂。”周同蒋的关系好比坐在游乐场的快速滑车上，惊险变化多。在 20 年代初，周曾在黄埔军校蒋手下工作过，据传蒋对人说过“周是个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几年之后，蒋悬赏八万银元通缉周。总之，我问过周和几个官员对蒋的看法，总的说来，我感到奇怪，他们对蒋持不同的见解。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憎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重他，甚至景仰他。在我同蒋的多次讨论中，他从没表示过相互尊敬之情。

我同蒋介石——20 世纪中国第三个伟大领袖——第一次会面是在 1953 年，在我当副总统时，以及在野期间，我同他保持接触，我一直珍视我们形成的私交。所以同北京恢复正常关系，是一件使我个人感到极为痛苦的经验。

蒋和他夫人经常在台北的华贵住宅里款待我。他夫人给我们当翻译，虽然她不时也参予讨论。有一位象蒋夫人那样在威尔斯利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担当翻译，实在太好了。她不但中英文流畅，而且透彻了解她丈夫的想法，所以当一种表达方式或一个名词，不能从一种语言恰当地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蒋夫人会插话，贴切地表达出来。

蒋夫人远远不只是她丈夫的翻译。社会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往往说领袖人物的夫人之所以引人注目，完全是婚姻带来的结果，认为她们在历史上或作为个人是无关重要的。这不只无视她们作为领袖夫人在幕后起的作用，而且这样说，是在践踏她们往往拥有的品质和性格。我认为蒋夫人的智慧、说服力、道义上的勇气，单凭这些就足够使她成为一个领导人物。

蒋夫人同毛的第四位夫人江青相比，比之蒋毛本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蒋夫人有教养，打扮入时，很有女性风度，但又是很坚强的人。江青粗野，毫无幽默感，完全没有女人特点，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狂热共产党妇女的样板。威特克·钱伯斯（已故《时代》周刊编辑，50 年代为尼克松主持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指控当时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查·黑斯勾结共产党出卖情报——编者）曾对我说过，“当你同一对共产党夫妇会见时，你会发现两人中，往往是那个妻子是个狂热分子。”就江青来说，情况就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加冷酷、更加俗气的人。她为我的访问安排了一个文化宣传的节目，我们坐在一起，她没有一点毛的温暖热情，也没有一点周的翩翩风度。她是如此之紧张，以致手上额上出现汗珠。她头一句带有意见的话，典型地表现她令人讨厌的挑衅态度。她问我：“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中国呢？”

周夫人邓颖超完全不同。1972 年我同她见过面。1976 年周去世不久，又见过一次，在许多方面她也表现了我在周恩来身上看到的落落大方和老诚练达的仪容。撇开她和周的关系不说，她本人曾经是，现在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党里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但是不同于毛夫人，她没有让共产主义思想抹煞掉她作为女人的风度。有趣的是终其一生，周只有一位夫人，而

毛有四个。

蒋夫人的家庭的悲惨结局，只需三言两语就能勾划出中国内战带来的分裂伤痕。以出版发行《圣经》致富的宋耀如有三个女儿——蔼龄、美龄和庆龄。蔼龄嫁给中国银行的总裁，中国陷落之后逃到美国。美龄嫁给蒋介石，同他一起与共产党作战，一起在台湾过流亡生活直到他去世，现在则在美国居住，庆龄嫁给中国革命运动的奠基人孙中山，在内战时期同共产党携手合作。在后来的风月中，她是受人尊敬的象征。1981年在北京去世时享国葬殊荣。

蒋向美龄求婚时，宋家反对，因为蒋不是基督徒。她家坚持，如果要娶美龄，蒋必须信教，成为一个基督徒。蒋不随便对待宗教问题，说如果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那么他就难以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答应完婚后一定专心致志研究《圣经》，宋家就同意了。三年之后，蒋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之后，夫妇两人每天早上总在一起祈祷一小时，蒋本性多疑又冷酷无情，但美龄完全赢得了他的欢心和信赖。对许多国家大事，他最能同美龄推心置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她作蒋的私人特使，多次访问了美国。她妩媚端庄，在国际上成为著名的人物，这样或式或少地冲淡了蒋那副冷酷的形象。

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色斗篷，头剃得光秃秃的，在私人场合，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在我说话时，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好，好”，显得有一点紧张。他双神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时闪出光芒，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前，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就盯着我的眼睛看。

在生活习惯方面，蒋毛两个是个鲜明的对照。蒋的一切井井有条——他的衣着、办公室、乃至住宅无不如此。他是个循规蹈矩、遵守纪律的人，无论那方面都是如此。用“干净整齐”和“井然有序”两个形容词，一点儿不过分。毛完全相反。他的书房到处堆放着书籍、文件、文稿，如果办公桌整洁是一个好行政官的标准，毛就不及格。蒋律己甚严，而毛不拘小节，蒋循规蹈矩，而毛则随随便便。用“不修边幅”和“杂乱无章”来形容毛的外表，似不夸张。

蒋是政治运动中稀有的典型——是守旧的变革者。美国革命终于建成一个有秩序自由的社会，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守旧的。他们为了曾经一度享有但后来被剥夺了自由而战。法国革命失败，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领导人追求实现一个纯属理性的和抽象的理想，而这在他们的民族历史上是没有基础的。

蒋的意图，类似美国人的意图，多于类似法国人的。他想恢复中国固有传统，反对旧社会的腐败。他反对到处有人抽鸦片以及还没绝迹的妇女缠足。但是他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尽管他推行立宪政治。他认为症结所在，不是由于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正如孙中山说过的，“中国是一盘散沙”，需要的是纪律。蒋寻求的是能解放中国人民积极性和生产技能的这种纪律。

他的思想在台湾贯彻，产生了经济奇迹。虽然一直到1965年为止，他得到了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数目很少，不足以说明台湾的经济飞跃。经济统计数字永远说明不了共产党取得胜利，意味着中国人民忍受了什么惨痛损失，但是统计数字能提供一些重要解释。共产党对农业生产实行了集体化。今天大陆的稻米生产每人平均少于革命之前。蒋收买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原来的地主就把大部分资金投资工业，台湾政府同时鼓励外国投资。今天台湾每人平均收入五倍于大陆的人。台湾 1800 万人口的出口产值总数超过大陆十亿人口约 50% 左右。蒋是一个行动家，在戎马倥偬的一生，所作决定往往是正确的，以致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他喜欢读儒家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说过“知而不行实为不知。”

甚至 1949 年的惨败，也没有动摇蒋对自己的自信。对他来说，那仅仅是一次挫折。我每次同他见面，他总提到要光复大陆。就是他一些同僚已放弃了这个念头，他从不灰心丧气。

他自己取名“介石”，是“搬不动的石头”的意思，就他的脾气而言，这个名字似乎很合适。我很钦佩他的决心。他从来不肯对“大势已去”低头，仅仅因为“大势似乎无法挽回”。常常有人会对一个公众人物说，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这些人缺少理想。他们往往认为事情办不到，就是因为前人没试图这样做过，蒋懂得这一点，他曾写道，“我从来就是被人包围，有时被敌人压倒过，但我懂得如何顽强坚持下去。”

尽管坚强不屈，蒋是有他的缺点的，但是象失掉中国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不是单独一个人的过错。蒋是精明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家，然而他僵硬地按“书本”行事，只成为一个平凡的战略家而已。在一定假设的战略情况下，蒋的头脑反应快捷，迅速采取决定性行动。有什么规章典范，他就按什么规章黄范行事，如果假设的情况稳定不变，没有几个人是他的敌手。离开这个范围，他就不那么行了。他不会抛弃旧的战略，想方设法制定一套崭新的战略方针。许多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对他们那个时代现成的一套进行过挑战。有些人的改革创新不适应时代要求，只能沦为历史过客，这种例子史不绝书。历史是由那些充分利用他们时代的机会进行创新的人特写成的，蒋的不幸，是因为毛泽东居于后者之列。

当年蒋的军队进行北伐，企图用军事来统一全国。那时中国有些地区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有些在军阀控制之下，有些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过程中，蒋逐渐把中国最强大的军队掌握在手里，没过几年他就成为统一中国的统治者。

但这种统一形式多于实际。蒋打败了同他竞争的对手，可是没有征服他们。他容许敌人遵循中国传统做法，屈从优势力量，换贴结盟，以便大家保存面子，也许这是他最大的错误。马基雅弗利[15 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及历史学家，主张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他著有《君主论》或译《权术》一书——编者]会警告蒋的，容许军阀继续握权，统率军队，蒋就永远不能确保龙争虎斗得来的胜利果实，因为矢志不渝的忠诚，是来自投靠他门下的人。

这里，马基雅弗利又是正确的。蒋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中国。他的部队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而被牵制住，假如他调动更多的队伍到某个地区去，另一个地区的军阀会乘机搞他们自己另一套，结果蒋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压制来自各方面的军阀挑战。这样一来，他永远不能复员一部分军队，给经济现代化和改革以足够的注意和物力支援。更糟的是，他不能布置全部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人。一言以蔽之，他的战略把面子挽回了，但他因而丧失了中国。

这个教训毛没有忽视，他步步为营地推进巩固他的胜利，在大陆每个地区，在社会每个阶层建立了共产党的控制。实际上，历史将会评价，这是毛泽东的最伟大成就。

周恩来的历史功绩，比较起来难于确定，他在内战期间对共产党取得胜

利。作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以后，几个副手争取毛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是其中之一。周想节制意识形态的僵化，采取实事求是的办法，实行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但是，由于毛心血来潮的政策，不符实际的前后摇摆，使周的工作不断受到牵制。此外，周几乎是单枪匹马在设法使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生活好一些，使大家多点自由讨论的空气，使中国社会能享有伯克所说的“并非金钱买来无拘束的生活”。可是他的努力又一次落空了。[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在下议院以雄辩口才著称于世。——编者]

周在外交领域，成绩斐然。由他掌舵的是一个潜在力量比实际力量大得多的国家，然而尽管如此，在国际活动中，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垂名青史。1976年周去世后不久，我会见了他的遗孀。我对她说，不需要建立一个纪念碑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因为历史学家将会肯定他为维护世界均衡局势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他的丰功伟绩的确证。后来我试图概括周恩来非凡的一生。我说：“你肉眼看不到的，往往远比你看得到的更加有意义。”

在我同周和毛几次谈话中，他们几乎是无可奈何地谈到有大量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而他们却没有多少时间去完成。两人不断地提到年龄问题，我感到他们知道来日不多了。

他们的苦恼也许是相同的，但两人的志趣与任务却不一样。

那最后的几年，也不是一样地度过的。据说，后来称作“四人帮”那个小集团，也许暗中得到毛的支持，要在周去世的前一年把他打倒。此时周已经意识到毛去世之后会发生权力斗争，于是不声不响地把拥护他的政策的干部尽量安置到关键部门。毛晚年政治倾向变幻无常，从这边摆到那边，令人难以捉摸，从而给中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有时他支持一个比较讲求实际的派别，过一阵他感到不耐烦，就同极左分子结合，搞个小型文化革命，之后又反其道而行之。

共产党中国这两位伟大领袖，在1976年9个月之内先后去世。到头来谁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周恩来的政策不因为他自己去世而没有贯彻执行，至于接过毛泽东权力的人，他们抛弃毛主义唯恐不及。

没有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会有那神话般吸引人的力量，不只吸引了众多狂热的追随者征服中国，而且鼓舞了世界上千百万人，可是，象大多数革命领袖一样，毛能破，不能立。

破，周也能。然而他具有革命领袖中稀有的才华，他不只在废墟上进行统治管理，还能保存过去历史的精华，为未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中国革命是否能幸存下去，以及结果利多弊少，那就得看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是否象周恩来一样，把中国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如果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能如此，21世纪的中国就用不着担心北方的苏联人，南方的印度人，东北方的日本人，甚至在中国以东的美国人了。中国有十亿世界上最有才能的人民，加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会发展为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美]理查德·尼克松



